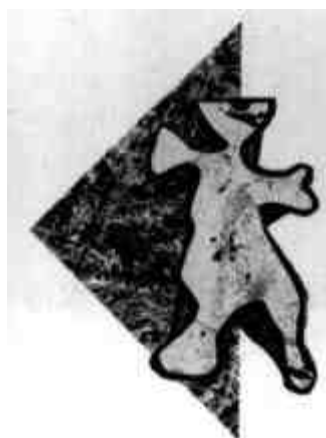


宿命的召唤

MAN AND PROSE

● 主 编 邵燕祥 林贤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1

9

9

8

邵燕祥 林贤治 主编

宿命的召唤

MAN AND PROSE

R 散文与人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宿命的召唤/邵燕祥,林贤治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
(散文与人 新一卷)
ISBN 7-108-01228-6

I. 宿… II. ①邵… ②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088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孙晓林
封面设计 裘大力
版式设计 傅克勤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6.20 元

世界需要正义的声音,于是有了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的炮声未绝,高尔基就在一片废墟、鲜血和混乱中,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系列时评,在被禁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以其人性的呼喊,让人惊惕。本辑发表柯罗连科致卢纳察尔斯基的六封信,贯注着同样的文化内容。可以证明,在俄罗斯知识界,高尔基的声音不是孤独的。对于德国纳粹罪恶的控诉,相对说来,我们有过较多一点的译品,但是,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威塞尔的文字,却未曾介绍过。威塞尔,著名的奥斯威辛的幸存者之一。令人感动的是,倾其一生,唯以苦难的记忆,顽强地对抗遗忘。

知识分子大抵是以写作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因此,书报杂志的出版、禁止和销毁,势必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筱敏的《书的灰烬》,即以激情的文字,描画了与此相关的重要环节。冉云飞描画的是另一些环节。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然而,都一样紧扣在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同一条链上。

目 录

1	书的灰烬	筱 敏
13	沙俄时代书刊检查中的告密(外一篇)	冉云飞
20	一部不该被遗忘的书	牛布衣
28	重读《1984》	乔 川
33	一次失去的会面	陈 实
40	世纪末蜘蛛之舞	林 宇
55	“少写”六记续篇	林 希
69	穿过西窗的南风	金字澄
74	插队素描(二篇)	詹志芳
81	跟随勇敢的心	周佩红
92	英雄在遥远中(外一篇)	何大草
103	豹子的美是难言的	洁 尘
109	魔鬼与天使	黄 何
113	守林人	一 平
119	看牙记	若 水
124	夜晚小径的十条道路(五篇)	朱 朱
128	1993年夏天的海滨(外一篇)	金海曙
132	午夜的颂诗(四章)	张 芸

136	关于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	牛 汉
140	秦汉之制与公社古丹	魏光奇
149	读“衰落”	墨哲兰
157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	林贤治

* * * * *

163	给卢纳察尔斯基的信(六封)	[俄]柯罗连科	余一中译
210	惶然录(节录)	[葡]费尔南多·佩索阿	韩少功译
219	威塞尔随笔(六篇)		陈东飏译
244	哈维尔散文选(三篇)	肖岩 黄灿然	崔卫平译
260	布拉格精神(三篇)	[捷]伊万·克里玛	崔卫平译
276	半先知与卖文人	[匈]杰瑞·格鲁沙	吴思译
280	龚古尔日记		罗新璋译
284	宿命的召唤	[美]尤金·麦锡文	程映虹译
292	作家论(二篇)	[英]福斯特	李向东译
301	编后		

书的灰烬

○ 筱 敏

1

文字得以记录下思想，记录下人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因其记录的丰富和庄严，需要装订成册而存留的时候，书就算是被生下来了。

人类尝试过的书写材料很多，比如古巴比伦人刻写楔形文字的粘土平板，中国人的甲骨、钟鼎与石鼓，及至后来出现过的铜片、玉版、羊皮等等。然而这些不能算是书。所以不能算，并非由于携带与装订之类的问题。我想，书是那样一种东西：张开是飘扬的，合拢是凝重的；质地是脆弱的，灵魂是坚执的。如同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星点痕迹的著书人一样，书的本身，必有一种天赋的悲剧气质。

由是我想，它只能是另外一些材料的集结：纸草，贝叶，竹简，绢帛……后来，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纸。

2

现在我知道，火是一种什么样的元素？

伏尔泰曾在他的实验室里反复试验火的重量，他的设想是：既然火是一种元素，它就该是有重量的，没有人可以掂量出火的重量，但他有理由期望通过燃烧物的重量推测出来。后来他放弃了他的设想，就他全部的试验结果，他写下的是：

“我亲爱的阿比，我们遇到的全是不确定性。”

因为火的不确定性，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显现了，何况寄居于不确定之舟上的，那些更为不确定的灵魂。

没有人测度过，农家灶膛里驯良的火，荒草坡上跳跃的火，还有火刑柱下暴戾的火，有着怎样不同的重量。但有什么必要测度呢？我们从自己胸襟的热度和肌体的灼痕已然明了一切了。

假如普罗米修斯的结局是被绑在火刑柱上，我不知道人们面对火焰是否颤抖，是否会泯灭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此我们遇到一个悖谬：火是自由的元素么？火是威权的象征么？火在一些时候照亮了什么，在另一些时候，却吞噬一切，而遇难的生物却不由自主地紧闭双眼。

过往的一切沉积在我们脚下。

当干燥的秋风把历史的余烬吹起，如浮土一样扑满我们周身，我的判别是不确定的。

然而，我所确知的是，余烬下而必定有佯死的火种，一经风的拨弄，便会在现时重燃起来。而那不确定的火焰，将迫使我们重新面对。

3

在火的面前，书是羸弱的。

火焰通天，而书们一律沉默着，如待毙的羔羊。此时天地之间充斥着的，唯有火的暴戾的呼啸声。

被投入火堆的卷册，几乎即刻之间就蜷缩起来，只抽搦了一下，便被火焰淹没了。有时在它蜷曲的瞬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里渗出几颗圆润的水珠，而这对于火海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蜷曲的躯体之上，火苗照样奔窜出来，有时是宝蓝的，有时是橘红的，有时是翠绿的。极其明艳的惨厉，其明艳

的程度，于人的视知觉是过分奢侈的。

焚书的火海，最有效地装饰了威权冠冕上的火焰。无论是神权，王权，征服者和专制者之权，都是需要妆以威慑的光焰的。那光焰需要臣服，需要仰望，需要一片颂扬之声。

于是，把书——那些异词、异见投入火海，就成了极权者登基的仪式了。王的冠冕金碧辉煌。

喽罗们热火朝天地向火海里投着，投着……这些书，这些该当灭绝的书经多少世代传存下来，它们真是多呵！竟能形成通天火海！谁能保证，这令沉默者惊恐的火海，就不对征服者造成另一种威慑？谁能保证，此时此刻，倚着权杖的那个躯体，不会暗暗颤抖呢？

4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段记录摘自鲁迅先生。

焚书者的理论总是简单明了的，斩钉截铁，不容抗辩，总是有一种神圣威严的王者气象，再加上一种维护神圣的信徒情味。

秦始皇的理论是：“别黑白而定一尊”。既然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统一了国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钱币、车轨和度量衡，那么，进而统一言论以至思想，在征服者和归顺者看来，就是天道之内的事情了。

罗马教廷的理论是：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讲信仰，培养道德。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非但理论简单明了，异端裁判所的审讯条例更是简单明了的：“……四，一切有利于被控告

人的证词都不能成立。任何从事有利被控告人的活动，都要予以最严厉的惩罚。……六，被告可以不经审判便予以处死；……七，被告认罪后，如又翻供否认，即不再审讯，予以火刑。……”

还有希特勒的理论：“今天的任务是造就一代新人。”“阻止一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到愚蠢和贫困的状况，这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这一堕落趋势必将在某一天结束。”希特勒的文化革命目的，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德国文化，重新塑造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为此，“清除有传染危险的霉菌”便是必不可少的了。纳粹宣传部长赞美说：犹太和知识分子的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灰烬中，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至高无上的理论，任何申辩的言辞都自然枯涸、粉碎。人是不可能对铁墙说话的，何况是金碧辉煌的铁墙呢？任何话语一经碰上铁墙，就会弹片一样反弹回来，堕入污泥，或击毙言说者自己。

于是诗人海涅写道：“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5

我们总记得在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有许多言说者被扔进了火堆，虽然我们说不出他们所有的名字，甚至说不出他们的确切人数。这些言说者的不幸是由于他们言说的是个人的思想，而非钦定的思想。事实上，人用不着多强的智力就可以明白，惟有浸染着个人的感怀，刊刻着个人的灵魂的思想，才与思想这一词汇的本义是相称的。思想者把思想写在脆弱的纸页上，也就是把个人脆弱的生命放置在风暴必

经的路途上了。

茨威格在其《异端的权利》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一次 16 世纪的火刑，被焚者是塞维特斯和他的著作、手稿，他的罪名是渎神。而在此之前，他的模拟像和他的被控为异端的著作《基督教的恢复》，已被当众焚烧过了。

“铁链挂在火刑柱上，并在柱子上和这不幸的可怜虫消瘦的身体上绕了四五周。刽子手的助手在铁链和身体之间塞进书和手稿，……最后，在受难者的额上戴上用硫黄浸透的树叶冠以表嘲弄。……”

“在火焰在塞维特斯周围升起时，他发出了如此可怕的喊声，……火焰立即盖住扭曲的身体。……之后火灭烟散，在灼热的余烬之上，贴近烧黑的火刑柱的地方，留下一堆乌黑的、令人厌恶的、烧焦了的东西，一堆使人恶心的、已全无人形的胶状物。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

如此恐怖的虐杀，竟然可以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那些标点着人类灵魂之光的思想者，竟然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又一次地被焚烧成乌黑的胶状物；这是人类的耻辱。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柱的凶手加尔文，曾几何时竟也是一名异端，一名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一名热情的宗教改革家，在他自己受迫害的日子里，曾经愤然谴责过火和剑的残忍，呼唤过每一个人阐述的权利。而当他终于拥有了权力之后，革命就经由他的手被控制住了。思想一旦附着于权杖，就丧失了使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的魂魄——独立和自由。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此时作为一个曾经有生命的思想者，已经死了。

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加尔文，以其严酷的意志建立他所需要的新秩序。他必须开始消灭异端了，尽管就宗教改革运动

的基本精神来说，“异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尽管加尔文自己曾经亲笔写下过：“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现在，他悄悄涂改了自己的著述。因为现在至高无上的是秩序，而不再是人道原则和思想自由了。他的理想如此崇高：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和罪恶的公社；从这里辐射对世界的拯救。

所有的罪恶都是在如此崇高的理由之下完成的，以致追随者、服从者、人民大众，竟不以罪恶为罪恶；以致人们竟可以如此冷漠地围观虐杀，而任由人类的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留下焚书的灰烬，自由思想者的惨叫，还有乌黑的、全无人形的胶状物……，如同耻辱的疤痕。

6

构成人类文明的无数珍藏，其实有许多是从火焰的跃动中来的。只需想像一下，火膛边上，一个肃静的人用膝头支撑双肘，抱住沉重的头颅，一动不动注视火苗的形象，我们就会明白，人类多少杰出的思想，正是火焰所催生的。但是，我们不能想像在焚书的火堆旁边，一个人可以支撑着头颅肃静地思想，那时候整个世界是狂躁的。一个狂躁的世界是群体至上的，它总是以猛烈的和更猛烈的运动，席卷或摧毁个人。

1933年4月，德国纳粹当局开始在报刊上公布德国和外国作家的禁书目录，宣传部的清单列出一百多名作家，一万二千余种书籍。马克思、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杰克·伦敦、纪德、左拉、弗洛伊德、普鲁斯特……简言之：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

者攻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5月10日，一场“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焚书运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希特勒青年团员、冲锋队员，举着火炬进发，纵队的首领是柏林大学的著名教授。这样一个队伍，唱着歌，点燃了广场上焚书的火海。柏林、波恩、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的夜空，被炙烤得通明。

大学生！大学教授！焚书！与冲锋队一同焚书！在今天，我们读到历史的如是记载，不禁为之愕然。

但细想一下，难道我们有资格愕然么？难道我们可以忘记我们自己曾怎样地被类似的狂躁席卷过么？举国上下万民欢腾的狂躁之夜，并不由于我们背过脸去，便会从一个民族的心灵中消失。

罪恶的发生常常让人感觉是一种恩典。焚书的同时，另一部分作家艺术家领受到的恩典同样令人们愕然。建造画室，赠送别墅，颁发奖金奖章，加封教授头衔，希特勒的国家财政预算中，为“繁荣艺术创作”的投入之高，是德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以致戈培尔先生实在有理由说：“今天的德国艺术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得多，无拘束得多。他们正在心情舒畅地为国为民工作着……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得到德国艺术创造者们的衷心的拥护，他们是我们的人，恰如我们是他们的人……”

艺术家们心甘情愿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受宠若惊地亲吻那金黄的轭。而人民大众呢？人民大众则在为德国的新艺术鼓掌。

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融入社会、融入人群的渴望，就像惧怕痛苦，惧怕责任一样，人多半是惧怕天赋自由权的。这种卑琐的惧怕招致“救世主”的一再降临。每当此时，宗教狂

热便卷地而起，千百万人翘首仰望，感激涕零。此时他们甘于服从听命，甘于自我牺牲，甘于被奴役被蹂躏。他们由衷地感叹救世主的高大，而忘记了这恰恰是由于自己一直跪着。

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怀着一种真正的幸福感，人们的脚步穿过德国艺术馆的广大空间”的同时，成百上千的作家艺术家遭到监视、陷害、逮捕、刑讯、公开或秘密处死，成千上万的文化珍藏被抛入火海。

7

更为可耻的是，今日已被冠名为本世纪“大师”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也站在狂躁的焚书行列里。

我不知道这位海德格尔，这位致力于说出存在的意义，使存在达到敞开、澄明、照亮，并且闪耀诗性光辉的大师海德格尔，置身罪恶的火海旁边，观赏着爱因斯坦们的著作痛苦地蜷缩、悲泣，而后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是如何赋予此在以诗性或美学精神的。关于这一点，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他的著作乐于阐述的问题是“人，诗意地安居”。而是否可以“安居”于火海？这不过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

纳粹党焚书的理由，是以人民和国家的名义。无论这个名义是由谁，又是怎样授权的，一个自由思想者，或说一个哲学家，站在这样的名义上，都是荒谬绝伦的。

思想者与世界的对话，只以他个人的名义，一旦假以别的什么名义，个人就消失了，思想者就消失了。正是借助那些非个人的名义，个人才有了推脱本应由他一力承担的责任、苦难、以及罪愆的借口。那些硕大的名义，常常不过是权力的代称，凭借它们，一种思想就被强加于一城一邦，成为思想的暴力和专制。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恶行。

半个世纪以后，论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有学者认为其内中隐含了一种权力主义的倾向，甚至认为其语言也受到纳粹语汇的影响，与那个极权时代的用语相呼应。这些或许可以长久地算作学者之中的未定之论。但另一个事实是，海德格尔始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他忠实地把党费一直交到柏林被攻克的那一天。忠实的党徒而“诗意地安居”——姑且不论是“党”的诗意还是个体生命的诗意——如果是可能的，那么，忠实的党徒而同时是一名自由思想者，却是不可想像的。

也许是有感于“在”的悖谬，海德格尔告诫日后他的传记作者说：有趣的是他的著作，而不是他的生平。

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大师和言说者，在说到“著作”一词时是怎样的动容。只是他必须忘记，另一些著作连同著作者的生平，是怎样被投入火海的。

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时代如何使思想衰败到最低点的过程，都负有责任。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在狂躁的时代里，都有义务摆脱集团思维的模式，回到纯粹的个人立场。

那一场焚书的烈火烧过之后，的确仍会有思想在极权的焦土之下生长，但那是别一种生长。犹太作家威塞尔的描述是准确的：

“而思想，无声又荒凉，在尸体间摸索着它们的道路，穿过泥沼与鲜血”……

8

焚书的火光我们是见过的，1966年。在闹市街头，在学校的操场，在作家学者蛰居的楼道深处，在平民百姓的炉膛里……

我们的手摩挲着书脊，书页。有一些书钉锈了，微微凸起锈黄的斑痕；有一些封面磨损，曾细心粘贴过的；那些被一双削瘦的手一页一页裁开的毛边纸，让你想像这双手举到口边呵气的夜晚；那些简陋的书签，折页，以及铅笔或钢笔留下的阅读痕迹；还有……那些曾在人的神经末梢擦过，在人的心脏一带穿过，并留下痛感的文字……它们对于火来说都是一样的。火苗从那里舔过，跃起，色彩炫目，然后是袅袅的清烟，什么内容也没有，消逝了，然后是灰烬。

焚书的火焰同样是热的，狂潮更是红色的。人们在火焰旁呼喊炽热的誓言——“扫荡一切封资修旧文化，开创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人们总是愿意相信，新世界必定要从火与血中诞生。于是为了寻求新世界，人们制造火与血。

自此，“火烧”就成了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象征了。

事实上，我们在这场“革命”中看到的焚书，大半是出于自觉的，固然这里有胆怯者的自觉，有无知者的自觉，有作恶者的自觉。还有一种自觉，我不知如何表述，比如一位大学者、诗人，竟在一个庄严的会议上如此宣告：“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样的自觉足以令世界愕然。毕竟，海德格尔焚烧的是他的前辈、同行、异己的思想者，而我们的学者和诗人，更进而要焚烧自己。

于是，几乎没有抗议的声音。即使许多年后，我们返回头去，在灰烬中和缝隙中寻找，我们仍是失望的。也有一些呻吟，但很快就自己抑制住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荡涤”和“火烧”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总是令人费解的。他们默默地在人群中间低头；默默地在墙角里烧自己架上的书，案头的手稿；默默地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种种与时代狂潮不甚合拍的主义；默默地发誓要忠诚，要认真

改造自己。

当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加入某种统一的思想，进而用言说去加固那思想的时候，所谓纯粹的个人立场，就成了万众唾弃的魔怪，所谓自由思想，更成了万恶之源。连被讨伐者本身，也加入了讨伐者的纵队，一个民族的理性就丧失殆尽了。通红的天空之下，触目都是火焰的舞蹈。有层出不穷的革命理论，然而，思想者缺席。

9

当罗马教廷焚烧异端的著作时，一名旁观者对拨弄火堆的修道士说：“若路德的书的灰烬吹入你眼中，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人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些灰烬，也是有生命力的。灰烬的记载比惯常的记载要强烈得多。

纸和印刷术堪称人类迄今最伟大的发明，它使思想飘扬，如风中的蒲公英籽实自由飘扬，使空气灵动，流布着生命胚芽的潮湿。

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为书发明一种抵御焚烧的办法，这不是书的悲哀；而是焚烧者的悲哀。从根本的意义来说，对于思想的播散，火的剿杀能力，是太虚弱了。

思想者在纸上留下思想的踪迹，如同蓟草在大地上留下生长的踪迹，这是生命自身的事实。因其无关乎荣辱，无关乎利害，所以不可能扼止。

站在大地上，吸纳土壤的气味，浸浴日月的馈赠，伸展自己思想的枝条，自由地伸展。这是人的权利，这是个体生命的尊严。

历史是被一次又一次焚烧过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也是一

次又一次被焚烧过的。火焰过后，仿佛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然而生命和思想的胚芽，却一次又一次从劫后的灰烬中萌生出来。

1996.12.17



沙俄时代 书刊检查中的告密

(外一篇)

书刊检查与书刊之被禁毁,有着深切的关联,其有案可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西方,大抵可以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前481—约前411年)被逐出雅典,其书《论诸神》及《论真理》被当众销毁,当被视作西方禁书史的发轫,同时也可看作是书籍(报刊)检查史的滥觞。翻检一些与书有关的词典,大多不载“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的条目,只是在《图书情报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里才有:“政府对书报内容实行审查的制度。凡对内容淫秽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不宜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生产、发行、流通或销售。一般采取的措施有禁止入关与邮寄及诉诸法律等。”多数时候,那些被禁毁的书刊作为葳蕤的文明之花,往往能够历劫火而不死地流传下来,除了证明禁毁者的短视与血腥外,还证明了思想是无法销毁的。

按上述“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容,历史上遭禁毁的部分书刊固然与淫秽以及与政治、宗教有关,但从事实上看,遭禁的多半与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有瓜葛,统治者一般并没有闲心雅量用法律来衡评该作品是否违法,只是书刊检查者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专制社会就更是如此。所谓的“诉诸法律”,只是书生们在专制社会里将一种依法而治的假相巧妙地妆点进辞典里罢了。在俄罗斯,书刊检查与禁毁至少从16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已着手对宗教方面的书刊进行例行的检查。1798年诗人、剧作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普尼斯特创

作了一部喜剧《毁诽》，后因一些大官僚在剧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控告作者的告密信纷纷来到保罗一世的案头，保罗处事草率，当即下令停止演出，查封已经印好的剧本，并立即把作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索科尔斯基《书的故事》P.159，书海出版社）沙皇统治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出版就要接受沙皇的亲自审查。当然，沙皇对于思想的钳制，不可能事必躬亲，谍报组织也预侦无力，所以便采纳了侍从官亚·本肯多夫关于《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这样，一个很能捕获猎物的鹰犬机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简称第三局就在十二月党人的无尽流故与鲜血白骨之上诞生了。第三局虽然人不多却势很众，在沙俄时代的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屡掀大浪，陷人于死地，诚如赫尔岑所说，它“置身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这样的机构一设置，文化悲苦的厄运就已然可知，他们通过宪兵团来实现其监视、刺探、侦察、搜查、拘捕、审讯、押解、流放等任务，因为第三局的局长历来兼任宪兵团的团统。比如他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采取了钉梢监视、收买女仆以告密、抄家拘捕、流放等方式直至其死去为止。第三局在收买告密人时，当然远不止收买思想家的女仆，如《北方蜜蜂》的发行人法·布尔加林就曾遵照本肯多夫的示意，以密信向第三局告发彼时的先进作家。告密组织所延揽的人才，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靡不网罗，因而街谈巷议、民间隐私也成了他们栽诬缉捕、深文周纳、陷入于不利的根据，在他们看来，捕风捉影正是其时。

与文化沾点边而与第三局合作甚洽的远不只法·布尔加林，诗人杰尔维格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儿童文学家、报刊工作者博里斯·费多罗夫：“博里斯·费多罗夫呀——/他的情诗太辛辣，/他的讽刺如蜜甜，/他的告密太肮脏……”费多罗夫在一则《公猫的寓言》里对赫尔

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正如前苏联藏书家尼古拉·斯米尔诺夫—索科尔斯基所说:“在第三厅(亦指第三局——引者),博里斯·费多罗夫被看作是自己人。”(《书的故事》P.349)第三局在书刊检查制度里既可以直接利用作家中的一些败类,对另外一些具有良知的作家进行大量的诽谤和密告,而且还采取派人打入这些作家所参加的组织内部——如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彼特拉舍夫斯基为首的、包括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在内而组成的“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小组”——的办法来达到逮捕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目的,其起因是因为《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里对“反语”一条的解释激怒沙皇尼古拉一世,“密探局派奸细安托内利打入小组,由于他的密告,使当局能够在1849年4月对小组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尼古拉一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我要让他们尝尝反话的滋味!’”(《书的故事》P.328)。自然,彼特拉舍夫斯基和其他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17个年头,最终惨死在那里。

一般读者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书刊检查里会频繁发生告密事件?对此其实不难回答。因为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在颁布俄国第一份审查条例时就明确地规定,凡是“反对正教和专制政体”的作品一律查禁。既是“专制政体”,那么必然与人类的进步愿望水火不容,因而凡是那些进步作品里都暗藏着对它的批判就是势所必然。专制社会既无言论亦无出版之自由,而它又不是法治社会,要翦除所谓的异己和违碍之言,一方面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到处捕风捉影,栽诬缉拿;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广泛号召人人告密的“群众路线”,发人隐私,互相攻讦,才可能尽快地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行一网打尽,铲草除根。即便偶有像亚·尼基坚科(俄

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这样稍微在法规容许范围里照顾作家利益的人,也会遭到《北方蜜蜂》发行人布尔加林的告发:“尼基坚科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成了布尔加林告密的对象,有一次布尔加林竟指控他是‘危及国家秩序的一枚地雷’。”(蒋路《俄国文史漫笔》P.210—211,东方出版社)如果有人称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是文化的敌人,恐怕也绝不是过激之辞。

自然,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不仅以告发文化人为能事,而且决不是绝无仅有,因为“当审查官是投身仕途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俄国文史漫笔》P.212)。因此像冈察洛夫、彼·维亚泽母斯基等人都或长或短地当过书刊新闻检查官,前者一向检查苛刻,比如1865年,他曾向内务部出版事业管理总局举报《俄国言论》第十一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皮萨列夫的《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并要求对其进行起诉,遭到尼基坚科的反对,出版总局亦未采纳其意见,可见同类相斗的惨烈残酷,以至于主子都不能接受;而后者由于审查手段之恶劣以及对进步文学的压制,被别林斯基蔑称为“贵族社会的公爵和文坛上的奴才”。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方面那些好发人阴私者,从中得到实惠,因而群起效尤,队伍庞大;另一方面,确是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或者干脆是领导带头告密,给属下作示范。正如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蒋路先生所说:“1865年的书刊审查制改革,是60年代诸多新政中最浮皮潦草的一项。内务大臣彼·瓦卢耶夫仍然用一个警官的眼光看待思想和出版问题,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实权人物维·富克斯则以进谗告密为能事,寥寥可数的改革成果不久便逐渐化为乌有。”(《俄国文史漫笔》P.214)

面对书刊检查苛刻以及各色人等的告密,别林斯基断言

道：“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靶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在专制社会里，文化的演进，倘要保持其生命力，都必须“不顾鞑靶式的审查制度”。再者，如果我们要对俄国文学及文化思想发展的难度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么，像藏书家索科尔斯基在《书的故事》里所提到的《俄国书刊检查历史资料》这样的书，应及早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并泽惠研究者。

1998年3月23—25日于成都

曼德尔施塔姆的 “告密者们”

近几年来，除了上班、读书和其它写作任务之外，我蜗居家中，每天均以“廿四史”作为日课。但我并不像有些自诩儒家文化将拯救世界的人那样做白日梦，相反，我的用心就是从中钩稽出同胞们何以喜欢打小报告（告密），以期撰写一部《中国告密史》。现今虽只读到《梁书》，然钩稽出的告密史料，却得十数万计，打小报告之风在吾国的兴盛，于斯可见。

就在我注意国人打小报告的同时，还从书中得知，彼邦他国亦不乏此类史实，且还有许多告密者系文化界巨擘，如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一位。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的排犹劣行，不仅加害于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而且还不饶过他的老师胡塞尔。《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一书里就曾揭露过，大学者韦伯的妻子曾给雅斯贝尔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康正果《哲人的是非与私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为人极不光彩的一面。可以说，告密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而作为前苏联“白银时代”杰出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堪称是被告密陷害

的典型代表。

曼德尔施塔姆对其生活的时代常怀激愤，与他交好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不无皮里阳秋地说，“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而曼德尔斯塔姆却直露得多，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猎的世纪”。其实，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真正的宿命，给他带来厄运的，并非仅因这些过火的、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辞，还有犹太人的共同灾难，以及他个性的多重矛盾——易怒与胆小、冲动与谨慎、敏感与率真甚至多疑等等。更为可怕的是，一个诗人命定追求自己独特的声音，而太独特的声音，响彻在一个只需要一种统一的声音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悲剧。所以布罗茨基说得对，在政治“收拾”曼德尔施塔姆之前，他“早就向自己的诗歌美学缴械投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对彼时的专制保持沉默，却无法让自己信奉的诗歌美学的方向改弦易辙，否则就将什么都不是了，如以长诗《春草园》歌颂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粉饰饥饿现实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即是如此。而曼德尔施塔姆正是秉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写了一首“我们活着，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的诗，来讽刺大清洗前夕的斯大林。他把这首诗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于是曼氏在坐过两次牢后，再度被捕。不过，特氏后来还是对粉饰饥饿现实的诗做了反省与忏悔，但在我们这里，除了《顾准日记》里对三年不太那么自然的灾害有过反思外，还没有看到“歌德派”诗人们的认真反思。如果说目下我们诗歌的处境较为尴尬，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斗胆地说，与诗人们都不善于或者不想（包括诗艺上的）深刻地反省有极大的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曼氏此次的流放地——引者注)的黑夜!”而他最后一次流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惨死在该地,实在与作家圈内的败类有很大的关系。天真的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斯氏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此人还将曼氏的言行向上秘密禀报)的评审意见,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曼氏的恶运就在劫难逃了。曼氏自然别无长策,只好写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在具有某种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里写道:“这些告密的星星有何用!/它们需打量一切,为了什么?”“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用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事实上,曼氏的诗简明其外,复查其内,用语艰辛,比喻奇绝,对过往文明的成果进行深度表达。他的悲剧,与其说是与专制制度对抗的必然结果,毋宁说“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难以被兼并”,其“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布罗茨基《文明之子》)。

“文明之子”就这样殒落了。尽管曼氏死于1938年12月(亦说11月)27日,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更加让人铭记的是,告密者巴甫科夫却于当天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1997年12月12—13日于成都

一部不该 被遗忘的书

○牛布衣

波兰、德国和国际共运的杰出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1871—1919）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曾同列宁在民主等问题上意见分歧，我在几年前就有所耳闻，但不知其详。她于1918年在狱中写的那部未完成的手稿——《论俄国革命》则仅仅在一年前才有幸读到。我之得以读到这部有争议的论著可以说完全出于偶然。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的《卢森堡文选》上册，我是1992年4月在东单书市以原价三折（0.62元）买得的，一个月以后，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以廉价买到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的《卢森堡文选》下册（原价7.30元，我以2元购得），而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一文就收在这本《卢森堡文选》的下册中。

这两册书的印数都不多，《卢森堡文选》上册印数为6300册；而下册则为800册。根据这两册书我均以极其低廉价格购得的情形看来，大概在初版以后并未加印过。这一情况不禁令我慨然兴叹，因为今天几乎是唾手可得，而且除了极少数理论研究者之外，一般人似乎漠然视之的这部《论俄国革命》在过去却属于被严密封锁的禁书之列，人们很难看到；即使侥幸看到，也仅仅是删节本，并非原稿全貌，而这一情况我也只是在最近才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的。

据负责编辑《卢森堡文选》的周懋庸同志在《不必再回避》一文（《读书》1993年第7期）中告诉我们，卢森堡于1918

年在狱中写的这部未完成手稿，其“本身的命运就够坎坷的。卢森堡 1919 年初牺牲，手稿下落不明。1921 年，德国共产党三月起义失败，有的领导人把失败归咎于卢森堡的思想。卢森堡的密友，也是德共领导人的列维，为澄清混乱，把手稿的不完全的抄本印成小册子出版。192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柏林发现了手稿原件，从此才有完整的版本。西方有关学科的学者一直很重视这部手稿，研究论著颇丰”。但“由于斯大林对卢森堡思想的否定，这部手稿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禁书’。直到 1970 年，当时的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卢森堡全集》时才第一次收入《论俄国革命》。据主编者之一安·拉西察回忆，能收入这部手稿也是经过一番争取的”。

下面，周懋庸同志谈到这部手稿在我国流传的经过：“《论俄国革命》1981 年才由殷叙彝首次译出，发表在当时尚是内部刊物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上。不久李宗禹撰文介绍这部文稿，由于要发表在公开刊物上，‘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便碰到了要不要删去的难题。编者最终忍疼将其删去，从此，在引用这段话时，中间的这句不让它出现竟成了定例。”

上面所说被删去的“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直到 1990 年 11 月《卢森堡文选》下册出版，中国读者才初次读到。这段话的全文是：“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这段话，据德文版编者注说，是“卢森堡写在稿纸左边的注，未说明插入何处”。

周懋庸同志在介绍了上述情况以后说：“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聪明多了，应当不必再回避这句话。”他说的当然是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于这句话何以在一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竟然遭到删节，封禁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人们从这一事实中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呢？

“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难道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反而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吗？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从争取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开始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生涯的。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他明确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①他在抨击书报检查机关压制言论自由造成的恶果时说：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②

恩格斯则直至晚年还在为言论自由而呼吁。他于1889年12月在写给格·特利尔的信中批评一些党派任意开除自己队伍中的反对派的做法时说：

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中文版，94、95页。

② 同上书，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1页。

恩格斯还于 1891 年为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严厉的检查制度写信给 A. 倍倍尔说：

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④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⑤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是主张和捍卫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因此，当卢森堡得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决定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时，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提出异议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她说：“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恰恰是完全不可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昭著、无可辩驳的事实。”^⑥

她在《论俄国革命》中还对托洛茨基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这一观点进行反驳。托洛茨基在《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一文中说：“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

④ 普特卡默是反动的普鲁士内务部长、在反对社会主义法生效时通缉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1973 年中文版，88 页。

⑥ 《卢森堡文选》下册，500 页。

—发展。”^⑦对此，卢森堡反驳说：

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⑧

卢森堡在她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还进一步指出取消民主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

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的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⑨

卢森堡在下面进一步尖锐地指出：

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这到再生的

^⑦ 转引自《卢森堡文选》下册，495页。

^⑧ 《卢森堡文选》下册，497页。

^⑨ 同上书，501、502页。

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⑩

卢森堡的结论是：

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⑪

德国 1918 年 11 月革命爆发，卢森堡出狱后立即投入斗争。1918 年底和 1919 年初，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等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彻底决裂，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919 年 1 月斗争失败，卢森堡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英勇牺牲。

⑩ 《卢森堡文选》下册，502—504 页。

⑪ 同上书，505 页。

对于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如本文前面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在原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内一直遭到封禁和否定的评价。例如原苏联 1974 年出版的《卢森堡传》（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是这样写的：“罗莎·卢森堡牺牲以后，她的手稿的抄本落在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成员保尔·列维手里，他被开除党籍后，在 1922 年发表了这个抄本，写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反苏序言，并保留了抄本中原来所有的错误和遗漏。从此就开始了无休止的盗用罗莎·卢森堡的名字，使反苏主义和反共主义神圣化的阴谋。当时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使用这种拙劣手段的目的。他写道：‘保尔·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点：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保尔·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面欢喜若狂，让他们去高兴吧。’”^②从此以后，卢森堡写的这部手稿就被错误地定调为“犯了错误的著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读过卢森堡这部著作，人们不能不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慧眼卓识和理论上的勇气感到吃惊和钦敬！事情正像周懋庸同志在《不必再回避》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论俄国革命》这部手稿经几十年的杀伐，愈见其非凡的预见性。苏东巨变后，各国学者尤其是身经巨变的学者越发

^② 《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253—254 页。引列宁文见《列宁选集》第 4 卷，600—601 页。

感到这部手稿的可贵。”^⑬据周懋庸同志告诉我们，他于1991年在东京出席卢森堡思想讨论会期间，前面提到的原民主德国学者安·拉西察曾在会上发言坦率承认在她过去的著作中，有些提法对卢森堡不够公正。她说：“沉痛的教训使我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她在会下还对周讲：“如果早日重视她的警告，也许会别有天地。”^⑭

为了接受必要的教训，卢森堡这部手稿确实值得人们给以足够的重视。而如果真的想要接受教训，那么，首先，“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句话不但在书中不该被删掉，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是真实的存在。那种给持不同意见的人动辄戴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投入监狱或封住嘴巴，剥夺其言论自由的做法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

1993年9月9日

⑬ 《读书》1993年第7期，148页。

⑭ 同上文。

重读《1984》

○ 乔 川

正好是在 1984 年，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政治幻想小说：英国作家奥维尔于 1948 年创作的《1984》。当时，这本书还是作为内部资料印行，与其它作品混订成薄薄的三册。1988 年 11 月 7 日，我又一次读这本书，那是在从成都讲学归来的路上，读的是正式出版发行的中译本。读完此书，我摇摇头，想驱走留下的可怕印象，列车正好进入了华夏文明最早繁荣昌盛的地方，窗外虽然夜黑如漆，但几天前从这条路上经过所见的情形还留在脑海里，给我印象尤其深的是一种荒凉——那种似与这块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的灿烂文明不相称的荒凉；那种与这一文明后来传播和扩展的地方——比方说秀丽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的荒凉。这块土地似乎已经把自己耗尽了，它曾经养育过多么悠久的文明，但现在似乎已经挤干了自己最后的乳汁。但我并没有深入其中，我对大地丰饶的生产力和人的坚韧的适应性可能还缺乏认识。我记得我也曾在来时久久地凝视着远处一些泛绿的黄土高墙，它们因其陡峭而像是山，而在达到某一高度之后又变得平缓而不像是山，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一种山，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我开始还以为它是人类所筑的堤坝，它们有多少千年这样默默无语地躺卧着？一个搞地质的同伴告诉我说，它们是通过某种必然的造山运动形成的，还是通过某种偶然的灾变矗立于此，至今还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谜。

我就陷在这样一种沉思默想中。提供以上这些遐想的材

料、契机和条件的，有我对我所目睹的情景和我以前走过的地方的回忆；有我所知道的历史、我能从旁人那里得知的科学知识；还有我目前在列车上的孤独和闲暇，我没有任何行动，这种思想的权利和快乐似乎是任何人也不可剥夺、也不能剥夺的。然而，当这一切思绪都在窗外的黑暗中渐渐隐去，在列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中，读《1984》留下的印象却又重新紧紧地抓住了我，于是有了下面的回忆与感想。

奥维尔的《1984》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1984》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

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控制者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

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控制思想的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成批、成批地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另外，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趋于复杂和微殊逆转为趋于简单，所谓《新话词典》的编纂者一语道破了其工作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

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它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象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玛”(charisma)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渲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

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奥维尔描述这一反面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警告，而警告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这和正面乌托邦不一样，古典的也是正面的乌托邦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对人类可能是有益的，但也可能是危险的。顺便说说，我并不认为这种反面乌托邦会完全成为现实，并不认为这种全面和深入的控制有可能实现，其理由和我认为那种充满美好幸福的正面乌托邦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它们都对人性做了错误的估计。反面乌托邦也还是一种乌托邦，我们不宜忘记：被压制者是人，压制者也是人；被监视者是人，监视者也是人。如何挑选并始终保证这些监视和控制者的纯洁和坚定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此外，全面的集体控制使每一次私人行为都成为一次政治反抗行为，这也是这一反面乌托邦难于实现的一个原因，因为，动辄得罪就会使罪不成为罪，动辄就构成反抗就会使反抗队伍无比的浩大和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控制又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我现在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令我感兴趣和惊异的是奥维尔在描绘思想控制方面所表现的天才直觉，他所提及的许多控制手段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哪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惟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16年，不是一段短时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又被遗忘了；老的一代消失，新一代诞生；科技的进步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结果连自然现象也在改变——我们头上天空的臭氧层穿了洞，全球性气温升

○ 陈 实

一次失去的会面

——新波逝世十六周年祭

高，隐藏着冰河时期再度来临的威胁。无中生有，有复归于无，似乎世上万物都离不开这个

规律，海也可枯，石也可烂，然而有些东西是永不改变也永不消失的，比如说，友情。奇怪的是，在我的印象中，“新波已经永远离开我们”这件事，却一年比一年淡化。老朋友偶然见面，仍会禁不住说新波如何如何，仿佛他不过在另一个城市或甚至另一条街。这样计算，从最初认识的那一年到现在，我们的交情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这篇文章就算是半世纪的回顾吧。

此刻我手上有一份文件的复印本，是1967—1969年新波在五七干校时所写的交代，我在这里抄下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时隔一个世代，相信已无保密价值，而且到了今天，新波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以及对革命的贡献已经无可置疑，而内容中提及我与他之外所有人的姓名都已略去，所以把它公开，应该也不牵涉道德问题。

……是在1945年1月在昆明英帝“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开始办公后认识的。她在那里的职务，我知道她是任日、英文翻译员，我与

其他译员、会计、出纳同在一个办公室……

从那时起，我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使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看待一切问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观念，更没有以无产阶级对敌对阶级的阶级警惕观念了，所以一直没有（按：此处有几个字不能辨认）是否为英帝作间谍和有其他反革命反动活动，只当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人物的玩物，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后来了解她爱好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而又从她平常的谈吐间，表露着搞艺术的人就是得专门搞艺术，不管其他，而以艺术从什么良心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社会的不平，崇拜贝多芬和罗曼·罗兰那时代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自由主义的精神，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个人、艺术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她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和艺术的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感情，这和我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感情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就在这基础上和她成了朋友。……

我为抄下这一长段噜苏的文字道歉，这样做有两种用意：第一因为它属于一个特殊时期的典型文体，即使是干校外面的人，用的也普遍是类似的文体，抄下来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见证；第二，只要删掉其中所有的定性形容词，新波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实话。但有一点必须说明：我并不属于资产阶级。我父亲早死，母亲虽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却非正室所生，况且“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自有记忆以来，小小年纪已懂得向亲友告贷的屈辱。好不容易念完中学，除了不能变卖的家具之外，可说已家徒四壁。这是新波不知道的。

回到正题。我与新波往来比较密切，是1945年秋至1947年秋之间，前后不过两年，但交情之深，都达到披肝沥胆的程度。“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就是这个时期先后成立的。1947年秋，我因病情恶化，医生主张易地疗养，因此离开了香港，次年回港即在一家周刊出版社工作，闲暇时间少了，有时“人间书屋”聚会，都是大伙儿在一起，直到1949年新波离港，很少两人单独见面。

1951年我回广州参加“人间书屋”聚会，是解放后第一次跟新波见面。参加的有十多人，大家嘻嘻哈哈的，意气风发，倒是新波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爱笑爱讲话，成熟了不少。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第二次见面是1961年，时间是9月或10月，新波跟蒙田兄一起到我在郊区租住养病的地方探望我，我们在沙滩的茶座坐了一会，我送了一件或两件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民间工艺品给新波，此外就没有什么印象，大约也没有怎样深谈。根据新波的交代文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蒙田兄也这样说，应该不会错，因为这以后一直到新波去世，我再没有回广州，而新波也没有再到香港——假如有，蒙田兄不会不知道。

可是，在我记忆中还有更清楚的第三次会面，年份说不清楚，只知道是个秋凉的日子，我记得自己穿一件长袖的夹旗袍，下班后从香港乘渡海轮到九龙蒙田兄的家去跟新波见面并且一起吃晚饭。我的印象是跟新波已经有几年未见面，觉得他身上米白色的外衣好像还是解放前在香港常穿的那一件，人显得胖了些也稳重了些。蒙田兄和他的夫人海涛大概各自在忙自己的事，不见露面。客厅里并排放着两张有扶手的藤椅，向着临街的一排窗。新波和我就坐在那里谈话，他在左，我在右。这次他说话比较多，讲无伤大雅的政治笑话，

讲文山会海的烦恼，讲行政工作和艺术创作的矛盾，等等。后来提到我的情况，他忽然靠过来就着我搁在椅子扶手上的左手按起脉来。我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意料不到的动作，感激他多年仍然记住我的病，而且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跟传统中国医术沾上边。到了晚上，他送我去乘公共汽车，路上行人稀少，有点凄凉的味道。车子开出之后，转弯时我看见他仍然站在那里。

蒙田兄说，那次晚饭是为了提早给新波饯行，时间在1948年夏秋之间。问题是，那一年我们还不时见面，有按脉问病的必要吗？可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1961年之后我们不可能有第三次会面。

1983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写过少年时在大英博物馆的一段奇遇：某个冬天的下午，博物馆一个管理员注意到戈尔丁对埃及展品的浓厚兴趣，问他愿不愿意帮忙处理一具木乃伊。戈尔丁马上答应了，跟他走到地质学室一个临时隔成的小房间里，除了放在临时架起的木板上的木乃伊之外，他看到房间里有许多绿色的文件柜，一排书架放满巨大卷册，书桌上摊开一本有彩色插图的古埃及《亡灵书》，有人在一个希腊小碟子里留下一根完整的香烟灰和一小片烧了一半的纸头，还有许多古代文物、一座破的石祭坛。木乃伊后而靠墙放着一个开了盖的石棺，里面绘了白色的神像，但头部在阴影里，看不清楚。他们首先解开木乃伊外层的布条，揭去大块的裹尸布，然后解开分别包住手指、脚趾、四肢和躯干的布条，捡起藏在布条底下各种形状的护符——上过蓝釉的小陶片。尸体在木板桌上翻动时会发出木头互相碰击的声音。最后，戈尔丁摸到尸体坚硬的骨头和已经革化的皮肤。之后，他飞奔回家，为家人详细叙述这次奇遇，并且写成作文。可是他念念不忘想看清楚石棺神像的面

孔，于是在白天再到博物馆去，回到地质学室的小房间。一切都改变了，里面只有一卷一卷的地图。他晚年回忆这件事，一切细节仍然清晰，但无法解释那个冬天下午自己身在何方，只好认为是骗自己的一个谎话，称之为“失去的周末”。

至于我的经历，最方便的解释是做了一场梦，但也或者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偶然受干扰而出现的错乱。谁知道呢，毕竟世上还有些奇怪的现象尚未找到科学的解释。梦也好幻象也好，我不会忘记这一次“会面”。虽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见面与否并不重要，但多见一次总比少见一次好。

我想用悼念新波的一首挽歌结束本文。那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几乎一口气写成的，当时只想到再没有机会去探望他的病而无穷悔恨，因为我当年住院时，他是我病房的常客，因此首先出现的就是医院的形象。现在读起来不免觉得肤浅，因为没有经过咀嚼、反刍、消化、酝酿，不可能表现出深度，但那感情是真的，就让它保留原来粗糙的面貌吧。

多么熟悉的颜色
多么冷的颜色
白的长廊白的床
白的墙壁围住
白的被单盖住
而白枕头上
是你的面颜

或者你像我一样
有时也揣测过
阴间的路有多长
有多黑有多窄

有什么诡异的眼
窥伺在闪烁的磷火间
有什么风景
出现在奈何桥的尽头
有什么旅舍
供新来的亡魂歇息

他日,当我走上
这没有回头的路
亲爱的朋友呵
可否请你提一盏白灯笼
在路口相候
伴我走最后一程
前往最后安息之所

也许你已忘却
太遥远的旧事
那么等一个月黑风高夜
让我们再度结伴
拾回往日的脚步
让我为你指点
山上那白色的大楼
是我住过的医院
在肺结核给看成瘟疫的年代
在刮风的日子,或者
下雨的日子,或者
酷热的夏天,或者
严寒的冬天

就在那里
你伴我呆望过
多少次日落
以温言笑语
教我忘记
死亡的恐怖

让我们回到那灰色的房子
第四层便是，昔日
你为我绘像的地方
有多少个小时
彼此默然相对
你凝望构思
你说我是雕像

让我们从半山走下
熟悉的斜坡
到路口小茶店的旧址
说不定空气中
尚有往日的笑声
在暗暗鼓荡

吾友吾友，你可知道
你可听见，如今
我最后一次与你道别
而这首歌
是我唯一的祭品

1996年3月，香港

世纪末蜘蛛之舞

胡宽是那只由卡夫卡《变形记》中溜到我们中间的甲虫吗？真实、荒诞的存在方式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血肉之躯充满艺术、诗与梦幻，有鹰隼、土拨鼠、蜘蛛的属性；却与沙丁鱼罐头式的从众世界格格不入。

我想准确地写出独一无二的诗人，却又力不从心；就像给他那揉和着散文、小说、戏剧、寓言、蒙太奇、歌谣、摇滚、绘画……等诸多元素的诗歌定位一样。他的身上兼有女性的风情、疯子的颠狂、醉鬼的迷幻和传教士的热忱与博爱；亦有道家的飘逸、天才的偏执、孩子的纯真善良和危重病者的恐惧与软弱……。

作为他的朋友与读者，我似乎无法如此近距离地写“他”。“他”猝然而去，令我感到房屋的一面骤然坍塌。我突然间面对着断垣之外的景物而无所适从。我仿佛只能用随想的文体，去描摹那个精灵与他的梦呓。

说他漂亮、可爱、些许软弱且才情卓绝，想来不会有错。在那张与卡夫卡相片颇为近似的脸上，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燃烧的眼睛。整个儿瘦削、匀称的身体，倒像似为这眼睛而虚设。

眼睛有时亦很黯淡而苍凉，蒙上一层倦意，此时多为他哮喘发作之时。高烧，缺氧，窒息，常常令其形容憔悴。但只要

静脉、咽喉注入的药物使他缓过气来，他便会快活地眨着眼睛说，“下一个节目擦皮鞋。”尔后呼朋引类烤肉摊上倾其所有，或钻进涮羊肉自助餐的小酒馆海吃痛饮；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起有益消化的体操。风情半老的老板娘，气鼓鼓只好将一盘盘珍藏起来的羊肉片给他端出。他会歉疚地握住女老板戴满戒指的手，用磁性、不安的声音说：“这是我吗？这是乔装的时髦货。匆匆忙忙咀嚼着自己的残汤剩羹。”女老板绝不会料到这个一脸病态、穿着旧风衣、手持喷雾器的“妖怪”，会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离开她的小酒馆，便写下了《谢谢各位》。

他像个大孩子，四十出头还赖在父母身边，独占一间小北屋，并为它写了《那是一间不透气的房子》。同为诗人的老父和晚年皈依基督的老母，亦未曾想到在他们那浪子的小屋里，还有“牝马伫立着/颤栗的景象慑人魂魄……”。

他一生的许多活剧都在这里演出。房间简朴，凌乱，窗帘布满了尘土。来去拨动，只能用那截弯曲的小棍。墙上挂着两幅油画；两用沙发上那只又脏又硬的枕头，亦给我颇深的印象。我们常常彻夜长谈，晚了便宿在他的小屋。昏睡之中，他会突然间中断鼾声，枕头下摸出喷雾器，对着喉咙扑扑几下，旋即又沉入梦魇。黑暗中那只紧攥手中的喷雾器，酷似孩童的难以舍弃的喷水枪。我曾问他，发作时何等痛楚？他摆出一副拳击架式，掌心的小瓶像似侠客手中的暗器，“老兄，揍你多狠都可以忍受，可是掐住你的喉咙，你想想绞索的魅力，哪怕它是丝绸的，尽管很温柔……”睡眼惺忪的脸上浮出苦笑。

屋子的墙角放着他的黑色旧书桌。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书籍、稿件、铅笔和小刀。他是罕见的用铅笔写作的诗人，似乎铅笔更谙诗情。用生锈的折叠小刀削铅笔，亦更易停泊于孩

子般纯真的幻想里。他边写边用橡皮涂抹，犹若是在画素描；这样，他才更加直接地品尝到那种运用笔触和抹掉错觉的快乐。

他热爱绘画，但飘荡、奔越的天性，却使他无法宁静地与石膏对话或为写生冻僵在雪地之中。他只好放弃了梵高再世的梦想。但对绘画，他拥有良好的悟性与鉴赏力。他能在写作之中自觉地运用现代的绘画技巧；作为读者，亦可在他的诗行里感受到扑朔迷离的画家目光。

书桌近旁，是那张黄色的人造革旧沙发；不少朋友曾深深地塌陷于此，一边下意识地抠着扶手上的破棉花，一边听他妙趣横生地讲故事。

他从小即是故事高手，像个身手不凡的窃贼；瞟一眼，便知晓何处窝藏着荒诞的笑料。无论那笑料隐藏得多么巧妙，鬼不知人不觉，便成了他的掌中之物。他热嘲冷讽，转瞬间把玩出妙不可言、意味深长的故事。他的故事每讲一遍都不一样。完全是即兴创作。他无法忍受重复。就像赛跑的人冲过终点之后，总要以慢跑调节心跳一样，如果说他的诗作都是以剧跳的心脏来完成的，那么讲故事，便是自然之中的悠闲徜徉。他那丰富的表情，悦耳、性感的嗓音，令其成为朋友圈里的大明星。我常戏谑地称他是红灯绿酒一奇侠。没有红灯，柜子里倒真的藏有一瓶“红方威士忌”。

他的小屋曾经是温暖的。诗歌、友谊，把个咫尺之地充塞得近乎爆炸。他真的不可一日无友。哪怕三更半夜，只要门铃揪响，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会向你扑来。瞥见防盗门里那张有点儿脏但却俊美的面容，那块鼻梁上的小伤痕，那双灼然逼人的眼睛以及灵巧地舔着嘴唇的舌尖，我仿佛见到了没有烦恼的“土拨鼠”。尽管他一肚子绝望，冬天将至，该“弯下腰系鞋带”了。

就连睡梦之中，他都在捕捉电话的铃声，生怕错过了朋友的呼唤。

1995年11月8日清晨，他的灵骨、遗像和正在凋零的花篮，出现在寒冷的月台上。上百位赶来接灵的朋友，佩戴白花肃立着，情不自禁地向他鞠躬。大家悲泣失声，看着酷似他少年时代的侄子和酷似他生前模样的哥哥，看着那红布包裹的小盒子，疑惑地问，他真的在里边吗？

胡宽的死给朋友留下一片真空。他的死使大家在一瞬间明白了《年轻人和葬仪在蓝天之下》的含义。

他们簇拥着他

.....

到

遥远的——或者——不远的

不知在哪儿的埋葬场去

.....

我呢——有时——完全

看不到小船

.....

大家陪伴着他走进黑黝黝的地道，像似陪伴他做那通过炼狱的演习。他还年轻，没有一点中年人的臃赘。或许了无羁束的独身生活才使他一直像个纯洁向上的青年男子。他丝豪没有油垢痕迹，全身心地洋溢着爵士乐般的特殊情调；他也有点儿像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时刻幻想着得到一颗凯悦酒店一般大小的爱情钻石。

有一次，听说联合国重新划分人类年龄，将 45 岁定为中青年。这一消息，竟令之欣喜异常。似乎这个来自美利坚的模糊福音，真的赐予他一笔青春。他兴冲冲洗了个桑拿浴，用哥哥送他的原装飞利浦剃须刀，把瘦瘦的脸膛刮得干干净净。眼睛亦充满了青春的光辉。他对着镜子说：“冒充一个 30 岁的人还过得去……”不久邂逅的一位女子，居然以为他是 27 岁。“不，”他郑重其事地说，“28 岁。”

他真正的 28 岁在想什么，写什么呢？《我们已不再幼稚——致二十八岁的一封公开信——理性的粉碎》。

翻开

生命的乱哄哄的抽屉

（几只隔年的老蝙蝠还赖在那儿

不愿轻易地离开黑暗）

.....

胸脯里存放的良心

只剩下几毫克

还准备发表一通

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

.....

真正的 28 岁还没有变形为那只奇异的先知——土拨鼠，还是一只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鸽子；而冒牌的 28 岁（其实已过不惑之年），鸽子已“银灿灿地点缀 / 饕餮者们的晚宴……”

一生耽于青春幻想的诗人从地道里走出来了，来到喧嚣的阳光下而，身后是一张张缄默的泪脸。他一生只有这一次给朋友带来悲伤，用他的永恒。人们远远地围观着。这是何等

人物？身后竟此般隆重。谁会相信，只是一个未被真正认识的写诗的人。

“诗？诗是什么？”

“是这古老而新鲜的一瞬吧……”

“还是不懂啊。”

“这么说吧。照片上那个嗅着花篮里腐败芳香的人贫病交集，为友情而去，却魂断异乡。”

“噢。但这不是诗，是悲剧吧。每天的电视里差不多都有。只是目的不太一样……”

死亡，尤其是诗人之死早已没有轰动效应了。诗人的同类在不断用死亡的腥味挑逗睡狮……

犹如伊吉利娅圣泉，胡宽，用他的欢愉洗涤着他人的创伤。有别的是，他不是汲水的圣女，而且不限于清晨。现在圣泉干枯了。于是雷霆也干枯了。

他的那间小屋已经改变模样。鸟儿经常落在窗台上瞅着那根弯曲的小木棍鸣啭。对面楼上那个从军队回来，长着一张瓜子脸的美妙而腼腆的姑娘可以在晾衣服时，瞟一眼窗子里的幻景了。往常，诗人犀利的目光总会令她羞赧。还有那个给诗人打了不少诗稿的像少年一样的打字员，再也不必为那稀里古怪的诗句而忙碌，花一倍的功夫挣一半的钱。他曾经的恋人，赶来时一切似乎都未发生。她要了一本诗集，一张小照片，还不知该放在哪里。泪水搞脏了黑眼圈，她哽咽着说：“当初我是真的想跟他的……”母亲也终于可以随时走进儿子的房间了。从前，当他的朋友散去时，他总是孤独地皱着眉头，一脸阴郁地在屋里焦急地踱来踱去；或斜依在两用沙发上。小屋似乎成了一片苦海。他对老母亲——这个日夜为儿子守望麦田的女人，暴躁地渲泻着心中的痛楚，嚷着：“想死！”

想死!”老母亲总是惊恐地回答:“儿子,我们同生共死。”那盆神奇的仙人掌还在妈妈的窗台上。它真的会在夜里为诗人的离去“流淌汨汨的热血……”?母亲的教友们会常常聚会在这一祈祷,不知基督的目光透过柜门的玻璃望着胡宽的幻影,会不会宽恕这个贫穷而巨富、焦躁又温柔的浪子?

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这间小屋里创作的,完成每篇力作都会患病一场。“用生命写作”这句箴言虽然锈迹斑斑,但我只能援引它来描述胡宽真实的写作状态。他至死都未学会玩儿艺术;尽管生活中他也能放浪形骸。

写作就是写作。他可以理喻一个妓女,劝其悠着点儿。但写作与世俗、功利、淫乱抑或名利双收,于他却是难解之谜。他有点像“保尔·艾吕雅,对于一切事物他并不总是聪明的,在一切事物上他并不都有见解”;他“并不谦逊,但亦不尚虚荣。他自己不想知道或是不想不知道他是个大诗人。他之所以成为大诗人,好像人的呼吸或血在血管中激荡一样自然。他是友善的、愉快的,惊讶而又十分敏感;但绝不任人摆



布”。不同的是，艾吕雅身边总有“机敏得像埃塞俄比亚猎犬、晶莹得像艾吕雅眼睛一样的奴雪艾吕雅”；而胡宽却是孑然一身。女人只能陪他走一段很短的路，旋即在他的梦境之中溜走。他太飘忽，像影子、风和云。女人最终要的是一块土地，而他永远是黑麦浪……

他能写出不可磨灭的诗篇，无疑受了艾略特、瓦雷里、金斯伯格等大师的感召。但他又视模仿为灭顶之灾。创作所仰仗的，是幽灵的神姿、巨人的基因、语言的秉赋，以及生命内核喷涌而出的原创与直觉的冰炭。这些，并非文学教授所能填塞或写作积累所能兑换的。

他置身斗室，身边几乎没有诗人朋友来共同维持创作氛围。诗坛日趋沉寂，却仍有新锐走向国际。奇怪的是胡宽闻所未闻。他“独自锻炼着奇异的剑术”；不断挥剑斩断陈规的根系和流行的缠蔓；在灵魂之光的辉耀下，为自己雕出一副不平常的面孔。污泥浊水中，胡宽清醒、自觉地守望着一块圣洁的精神空间，为人格、灵魂的最终升华，疏通了甬道。

胡宽犹若一只飞旋的蜘蛛，在万物的神经末梢上拉网结线；他的诗是野性蛮荒的，藉真情攀登文明的高峰；他的诗是残忍的，凭实感捕杀沉浮的美艳；他的诗是黑色的，用纯粹埋葬了靡丽的杂芜；他的诗是绝望的，极端的想像撬开了死灭的理念；他的诗构造崩溃，熔化的姿态重新聚合了万象的本真。

把诗写到这么一种大法之境，已全然无须仰仗什么现代诗的技巧——那一套套精良、先进、受过“新批评”之父检验的扳手，已无力装卸这只奇异的蜘蛛。从古典教义中脱胎换骨的现代诗游戏规则，随着风格的演化成熟，已跨过青春的门槛，萌发出几许腐味。食腐是秃鹫的行为艺术或鸦群对残

局的最后一次扫荡；与敲打语言胯骨、崇奉个性节拍、无所顾忌地行走在冰冷的艺术之路的诗人——胡宽，全然无缘无份。

胡宽也说：“悲剧不是别的，不过是吹捧的艺术而已……”因此，无论是胡宽拒绝了诗坛，还是诗坛拒绝了胡宽，我都感到一丝庆幸，因为独创诞生于拒绝之中。

冬天的胡宽，犹如一只名贵而失去照料的花猫，脏乎乎的口罩上琥珀色的眼珠闪烁着渴求。他眉头紧皱，头发蓬乱，艰难地喘嘘着。稍一松弛，他又向冬天示威式地挽起袖子，露出细长的像女人一样白净的胳膊。

口罩是他冬天的一个标志。他厌恶寒冷，惧怕寒冷。雨雪交加的寒流是他生命的杀手。每当寒冷降临，他总要患病几场甚或现出危相。但他从不气馁，总能化险为夷。打上一针氨茶碱，便又精神抖擞地回到家。一进门，第一句话总是问：“有电话没有？”他常常失望。老友已为稀客。他眼中的某些“神圣”，亦被人利用纷纷沦为欺骗的筹码。

苍白的太阳之舌舔吮着荒废的生命意象。胡宽像一只不甘冬眠的土拨鼠，躲藏在洞穴里，独自磨砺他的幻觉与诗情。

拉上窗帘，背倚着忽冷忽热的暖气，他在黑暗之中削铅笔。在金属、软木急促的撞击声里，奇思异想之门敞开了。他走进亲切、熟悉的魔域，又变成那只蜘蛛，呷一口威士忌，舒展开弯折的长足，酿好粘液，准备飞旋。

飞旋，使他暂时忘却困难的呼吸，僵冷的身体也逐渐地舒缓过来。飞旋，使他感到脖子上的绞索松弛了许多。他在飞旋之中成了快乐的蜘蛛王子，心中沉淀的阴影像霓裳一

样飘拂。

在寒冷、病痛的假面舞会上，他异常清醒地洞察生命。孤独而颤栗的景象，令人性在扭曲的狐步中一再地发生畸变。他咬紧嘴唇咆哮着，凝成一团沸腾的火。旋舞中他已不是什么诗人，而是爆发黑色悟性的火山抑或灵智灌顶的怪物。寒冷的恐惧中夹杂着对于寒冷的腼腆而风骚的期待。与寒冷搏击，他感受了生命的艰难；与寒冷交欢，诞生了勾魂的生命挽歌《雪花飘舞》、哀恸的爱情挽歌《黑屋》和睿智的梦想挽歌《受虐者》……他站在都市荒原的尽头，迎着寒冷的白夜，尽情尽性地弹奏一曲曲黑色的旋律。

他从未被名利火山溢出的硫磺气体熏得神志糜烂。他穷愁潦倒，像个落伍者，却并非造作地鄙夷星级饭店的艳慕者。他也没有被潮流的幻雨淋成水鸡，硬把自行车夹在出租车的后箱盖里，又心痛地瞅着计价器。

他桀骜不驯地站在荆冠、铁环、衣钵、时尚的彼岸，一边拉弓射箭，一边嚷嚷着我就是土拨鼠，是阉人、发烫的猪排、飘舞的雪花、受虐者、东方奇观、开山鼻祖，或是无法改变的、徒劳的 KUAN。

这场短暂的心路历程，真是一场徒劳的奔波吗？他也曾幻想过用诗作来与现实签约，收割一点人们的关爱。但他一走进那狂歌艳舞的剧场，未及就座，胸口就涌出一种厌恶。只好戴上廉价的、款式还不错的墨镜，穿着那件很能勾勒其特有灵性的蓝条纹旧西装，提上过时的黄尼龙公文包（里边永远装着诗歌、铅笔、小刀、橡皮和咖啡色塑料皮有点儿破烂的电话簿），蹬上与朋友交换的、尺码略大的澳大利亚旅游鞋，钻进那西去的“金属壳子/在山峦与河流，洞穴与洞穴之间滑动喘息/被黑夜咀嚼得支离破碎……”，体会“从未冷却过的

肆意弥漫的残留情欲”。

旅行，正是他逃避沉闷的杂耍。生活中他总是变幻着各种角色。登上列车，他就成为动物学家，在一排排陌生、可笑、卑俗的面孔中，他挥动网篮，捕捉斑斓的彩蝶。有的放进诗里，有的放在故事里，有的放进小说或寓言，也有的永远沉睡在心底。……

这次奔赴衢州的绝命之旅，是否亦有新的创意？……已永远不得而知。只记得他曾想写一篇有关他自己和朋友和情侣的长篇小说。他自信地说，不会比《挪威的森林》差。说起脑海里这部小说的幻影，他像似阳光波涛中睨见鲸影的猎手，举叉的手臂微微颤抖。——神秘的蛛网，永远游散在丛林中了——那中国的“挪威森林”。

他天然的是卡夫卡式种子生长的沃土。短促的一生就是一部长篇《变形记》。在代表作之一的《土拨鼠》中，他用辛辣之极的语言风格、连锁的想像和咄咄逼人的嘲讽，将对象描摹为人类之象征符号。作品涉及人类伟大而卑劣的行为、灿烂而阴暗的心理、机智又愚蠢的思想、壮丽而琐碎的生活、庄严又荒诞的追求、美妙而悲惨的处境、严密却背悖的逻辑以及庸碌而险恶的命运……它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寓言化史诗。

这样的诗歌才是现代意义的诗歌。才能逃过葬身于一次消费性文化垃圾的厄运。这样的诗歌才有可能比诗人活得更长，比时代活得更长。它已经没有什么优美、浪漫可言，已经没有什么慈悲、拯世可言，已经没有什么消遣、熨贴可言，已经没有什么朦胧、精致可言……甚至完全没有诗人的腔调、姿势、面孔可言。胡宽像一位胆大妄为的外科大夫，以“太阳漆得黑黝黝的戈壁滩”为手术室，对人性的脓疮做了一次次彻底的解剖。

胡宽不断地独自写着，写着；突然间竟发觉已入“绝境”。无处发表。无人阅读。连最好的诗友亦忙着鬻文为生；对他桌上的诗作信手翻翻，便“王顾左右而言他”。“诗人”好像成了“废物”的别名。画家可以卖画，标出令人咋舌的价码。雕塑家可以搜索公共场所的每一块空地。小说家摇身旋入影视圈，尾随大众化的视觉趋向，不伦不类地在不合时宜的处所，绣缀上潜在情结中的黑玫瑰、红玫瑰……

一切都匍匐在金币的齿轮之下，人们“眼睛在阳光中半闭着/双脚不管怎样也要行走/只要有点蝇头小利在勾引/人像草一样荏弱而贪婪……”。“发现需要并满足”——犹太人的敛财之道已为国人全盘地接受。大众娱乐的需要，享受挥霍的需要，满足世纪末情绪的需要乃至发思古之幽情的需要，一一为社会学家、商贾、文人、市民所发现所满足；而诗人却仅只发现了绝望。尽管1995年瑞典国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诗人，但对我国国民来说，那只是镶嵌于北半球的一个童话。

胡宽在1995年3月写下《同呼吸，共命运》。他第一次低下他高贵的头颅，悲哀地承认“在诸多方面、在生活的舞台上/我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蹩足的卖艺人/（通常采取逃逸的策略）/例如摆弄植物、培育情感、弥补灵魂缺陷等/干起来也常常劳而无功/并很难掩饰自己的真实面孔……”。胡宽通过心中那只“振翅欲飞的孔雀”与现实对话失败了。而且无路可逃，只有放弃了用诗歌获取光荣与梦想的奢望。他沮丧地窝在破沙发里，真的成了局外人。他读着灿烂、缥缈的文字，吃着地摊上不洁的食品，穿着泊来的旧西装，听着同病相怜的邓丽君（用那台经常卡带的旧录音机），写的则是一个幽灵的梦呓。“沦落”、“潦倒”、“落魄”……之类病菌般的语汇，鬼鬼祟祟地爬上了天之骄子的身上，啮咬着他的自尊心。

再向人介绍他是诗人时，他的眼中已没有光辉，仿佛只是他的一个绰号。他有点儿像个中年人了。低头沉思的时候，有了双下巴。飞利浦剃须刀许久不用。威士忌早已瓶底朝天躺在桌下，和一双旧皮鞋、一团揉皱的稿纸、一个小铅笔头扔在一起。

1995年4月他写下《留给3月28日的箴言》，再次流露出哀伤的绝望心情。我们可爱的蜘蛛先生没有飞旋，而是在宁静地爬行。

“那时/我像蝌蚪一样年轻/鸟儿般的自由/想像/天堂的模式和/营造天堂/尽心竭力地贡献/年华青春/使其日臻完善……/但因此也错过很多幸福和机会/时至今日/仍留下一堆庞杂的事务/堆积着/我已衰弱凋零/形同废人/慢慢地咀嚼/懊悔……”，但是“刹那间/他胸中充溢着/异常优美的/希冀/可以重新开始吗？是的……”

他不甘沉沦，又生出类似橡树对太阳的欲望。

他还要写。只是，写诗已转换为一种纯粹的隐私行为。像似在与情妇秘密交欢。他不再奢望一场公开的婚礼，盛大而喧哗。他把欲望——有关诗和世俗之间的暧昧关系——青春的废墟——浑噩之中的期待、妄想与冲动、生命的葬送过程，统统清扫了一下，全部撕碎了，从小屋、火车、急诊室的窗口，从心灵的窗口抛洒出去，变成“花的精灵/浪的眼珠/千万簇神焰/亿万颗鬼火/翻腾燃烧/在辽阔的海空中化为灰烬”。

1995年6月写下的短诗《旅途中的妙曼境遇》，梳理了对于旅行的回味。9月，我们同行飞抵南海，他快乐而忧郁；为和大海短暂的会晤，也为大风降温的栖息地。回到家病倒了。抱病挥就七百行《受虐者》。三上宝鸡，安排好急赴衢州的绝命之旅。而他并不知晓，此番终点的门外，便是那万丈

悬崖。

行前，我们还在一家小酒馆喝酒。小酒馆窗外异常喧闹的布匹市场刚刚停歇，浙江的布贩们正将五颜六色的布匹从竹杆上卸下来。沿街摊面上花花绿绿的毛线，亦纷纷塞进了纸箱。越剧中婢女一般妩媚的摊娘们，正在忙着数点钞票。她们何曾想到，她们身后橱窗里的诗人，明晨即要启程，去往她们的故乡……

喝酒，畅谈，他情不自禁地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挽起了衣袖。难道，他已看见了死神的影子而准备决斗？他深情地回顾友谊。我想笑他，怎么像个儿女情长的女孩子？

夜晚在楼梯口分手。他的手冷冷的，干干的。那种触觉永世难忘。灯光之下，他显得十分悒郁。被什么诱惑着想早点儿走，又眷恋着什么迟迟不走。终于挥手而别！望着下楼时那微微驼背的身影，我的心中骤然涌出一阵酸楚。不曾料到，这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场的诀别带来的滋味。

三天以后等来他的电话，竟是噩耗。

“斯丹达尔曾把小说比作大路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过往的车马人群；雨果曾把戏剧比作一面浓缩的镜子，化微光为光明，化光明为火焰。”胡宽的诗胡宽的死，是否亦可喻为一面镜子？遗憾的是镜中映出的，乃时代人文精神的瘫痪。他的死又像似一次谢幕。当人们涌出剧场，回到各自的车厢，有人会在霓虹灯里重新打量自己。用胡宽那猫一样琥珀色的眼睛。他的死还像一次日食，使人们终于有可能观测到几乎和太阳同一方向的恒星的光线；而当它与太阳摩肩而过时，却为强大的时空曲率所弯折……

他的死更像他的——《雪花飘舞》：

浩劫之后，

纤小卑微的你却生活的恬淡、
处子般的宁馨，
脚步踉跄，但朝气蓬勃。
嘴角竟露出一丝温煦的
笑靥。

雪花飘舞

.....

掩埋了一切光荣、理想和罪恶。
飘舞的雪花
落在了生与死的界碑上，
落在了一切应该落和不应该落的地方。

1995 年末于西安



“少写”六记续篇

○ 林 希

遇救记恩

大跃进年代，“江河大地重安排”，全国上下，大江南北，一片改天换地的革命热潮，那真是令人兴奋得激动不已了。如果说当时的彭老总已经发现了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农场里的学员们来说，却根本就没有想过领袖的指示还会有什么偏差。后来说的那种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1958年的当时，人们还没有想过；对于1958年的人们来说，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非常理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那是世界革命的最高体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在总路线的指引下，高举三面红旗，参加大跃进，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幸福，自己要在火热的年代里改造思想，更是每一个学员的最大愿望。

终于有一天，农场下达了参加大跃进的命令。当然，农场下命令总是按照农场的固定方式，那就是前一天让学员们早早地睡觉，第二天一早，全体集合；这时再由场长下达命令。下早了，怕你策划对策，对付阶级敌人就要有对付阶级敌人的办法。

最先得到的通知说，免去今天晚上的读报学习，这时大家就猜出明天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虽然谁也想不出会是什么活动，但人们也都知道不外就是苦战呀什么的，也就……

是加大劳动量罢了。养精蓄锐么，早一点睡觉，明天好大干一场。

果然，一觉还没有睡醒，一阵急促的敲打铁道的声音就把人们唤醒了，大家匆匆地穿衣下地，看一看表，才只是黎明三点。

这时刚刚是早春的时候，天气还没有转暖，披上棉衣站到院里集合的时候，一阵寒风袭来，冷得人们一阵一阵地打寒战。队伍刚刚站好，黑暗中，就听见农场场长开始讲话了，他大声地喊着说：“现在宣布农场命令，全体学员开赴挖河工地，并宣布如下纪律：一，到达挖河工地后，任何人不得离开工地，更不得自由走动，由于此次挖河工程是一次全市性的行动，所以一切农场学员在工地上一律不准和市民接触，遇到亲朋不得讲话。第二，在挖河工地不得购买市区供应群众的任何商品，一切学员用品，一律由农场统一购买。第三，凡农场内的一切纪律，在到达挖河工地后，一律有效，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场长宣布完纪律之后，浩浩荡荡的挖河大军就出发了，从黎明三点出发，整整走了一天的路程，直到晚上九点，才走到了目的地，中间在路上吃了一些干粮，也就是饼子之类的东西吧，还在路边的河里喝了不少的水，也就走到地方了。是什么地方，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估计不会出河北省吧，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路程呢？一百里吧，也就是这样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吃了一餐饱饭，然后班长传达农场命令，立即备战。所谓备战，也就是每人发一把铁锹，这里面有撅锹，也有平锹。班长说，地质很硬，下面还有芦苇，谁不好好把铁锹磨好，干活的时候，谁就要自己多出力。其实这事是不用班长多说的，凡是干过重活的人，全都知道不先把工具准备好，那是要自己吃亏的。

和大家一样，不多的时间，我就把一把撅锨磨得和刀子一样快，在地上试了试，果然好使，这时我才在指定我睡觉的地方，躺了下来。

天亮之后，我最早起来，站到住地的高处向远处一看，只见不远处有临时搭起的工棚，人出人进地全是城区的群众，也就是农场说不许我们接触的革命群众。和外界疏远的过于久了，虽然不许接触吧，但是看着有这么多的人就在自己的附近，心里也感到一点温暖。

干过农活的同志们全都知道，挖河是一桩最重的劳动，虽然这时我已经干了好几年农活了，可是对于挖河还是看着就发怵。但是没有办法，改造么，哪里会是一件轻松的事呢？再累也是要拚命干的呀。到了工地，班长又传达了命令，每两个人结成一对把子，一把平锨，一把撅锨，一对把子一天的进度是五米，质量要求还是老标准：三、二、一。这个三、二、一，是一个挖河的专业术语，这就是说，这条河的上口是两米，底口是一米，而河的深度则是三米了，这样的河道，每一对把子每天的定额是五米，应该说是大劳动量了。

和我结把子的人，是一个姓窦的右派分子，我们两个人平时在农场里也说得来，干活的时候谁也不会偷懒，这样也好配把子，两个人谁也不会“玩”谁。只是这次挖河实在是太苦了，不光是地表面硬得似铁板一般，一把撅锨插下去，只听见“当”地一声，撅锨就被硬硬的地面弹了回来，再插一下，才插下去半个锨头，还要把手腕震得生疼。好不容易把表面上的一层硬地面挖开了，再下第二锨，就遇到了芦苇根，这芦苇根可是比硬地面还要难对付，尽管我早把撅锨磨得和刀子一样快，可是，一遇到芦苇根，撅锨就再也插不下去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往下铲，到了下午，我们两个人也才挖了不到一米。这可实在是太可怕了。知道农场对于完不成劳动定额的

人是使用什么办法的吗？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就是干不完定额，不许收工，就是干到夜半，你也要把定额干完，而且第二天还要和大家一起出工。

好不容易，我们两个人总算把第一天的定额对付完了，晚上收工的时候，累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回住处的，第二天早晨在我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昨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我连鞋子都没有脱。

挖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实在是累得没有一点力气了，早晨和窦姓右派分子一起上工，在路上我就对老窦说：“今天我怕是不行了。”老窦当然还是鼓励我，对我说千万不要气馁，一定要鼓足劲，精神上要有勇气，否则就更支持不住了。就这样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上工了，但是挖到十点钟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随之，我就失去了知觉。

事后有人告诉我说，这时我喊叫了一声，那喊声就像是狼嚎一样，凄厉而又绝望，听到这声喊叫的人全都停下了工作。这时，当人们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看见我软软地倒在了河道里，河道里才涌出来的浑水，一下子就把我淹没了。

但是，农场里有个规定，凡是学员，无论谁在劳动时出了意外，任何人都不可自行帮助，一定要先报告“政府”，由“政府”决定如何办，再听从“政府”的吩咐去做。大家看着我倒在河道里，自然谁也不敢过来，倒是老窦喊了一声：“死人啦！”然后他在我的身边蹲了下来。也是老窦这人太义气，他也没有向“政府”报告，就自做主张地把我从河道里拉了出来，据老窦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自己不知道时间是如何过去的，也不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后来大家向我述说当时的情景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如何得救的。

据有人后来对我说，在得知有人死在河道里之后，“政

府”的人来了，这个“政府”看了看我，只说了一句：“是他？”就走了，也没有交代应该如何办。倒是那位窦姓的右派分子，他不顾一切地把我背在背上，走出好远，这才把我放在了一处没有泥巴的地方，然后就用尽一切办法给我做人工呼吸。

就在窦姓右派分子给我做人工呼吸的时候，那位“政府”又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背着一个挎包，看得出来，是一个在工地上服务的什么专业人员，这位人士把我在地上翻过了身来，又给我注射了一针，不多时，我就舒缓过来了。

实实在在，我真体会到了人死的滋味，那实在是太舒服了，就和飘起来一样，一点痛苦也没有了，打一个比方吧，那就和后来咱们大家住宾馆从浴缸里站出来的时候一样，那种全身通泰的感觉，就和成仙一个滋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了。只是在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尽管我心里已经有了感知，但是行动还是不能自如，我想说话，但是找不到嘴，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发出声音，我想动一动手脚，但是手脚就是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我发出了一声呻吟，这时我就听见大家一齐在说：“活了，活了。”我知道，这是说我已经被救活了。

渐渐地，我终于有了一点知觉，大家已经看到我的眼睛开始活动了，这时我就听见有人在对那位抢救出我的性命的人说：“医生再想些办法吧，你看这不活了吗？”

“继续人工呼吸，我再给他打一针，你们赶紧找辆大车把他送到村里去，那里面有卫生院，也有医生。”

“唉呀，还送卫生院做什么呀，你不就是医生吗？”大家自然是求他再对我做一些医治，好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过来。

“我不是医生。”这位救了我性命的人对大家说，“你们还是找医生吧，出了事，我负不起责。”

“你怎么不是医生呢？明明你背着医包的么。”大家还是恳求着他。

“嗨，你们这些人呀，告诉你们我不是医生，我自然就不是医生。”这位救了我性命的人有点不耐烦了。

“那你是做什么的呢？”我们那位老窦当年就因为打破沙锅问到底才当的右派分子，这时他又犯了老毛病，一定要问人家是做什么的。

“唉呀，你这人就是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医生，你还不相信，告诉你们吧，我是个兽医。相信了吧？”

“哦！”众人一齐呼出了一口长气。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人和牲口一个样，也就是少用点药是了。”说着，这位兽医就走了。

直到现在，我总是感恩不尽地对人们说，我曾经死过一次，而且是被一位兽医救活了。

呜呼，快哉！

交心记险

60年代初期，郭沫若先生在北京带领数万名知识分子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打着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向党交心”；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心运动，就从北京向全国蔓延开来了。

郭沫若先生自己是如何向党交心的，如我这样的小人物，自然是不得而知的，郭先生向党交心之后，党又是如何对待郭先生的，大家倒也不会忘记；但是，这场交心运动，蔓延到了农场，那就几乎是酿成了一场大祸，不知多少人在这场交心运动中吃尽了苦头，甚至还有人在这场运动中惨遭不幸，在这里记上一笔，也算是留下一点历史记载吧。

动员向党交心的大会场，就设在农场的大空地上，平时在这里无论开什么会，大家也就是席地而坐罢了，但是今天

突然下了命令，一律要站着开会，而且会议进行中不得自由走动；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今天的会，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议了。

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的，自然是第一把手，他的面容和声调都极为严肃，从他的声音和面容上，人们早就嗅出了一种火药味，一定是运动又来了，人人提心吊胆，做好准备，等着挨整吧。

农场场长自然又是说了许多向党交心的重要性，也不外就是加速改造之类的话吧，而且还在会上做了保证，凡是在交心运动中说出来的话，只看做是向人民靠拢的表现，决不会以此整人，大家尽管放心，越是向党交心交得彻底，也就越是表明你的思想改造有进步；这样，距离摘掉帽子的时刻也就不会太远了。

当然，交心活动的时间，只能在晚上进行，每个班组都在自己的住房里开会，会议自然是十分严肃，有人发言，有人记录，开过会后，会议记录立即要交上去，而且要由三个人一起交到“政府”那里去，第二天晚上开会时，“政府”再把会议记录交回来。就只看这阵势，你说这场运动能轻得了吗？好自为之，我早就在自己的心里做了准备。

交心运动是有要求的，交心时，不能只听你一个人说，你说是已经向党交心了，可是大家说你还没有交出你的真心来，这时你就要继续交心，交不到水平，大家不通过，你就是没有过关；这时你不但没有向党交心，反而要给你下一个结论，说你对抗运动，到那时，可就要自己负责了。

听着这个要求，已经是让人毛骨悚然了，自己如何过关呢？不交吧，你就休想混过去；真交吧，交什么呢？这时候农村已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了，就在农场附近的农村，农民们把农

场因患猪瘟死去的病猪担到村里去吃，种种情景，大家全看在眼里，把这些话通通说出来，当然是交心了，可那样你不是自投罗网了吗？正想找一个反面教员，你来当这个角色吧，那才叫上鬼当呢。

好在交心活动是有顺序的，第一个自然是我们的班长，然后按照交心难度的大小依次排队，我被排在几乎是最后的一名了，这主要是因为年岁小，政府估计我没有多少心好交，这样就给了我时间，好在前面一些人的交心中，吸取教训。

第一个交心的，是我们的赵班长，他也是为了要带个好头，第一天，他说自己要来一个竹筒倒豆子给大家做个榜样，果然，当天的会议，“政府”就派下了人来旁听，以表示对我们班长交心的重视。

其实呢，我们的这位赵班长人很好，他在劳动中总是抢着干最重的活，而且努力学习各种文件，还写了好多的改造总结，在脱胎换骨上，那是很有成绩的；可是，他这个人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头脑容易发热，一事当前，他不知侦察火力，一下子就暴露在了人家的火力网上，所以最容易吃亏。

赵班长的交心发言，堪称精彩之极，他果然来了一个竹筒倒豆子，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步到位，一下子他就把自己的心交出来了，他从自己上学读书时追求革命开始说起，说到自己曾经是多么狂热，再又说到参加革命之后，自己又做了多少贡献，到了1957年整风，他又是多么一片真心地给党提意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落了一个右派；从此，他就开始和党离心离德了，下面他说出了他的许多看法，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饿死人的各种情况，下面又是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一句，我听着打一下冷战，当时我心里就想，赵班长，你可是要找倒霉了。

赵班长的交心发言，一次通过，大家都说他交得彻底，“政府”也表示赵班长是交出了自己的真心，而且要求大家都要像赵班长这样，把自己的一颗黑心交出来：“什么叫作脱胎换骨呢？就是把自己过去的一颗黑心放在阳光下面晒一晒么。有人说他没有黑心，你没有黑心怎么会被送到这里来呢？不要自作聪明么，有什么样的黑心，你就交出什么样的黑心，这就是脱胎换骨。”

一个个地差不多已经全交出黑心来了，这中间，也有几个人交得不那么痛快，大家很是做了不少的工作，还开了批判会，也喊了口号，但那个人还是不肯交心，最后也只能先把他们挂起来了，不能被他们打乱了后面学员们的进步要求；这样，就往下轮到我交心了。

在我交心的那天，“政府”没有来人，我一看好办，这证明我不是重点人儿，一下子我心里就有了谱儿；于是，我就开始交心了。

我交心的第一部分是说自己对革命如何一片真心，而且再三表示我从心里就没有一点对革命的怀疑，但是到了1955年，我突然被卷进胡风事件，这时我的思想是有点想不通，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很快我就有了一点觉悟，我认识到这是由自己的立场决定的，自己对于阶级斗争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才落入了反革命的泥坑。下面我就又说了好多好多骂自己的话，我说我的一颗黑心，就是觉得自己对不起革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还对不起一切一切……，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我都说了一些什么。

当然，我的交心发言没有通过，同学们都说我狡猾，到了第二天，我要接受学员们的挽救，大家就对我的交心发言做了好多好多的揭发，有人说我在什么地方说了鬼话，有人说我一句实话也没说。反正人家对我的挽救我是完全接受的，

这样就到了第三天，再由我做交心补充。到了这一天，我就开始哭了，一面哭着，一面向大家说自己是多么的对不起同学们的帮助，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出自己的黑心在什么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我才好。

就这样死皮赖脸地拖了四天，大家对我已经是忍无可忍了，第五天晚上，“政府”下来了人，我一看，事情到火候了，今天晚上我再不说出点真格的来，那是休想过关了。还没有等我发言，“政府”就开始说话了，这位“政府”说，交心运动开展到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场交心运动当中，我们大多数学员是愿意向人民靠拢的，可是我们也不能不冷静地看到，也有极个别的人，借着这次交心运动继续向党进攻，这个人就是你们这个班里的赵班长，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在他的交心发言里，曾经说过多少恶毒的话，那是向党交心吗？他是借题发挥，明明是向人民示威。告诉你姓赵的，我们早就估计到有人会在这次运动中跳出来向党进攻的，所以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旦他们跳出来，我们就一定给以打击！

就这样，这场交心运动就算达到目的了，活靶子找出来了，别的人也就放过去了，从此，交心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大家向继续向党进攻的赵班长开火。这一下，赵班长可怜了，他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之外，晚上还要接受批判，大家可以想像，这种批判是种什么滋味，那就是后来的批斗会，赵班长站在当中，大家一齐喊口号，还要一个一个地发言，揭发赵班长的反动本质，整整开了半个月，赵班长才算被大家斗倒。

这半个月的时间，老赵又要挨批判，又要写交代，又要劳动，还有时受隔离，可真是吃够了苦头；到最后把他放回班里来的时候，他已经瘦掉十斤肉了。

赵班长的班长职务自然被撤掉了，新上任的班长是在批

判赵班长时最积极的一个姓史的右派，至于我呢，大家早把我忘掉了，我也就还作我的学员，依然老老实实在挨改造。

事过之后，一起干活的时候，老赵私下里对我说：“林希，你说我这人多傻，我怎么就又犯了老毛病了呢？”

这时，我就对老赵说道：“让你交心你就交，你光看人家郭老交了心，还是做大官，你也就跟着一起交心，你忘了引蛇出洞的教训了吗？”

“当时你怎么不提醒我呢？”老赵不无抱怨地向我说着。

“我怎么没提醒你？你没见交心发言时，你说一句我就打一下冷战吗？”

“看见啦。”老赵回答着说。

“那就是暗号，告诉你别再往下说了，够怕人的了，你怎么还往下说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可是明白了，也已经晚了。”老赵无精打采地说着。

扩大记冤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一大批有才学、有志向，又对革命一片忠诚的好同志受到了不白之冤，但是，运动还没有结束，一阵扩大“战果”的狂风刮起，又使一批本来不至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蒙受了更大的冤枉。

作为一个运动对象，我自然是不知道反右运动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布置下来的，只是到后来才知道有了一个指示，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听起来，这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大多数了，大家应该放心才是；可是，有了百分之九十五，后面就有了百分之五，如果没有百分之五，前面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不存在了。

也是上级没有交代清楚，可是下边为了这个百分之九十五，却用了心思，一个单位有一百名工作人员，那就是说，这个单位一定要出五个右派分子；少出一个，那就不是百分之五，而是百分之四了，如此，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也就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干部是好的了，虽说不算是对抗吧，但至少是没有执行指示；所以，这个百分之五，是一定要凑齐的。

这样，到了1958年末，又有一批新学员被送到农场来的时候，这其中大多是被扩大成右派分子的人。按照农场的规矩，一个学员被送来之后，要先向老学员们交代罪行，然后才能得到老学员们的帮助；只是这一下，可难住了这些新来的学员们了，让他们如何交代罪行呢？老实说，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罪行”好交代的，开了好几次会，他们就是转不过来这个弯子，最后，有一个河北省来的右派，说了一句话，这才使我们这些老学员们恍然大悟，原来，在我们离开社会之后，反右斗争又有了这样的新发展。

这位从河北省来的农村干部在会上交代说，他是服从上级分配，按照县委的要求到农场来的，大家问他，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他说知道，“不就是改造思想吗？一个人要活到老，改造到老的么，多改造几年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一下，我们这些老学员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大傻蛋，从此，也就不再不和他纠缠了。

后来，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这位农村干部对我说，他原来在县委工作，因为他出身好，有工作能力，所以一直受到领导的重用，反右斗争开始之后，县委把他调到反右斗争办公室，让他做具体工作，他们县里所有右派的材料，全是他整理的，为此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但是，突然一天，县委书记找他谈话，这时他想一定是运动就要结束了，上级要分配他去新的岗位工作，好在他历来

是服从分配的，共产党员好比是种子么，无论是落到哪里，就要在那里开花结果。

于是，他就走进了书记的办公室，书记自然对他还是那样客气，请他坐下之后，又给他端过来一杯茶，然后才极为知心地对他说：“同志呀，你在反右斗争办公室工作了这些日子，成绩么，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只是目前有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困难问题，所以我才把你找来，想和你商量商量。”

“书记，有什么指示你就说吧，这许多年你对我总该有个了解吧？什么困难不是我第一个上？”这时，我们这位同志就对他的书记说着。

“唉呀，这问题和以往的问题不一样呀，这问题我不好张口呀。”书记万般为难地说着。

“书记，你就说吧，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你只要说出一个办法来，我就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位好心的同志当时又拍了一下胸脯，向他的书记做了保证，这时，他的书记才对他继续说道：

“你看，咱们领导反右斗争，怎么就忘了咱们自己的单位了呢，我到地委去开了会，人家别的县里，每个县委里都有右派，只有咱们的县委机关，竟没有一个右派，你说说这是不是咱们右倾了。”

“唉哟，”这一下，我们的这位同志想起来了，怎么反了这么长时间的右派，就没想过在县委机关里反出一个右派来呢？“可是，可是，咱们县委机关里，没有人向党进攻呀！”我们的这位同志对他的书记说着。

“这就不可能了么，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县委机关里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呢？”县委书记的一席话，说得我们这位同

志茅塞顿开，立即，他就对他的书记说道：“这样吧，书记，你容我回去考虑考虑，我一定在咱们县委里揪出一个右派来。”

就这样，我们的这位同志就回去考虑去了，可是还没有等他考虑成熟，他的书记就把他又找了去，这时，他的书记就对他说道：“根据集体决定，我们一致认为咱们县委机关里的右派，就是你。”

“哟，书记，这右派罪名怎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呢？”我们这位同志不服气地反问着说。

“把你放在反右斗争办公室来工作，你偏偏认为县委机关里没有阶级斗争，你知道右派分子的一个观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你如今执行的是一条否认阶级斗争的路线，这个右派不是你，还能是哪一个呢？”

心服口服，我们这位好心的同志就被定成右派分子了；这样，他也就被送到我们这个农场里来了。

冤煞人也，我的老天爷！

穿过西窗的南风

○ 金宇澄

大海翻动灰黑色的浊浪，冬季的阴霾天气，云头很低。我倚在甲板的栏杆上，不远处，有一位女孩。夜晚溅上甲板的海水被风吹干了，我的脸开始发疼，太冷了。

这是 1971 年 2 月，长锦号轮由上海至大连的中途，我发现了那位女孩。我和她都穿着统一的绿棉袄；可以断定，我们都是“知青”，也许都是第一次回沪探亲后，又返回东北黑龙江。服装在那个乏味的年代仍然隐隐代表着某种职业和阶层，仍可以借此分析对方的身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自从 1969 年“上山下乡”这一最高指示所规定的青年方向发表后，上海为去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寒冷地区的知青分别制定了棉制服：赴黑龙江各兵团农场及农村的知青为大、中、小三类棉大衣、棉帽、棉军衣、棉裤。去吉林的青年，领取棉帽、棉短大衣、棉裤，以上的服装均为草绿色，式样臃肿。到了农场，我才发现天津和北京的知青大衣为草黄色，式样也更接近准军队制式，令人羡慕。哈尔滨、齐齐哈尔知青，本就在省内生活，没有制服。陌生青年相遇，来自何地一眼便看得很清楚。

海船由沪驶向北方。女孩最多有 18 岁，留着“童花”头发，身材娇小，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因为寒冷，她披着棉军服，内穿一件藏青中式小棉袄，领口围着鹅黄领套（开司米织成条状，两端有揷钮，围在颈处以御寒，具有高领毛衣般的装饰性，现在已归于历史了），她看着海洋，并不知道我在注意她，看来她是独自

旅行。有几次我与五六个同伴走下甲板，或一同在旅客食堂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时，我都注意到她是独自来的，她的脸从来没有笑容，也不跟任何人谈话，眼睛明亮，但有着郁闷的影子。有一次，当我独自一人同她在狭窄的舱内通道相遇时，她像是怔了怔，我侧过身让她过去。我发现她是那样地娇小，她的棉军衣和我的臂膀轻擦了一下，留下一阵小风。我看清了穿着十分合身的黑卡其裤子，裤脚露出黑边鹅黄色的运动裤，翻毛皮鞋扎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鞋带。如果是在90年代，或是在西方电影的情景之中，这种际遇将会使一个陌生男子涌动着说话的欲望——“您真漂亮”，“谢谢”，于是交臂而过。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相视无言，她仅仅在我心中留下一张照片、一个细部和那阵小风。

近期，我曾听闻一个朋友在四处奔走，打算编辑一本《文革中的市民生活》的书，我不知道他除了收集各地的票证和供应情况外，是否还注意到当时地域之间人们服饰特征的明显距离。在70年代初，上海的男女青年仍是以卡其布紧窄的长裤为流行的，所不同的是，文化革命大潮中体育的一枝独秀，使城市男女均以运动装为时髦，当时标准的打扮，有厚绒或48支薄形拉链翻领运动衫，裤装就如那女孩的款式，以露出内里的运动裤脚为细节。尼龙袜，白色乒乓球鞋抽去鞋带，将鞋舌翻入鞋内，脚背可直接露出袜子的颜色。这种装束带到北方后，首先遭到北派人士的一致抵制，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阿飞，“鸡腿裤”。此时的东北大地，正流行难看而肥大的军裤（也许是经济的原因，裤子肥大冬季可罩棉裤，夏季单穿），脚着军用翻毛皮鞋，时髦的细部仅是将篮球鞋的白鞋带系在这类皮鞋上，别具一格。按如今的消费心理分析，大概这是一种富有的标志，在当时，要拥有一双上海产的高帮回力牌篮球鞋是极为奢侈的挥霍，这种鞋的鞋带价格倒是便宜的。

南北之间因为服装的差异形成斗法，僵持的时间并不长，东北青年很快就接受了“鸡腿裤”的尺寸，而坚固保暖的翻毛皮鞋，同样也得到南方女孩的认同，走在冻硬了的或泥泞的土路上，这种鞋更为方便。在一年的时间中，北方青年已经改小了棉裤的尺寸，并推迟了穿着的时间。然而将两地间时髦装束浑为一体，或许是上海女孩更热心从事的工作，按照当时的审美标准，船上的这位女孩的改良可称是完美无瑕的，此外她的藏青色、黑色，以及若隐若现的鹅黄色的搭配，甚至是高于流行色的境界，达到品位和气质，遗世独立的美与神秘的统一。

以后我和她可以单独站在甲板上了。我们相隔二十米，在左舷或右舷，相隔着寒冷的海风和海涛声，看海。她有时取出口琴，试着音阶，声音不连贯地上升，然后停止。她倚着栏杆，鼻尖冻红了，眼睛盯着海浪，她几乎从不看我，但也许她明白有这样一个不满二十岁，瘦高的，戴着棕色羊剪绒皮帽的青年在远处。似乎我是一个陪伴，固定了的一个景像。上船的当晚，我与同伴们在难闻的底舱玩牌（那是有名的“十三道罗宋”），我感到无聊，我听到空气中飘来口琴单调的声音，音阶一个一个往上爬，然后又重复着。我拿着满把的牌，试图拼凑一个“三轮车”（牌式），突然就放手在平铺的报纸上，跑了出去，在吵闹中我慢慢地爬到顶舱，才冷静下来，这是干什么，我慢慢踱到甲板上，四处一片漆黑，浪花细碎的声响中，只有尾旗单调的忽忽声。我感到了苦恼。我看见她站在左舷近船尾处，我们相距二十米，舷窗在她身边留下明显的灯影。她没有回头，似乎是看着漆黑的海洋，我们远远地相持着。不知过了多久后，那几个同伴骂骂咧咧地寻找的声音逐渐近了，我有些无奈，于是只能返回那温暖的、难闻的底舱去……

两天两夜的旅程即将结束。虽然我仍然经常站在甲板上，她也经常站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然而此时凭栏远望的旅客逐

渐增多。天气好了，渤海寒冷的洋面上，阳光耀眼，海水如深蓝色的、大块大块的玻璃那么碎裂和喧哗，风吹向船的右舷时，人们便走向阳光处的左舷。我觉得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那就是——再也没有同女孩说话的机会了，从此就要分手，没有“再见”这句习惯用语。也许，谁都知道在这条船上，这次航程中，有一对男女相隔二十米，却无法相互走近，谁都在关注这件事——在当时的行为规范里，你还没有学会可以轻松地对陌生的异性说话，那积累着的苦恼，只是形成强大的内心压力。

我们走下舷梯上岸。同伴们高声说话，仍然抱怨着风浪的恶劣、饭菜的恶劣。他们有逃脱的快感，只有我深深地落寞，我们都将去换坐长途火车，继续北上，重新面对新开垦的土地。就像古诗所言的“青春结伴好还乡”，我们是莫名的高兴的，这是一个家乡，一个归宿，但那个女孩，却使我感到归宿的渺茫。我回过头，想看一看她，也许“看”在许多无奈中是一种解脱了，可是没有发现。绿棉袄，藏青色的小棉袄，鹅黄领套，没有。

大家提着行李，顺大连港漫长的码头朝出口走。这段路极长，沿码头有一个一个仓库，似乎没有尽头。不久我们就出汗了，我们站着脱下帽子，我这时发现了前方极远处的那个女孩，她拖带着两个极大的旅行袋，一个背包，绿色棉军衣脱下挽在臂弯里，孤零零地走得很慢，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我们都累极了，我们的行李里塞满了各种食物，我想那女孩沉重的旅行袋里也不会是别的东西，也许整整一年或两年，我们都收藏着这些食品以改善伙食，大家的手被行李勒得发木，远处那女孩每走十几步，也停下来休息，我觉得她跟我们这些吵吵闹闹的旅客相比，更为弱小，孤独无助，没有一个人帮助她，谁都急匆匆往前走，从不回头。她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离我们也越来越近，我很想帮她，我努力地高声说话，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显然她没有听见，她没有转过脸来，或再练习一下她的口琴音阶，她拎着两个

沉重的旅行袋，走几步摇摇晃晃放在地上，再拎起来，放下，我加快步伐想赶上她，我幻想接近她时，也许会有帮助她的勇气，但这种追赶的方式，无法不顾忌同伴的状态，我知道他们一旦发现这种意图后其反应的激烈程度。

我像是带领着一帮散兵游勇，忽快忽慢地往前走，走到与她相隔近二十米的距离，发现她站着发怔，她背对着我站着，看了看手，看了看两边的旅行袋和扔在地上的棉衣背包，然后蹲下身，拉开两个旅行袋的拉链，用力将它们翻倒过来——袋子里白花花的装满了晒干的年糕片，满满的两堆年糕片，被她倾倒在码头上。

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船在鸣号，码头上的吊车在装卸货物，旅客急匆匆地顺着码头疾行，只有她站着，如流水中的一块静止的石头，似乎遗忘了——一切。

可能，我注定只能在二十米开外关注她。女孩只怔了怔，她做了这件异乎寻常的事，然后将她的棉衣和空旅行袋塞入另一个旅行袋中，拎着它，疾步消失在人群中，在我的眼中，她永远消失了。

走近那两堆年糕片，我听到一个北方人的疑问，他显然不知道这白色片状的东西为何物。我看着它们，胸中充满悲哀，我知道这也许是女孩全家过年时的规定购买量，再加上亲戚们的援助，大家为她的远行，在深夜里一刀一刀切下年糕，细心放在竹匾里，晒干。大家为这个娇小的姑娘的远行伤心欲绝，将那份爱寄托在洁白的年糕上，大家都要送她去云平路码头上船，也许一路还曾劝告她在旅途中一定请人帮忙，她太娇小了，他们相信有人会在旅途中照顾她的……

但是没有。

这也许是回想时我觉得痛苦的。

插队素描(二篇)

○ 詹志芳

疙瘩老汉

我插队到村上时，疙瘩老汉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相当粗壮、矮个头，脸色黑红，皱纹深深的，就像那被人常年玩弄的核桃。一双大脚，像熊掌似的支撑着身体。小时候，只因为他长得结实，人们都叫他疙瘩，年纪大了，才叫成疙瘩老汉。

听乡亲们说，他六岁那年，河南老家发大水。他们一家四口逃荒要饭来到山西晋南，母亲实在受不了饥饿和劳累终于死去时，弟弟才两岁。疙瘩的父亲也无力再走，就领着两个孩子，给本地的地主当长工，勉强养活着三口人。幸亏疙瘩和弟弟相当的结实，吃什么也不生病，人也不淘气，免去父亲不少的麻烦。疙瘩稍大时，也去给地主干活。他从小吃苦，所以也并不觉得苦。晋南这地方地多人少，物产以小麦、油菜、棉花为主。日常生活需要的都可以满足了，比河南老家强多了。过年时，地主还会给白馍吃，平时虽然馍黑些，可是管饱。一年到头，地主还会给些旧衣服，也就算不愁吃不愁穿了。

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子像车轮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岁数长了，眼看疙瘩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爹穷得没办法，又是外来户，谁会把姑娘嫁给他们家呢。爹冲着疙瘩说：“咱不想。”疙瘩是个老实孩子，平时无话，只点点头。过了几年，爹去世了。疙瘩和弟弟继续当长工。

解放那年，疙瘩已经四十五岁了。他是雇农，成分好，所以在贫协里最受重视。分到的土地、房子、东西也最多。当年雇他的地主被赶到了偏房，三间正房分给了他。

有一回镇上开大会，工作组的同志指着会场边上的几个姑娘大声说：“这些窑子里的姐妹，也是被剥削，被欺负的。哪位农民兄弟愿意帮助她们，带她们走向新生活！”有几个胆子大的举手领走了几个姑娘。别人都捅疙瘩，让我也去领。疙瘩想了想，刚分到三间大北房，又分了十来亩地，可以养得起媳妇了。就跟着举起手，领了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爱娃回家。

爱娃中等个，人还算标致。十三岁上死了父母，被舅舅领走，舅舅不务正业，家里几亩地养不活一家人。她十六岁那年舅舅把她卖到了窑子里。爱娃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地里活儿一点儿也不会干，做饭洗衣服还行。但爱娃有个普通农村妇女没有的特点，她很会讨男人喜欢。疙瘩从记事起就没了娘，从来没人疼爱过。现在，下地回来，有热饭、热水等着，冷暖也有人管了，小日子过得很有生气，房间里充满了爱娃的笑声，这些都是疙瘩做梦也没敢想过的。

那年头重成份，疙瘩苦大仇深受重视，爱娃也跟着光荣。好好地过了几年，爱娃为疙瘩生了三个孩子，不知怎的都长到一两岁就死了。疙瘩伤心，爱娃落泪，日子过得没了生气。

一天，疙瘩在地里下活，兄弟的儿子风风火火地跑到地里告诉他，爱娃带着一个大包袱，让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带走了。疙瘩赶回家，家里虽然干干净净，东西也放得整整齐齐，可是没有了爱娃显得空空荡荡的。人家骑车走了一阵子了，疙瘩光凭两条腿怎么追呀？疙瘩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他想也许爱娃过几天会回来的。

过了些日子，爱娃托人捎话回来说她又结婚了，原来那人是她在窑子里的相好。疙瘩伤心极了，人一下子老了十几岁，疙瘩老汉也是从那时叫起来的。从此，疙瘩老汉饭也吃不好，穿也没人管，每天提不起精神。黑土布棉袄脏得发亮，三间正房没人打扫，被煤油灯熏得乌黑，墙上挂满了蜘蛛网，破烂的家具积了厚厚的尘土。幸亏兄弟媳妇心眼好，做了稀罕饭菜就打发孩子给疙瘩老汉送去，四季衣服有空就帮他洗洗，每年过年也给他做身新衣服。

可是到了晚上，疙瘩老汉一人守着三间高大寂静的空房子，孤独的感觉就别提了。他总想着爱娃在的日子，那时候满屋子是爱娃的笑声，爱娃抱着孩子玩，给孩子喂奶和爱娃那撩人发躁的眼神都使疙瘩老汉吃不好睡不好。村上人给他介绍了几次对象他都没点头。他总想着爱娃，以后也就没人给他介绍了。合作化了，每年分下粮食他总把最好的拿上一口袋给爱娃送去。爱娃后嫁的村儿离这六十多里，每次都是天没亮就上路，回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有一回，爱娃托人捎话说想要疙瘩老汉的缸。疙瘩老汉不爱说话，不求人，也不和兄弟商量。第二天，三四点钟起来，用绳子把缸捆好背在背上，那缸足有六七十斤呢，硬是走了六十多里给爱娃送去了。回来后，人病了一场，他兄弟心痛地说：“你说一声，我套个牛车给你送去呀。”疙瘩老汉心里明白，爱娃已经嫁人五六年了，和你说了你能让送去吗。

又过了些年，疙瘩老汉已经六十多岁了，看上去像七八十岁的老人。他的腿也不像前些年有劲了，也就不再给爱娃送东西。但是，他还是想着爱娃，希望她有一天能回来。生产队为了照顾他，让他干一些看地看场的轻活。我经常看见疙瘩老汉在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他看见空中的飞鸟，就用一双皱皱巴巴的手做成哨子学鸟叫，也不知道他

的鸟叫是欢喜,是悲伤,还是凄凉。

六十五岁那年夏天,疙瘩老汉不知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肚子拉了十多天,打针吃药都止不住。兄弟媳妇眼看疙瘩老汉大概不行了,赶快扯布给他做了身寿衣,衣服刚做好,疙瘩老汉就咽气了。他兄弟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发现他手里还攥着爱娃忘在家里的一个塑料发卡。他兄弟就让他攥着那发卡入土了。

他去世时,我正在北京探家。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黄土堆。听人说爱娃回来给他上过坟,还哭了一场。我去他坟上看他,那黄土还没干呢。

莲娃

莲娃家是贫农,她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和团支部书记。还是我们村的才女,心灵手巧。鞋底纳的真是横平竖直,一天能织两丈布,几乎没人能比。人长得又漂亮,性格温顺,十八岁的妙龄,皮肤黑里透红,一双大眼睛成天笑咪咪的。她结实健美,两条乌黑的大辫子有时拖在背后,有时盘在头上,无论怎样梳都出众的好看。她还有一绝,就是有条好嗓子,每年春节队里搭班唱样板戏准少不了她。

我们在队里时,有时大队也放电影。放的最多的是八个样板戏和新闻纪录片。我最喜欢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可社员们不喜欢,他们说腿撇得老高,真真(实在)不美,也不说话,跟那哑巴差不多。但是,他们听起秦腔碗碗腔却乐不可支,百看不厌,看到关键的时候眼睛眨都不眨,嘴巴都张开了。

每年春节,那是一年中最欢乐最有色彩的时间,娶媳妇的也最多。农民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服,有点能力的人家都

换上新衣服。没有能力换新衣的，也会把旧衣服拆洗拆洗，用染料煮一下，或者翻个面，总之会想办法让衣服翻新一下。连老婆儿老汉头上的手帕毛巾都要换新的。只有我们知识青年依旧，仅仅干净而已，这和父母不在身边有关，我们换新衣都是在探亲以后。

离过春节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家家忙着蒸白馍。最可爱的是花馍，用黑豆做眼睛，用剪刀剪的一身刺儿的小刺猬，用梳子压花修饰鳍和尾的鱼，有时还用胭脂等染料染上颜色。乡亲们送给我，我从来舍不得吃，都带回家当工艺品了。这时的莲娃是家家抢的，因为她手巧，在每家做的花馍可以不重样。农民一年的节省这会儿全忘了。

大年初一一大早，街头巷尾涌出的人群，用红男绿女来形容绝对不过分。若是有一台升降机，拍个《新春乐》，一定不会比《清明上河图》差。

到了春节那天的晚上，莲娃可就成了我们全村的大明星了。无论是《智取威虎山》还是《沙家浜》，莲娃都是主角。在戏台上她那高亢的嗓子迷住了多少人呀，她化上装也特别的光彩照人。我虽然不会欣赏秦腔碗碗腔，但是我也要去看看莲娃的表演。每次演完戏她都要被议论好些日子。尤其是那些老婆婆，她们因为生活阅历丰富，总能挑出别人的毛病。但对莲娃却异口同声地赞扬，夸她人长得俊手又巧，还说谁娶了她谁有福气。

莲娃也有不顺心的事，那就是家里给她定的亲，是她并不爱的人。对方虽然是公社的拖拉机手，有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莲娃就是不爱。无奈她家收了人家的礼，钱都让家里花了，布料也都做成衣服穿了。

莲娃一有空，就喜欢到我们屋里来说说笑笑，她爱听我们讲城里的事。可我们一拿她对象开心她就不高兴，以后我

们知道了就不再提她的对象。

后来我发现原来她喜欢我们队里的一个小伙子。莲娃总找机会和他说话，每次都是涨红了脸神采飞扬的，他们在一起笑得也特别开心。可是小伙子的父亲是地主，他上过中学，人长得也好。依我看他们很般配，确实有点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劲儿。在那样的年代，他们是不可能结合的。

莲娃已经十八岁该嫁人了，对方催了好几次，莲娃一拖再拖，实在不能拖了，才把过门的日子定了下来。从那以后，莲娃的心情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前几天就开始哭，结婚那天是红肿着眼睛走的。

三天后回门(回娘家)，她来到我们屋里。看她神情恍恍惚忽，眼神也有些发直，但人稳重了许多，在我们屋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可真替她担心，她内心的痛苦我们那时是无法理解的。她为什么非要嫁过去，她可以把婚退掉嘛，她承受了多少压力只有她自己知道。

一天，听说莲娃回来了，我们下了工都去她家看她。一看她人瘦了一圈，眼圈发黑，脸上失去了红色，人也不大爱说话了。我们还以为她是怀孕的反应，说了几句，看她精神不好我们就都走了。

没多久，听人说莲娃病了，病的还不轻，我们都很惦记。直到有一天她被抬回来，我们赶快去看她。才知道她不愿意生下那个孩子，平时就吃的很少，眼看还有一个月就生了，她乱吃药引起大出血，孩子也死了。幸亏她婆家离县城近，否则就没命了。看她形同枯槁，奄奄一息的样子，我们都为她揪心。

我们经常去看她。可她失血太多，自己又不愿意养好再回那个家。那时又没有什么营养品，只能劝她多吃点饭，可谁劝她也不听。看得出她是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那年年终的

一天夜里她走了。

乡亲们都替她惋惜，可如果莲娃当初退婚的话，他们会把莲娃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这样的愚蠢又这样的好心。这就是农民，一辈子也活不明白的农民，自己深受其害又照样去害别人。

我至今都在悔恨，我们懂事太晚了。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跟随勇敢的心

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了眼泪。现在我不再看，尽管这部VCD就在我手边。回想比现场观看更有魅力。回想，这已经是我自己的东西了，属于我。不正是在一遍遍的回想中，力量如同血液一样，到达我的全身？

回想。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爱情。

一开始他还是个小男孩，有着清澈的蓝眼睛。那么蓝，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它。是比天空和湖水更纯澈的一种，而天空已经布满了阴云，湖水里流淌着杀戮的血污，在他周围。他站在这天地和湖水之间，幼小，无助，孱弱。

那么这纯粹的清澈的蓝又有什么用呢？血腥的世界会把它夺去，消灭，或者就让它改变。

它只适合梦。它是他梦中的颜色。寒冷的蓝色，一道银光——他死去的父亲躺在他身旁，突然，转过身来，对他说话。那声音弥散在蓝色中，醇厚而平静，仿佛来自远方。“从此你已了无牵挂，尽可去追寻你的理想。”从此。这是起点。这声音在蓝色中飘浮回荡，像是到达彼岸的人向此岸呼唤。这是他英雄的父亲之魂，经由梦，传达给他的声音。

他实在太清秀了，这个小男孩。他懵懂茫然，还有一点儿胆怯，当残暴的杀戮像天边乌云滚滚而来时。在父兄的葬礼上，他清秀的脸上满是泪水。这小小的、套一件简单粗糙的苏

格兰短裙袍的男孩。人们叫他威廉，一个普通的平民的名字。比他更小的一个小女孩已经离去，回过头，望望威廉，又转回来，摘下一朵生长在墓地边上的紫色花朵，递给他。这也是普通的、苏格兰大地上处处可见的花朵，细密的花瓣，没有绚丽的色彩。他的眼泪还没有干。他伸出手——一只纤瘦的孩子的手——接过花朵。我的心在此时荡了一下。微小的或者永恒的力量可能就从这里起源。谁敢说不是？但，小男孩威廉，长大后 would 怎样呢？对这一切——梦，死亡，花朵——还会有记忆吗？只要生命延续，一个孩子的前程就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当我看到一些平庸的或者猥琐的甚至邪恶的男人，我常常会想像他们孩童时的模样，但常常想像不出。那些孩子的脸是含混的，平等的，在那天真和纯洁上，并没有打下日后的烙印。我已经不相信纯澈的永恒。不变的只是那灾难深重的高地和低地，长长的中世纪，前有绰号长脚的英格兰王爱德华的侵略，后有英王乔治和苏格兰贵族坎贝尔的首领亚哥尔公爵的暴政统治。生活在这片天地中的人们，不能穿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譬如高地男子世代相传的叠褶短裙，不能随身携带短刀长剑和枪，甚至不能吹奏他们的民族乐器——风笛。但风笛的声音响彻了威廉所在的荒凉时代和贫瘠山川。一个男孩在这样的时代山川中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很难说。揭竿起义的勇士，苟且偷安的懦夫，纯朴温厚的善者，奸诈歹毒的小人……可能我的心过于冷酷了一点，这也正是我所在的生活给我的。

风笛的乐声像风一样掠过高原和草地，远去了。男孩威廉，他会长成怎样的男人？我只是好奇。我等待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他。他长成一个健壮的苏格兰男人。棕色的肌肉十分强健，手臂和胸背裸露着，暗格子短

裙系在腰间，还有一根同色的宽布带像绶带一样斜着挎过上身。每一部分都是有力量的，是常年在烈日下风雨中种植、刈草、劳动的结果。我看到他的脸。也是同样在劳作中变得坚毅的脸，棱角分明，嘴角和下巴沉稳。已经不再清秀，皮肤是粗糙的。也还称不上英俊——当心里的东西没有表露出来时，说一个男人是否英俊似为时过早，五官和身体在此时仅是物质的。一头亚麻色的头发雄狮般披散在肩，鬓边有编得极细的苏格兰男人的辫子。我看到他的眼睛。蓝色的，但已不是那种晴朗单薄的蓝，年龄和阅历将它变厚了。他跳下马，深深吸进一口气，那是山川和草叶的气息。他仰头沉醉的样子犹存天真。在风笛吹奏的欢乐乐曲声中，他走进在草地上跳舞的人群，寻找。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朝她欢快地笑。一个纯朴的年轻农民见到年轻姑娘时那种自然愉悦的善意的笑。他向她走去。

我预感到一个爱情故事就要开始。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简单的，命中注定的，因为——恰恰发生在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它不伟大也不惊人，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之一种。不过我还是有兴趣。爱总有它特殊和个别的一面，即使没有，爱本身也是奇迹，相对于泥土一样平凡的人生。我看到人群中那个年轻姑娘美伦也在朝他欢快地笑。毫不扭捏，也不羞涩。她笑的时候嘴就自然地张开，露出牙齿。不是饱满的樱唇，没有珍珠似发亮的牙齿。她未免显得普通了些。不，这正是她最可贵之处，这不加任何修饰的笑，劳作中健康的发红的脸，健壮到甚至有点粗壮的身体，自然垂落的直发，简陋的手工缝的浅蓝色布袍。苏格兰农民威廉爱的只可能是这样纯朴的苏格兰姑娘。相似的、同类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已经够了。

我想得似乎简单了些。我将那些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

关于爱情的观念无形中加诸于几百年前的苏格兰男人威廉身上。我实在是低估了他。他骑着一匹马在淅沥的夜雨中来到美伦家的简陋棚屋前，邀请美伦随他夜游，而美伦毫不犹豫地、飞一般地在她父母阻挠的目光下扑进雨中，跳上他的马。天气正好。她似乎一边跑一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老是忘记人物具体的台词，而只记得大意。不过也许更好。这姑娘是多么可爱啊。她几乎是凭直觉就爱上了一个男人，爱上就勇往直前。他们在雨中骑马漫步在夜色朦胧的苏格兰大地。他们面对有亮光的远方彻夜长坐，彼此倚靠着。他想的是要拥有一大群儿子，做他的好帮手，种上一大片庄稼。临别的时候他对她说，我爱你，此情不渝。他的蓝眼睛里柔和希望和无限深情。这样直捷而古老的表白在我所处的生活中已经极少出现，人们说它老了，老掉牙了，或者就是将它作为嘲笑的对象，说它做作而不真实。它有时候确实伴随着虚伪和浅薄出现。它渐渐被人们所抛弃，因为它的不可靠。它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时也是常带有不可靠，譬如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欲火难耐时的宣言，说的是“爱”，实质是“要”，又譬如那种轻飘的盟誓，短暂的真诚。这一切人们已都能宽容，人们说，这就是飘忽无定的、有弱点的、真实的人性。而真正的爱已经成了乌托邦。而我仍一次次被银幕上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深情道出“我爱你”时的一幕所打动。这也只是短暂的被打动罢了。在被打动的时候，心的另一处仍对它抱有怀疑。音乐低回，大地朦胧在目，威廉的眼里有真诚的光在闪动，蓝得一无杂质。我的心再一次荡到深处。这时候，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取出一块棉布交给美伦。那柔软的棉布中，包着一朵被时间压干的不起眼的紫色花朵。那正是多年以前小小的美伦在威廉父兄落葬的那片墓地上采摘的花朵，它代表着她全部的心和话语来安慰流泪不止的孤独的威廉。我的心不由自主地



颤栗和激荡，荡到实处。那么这“此情不渝”的爱是真正真实的了，是有多年的记忆、梦和美好温暖的慰藉作前提。那蓝色的深情、愉悦的笑、急切的寻找和直率的追求也都不是无缘无故。我爱你，我将终生爱护你。这是他的话。这也不是轻易和随便。它像大地山川一样肯定，我相信。

然后他们在有月光和十字架的夜晚结婚。那十字架的所在似乎是他父兄的墓地。我不真切。那是面对上帝、宇宙和英雄灵魂的神圣婚姻。之所以秘密结婚，是为免受英格兰贵族“初夜权”的侮辱。这一切似乎来得快了些。是的，很快又很短暂，这甜蜜的充满梦想的婚姻。试想在日常一切都处于英格兰红衣士兵监视之下的人生中，又有什么期待和美好是不短暂的！仿佛一会儿功夫，美伦就死于红衣军官的短剑下。嗤啦一下，轻微地，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垂下美丽的头颅，连一个梦想都没来得及孕育。她死的原因就是她反抗了凌辱，

出于本能的、天性的反抗。在这“初夜权”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地方，倘没有与威廉结盟的爱，她会如此抵死反抗吗？我无法知道。威廉所爱的女人也许本就非同寻常，在血性和灵魂深处。或者就是苏格兰人那种更接近自然和上帝的血液的浇灌。无限美好和可爱的女人啊。威廉出现了，在红衣士兵布满杀机的视野中，骑马出现。一时间我不知道他将做什么。孤身一人，摊开双手，手是空的。脸上没有表情。他靠近，靠近。旋风和霹雳在一瞬间闪现——他抽出身后的多节棍，蓦地向敌人打去。雷霆万钧之力！宣战就从这一刻开始。斧头，大刀，长剑，无数旋风和霹雳。几代血海深仇。那些纯朴的衣衫褴褛的苏格兰农民转眼成为勇猛的战士。他把那个红衣军官逼到死路。嗤啦一声，肮脏的血流了出来。他没说一句。就是这样，嗤啦一声，像这红衣军官杀死美伦一样。毫无商量的余地。

他脸上和脖颈上溅满鲜血。他成了战士。苏格兰人呼唤着他的父名：华莱士！华莱士！那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成了战士的首领。从此他就是华莱士。他不笑。在厮杀和风餐雨宿的生活中他的筋肉越来越强壮，神情越来越刚毅，体魄越来越矫健。冲杀征战，他总在前列，白天，黑夜，姿态英伟。命运和仇恨驱动着他。眼睛的蓝又有变化，掺入钢铁似的蓝灰。我的眼睛越来越离不开他。我只是注视他，而忽略其他，那杀声震天的战场，红衣士兵倒地的景象。我在生活中很难看到这样的人，这刚毅和勇猛。这刚毅和勇猛不是为他个人的私利而生，这样的生活带给他的，除了危险，便是死亡。没有其他。然后又是战场，漫无尽头的战场。他飞马跃来，脸的一半涂上了蓝色，鼻梁，下巴，嘴唇，像钢铁一样棱角鲜明，同时又神秘。英俊异常！我不能不这么认为。他驭马在行将退却的人们面前走过，话语像风，像一面凌空飘扬的旗帜——“你

们是否愿意，用苟且偷安所得的余生，换取一个机会——仅仅是一个机会——换取自由？！”不用说那雷声般响起的回应的呼声，我的心，几乎在同时，也有雷声滚过。我知道我已不可改变地爱上了他，这个存在于几百年前陌生山川的男人。我不可能通过文字、书籍、声音、思想、图片等等爱上一个具体的男人，而只能是这样，有活生生的五官，身体，话语，行动，有在此之上的一种灵魂的光华，然后，产生爱。这种爱不可触摸——你和你所爱的人永远无法相遇接触，但它确实是爱，你能感觉到你心里涌动的激情，随时准备做出的呼应，你的目光对你所爱之人那强健英武之躯的每一寸抚摸，你的心随他而去，随他而起伏，你想，他是多么好，多么英俊，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男子比得上他好而英俊，正气凛然而又温情如斯……你很久没有这样由衷地、毫无保留地、热情地赞美过一个男人了。你所有的关于爱情的理想都在此时、在这个男人身上得到实现，而你以往所有对爱情的怀疑和失望也都在此时、在这个人身上烟消云散。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地不由自主，情迷意夺，这样地不怕别人笑话——读到这篇文章掩嘴而笑或嗤之以鼻的肯定大有人在。你不管，你这样说出来、这样表达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你就这么想。你的目光追随着他。你确信，这是爱。你很久没有这样爱过了。

华莱士，我也开始这样称呼他。他正在露营地，做梦。一个有梦的男人是格外令人心动的。他看见一个身披斗篷的人影飘飘忽忽向营地走来，靠近，又不能太靠近。他看见黑色斗篷下美伦的脸。他远远向她跪下。他知道，他在梦中。他说：“我在做梦。”美伦说：“你要醒来。”他说：“我不愿醒。”而他醒来了。于是他遇见威尔斯皇妃。而我也格外关注他此后的际遇。

皇妃苍白华贵的美与美伦形成绝大的对比，但本质上她

只是一个孤独的未得到爱情的年轻女人，有一颗柔弱的心。华莱士似乎马上就感觉到这一点。他不卑不亢。他在保持了自己尊严的同时给了她莫大的信赖。在英王爱德华面前，她用一句“化外之民”的概括将对他的印象掩盖起来。化外之民，他是吗？是的。他没有被所谓的文明、道德和伪善污染过，他的善良纯朴正义勇敢接近原始，他是被高贵天性和血腥事实教育出来的一个平民。这已经足够。而他眼睛里的东西，那些贵族有吗？没有也不配有。那是一种罕见的豪情——威尔斯皇妃说得对极了！她为什么两次提醒他，帮助他？为什么？连华莱士也这样问她。这时他俩的脸已经靠得很近，咫尺可触，他呼出的气息已轻轻吹动了她的头发。我预感到另一次爱情就要在这两个人之间降临。她侧过脸，避开了他的眼睛。她说：“因为你眼里的豪情。”我的心再一次激荡。也许，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一颗正义且勇敢的心，何况这颗心又长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英俊男子的身体里。而能够感觉到这一切、这眼中豪情的女人，也确实是值得他爱的。他们接吻，情不自禁。一切都在情不自禁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无论其地位教养多么悬殊，如果能情不自禁，那就是爱的最佳境界。那是不问结果、不求其他的爱。那也是没有“以后”、只有“此刻”的爱。他朝她俯下身子。他们此刻是赤裸相对。他的头发、呼吸和肌体中，一定留有战场拼杀时汗水的气味，野营时青草、露珠和马粪的气味，山川宇宙粗犷博大的气息。那么她该是何等幸运。一次这样的相吻相亲，该能胜过无数次男女之欢。他们在清晨的草原拥抱离别。我感到他没有留恋，而她则低回不已，只剩她一个人了，还独自伫立在草原上，低头看那无边蔓生的青草。这样的爱对她而言一生只可有一次，从此以后她再不能爱了——除了这不凡的“化外之民”。

这样，我们等来了他最后的结局。我看到他已经疲惫不堪，在无休止的征战、拼杀和露宿之后。他渴望安享和平，生儿育女，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这也是他反抗和战斗的最终目的。即使和谈有危险他也准备去了，他仿佛已经别无选择。在此，一种悲壮的征兆已经出现。我看着他并跟着他踏上险途。悲剧不可避免地到来。他，华莱士，落入了魔掌。这仿佛就是他的命运。他还会有别的命运和结局吗？

不承认“叛国罪”就要被施以残酷的极刑。不，他说，他从未宣誓要效忠“国王”，他只是上帝的子民。他不认罪。这在他是斩钉截铁的，不会游移和动摇。死的结局便这样铸定。这成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另一个注脚。威尔斯皇妃来探监。她说，认罪吧，只要能活命。我在此只能认为她是不忍看到所爱之人死去。何况这也是大多数人在死亡面前的本能反应。毕竟人只能活一次，而死亡会将人所有之一切剥夺和终止。但他毕竟是他，华莱士，我认定的勇士。他平静地说，倘认罪，便与死无异。那么就服下这药吧，以逃脱残酷的、常人难以忍受的极刑之痛苦。皇妃向他出示了药。一个小小的药罐。不，他仍然说，这样他可能在麻痹中无法自制，从而失却面对死亡时的尊严。尊严是比生命、比肉体的痛苦更重要的，这也是他选择死亡的一个前提。不过他最终还是听任皇妃将药水倒入他口中。他似乎已经不愿多费口舌。或者是他不愿辜负皇妃的仁慈。哪一种解释都可能成立。最后他们吻别。是有些平淡的、哀伤而无奈的吻。似乎已经没有了激情。在这样有关“活命”和“宁死不屈”的分野之后。她无望地离去，没有回头。牢门关上的声音响了一下。他随即喷吐出含在口里的药水——可以想见他与皇妃吻别时是含着这药水的。那药水被喷吐出的景象在牢房幽暗的背景下显得清晰。水滴散落。仿佛皇妃的吻也被一并吐出。

最后，死亡到来。它不是一瞬间，而是一个极漫长的痛苦的过程。暴君爱德华即使行将就木，也要他的敌人在被凌迟、被肢解的过程中饱受恐惧和肉体剧痛的煎熬。不知道是怎样的酷刑，我只看到那些锋利的刑具——尖刀，利斧，铁钩，长剑，绳子，马匹……每一件在刽子手和酷吏手中都会成为可怕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人的忍受是有极限的，现在华莱士就要向这极限挑战。他对此并非完全有信心，我看见他在无旁人在场的牢房里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赐予他面对的勇气。我看见他的脸，面对蓝天，因剧痛而痉挛。刽子手已经对他的身体下手。看不见比看得见还要可怕，那是超乎我想像的。鲜血一定在飞迸而出，还有神经，肌肉，骨头……人为了他的自由和尊严，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啊，从抽象到具体！华莱士。这一刻我有无比的憎恨和无比的爱！这个男人在比死还要痛楚的辗转中的姿态是何等神圣和伟大。这一刻我无比爱他。观看行刑的人群也像被惊呆似地静了下来。一个女人高喊：“开恩吧！”所有的人都高喊：“开恩！开恩！”这相对于他们先前向华莱士的起哄、咒骂和扔鸡蛋石头已经是一个进步。而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暴君的仁慈上。他们永远是被欺骗的愚昧的一群。现在，结束这酷刑折磨的权力掌握在华莱士手上了——只要他认罪，便可速死，永获解脱。他张开嘴。他有话要说。刽子手也停止了动作。全场都在等待。他将说什么？有什么是他在走向死亡前非说不可的话语？涌动在他极端痛楚的身体中的，究竟是什么？我也在等待。我看见他的嘴在翕动。一股气流，带出极其巨大的声量和气流，从他口中冲出，那就是——“自——由——！”我的心在这一刻停止了跳动。这个词，这声音，从银幕、从几百年前的遥远山川，穿过岁月、时代、生和死，像光和电一样闪光呼啸，直冲云霄，穿透我的心脏。我相信它也一样穿透了他周围人们的心。也许他们尚不

明白那是什么，但那绝尘的气势无疑已令他们目瞪口呆。他们现在是完全安静下来。他们在想这“自由”一词的含义，在想这“犯上作乱”者最后的心声。他们呆立在原地。连行刑官也似乎受到震撼，知道一切都不可逆转，如同日月之不会坠落，江河之不会倒流。于是刽子手在得到示意后举起“仁慈”的利斧。华莱士，他在喊出这最后的呼声后便仿佛已获解脱。他最后看到的景象，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向他微笑的美伦。死并不是可怕的，彼岸有他英勇的父兄和妻子。他的手最后接触到的东西，是他珍藏过许多年并包过一朵紫色无名花的柔软棉布，那棉布上，有美伦所绣的一串紫色花朵。他至死怀抱和珍藏的，是对美伦的爱。而我对他的爱，也在这最后一刻，得到了永远的确定。

这是非比寻常的爱情。千真万确。从此我不能再看米路吉逊演的电影——他的形象，那蓝眼睛，坚毅勇猛的神情，强健的身躯，连同眼中的温柔和豪情，是与威廉华莱士一体的。所幸我从来没有看过米路吉逊演的电影。他脸上哪怕掠过一丝狡诈和猥琐，都会令我受不了——如果他在别的角色中需要如此的话。我也不要看满街都是的书摊上的这部电影小说，蒙上《惊世未了情》这么一个迎合世俗的名，介绍说是华莱士与威尔斯皇妃的一段“惊世艳情”！追求自由并为之甘愿舍弃一切的华莱士，如果知道他被作了如此的商业包装，成为获取巨额利润的标签，他会作何想！即使不是这样，那书也写得很好，我也不准备读。我不想去弄清什么细节原委，来龙去脉，我只是要自己的感受，那活生生的爱、感动、震撼，不被任何语言所扭转，然后方可保持这感受的清新蓬勃，永远如初。

1997.1.3



英雄在遥远中

(外一篇)

○何大草

199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夜，我曾在北京观看由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指挥为德国老人沃尔夫冈·萨瓦利施。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世界一流乐团的演出，心情激动。但称“观看”而不说“聆听”，却又是恰如其分的。人民大会堂真是太大了，我的座位靠后，靠边，我的目光吃力地越过许许多多人的头颅，只能看清台上一团黑色礼服的模糊身影，以及铜管乐器几道铮铮的眩光。指挥自然背对着我们，我们无从得知他的表情，甚至他身子的起伏，手势的变化，都淹没在了遥远的距离和音响的洪流中了。但大会堂中靠电子设备造就的音响，比不上音乐厅原汁原味的醇厚；而音色是沉郁的，远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精致与绚烂。然而我仍从始至终，引领遥望，心愿在急管繁弦的深处，呼出那个向往已久的英雄来。

曲终人散，步出人民大会堂，我觉得自己得到的很少。广场的天空是浩渺而深邃的，有几颗星星在闪烁。我想起卡通片《狮子王》中慕法萨说的一句话，那是死去的君王在看着我们。

半年多以后，我在市场上抱回一套由DG公司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影碟，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次，《英雄》来到了我的家中，几乎让我触手可摸。摄影气势辉煌，画面切换之繁复瑰丽，灯光变幻之神秘诡谲，真让人感

叹技术革命之一日千里。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交响乐团，柏林爱乐的演奏自然是精采绝伦，乐评家称它“具备优异的、柔软的反应力。”这“柔软”二字真是用得好，远比“快速”、“敏捷”、“灵活”一类的词句更耐人寻味而又无可捉摸，也就更接近于音乐这“大象无形”的本体。卡拉扬则是当代指挥界的巨擘，录制这套影碟时，大概正是他生命晚期中的盛年，金色的头发已开始白了，而仪表却愈显高贵，他站在鸦雀无声的乐团前面，如同古时候的统帅在战斗一触即发时，用强弓硬弩压住了阵角。

《英雄》的第一乐章在排山倒海中开始，在如火如荼中结束。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战斗的剧烈与残酷，真就像中国唐诗描绘过的“杀气三时作阵云，相看白刃血纷纷”。战争只有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苍烟落照、伏尸遍野却永远都是相似的。而那个让我望穿秋水的英雄呢，他尚在自我允诺的期待之中。

接下来就是感人至深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然而英雄已经死去，素车白马载着英雄的灵柩，踩着“很慢的柔板”，走向我们不知晓的坟场……贝多芬在这儿表现了严峻的克制，柏林爱乐在倍大提琴低沉浑暗的音色中陷入了冥思。卡拉扬呢，他几乎在奏响第一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前，就耷下了眼帘。屏幕上不断推出他那双举世闻名的手，和脸颊左侧的特写。卡拉扬似乎对自己的左侧像更为偏爱，这就使他的面容常常处在大提琴的背景之上，大提琴优美而丰腴的形体，同他瘦削的脸庞形成了某种超然的对比。他的双眼闭合着，你纵能看清他面容的最细微之处，却无法窥测他内心的风云。所以，我以为比那双手更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消失的眼睛。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之初，那些习惯了被富特文格勒热情的双眼所注视的乐员们，面对卡拉扬耷下的眼帘，一度茫然失措。这些世界一流的演奏家们，感到自己就像孩子似地

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我坐在“台下”，我没有迷失的感觉；我感到的是迷惘。那双耷落的眼帘，像时间的夜幕，遮掩了我与英雄相遇的途径。

而卡拉扬在他演绎的英雄梦中沉浸着，似乎正与英雄对话。在当代的指挥家中，也许卡拉扬是最具戏剧性，也最具个人魅力的一位，他为他的英雄染上了浓烈的卡拉扬色彩。他表达的英雄与贝多芬心目中的英雄相距该有多远？再想一想，卡拉扬驾鹤西去，追随英雄于天上，坟草已有数青矣。我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他投向现实世界的一个虚影。我们即便与卡拉扬的英雄之间，也不知隔着蓬山几重。

关于《英雄》——四乐章的构成及意义，在业已出版的各种音乐手册中，都可以读到详尽而深刻的阐释。虽然美国乐评家爱德华·唐斯认为，言语、文字甚至可以表达无论多么精彩的演奏也无法传送某种对音乐的理解，但我对此心存疑惑。我更愿意相信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说法，一个沉迷于音乐中的无神论者最终也会相信上帝的存在。人间、天上，还有什么比上帝更难以看得清、摸得着、道得明的呢！

我想起另一位指挥泰斗托斯卡尼尼对《英雄》的演绎。托氏声称自己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只是忠实地反映作曲家的的心声，演奏出作品的原貌。托氏被称为客观主义者，在他看来，《英雄》的四个乐章就只是有活力的快板、很慢的柔板、活泼的快板和很快的快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我曾有幸在电视节目中，目睹过托氏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交响曲的资料镜头，画面是黑白的，声音是陈旧的，却看得我内心一阵阵地悸动，不是为音乐，而是为这位在风烛残年努力保持着威仪与尊严的老人。而对神圣的音乐，托氏心肠冷酷，为了追求完美，他排练时平均五分钟就要对乐队发一次脾气。但他的苦心孤诣，并没有赢得普遍的认同。富特文格勒就托

斯卡尼尼的指挥艺术说过一句更为冷酷的话,称他是“可怕的节拍机”。

从贝多芬 1804 年写出《英雄交响曲》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爱乐者更多的是在家中聆听音乐,一张小小 CD 就将整个管弦乐团聚集在自己的面前。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可供我们从容挑选,以《英雄》为例,在唱片行不费太多的力气即可淘出不下十种来,甚至张张有来头,不是上了这个榜,就是得过那个奖。这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的人都可以选择到与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形象相叠合的那一张。然而,每一次演奏、每一张唱片,都带着缺憾,都带来失望。在人类变得越来越个性化的今天,我们共同的英雄该是什么样的呢?聆听一次演出的过程,就是一次寻找的过程。聆听在重复,寻找继续,而失望也在长长地延伸。

如果我们设想,今天倘真能够起贝多芬本人于九泉,他会给我们一个关于《英雄》的权威性诠释吗?他给了,我们又会感到心满意足吗?我以为,贝多芬一定会感到非常的为难。从他 1827 年死去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他在地下,辨认着世界的变化,花开花落的季节。贝多芬今天心目中的英雄,还能与 1827 年的英雄相叠合吗?更为深刻的疑问是,1827 年的英雄,同 1804 年写作时的英雄一致吗?

我仔细观察过贝多芬在不同时期的三张肖像,一张正青春年华,清秀、英俊,眉目之间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一张是为中国人所熟识的成熟期面容,头发因为紧张而竖立着,嘴唇严闭,圆睁的双眼闪着亢奋的光,你能很容易地读出他内心的波澜,对战斗的渴望。与他对视,自然就会想到《英雄》的旋律,《命运》的脚步。最后一张是从他死后的面孔上模制的塑像,紧张消失了,生命也消失了,他的面部是松弛的,神态是安详的。这是写出了晚期弦乐四重奏,完成了与上

帝对话之后的贝多芬。一般认为，贝多芬的英雄主义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走向胜利”来概括，但这些概括离这张图片上的贝多芬何其遥远。我国翻译家傅雷说过这样的话，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存在着自我和命运两个对立、斗争的主题，斗争的结果总是自我的胜利。可是在晚期的四重奏里，结局却是自我的隐忍与舍弃。斗争了一辈子再放弃斗争，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上帝，言归于好，求得妥协。我凝视着这张贝多芬真正的“遗容”，再一次地感受到，他其实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复杂，比我们理解的更为陌生。他最终不愿作一个悲壮而徒劳的西西弗斯，舍弃了扼住命运咽喉的努力，隐忍了对所谓英雄的深深失望。

是的，贝多芬对英雄是失望的。对英雄的失望也许正是理解《英雄》交响曲和理解贝多芬的重要所在。贝多芬是从拿破仑身上吸取素材而创作出《英雄》的，同时他把《英雄》题献给了拿破仑。在拿破仑身上寄托着贝多芬的政治热情和人生理想。把自己的作品主动题献给人，而不考虑任何的现实回报，这在贝多芬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拿破仑无负于一个英雄的光荣。作为一个疯狂迷恋大炮的科西嘉人，拿破仑对法国对欧洲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狂轰滥炸，他的铁蹄快意地践踏着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贝多芬的祖国德意志。看一看拿破仑的宫廷画师大卫当时为他所作的画像《拿破仑飞越阿尔卑斯山》，他骑在白马上雄姿英发，遥指苍天，满脸都洋溢着天才与意志，整个旧世界似乎都在他的眼中发抖！就因为这一切，贝多芬没有怪罪他。贝多芬憧憬着，在拿破仑所摧毁的旧时代的瓦砾上，能建立起他认为最纯洁的政治体制共和制。他坚信在共

和制中,能够实现人类平等、人类大同,唯有共和是人类幸福的田园。但是悲剧就在这里产生了:“共和”与“英雄”是如此的相悖!实现“共和”的理想,只能像后来的人们所唱出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救世主似的时代“英雄”,集意志、权力和荣誉于一体,他产生于专制,也必然回到专制。大概对这一点,贝多芬也心存疑虑,但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历史,也注定必须由一个专制者来捣毁专制制。贝多芬无可选择。

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的第一页写下了:“为拿破仑而作。”但是,他耐人寻味地把第二乐章写成了英雄的葬礼进行曲,他让英雄在完成其大业之前,光荣地死去了。对此,贝多芬的同胞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书中的解释是:“因为他(贝多芬)预知这个伟大人物的悲剧。”拿破仑终于做了皇帝。贝多芬悲愤地怒吼着:“他难道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吗?”是呀,在贝多芬的心目中,拿破仑不是一个“普通人”。拿破仑应该同时是伟大的救世主又是共和的缔造者。最后出版的《第三交响曲》改名《英雄交响曲》,拿破仑的名字被贝多芬粗暴地擦去了,改写为:“为纪念一个伟大人物而作。”但是标题被换掉了,主题却留了下来。这是贝多芬的妥协,也是时代的无奈。贝多芬的时代,需要英雄,需要救星,需要一个伟大人物来统率着时代狂飙突进。那该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代,又该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时代!

拿破仑在大西洋的孤岛上百无聊赖地捱过最后的流放岁月,于1821年病逝。比拿破仑年轻一岁的贝多芬死于1827年。路德维希说,“19世纪没有别人能比得上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火一般的力量了。”拿破仑用血与火毁灭了旧世界,贝多芬用音符拓展了新空间。拿破仑属于历史,他留下一部《法典》供后人借鉴;贝多芬属于未来,他留下音乐让后人常演常

新。拿破仑的时代像彗星一样过去了，我们今天在黑夜中看见的，只是他光芒的余焰；而《英雄交响曲》只要一奏响两个严厉的顿奏和弦，每一次演出就都是一次英雄的复活。贝多芬放弃了斗争，而斗争在现实中继续；贝多芬呼唤着英雄，而英雄主宰人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另一位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音诗《英雄生涯》在柏林首演。施特劳斯由此被一些人严辞指责为妄自尊大，因为《英雄生涯》中的“英雄”正是作曲家自己。《英雄生涯》预告了一个新的“英雄时代”的到来。“英雄”不再遥不可及，他就是芸芸众生中的我或者你。人人都是“英雄”，“英雄”也就消失在人群中了。一个当代中国诗人写道：“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愿作一个人。”

然而贝多芬的《英雄》仍在轰响，在瓦尔特、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的棒下，在某一个简陋的排练厅里，在某一张失真的胶木唱片上，流淌着，歌唱着。《英雄》以拿破仑似的超人形象，观照出我们生活的匮乏、贫血和孱弱。我们不需要超人，但我们是否已得到了“大写的人”呢？我一遍一遍地聆听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尽管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在漂浮的音乐旋律之上，看清我所向往的那个英雄，但我还是听到了他深长的呼吸，滞重的步履和孤独的哀思……我遥望他的时候，我必然要站直我自己的身子；我追随他的时候，我必然要知晓我自己的萎靡。

就在我一边听着《英雄》，一边写下这篇随笔的时候，我忽然联想到本不相干的三个人物。第一个是公元前 227 年，从容深入秦廷谋刺嬴正的荆轲。从一开始，荆轲就明白自己的结局不是通过斗争走向胜利，而只可能经由死亡抵达归宿。第二个是 1948 年被印度教极端分子谋刺身死的圣雄甘地。荆轲衣冠似雪，对酒当歌，是个萍踪无定的独行客；甘地

只披着一块布,禁欲苦行,始终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荆轲了断人生的最后手段就是死亡;甘地唤醒人民的有效方式则是绝食。拿破仑的英雄梦,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和征服;荆轲与甘地的信念则是舍身饲虎,一切为着和平的目的。荆轲失败了,他血溅秦廷的细节,流传下来的已不足信。漫长的岁月几乎将他的身影吞噬殆尽,他留下的,是人生的绝望与唯美;甘地死于三颗左轮手枪的子弹,弹发前的一刹那,他对凶手说,“你来迟了。”甘地留下的,是自己难以割舍的祖国和人民,在烈日的曝晒下,生息,繁衍,还要去争取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第三个人就是前述那张面模塑像下真实的面孔,《英雄》的主人贝多芬。他向命运斗争,最后向命运皈依。生前他就是个聋子,身后更听不见世人的吵吵闹闹。他的面孔出奇的平静,像是宽容,又似嘲讽,他说,谁是英雄?谁又不是英雄?只有上帝知道。

我终于听出来,《英雄》其实就是英雄的挽歌。英雄在音乐中诞生了,在音乐中埋葬了,英雄也就在音乐中永恒了。在我这样肤浅的无神论者听来,《英雄》的声音就是天国的声音了。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为死去的英雄允诺:

明天,明天,明天是上帝复活节!

活着的和死去的大师



帕尔曼

在小提琴的天地中，帕尔曼是活着的大师，海菲茨则是死去的大师。不过，把海菲茨和帕尔曼相提并论，却还有另外一些不合适的地方。虽然他们同属大师，却不属于同样的重量级。帕尔曼如同高山，海菲茨好比大海。高山总有尺寸，海水却不可斗量。不过，在中国，帕尔曼名头要比海菲茨响亮许多。一是海菲茨弃世已经十年，而帕尔曼还快乐地活着，并拖着伤残之躯在世界巡演。一是帕尔曼的琴声妩媚而煽情，能把观众的眼泪给拉出来。海菲茨冷多了，演奏时他只一心一意看着小提琴的指板，却看不到周围的观众。这不符合世纪末的潮流。

当然，所谓世纪末的潮流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表情的忧戚和感伤；一方面是内心与感观的双重愉悦。两者都是真实的，只是看起来难免矫揉造作。大家都说，时间不多了。大家又说，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快乐地活着吧。

帕尔曼作为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是不幸的。但他以天才和毅力超越了自己的不幸。当他以愁肠百结的表情拉起《辛德勒的名单》或者柴柯夫斯基的小夜曲（作品26号）时，他的病腿成了他演绎这类乐曲最好的注脚。我看过纪念柴柯夫斯基150周年诞辰音乐会的现场录像，帕尔曼演奏的就是这支小夜曲。当他拄着拐杖走上前台时，观众掌声大作，他熟练地微笑，致意，然后焦眉苦脸地拉起来，一直拉到掌声再次如同风暴般地在大剧院中轰鸣。帕尔曼迎着掌声艰难地站起来，微笑，致意。我就想，这支通常被译为“忧郁小夜曲”的作品，在帕尔曼的弓弦下，倒更像是一支酣畅迷人的“忧伤小夜曲”。我还记得，法国女作家萨冈的处女作就叫《你好，忧伤》，这部作品让她一夜成名。可见，忧伤是多么的招人疼爱。当有朋友问我小提琴CD买谁的最好时，我就说，当然是帕尔曼啦。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对遇见的学习小提琴的娃娃说，你应该多听听海菲茨。不过我知道我说也是白说。中国人对小提琴的理解，大多来自《梁祝》和帕尔曼。帕尔曼身残志坚的事迹，温暖着我们许多人的心。他是一位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大师，也是一位极为罕见的聪明人。

海菲茨的私生活是神秘的，甚至有人说，是严峻的。而他的气质是冷漠的，也是高贵的。但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高贵者最愚蠢。”所以比起帕尔曼来，他今天的不合时宜，也是正常的。33岁那年，海菲茨荣归故里，他的崇拜者们砸锅卖铁换了盘缠，跋山涉水跑去听他的音乐会，为他欢呼，为他唱赞美的歌。这样的场面无疑是辉煌的，但今天，已经有更多的人有能力调度出远比这更为宏大的景观，他们中包括惠特尼、麦当娜，以及癖好整容的杰克逊等等。即便是海菲茨再生，他也已是回天无术了。他为之献身的古典音乐，在许多地方已经被雅称为“白发艺术”。年轻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或打开了一个快乐的缺口，学会了用己来娱乐自己。像帕尔

曼那样能够以古典音乐家身份创造出流行明星奇迹的人，是极为少数的，这之中，并不包括海菲茨。有一次，海菲茨对一位乒乓球运动员说，我能为你拉点儿什么吗？小伙子耸耸肩：我什么也不要听，我讨厌这玩意儿。我聆听过海菲茨演奏的柴柯夫斯基的CD，他拉的《忧郁小夜曲》似乎没有什么感情，即使有，也被有力地抑制住了。忧郁来自孤独者的内心，也只能回到孤独者的内心，这是大的忧郁。

海菲茨使我联想到海明威。海明威著名的冰山似的写作方法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非议。即使在他最走红的那些年月，一些沙龙里的妇人也在抱怨，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老是成天喝酒，他们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可以理解为什么也没有表达。但海明威对自己写下的故事和写下故事的方法十分清楚。马尔克斯为他总结道：那就是恰好与浪漫主义的创作观相反。判断海菲茨和海明威这一类艺术家，是让人颇费踌躇的。他们可以被认为没有激情，也可以被认为最富激情。岩浆喷薄大河奔流，诚然是激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激情？

一二年前读到过一篇写“寻找海菲茨”的散文，文章写得很好，只是觉得有些过于抒情了。如果是注定要远去的東西，还是不要寻找的好。寻找回来的海菲茨，似乎总会有些变样的感觉，这就像雪落在地上，我们无法将它重新拾起。死去的海菲茨是鲁迅描述过的那种雪，“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所以，我们还是多听听帕尔曼吧，他是那么的忧伤，又是那么的欢乐。

豹子的美是难言的



《少女头像》 莫迪利阿尼

说来也怪，我一直觉得莫迪利阿尼像一头豹子。可能是他的面孔太俊美了，太俊美的事物总是有一种孤独的意味，就像动物中最美的豹子，它因它的美而独自游荡在丛林草原上。阿波利奈尔有一句诗，“婊子美如金钱豹。”高级的婊子应该是野性的、沉默的、孤独的，像豹子一样，又跟夜相似，淫荡而贞洁。阿波利奈尔是莫迪利阿尼尊崇的诗人，在巴黎那段未来的大师们云集酝酿的时期，莫迪利阿尼没有机会在阿波利奈尔面前展现他豹子似的美，因为他不愿奔跑。换一个意象来看，莫迪利阿尼也像夜里的一滩霓虹灯照耀着的水洼，美且忧伤，至于水是清是浊，那就看不分明了。

一般说来，太漂亮的男子在女人眼中反而单薄，缺乏一种浓酽的性感气息；好在莫迪利阿尼并不完美，他太矮，差不多一米六五左右，

这就有了一个缺口,他所有的令人不安的、不满的东西,通过这个缺口都有了一个说法。就我自己来说,对于莫迪利阿尼这种放肆的天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如果我和他恰巧处在同一时代而且时不时还得打交道的話,我会无比痛恨那种处境。我这个庸人,有的是一双脆弱的眼睛,经不得他那类天才的强光。我能承受的是经过处理后的光,这种光滤掉了无耻卑劣,剩下的是一种诗意的乖张、让人爱怜的淘气和温情脉脉的无奈。七十多岁的阿赫玛托娃在1964年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与莫迪利阿尼的那段短暂的恋情时,就是这样的经过过滤的情感,是一种老人的慈祥心境。一切的扎刺都已经去掉了,回顾往昔,回顾死去的爱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凄伤柔和了。她写道:

“莫迪利阿尼喜欢彻夜在巴黎游逛。当街道陷入沉睡的寂静时,我常常听到他的脚步声,于是我便走近窗台,透过百叶窗,望着他在我窗下缓缓漫步的身影。”

阿赫玛托娃的另一段与莫迪利阿尼的故事仿佛就是一段地道的法国爱情电影里的情节。

“有一天,我和莫迪利阿尼大概没能约好时间,所以我去找他时,他不在家。我决心等他一会儿,我手中有一捧红色的玫瑰花。画室的大门锁着,门上那扇窗户却开着。我闲得无事可做,便把鲜花一枝枝抛进画室。没有等到莫迪利阿尼归来,我便走了。当我们见面时,他表示万分惊讶:房间上着锁,钥匙还在他那里,我竟怎样进了他的屋。我把经过说了一遍。‘不可能,花儿摆得那么美……’”

我喜欢看这种优雅的故事。虽然事实中的莫迪利阿尼酗酒、吸毒、斗殴,时时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跟人争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忧伤静谧的画,也足以让人忧伤静谧地想念了。我经常静静直视莫迪利阿尼的照片,我喜欢他微微侧

扬着头的样子，浓黑齐整的卷发，无法挑剔的五官，孩子似逞强的却又柔弱的神情。意大利地中海边的那种特有的忧伤和热情，波希米亚似的铺张气质，这种魅力如今我在每周一次的意大利甲级联赛中还可以十分饱满地领略到。



《比阿特丽斯·哈斯丁斯》
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情人比阿特丽斯·哈斯丁斯，认为莫迪利阿尼既是珍珠，又是猪崽。这使得阿赫玛托娃十分气愤。针对有传记称比阿特丽斯曾对莫迪利阿尼有过巨大影响这种说法，阿赫玛托娃认为，“一个把伟大的画家叫做猪崽的贵妇人，未必对某人能起开导作用。”七十岁的阿赫玛托娃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容不得别人尤其是别的女人对莫迪利阿尼的些微不恭之词，但她的反驳依然是收敛温和的，有着充分的修养。我想，幸亏莫迪利阿尼画了几幅阿赫玛托娃的肖像后就开始了对其他女人的追逐，这才使得五十年后的我们读到了阿赫玛托娃那篇动人的回忆录。画中的阿赫玛托娃像一个埃及女王。他们两者之间的那场巴黎邂逅是一个豹子与少女的故事，美丽得令人眩目的豹子围着俄罗斯少女盘

旋了几圈，就一路烟尘地消失了，留给少女一生的晕旋的美妙。而豹子的最后的那个女人让娜·赫伯顿则是在豹子死后的第二天怀着已经满了几个月的孩子跳楼自杀。这个忍心害死孩子的女人！莫迪利阿尼生前并没有善待她。

莫迪利阿尼将这个世界看成是薄薄的一片，锐利、易碎。他的风景画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处理树与房舍之间的关系，就干脆把树画得跟长在墙上似的，后面贴上一块房顶，再贴上阴霾的天空。他笔下的女人也都是薄薄的一片，造型上多是长面、窄鼻、细眼，其灵感来自非洲木雕。这些女人们大多作足了一付厌倦的模样，斜睨着；就是正对着你，也都是把你看穿了的。

美国的美术评论家卡罗·曼女士著有莫迪利阿尼的一本评传，里面有两段关于他笔下的女性肖像画的评论，很感性、很能引起我的同感：

“在早期的裸体画中，模特们总显得精神高度紧张，身体



孱弱，这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他和情人们的关系缺乏稳定性。模特多不漂亮，有的竟丑陋不堪，气势汹汹。他对女人总是怀着既爱又恨的双重心理。画面上总是隐藏着某种潜在的兽欲。”

“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樱桃小口，眼睛是全画着墨最多的地方，它们常常是一只明一只晦，有时茫然若失，有时睡眼惺忪，有时又闪亮如星、清澈似水。总之，人物的眼神千变万化，让人难以捉摸。……莫迪利阿尼最引人注目的也是他的双眼。被他打量的人，常常因那奇怪的眼神而手足无措；而女人则常被这一眼神搞得神魂颠倒。也许这种醉人的目光和他吞服可卡因有关。”

关于莫迪利阿尼的眼神，我想这是一种复杂难言的事物。我看过他的一些照片，那眼神确乎是摄人心魄的，野性、怯弱、警惕、温柔，超出了性别和物种的界限。这眼神令我想起德国影星娜塔莎·金斯基演的《豹人》一片。动物园铁栅栏的内外，里面是豹子的眼神，外面是金斯基的眼神，二者对视着，瞬间，血脉相连的神光贯穿了人与豹之间的物种上的屏障。这个镜头给我印象太深，我也是在这个镜头里领略到豹子的深刻和趋于极致的美丽。这种美总是和厌倦联系在一起的。里尔克有首写豹子的诗，其中写道：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

华美的生命到了最后总是厌倦的。一个人为一辈子的才华横溢付出的代价就是临了痛弃一切荣耀和自豪，就像柴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在华丽繁复的洛可可风格中人的感观是怎样从迷恋、沉醉跌入万劫不复的厌倦的深渊的。临死前的莫迪利阿尼，那种英气逼人的美貌已经荡然无存，虽然他只有35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19年，在自画

像里，他的眉宇之间突然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宁静气质；他穿上了褐色的外套，围着一条淡蓝色的围巾，头发纹丝不乱；他把眼一闭，头向后轻轻地扬了过去……他是不是应了他少年时代的那句谶语呢？他曾说，“我希望有一个短暂却诚实的一生。”

关于豹子与莫迪利阿尼之间那种类比点，在我也是复杂难言的。我还是把里尔克《豹》（冯至译）这首诗完全抄录下来吧，这里面包含了很多，虽然不是全部。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1998.1.25

魔鬼与天使

家里有一本稀破的《歌剧素描》，徐迟先生编译，商务印书馆发行。版权页早没有了，但是看原书的所有者 1938 年夏的题签，当然此书出版是在此之前。这是我最早看到的介绍歌剧的书，其时正是“文革”，我全当是故事来看的。印象最深的是徐迟先生相当欧化的句子和对音乐的激情。倒是“文革”后，有机会听了一些歌剧的录音之后，再读一遍，才对徐先生所描写的音乐家和介绍的歌剧有些认识。

其中介绍了 19 世纪法国作曲家查理·古诺的《浮士德》。正是此剧确立了他在乐坛上的地位。书中介绍了古诺是如何走上作曲家道路的。古诺的父亲是画家，母亲的艺术修养也很高。父亲去世后，就靠母亲教授绘画和音乐来维持家庭生活。他六岁第一次进剧院听音乐会，就兴奋激动得不吃不喝。他的母亲不愿他做音乐家，去恳求学校的老师把音乐从他的脑子里驱赶出去。老师就对小查理说“莫扎特在你的年龄已经很出色了。你干得了什么呢？”于是随手写下一部歌剧中的一段爱情诗，让小查理谱上音乐。小查理很快谱好，老师让他唱出来。“‘我唱了’。后来古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我一唱完，羞涩地望一望他的判官。他的眼中充满了泪珠。他把我拉近了他的心，说：这是美丽的，美丽的，我的孩子……决心做一个音乐家吧，既然有魔鬼逼你走上这条路，就是反对也没有用的了。’”

这逼他走上音乐道路的魔鬼也许称作命运更合适，如果魔鬼真都这样的圣洁，也就不成其为魔鬼了。魔鬼是要诱人堕

落犯罪的。浮士德是欧洲古老传说中的一个角色。歌德曾把这个传说写成一个诗剧。古诺的歌剧就是根据诗剧中的浮士德与玛格丽特恋爱的一段改编而成的。浮士德是一位老迈的哲学家，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研究科学与哲学，他渴望了解一切自然人生奥秘，诅咒生命和衰老，向魔鬼摩菲斯特求救，并且签订了死后出卖灵魂给魔鬼的契约，而魔鬼则许诺给他一切，包括青春和爱情。在魔鬼的帮助下，他引诱美丽纯洁的玛格丽特，害死她的母亲，然后抛弃了她，还杀死了她的哥哥。玛格丽特在绝望中，把自己与浮士德的孩子溺死，因此被判死刑。

虽然在诸多有关浮士德的故事中，都是最后善良战胜邪恶，上帝战胜魔鬼，玛格丽特的灵魂最终升入天堂。但故事的劝喻世人的用意还是非常明显的：不要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

“文革”中还读过一本好像是土耳其的小说，内容是什么，差不多忘光了，大概是说原本善良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受心里魔鬼的诱惑，走向罪恶的道路，结局好像是改邪归正了。这书名留下的印象极深——《我们心中的魔鬼》。魔鬼要引诱人，必须利用人们内心的罪恶。就像“上帝”劝人向善，也靠的是人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可有些时候事情也许正相反。

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又译作《丽哥来陀》）中，好色的公爵去勾引他的宫廷小丑丽哥来陀的独生女儿——美丽纯洁的吉尔达时，隐瞒自己的身份，扮成穷学生向吉尔达求爱。这同浮士德引诱玛格丽特可有点不同，浮士德是以一个社会地位比农家女玛格丽特高的绅士形象出现的，而且魔鬼还给她送来一盒珠宝。在古诺的歌剧中，玛格丽特的《珠宝之歌》是最受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青睐的曲目了。这支歌充分表现少女的单纯、天真、欢乐和虚荣。而吉尔达却没有半点虚荣，公爵是清楚地看透了她的纯洁善良，所以才会扮成穷学生，只以一个情字来打动她，而不是对一般慕虚荣的女孩子那样，以

金钱珠宝地位来骗她们上钩。所以吉尔达的被欺被弃，以致最后明白公爵的无情无义，仍深爱他，并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在刽子手的刀下换取他的生命，就更让人觉得可悲可悯。

摩菲斯特与浮士德签订卖身契约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什么是他的权利，什么是他的义务，什么是他的最终的结局。可惜世界上引诱人走上罪恶道路的魔鬼并不都像《浮士德》中的摩菲斯特那样头角峥嵘“正大光明”地出场，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魔鬼就对钱钟书先生说：“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这是钱钟书先生 30 年代末作品，让人无法不佩服他那样敏锐的洞察力。

魔鬼的确会扮成可追求的理想，就像“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等等极端的邪教组织一样，教主最开始总是做出天使一样的圣洁，就是做恶也以神圣的名义，让你放弃自己的思想，无条件地服从。张北海先生的《从魔鬼到梦魇——琼斯和他的人民教》一文，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 1979 年圭亚那“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的惨剧中，教主琼斯和九百多名教徒“自杀”而死。其中一个善良的家庭的遭遇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狄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全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她的母亲丽莎因跟随丈夫的信仰而成为清教徒。丽莎痛恨暴力，主张种族宗教和谐，为贫苦大众服务。狄比的父亲雷顿博士当时替美国陆军主持一个研究化学武器的实验室，因丽莎痛恨这种不人道的研究，在她的极力反对下辞职。先是这双夫妻的儿媳卡露莲加入人民教，接着劝说儿子劳利加入，再就是女儿狄比和她的丈夫。再接着是患癌症的丽莎。卡露莲不久被教主琼斯夺走，教主又给劳利另找一个太太克伦，到圭亚那后克伦又被琼斯夺走。丽莎·雷顿夫人也与丈夫离婚，据她丈

夫的估计，她前后捐给人民教的财产有二十五万美元。丽莎最后也去了圭亚那，后来因癌症去世。狄比是这个家庭唯一的觉悟者，她向联邦政府警告了“琼斯村”集体自杀的危险，但是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她自己逃出了琼斯村。克伦跟大家集体自杀，作为琼斯“安全人员”的劳利被控谋杀罪，狄比的丈夫布莱基因惨案发生时，不在琼斯村而幸免于难。一个家庭就这样毁灭了。可悲的是这个家庭不是因为贪婪、自私、暴虐等罪恶而毁灭，却是因为善良、纯洁，渴望非暴力，关心帮助他人，甚至捐出自己全部的财产，而且他们全部受过高等教育。这真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有一部钱拉·菲利普和勃洛碧吉达主演的法国影片《魔鬼的美》，也是一个浮士德与玛格丽特恋爱的故事，但是却和以往浮士德故事大有不同。浮士德与魔鬼签订了死后出卖灵魂的契约。但是在魔鬼帮助他得到青春爱情的时候，魔鬼又指引他在午夜钟声响起时，去王后的寝宫。浮士德强迫魔鬼告诉自己，他这样走下去，最终会如何。魔鬼被逼无奈，在王宫的镜子里展示，浮士德进入王后的寝宫后，国王会来，他会杀死国王，自己成为国王，远近不臣服的国家他就去征讨，在尸横遍野的世界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浮士德看到了这样的前景，不再听凭魔鬼来安排他的后半生，最终战胜了魔鬼。

我曾想，在早年琼斯本人和他手下最忠实，甚至为他去杀人的追随者们的心中，也未尝没有一点善良和理想，或者他本人也未见得想到最后自己会成为魔鬼，然而听凭野心、权力和魔鬼的指引，最终走上一条罪恶的道路。有一句西谚说，傻子的后面跟着骗子。这话不仅适用那些因为愚蠢、贪婪、自私而上当的傻子，同样也适用于善良纯洁，被理想蒙住眼睛，不再用自己大脑思考的信徒们。

守林人

○ 一平

院长邀我一家到北部林区度假。他是自然生态学家，那里有他的一个工作站。营地不大，占地约有 30 亩左右。一座两层的波兰乡间木阁楼，院长专用。还有一排简易木房，供客人住宿。学院的一些学术会议常在这里举行。假期，教师、学生三三两两也常来此度假。还有就是工具库，木柴棚，一处食堂和三条狗。来到这儿，便像来到一个世纪前的波兰。那时，波兰的地主便是这样生活的吧？

营地紧靠湖边，走出旁门就是丛丛的芦苇。一道窄窄的湿滑的木栈，系着两条小船。那份幽静，使人想到中国那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天光水色，水鸟浮游。我叫这片湖为“白湖”，因为这地方的名字是“Biale、Blota”，“Biale”是“白色”的意思。再则，它的水光也的确明亮。营地之外是方圆绵延数十公里的森林。波兰的美丽，主要是它的树林。

那日，车开入林中，颠颠簸簸。虽然有地图，但还是转了半个小时，才偶然找到了那个营地。时已黄昏，晚饭已过。院长又重新招待我们。长长的松木饭桌、木凳、粗糙的餐具，一只陶杯的把儿已经摔断……面包、黄油、奶酪、蜂蜜、香肠……简朴而丰盛，像回到了乡间农家。饭间，厨房里走出了一位老人，有六十多了吧，腰身很直，灰蓝的眼睛灼灼有神，穿一双高式旧球鞋，达膝的线袜，短裤，一件圆领短衫。他清瘦，但脸色红润、健康。最扎眼的是他那一脸传统斯拉夫人灰白的长须，更显出老人的自持和尊严——我想到老托

尔斯泰的那幅蓄须像。他很像一个斯拉夫农民，或守林人。院长介绍说：“这是诺瓦契克教授。”我有点吃惊。老人放下围裙，用他平缓的低音，诙谐地说：“今天我不是教授，是厨师。”（营地的伙食，由大家轮班做。）我们都笑了。

我的儿子很快找到了一个同龄伙伴——乌卡什，他们一起打闹、骑车、去树林、点篝火、带狗奔跑……儿子告诉我：乌卡什的爸爸像爷爷。在外几年，儿子的汉语已有问题。但我明白，乌卡什是诺瓦契克教授的儿子。儿子才十岁，而父亲已六十多，年龄上当然是爷爷了。诺瓦契克只有这一个孩子，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他们像是伙伴。父亲不训教儿子，儿子也不叫他“爸爸”，而直呼其名：“阿大姆”。乌卡什是个有意思的孩子，他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城市，而喜欢乡村。一个夏天，他都住在这儿，几条狗终日跟着他。他总是漫不经心，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好动，拾柴，搂草，点篝火，和父亲做手工……他常常一个人随意地躺在干草上，眼睛眯眯地望着太阳。诺瓦契克小时大概也是这样吧。

诺瓦契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他总是精力充沛，像苍老清新的树林。这里，我的儿子最喜欢他，总是跟着他，俨然是他的朋友。他带两个孩子去树林、采野果，也骑车去十几公里外的小镇。有时乌卡什闹“独立”，他就带上我儿子一个。黄昏，儿子带着一身新鲜的气味回来，满嘴的紫色，他闪着亮亮的眼睛告诉我：爷爷今天带我去采牙个蛋（Jagoda，一种林中的小浆果）了。夕阳照着他，那是生命的光辉。

营地的南端一角，诺瓦契克搭了个小棚子，长、宽、高各一米多。四根不粗的红松木架，罩上苫布，晴天可以遮阳；阴天，可以挡风雨。白天，他将小棚的前帘撩上去，上面工整地刷着几个白粉字母：“工作间”；晚上，他将其放下，又有另几个字母“休息”。“工作间”里有个小桌子，40厘米高，

两层抽屉，里面有各种工具：钻头，木锉，小钢锯，沙纸，胶水，铁钉……桌面上固定着一台精致的小台钳。白天，如果他不进林中，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

他送给我儿子两件礼物：一支木笛和一把木剑。波兰有一种灌木，杆很直，木心很软。他锯下一段，刮去外皮，露出白净的木质，用铁条将木心掏空，在一端切出一个小小的斜面，相对斜面刻出一道长方的笛孔。这是一支十几厘米长的竖笛，像中国的箫。把它含在嘴里，随着用气的不同，便发出呜呜的曲调，他让我儿子写出他中文的名字，于是他模仿着，在竖笛的一面用木刀刻出“李茅”两个中国字，他又拿出一只放大镜，对着太阳聚出一个小小的光点，那光点在木笛上慢慢移动，于是木笛的另一面便灼出两个波文“Biale、Blota”，那是漂亮的手写体，圆润而大方，我的儿子看得惊奇不已。诺瓦契克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把日本的刀和一把中国的剑，问我儿子喜欢哪一个。儿子挑了剑。于是他便选了一柄硬木条，削了一把中国剑，用沙纸细细地打光，剑柄刻上斜纹。剑上的横把儿，用两片短木，中间掏出凹形，合扣在剑身，用木胶粘住，又截锯了几枚小钉钉上，两头打平。儿子很高兴，说这把剑唯一缺的是一条红穗。

这是我儿子两件珍贵的礼物。每当我禁不住拿起那支短笛，把它含在嘴里——我喜欢它那清香的木质的味道，呜呜吹响的时候，儿子便远远地喊道：“别吹我的木笛，是我的。”于是他走来，愤愤地把它拿走，将笛口在衣服上随意地擦一擦。我想，这两件礼物会一直伴他长大。

那日上午，我们由湖上划船回来，诺瓦契克正裸着背，坐在木墩上，修一把旧帆布躺椅——那一定是营地最“古老”的财产之一，白灰色木质已经失去了本色。“工作间”太小了，他只能在“野外”工作。阳光灼热，他结实的脊背渗出亮亮的

汗迹。他拆开两只化纤袋，更换躺椅上的旧帆布。他戴着花镜，背着太阳，举着粗粗的缝针，把丝线慢慢地穿过去，我看了他的“缝纫”，那是男人的手工。

诺瓦契克是院长的朋友，住在院长的楼下。他是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谦朴得像个农民——斯拉夫农民。如果你熟悉米勒的画，一定可以想像得出这位“农民”的神态。他对谁，甚至对孩子都抱有敬意。谈话的时候，他认真地望着你，但他站或坐的位置却保有一定的距离。他说话不多，但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甚至是玩笑。他喜欢玩笑，并不刻板。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饭桌最末一个位置，默默地来，慢慢地吃，然后静静离开。他是多么不愿打扰别人。

一天，我问他：“您的妻子怎么没来？”他说：“她身体不好，可能这个星期来。”“她自己开车来吗？”他停了一下，望望我：“不，她搭别人的车来。我们没有汽车。我们的一切都靠自行车。”我自觉有些失言。波兰大多家庭是有汽车的，我不知道他是不喜欢汽车呢，还是其他原因。不过，波兰教授收入很低，这是我知道的。汽车对波兰男人、女人都很重要，它是地位与身份的标志。我很想见见这位没有汽车的教授的妻子。

对，我应该说一下诺瓦契克的自行车。他和他的儿子各有一辆自行车。父亲的是二八大车，儿子的是二四小车。样式旧，年头也旧。他那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吧，脚蹬子的电镀都已经剥落了。车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车身新涂的漆（不晓得这已是第几次），车架亮黄色，前后挡泥板浅蓝色。弯式车把，镶一面精巧的反光镜。前灯、后灯、旧式磨擦中轴自加了一个木质扳钮。黑色的后座架搭着一副淡紫的自行车旅行袋。车的横梁上红漆写着“Biale、Blota”。儿子的车也同样收拾得利利索索。诺瓦契克每天在林中骑车十几二十公里，是

锻炼身体吧。他是依靠双脚在大地上生活、行走的人。

每到黄昏，诺瓦契克便开始和他儿子准备晚上的篝火了。乌卡什去拣树枝，燃篝火是他一天最重要的事。而父亲则去木柴棚劈柴，他是左撇子，用一把宽刃短斧。这是林中，不允许燃草原上那种熊熊的大火堆，因此，我们只有小小的篝火。诺瓦契克用泥捏了一个30厘米见方的小火炉。乌卡什也捏了一个，比他父亲的小一半，不同的是它多了一个小烟囱，他告诉我的儿子，在它烟囱里可以熏鱼和香肠。我们的篝火就是这两座小火炉。点燃干草，加上树枝，冒散烟，闪出火苗，再添小块的木柴……林中的夜风很硬，炉口小，但火焰依然旺盛，突突地，迸出的火星在漆黑的夜色随风散去。人渐渐地多起来。人们围坐在篝火边，谈笑，唱歌，饮酒，年轻人相恋着，情爱像火焰一样浓烈。高远的夜空，碎星钻石般闪烁，它们也有自己的秘密。无边的森林更加辽阔，更加寂静，重叠的树影交换另一世界的深秘言语。诺瓦契克父子照看着炉火，不时地添加木柴。侧着的头，靠近炉火，红红的火光把他们专注的面颊、眼神映得更加清晰、兴奋。他们像主人，招待远方的来客。我的儿子立在火前，很有兴致地学着用长长的树枝插上香肠，青苹果，伸入火中烧烤。窜起的火苗，把他长长的身影投到远处。

如果我不告诉你，大约你永远也想不到他的专业。他是哲学教授——数理哲学家（于某一学科做一教授算不得什么，但在欧洲做哲学教授则是另一回事）。这真令我吃惊。波兰的数理哲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真遗憾，我的语言无法和他讨论哲学，也不能阅读他的著作。我喜欢哲学，读黑格尔，康德，但读不了数理哲学，对那些繁难的公式，望面生畏。由毕达哥拉斯到罗素，到当代，这一部渊深浩瀚的西方哲学，他一定异常熟悉。我没想到，

他实际上是一位渊博的老人；我也想像不出他是如何把那天文般高远的深秘的学识化为农民般简朴的生活的，或说二者是怎么衔接的。他是一位智者吗？即使不是，也一定洞悉人世。否则，他怎么这么从容而坦然。或许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真正的内涵。“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也许我不该把东方的思想加予他，他属于另一文明，但我还是相信千径宗一，万川归海。人类的语言、思想、道路和方式各有不同，但人类生命的真谛，各文明的终极意义是一致的。而诺瓦契克对中国文化也确有所知。年轻人围在一起问询中国，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个“口”形，中间加一“丨”线，说：“中国是世界之中的意思。”他也知道老子和“道”。作为哲学家，他不乏这些知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便想起我的朋友写的一段话：“他（放蜂人）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我称诺瓦契克是守林人，因为他看守着人类的知识智慧，也看守着人类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简朴的生活。就像他驻守林中，在黑夜燃起小小的篝火。燃起的火焰，呼应着浩渺夜空闪烁的星辰。是的，他在现代之外。他来自历史的源头，脚踏泥土，在大地上播种，看守时间的种粒。他是一位怎样的哲人呢！

1996年8月30日—9月3日于波兰罗兹

看牙记

○ 若水

在美国住了一年半，很幸运的是没有生一次病。早就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贵得惊人，所以不敢生病。

但是我的牙齿不好，到美国后，每次刷牙都要流血。朋友劝我去洗牙，说他认识一个牙科学校的学生，现在正在做毕业实习，因此收费很低，只要 20 美元。“等于不要钱。”朋友说。

20 美元还等于不要钱！我才不想花这个钱呢。

拖了一两个月，牙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不可能拖到回国后再治，只有下决心去看牙。我听说，若是找正式的牙科医生，洗一次牙要 100 多美元，所以 20 美元确实是很便宜的。我按照朋友给的电话号码打了电话。那位朋友认识的学生是越南人，她没有时间，让我去找一个美国学生，反正都是学生，水平差不多，收费也一样。

我到了波士顿的弗西斯牙科卫生学校。服务台先让我填一张表。那张表密密麻麻，正反两面全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关于就诊者健康情况的。填这张表费了不少时间。我把表交给服务台，就坐在候诊室等待。

这是我第一次到外国医疗场所，不免有些好奇。候诊室摆着许多关于牙齿卫生的宣传品，任人取阅。引起我兴趣的是墙上还贴着一张告示，告诉病人他们有哪些权利。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华盛顿坐出租汽车时，也看到汽车里贴了一份

“乘客的权利”。

我预约的实习医生出来了，她礼貌地同我握手，介绍了自己。当她拿着我填写的表看时，我告诉她，有好些医学名词我不认识，只好空着。她说没有关系，就领我到治疗室。

那是一个很大的大厅，分割成许多小间，在其中工作的清一色的都是女性。我的医生跟我解释那些问题的意思，然后代替我填写。在我看来，那些问题是很繁琐的。

这里有一种友好的、融洽的气氛，让病人感到放松。她带着口罩和乳胶手套，开始工作，不时吩咐我：“张大嘴！”“脸往左转！”“往右转！”声音轻快柔和，那口气就像哄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她说我的牙早该洗了，牙垢太多，所以特别费事。美国人很重视牙齿卫生，大约半年洗一次牙，讲究的三个月一次，所以牙病比中国人少得多。

洗一次牙要半天时间，可是对我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我记得我在中国洗牙用的时间大约是一个多钟头。

最后她把老师请来进行检查，这是一个年纪稍大的妇女。我觉得我的牙齿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细心的对待，可是老师还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老师又示范式地在我的牙齿上补做了一些工作，一面指点着她的学生。

这一次以后我的牙齿暂时好了。可是半年以后，我的左边的一颗牙疼起来，而且牙齿又流血了。我找到了哈佛大学所属的一所牙科学校。我到这里看牙，是因为收费便宜。可是我马上发现，这种便宜不是白给的。

接待我的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国青年，三年级学生，姓陈。这次没有叫我填表，不过陈在膝盖上摆了一叠纸，开始向我提问题，从我的眼睛开始。

你的眼睛近视吗？有老花眼吗？你的耳朵疼过吗？有过耳病吗？咳嗽吗？上楼喘气吗？咯过血吗？体重在减轻吗，还是在增加？有没有得过肺结核？有没有淋巴腺的毛病？有没有胃病？有，那么你什么时候发现胃病的？吃什么药？多久好的？便秘吗？泻肚子吗？有没有肝炎？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心脏病？感到过烧心吗？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关节炎？你对牛奶过敏吗？有没有神经过敏？有没有水肿？过去还生过什么病？动过什么手术？住过几次院？现在还有什么病？在吃什么药？对药物过敏吗？对麻醉药过敏吗？皮肤上有没有长过红点？有没有发痒？有没有什么地方淤血？……

你的父母健在吗？——父亲死了，怎么死的？他们的心脏有毛病吗？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分别是多大岁数？有没有心脏病，糖尿病，血友病？几个儿女？多大岁数？你生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水含氟吗？你在什么中学上学？那个中学叫什么名字？什么大学上学？什么系？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

我忍不住了，说：“这跟牙齿有什么关系？”我想陈是在参与一项科研调查，可这是查三代了。这到底是在看病还是在我做调查？也许牙齿跟全身都有关系，只是我不懂，可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这和牙齿扯得上吗？

陈无可奈何地说：“对不起。我们对每个病人都要做这样的询问。”他自己似乎也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

终于问到牙齿了：你每天刷几次牙？用什么牙刷？什么牙膏？用什么方法刷牙？你用牙线吗？你爱护自己的牙齿吗？定期洗牙吗？得过什么牙病？你喝茶还是喝咖啡？你有吃糖的习惯吗？……

从下午两点到四点，整整两个钟头，都在询问和回答问题。最后总算问完了，陈说：“现在开始做检查。”

可是他先查颈部，耳旁淋巴腺，再查唇，然后才到牙。他

看了透视照片,说我的那颗疼牙保不住了,要拔掉。他还没有资格拔牙。他请来一个美国人,大概是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几乎是把上手教他如何拔牙。牙齿终于拔下来了,收费 50 美元。结束时已是五点半钟。陈说,检查还没有完毕,下次再进行。

那天晚上,陈来了电话,询问我在拔牙后情况如何。我说,一切正常。他一再强调,如果有什么不舒服,可以马上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的解释是:他们不仅仅是对我的牙齿有兴趣;这是一项全面的健康情况调查。之所以要知道我在什么学校上过学,大概也是想从那里看到我的医疗档案,以资比较。

我不想再去了,可是我还需要再洗一次牙,于是我又到了牙科卫生学校。

我到了服务台。这次值班护士看我是一个老人,也没有问我的岁数,就说,我可以享受半价优待,只收 10 美元。

担任洗牙的换了一个女士,同样友好、亲切。这次先让我看一份说明书,说:这里是学校,所以在治疗时要兼顾教学,可能使病人感到有些不便,请予原谅。

果然,在看牙时,有一位老师叫了四个姑娘来,站在我身旁,每人动一下手。有一个学生肯定用工具锉了不该锉的地方,因为我看见老师对她使了一个眼色。

女医生建议我用牙线。我说我从来没有用过。她把我带到镜子面前,用牙线清理我的牙齿,并叫我看牙线上的芝麻大的食物残渣。

这东西确实不错,开始时不习惯,后来就用惯了。我现在每餐之后都用牙线,它比牙刷或牙签都更能清洁牙齿。

实习医生说我的牙龈有毛病,要治,我还需要多来几次

才能治好。她说我的病例很有典型性，想结合治疗写一篇毕业论文。如果我同意治疗，她说，可以不再收费。

这对我当然是合算的。她递给我一张协议书之类的东西，让我签字。那上面说，我同意她使用我的牙齿资料来写论文，同时不再让别人使用我的牙齿资料。

我从没有想到我的牙齿居然对别人有用处。这大概也属于我的权利。牙齿是我的，要利用我的牙齿资料需要我的允许。

哈佛的校报上常登出一些研究机构的广告，为进行某项研究而征求受试者。我就看到两条征求老年受试者的广告，一条是研究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一条是研究老年人的牙齿，受试者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一个多月后，治疗结束了。美国女士向我表示感谢，说我配合得很好，很耐心，帮助她完成了论文。我也很感谢她。从那以后，我的牙齿再也不流血了。

1995年8月

○ 朱朱

人们以为自身就处在黑暗中，人们以为心灵已经充满了黑暗。然而，进入黑暗是何等艰难……

夜晚小径的十条道路

(五篇)

世纪的怀念

不像总是没有下文的乌托邦，巴黎教会了瓦尔特·本雅明“迷失的艺术”。巴黎干得真好，消除了一个青年的年少气盛，又用自身的复杂性保护了他处于最脆弱阶段的神经。不像巴黎，一个最好的城市当然不该缺少小巷、狭长的街道、拱廊、地铁和宽广的远景，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具有某种真正的暧昧，它必须将存在于境内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件、每一块石头都理解成与它同样不朽的生命，凡是在它的内部存在过的东西都自然地烙上了不朽的火印——对它而言。

每一个外来者都将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房子，世界的每一条新闻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而且至今没有成为旧事。不朽的城市不具备本雅明式的知识分子的谦卑，也不具备暴君的果断，但它具备两者都有的内向。它在昼夜之中转动，将每一条纹理都孕育成固定的刀和风暴。它使一切虽生犹死，虽败犹荣：一颗塑像的巨大头颅只是鸽子们的栖息地；在银行里人们又见到了古埃及的鲜花；可能你的隔壁住着老虎先生和他的新娘；早晨醒来时发现情人是楼下看门的老家伙……对于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巴黎”，而且完全不同，即使是因为一个微小的不同。在不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每一个人的城市与这座总的、

概念上的城市有着真实的距离。而处于这种距离之中，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才可能是真实的距离，其中有色彩，有叫喊。

殖民时代的石柱

市百货大楼对面的一家银行。建筑本身是一件遗物。光学和几何学嫁接出的百合。过去，有一个人在这附近的广场上用刀子切开了一朵花，然后将花的每个部分都带走了，他切花的那块地方成了广场，人群、车辆和商店围着它旋转。那家银行则是他漏下的花瓣的一角，一小块芳香消尽的正方形，色彩也越来越旧。现在，你从高空看，这圆形的广场和不远的银行仍在暗示一朵花完整的形状。

走廊很高。天色微暗的时候，我从台阶下走过，能看到圆柱的底部。雨水和风的侵蚀，火焰的投影，飞鸟的擦痕，血和痰迹，都很清晰。可能圆柱的材料本身就是这些东西，可能石头的成分就是这样——这时候，所有的圆柱都是暗青色，背对着建筑本身，面向街道和行人，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它们的来历、遭遇都可以在书籍里一字不漏地找到，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是感到模糊、不可捉摸并且有让一条蛇滑过似的空虚。

对基督教的怀疑

1

《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是有形象的。有形象的即物质。上帝造人，上帝是因，我们是果。上帝是有形象的，上帝的因又从何而来？

2

也许我的怀疑并非针对基督，而是基督教。一个瑞士人的观点通过别人传到了我这里。他认为《新旧约全书》只是秘而不宣的圣经的一部分，被篡改和扭曲的一部分。按照这种同样不可靠的说法，人们能得到的只是教会的权力、意志和对误读的误读。

诗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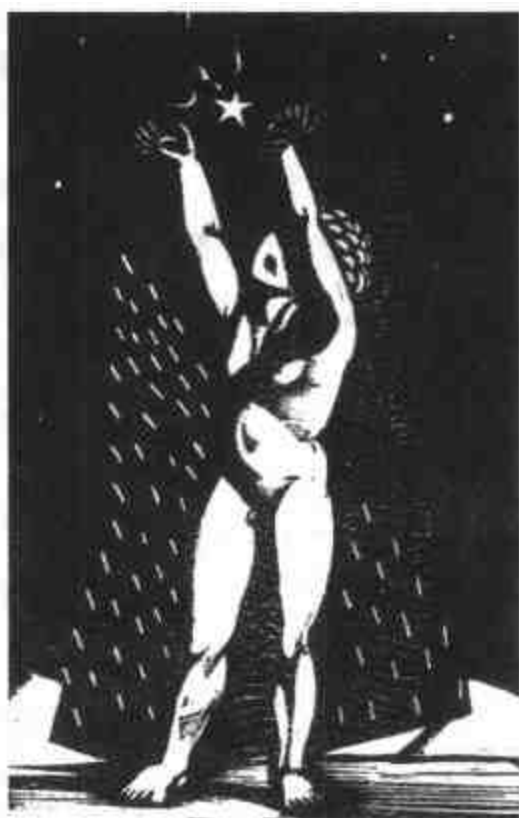
由于诗人们尤其回避被每一代人称之为“现在”的那个概念，由于语言是一面镜子，诗人们往往是形象。现代诗人的形象，从波德莱尔开始（也许要追溯到爱伦·坡），似乎一直是扭曲的和变形的。在小说、戏剧，甚至在诗人自己的笔下都流露出对诗人的厌恶和嘲讽，这种现象有时会让我奇怪。我在上海和南京分别遇见过一位诗人，生活在后一座城市的诗人属于未来，他希望成为上等人（地位、荣誉和金钱），或者说成为一个绝对的现代人，生活在前一座城市的诗人属于过去，他的写作是努力让果实成为花朵、芽，他相信有过一个古老的黄金时代，他不停地写作，为了人们最终将他确认为在那个时代出生的人。

郊区史

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应该只是关于市区的历史。实际上，市区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存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市区和市区正变得越来越相似。人流、车站、商店、银行、酒店、流行歌曲、广告……非常相似，甚至是相似中的相似：商店出售同样品牌的商品，本周上榜的是同一支歌曲。现在，南京人不

必为了买到时髦的衣服坐火车去上海，因为城市本身已经成为“连锁店”。在世界这座隐形的城市中，每座城市都只是它的专卖店。这种现象并非现在才有，在过去的欧洲，市区的建构几乎都采用了同一个模式：中心是广场，广场矗立着大教堂（Cathedral），一侧也许还有洗礼堂（Baptism）。基督教——另一种隐形城市——的连锁店。

似乎是郊区形成了个性。上海的郊区都指向它的市区，围绕它的市区，是市区伦理和美学的延伸。这在南京有所不同，南京的郊外并不特别渴望围绕它的市区，它是它本身的延伸，它指向城市以外的所有地方（音乐台的设计中呈现出的弧线令人想起那是另一颗天空中的球体在这里压出的一个半月形的坑，一个擦痕）。写一座城市史也许应该为它的郊区变迁留下更多的页码，当市区和市区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许有重叠的一天）的时候，郊区和郊区的比较似乎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这一发现对人同样适用。



1993 年夏天

的海滨(外一篇)

○金海曙

也许我看见的只是一个疯狂的孩子，我看见他在海边疯狂地跑着。嗨！我大声地喊他。站住！别跑！可是我相信他已经疯了。他完全听不见我的叫喊。虽然我已声嘶力竭。

永无止境的沙滩，褐色的，仿佛是陈年的血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一个梦里。我的手伸出去时，空气是粘稠的，你能感觉到它干燥的皮。

巨大的窗户，我站在那儿眺望。我看着一个肮脏的男孩，看着他面对虚无的空间，却好像面对一个彩球。我不禁感到痉挛。胃部的疼痛是迟钝的。它像潮水一样往上涨。嗨！我继续喊。我只觉得自己的声音被送进一个宽敞的洞里。

蓉蓉开门进来，我听见她进来。她走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去海边走走好吗？”“好吧，”我说“好的。”当我们走到海边时，那个疯狂的孩子已经不见了。一瞬，我很难确定刚才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孩子从这儿跑过。我也说不准我是不是大声叫喊过。在这个夏天里，我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蓉蓉不知为什么笑起来。她的声音在这个空旷的地方显得如此孤立，又是那样清脆。你看，她指给我看海的尽头处浮着的一块奇形怪状的云。它白得出奇。

海风充满了腥味。我又想起那个孩子。我现在几乎可以看见他的额头。接着我想仔细看一看他的眼睛。但在他眉毛的地方我的想像力停顿了。我无法越过这道界限。我跳过他的面部，现在我看着他的手，他满是污垢的指甲。他的手里握着一张纸条。

“这儿的海水太干净了。”她说，“我在国内从没见过。”

是啊，我说：是啊，可是我们回去吧，我们得找个地方吃饭去。肚子可饿坏了。

我们走进餐厅时黄昏还未结束。餐厅里已是漆黑一片，四周是厚实的窗帘。灯光集中在一个圆形的舞台上，舞台空出一个位置等待乐队。靠窗的餐桌上摇曳着烛火。蓉蓉像真正的有钱人那样点了菜。她是一个天生优雅的女人，有时我会想到她是上帝派来领我走上生活台阶的人。我反刍那些带着新鲜露水的菜叶。接着，我看见了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场面。

一个穿黑色礼服的侍者走过来。再点点什么？好，来点葡萄酒吧。蓉蓉拿起沉甸甸的菜单，这是一个需要质量和档次的夜晚。虽然是在飘忽的烛光下，我仍然相信侍者一定注意到了我的局促不安。侍者是这个世界上观察力最为敏锐的职业选手，超过了所有在世的伟大作家。我抬起头想看看他的表情。那种宽容的微笑我太熟悉了。当我将目光逗留在他脸上时，我差一点叫出声来。他分明就是我从旅馆21层向下眺望时，那个在沙滩上奔跑的孩子。他呆滞的表情和阴沉的目光，同在灿烂的夕阳下奔跑时毫无变化。可是，我无法理解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成为一个肌肉结实的青年。他站在那儿，嘴角边的微笑一如粘在墙上的一朵纸花。

我的目光向下移去。在他黑礼服的袖口下，我看到了他的手。他的手上刻满了皱纹，仿佛是皮肤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肉体而裂开的口子，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始终无法看清他手上握着的那张纸。那张纸就是我现在要付的账单。

不可回避之轻

是的，我是一个黑人。这不是说我皮肤黝黑，眼睛翻白，能歌善舞。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黑人。如果是这样我会非常高兴。我说我是黑人，是因为我被叫做黑人。这在语言学上是一个被动式。被叫做黑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住在这儿没有合法的签证，而且，更糟糕的是我的护照也过期了。这样，我不仅永远不再会变白，甚至你不能正确地说出我是哪国人。虽然我的祖父、父亲、母亲、妻子、儿子都在我的祖国。今天我到我国大使馆申请回国。大使先生和我亲切见面，问我是不是为了增进和我国的友好准备到我国去旅行。我说我是我国人。大使先生哈哈大笑说，你怎么会是我国人呢，你怎么会是我国人呢，你的护照已经过期了嘛，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你只不过是我国语言说得很好而已。

从大使馆出来后，我直接到所在国的入国管理局去。我申明我是一个不法在留者。一张马脸表情严肃的官员向我挥了一下手，好像是驱赶一种有异味的[●]气体。我转过头来，看着大厅里排队办手续的人，他们看着我仿佛没有看任何东西，他们的视线穿过我一直通向永恒。这个现象加深了我是一种气体的感觉。我想到我远在国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认为我在国外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家，或者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背死尸的家伙。他们想像这个，想像那个，但肯定不会想到我居然会成为一种气体。直到国家规定的公务时间终了，没有谁来招呼我。当马脸收拾东西站起来准备回家时，我咳嗽了一声表明我的存在。他皱起眉头问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说是来这里办回国手续的。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要审查我这团气体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接着，他又挥了一下手说：“回家等着吧，到时候会寄明信片通知你。”

他的话让我高兴了好一阵。他要寄明信片给我！我想，这就证明了我不是什么气体。你会给气体寄明信片吗？不会，没

有人傻到这种地步,而且,你也不会有气体的地址。但这种高兴是短暂的,我无法摆脱关于气体的想法。这虽然非常可笑,但一个想法一旦钻进你的头脑,我们除了等待它自动消失,不会有什么遗忘的好办法。

回家时我骑在摩托车上觉得速度快于往常。当然,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既然你已经成为一种气体,没有飞起来才是不正确的。是的,我想到另一个黑人朋友,当时他坐在马桶上突然飞了起来,不得不紧紧抓住腰带,大声叫人把门关上免得飞到街上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女朋友就再也不会带着玫瑰花来让他接吻了。这个尴尬的场面让我不由自主地大笑。我这时才发现,笑声在摩托头盔里回荡着是多么古怪。

是的,我看到了交叉点,看到一瞬间闪亮的红色信号。但是我根本不能抑制我的速度。我听到隐藏在暗处的警车拉响了警笛,突然得仿佛它是阴影的化身那样快速地冒了出来。红灯闪闪,一个警察躲在扩音器里大声警告:“前面的摩托停下,前面的摩托停下。”我仍然无法降低速度,警车紧追不舍,像我在乡下时看到了一碗肉汤。这确实有点反常,我想,我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无法控制日常生活用品的现象。接着我就看到了我命运的终点:一个挖阴沟的工作现场。它的周围用黄色的栏杆围着,一个工人挥舞指挥棒表示危险。我是那样灵巧、那样富有韵味地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之后才一头栽了进去。我至今奇怪那个工人为什么没有当场鼓掌喝彩。

一个警察从汽车里钻出来和工人谈话。随后工人下到阴沟里把我捞将出来,我生气地看到我居然变成如此软皮拉沓一团东西。警察在用步话机和别的警察通话,我想我可能会成为明天报上的一条新闻。但我对这个问题抱有难以忍受的好奇,我不明白他们将利用什么样的技术把一团气体登到报上。而那位瘦精精的大使在读到这段新闻时,也许会像他平常所做的那样,抬头嗅嗅四周的空气。但他绝不会想到,今天我不用任何证件就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且和他并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

午·夜·的·颂·诗

(四章)

○ 张 芸

生命的重责

给 Rolland

真正知道生命的珍贵，却是在给予生命之后。

你降生在午夜之后，在天涯海角的一叶小岛。虽然已是三月，仍下着雪，清晨从病房的窗户朝外望，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婴儿室里，护士微笑着将不足一日大的你交给我，说，这是个小组芬兰人，长大了喝水都要放冰咧！

而你是那么安宁、舒适，仿佛对这个明亮的世界毫不新奇。几回听到隔壁婴儿室有婴儿的哭声，跑过去将那排小床逐个看过，总是见你左右躺着的婴孩急促地哭喊，唯有你安睡着。新生儿中，只有你顶着一头黑发，虽然柔软，却又厚又长，脸儿红红的，好可爱的样子。那天早晨见你时，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感情冲袭，想到今生今世多了一个重责，就是要爱你，保护你，眼睛不由充满泪水。

等你满月后，天亦开始暖起来。风已不像往日那般凛冽，雪亦在不知不觉中消融成泥泞。那天下午太阳很好，我带着你，穿过一个渔村，去看海。晴朗的天空无一丝云彩，淡淡的蔚蓝，仿佛还带着初见春天的迟疑和苍怯。而大海却有宝石般的深邃，蓝得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海涛打在岸边的岩石

上,不时溅起轰轰巨响。我们坐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我将你抱在怀里,就像大海的一朵小浪花,生命的海潮卷过,就这么一浪接着一浪,永远没有止息。

鬼节里不怕鬼的孩子

给小女 Karrie

最爱在夜晚柔柔的灯影下看你,轻抚你长着绒绒乳毛的小脸。

入夜,开灯正要读一本小诗,不想灯亮照醒了你。你睁开眼睛,仿佛睫毛下还垂着一道梦帘,嘴里却清晰响亮地说,“不怕 monster!”

我一惊,遂想起白日四周为鬼节吊挂的各种妖怪魔鬼的道具与装饰。

我将手贴在你温热的脸上,轻轻地跟你说,“不怕 monster,没有 monster!”

“是没有 monster,要妈咪。”是你梦呓般的对答。一翻身,你复又回到原属于你的梦乡,微红的脸蛋隐约地像是灿放着一朵甜甜的微笑。

怕你不能熟睡,我将灯关了。乡村无风的秋夜,连一粒虫鸣也没有。广浩的夜是如此深沉、宁静,如我深爱你的心。好久好久,我坐在你的身旁,听这静夜,也听你均匀的、甜甜的呼吸。

星星的银钥匙

给娜娜

在两岁之前,你是个不说话的孩子。

像是守着一个小小的誓愿，你对学话的冷漠，近至于固执。不足周岁已四处跑的你，却拒绝舌头部位的运动与练习。每回为你读书，一遍遍教你说太阳、月亮、彩虹，你的反映只是无言。那时，刚从美国搬到加拿大南部的汉美顿，在市里租赁了一套四楼的公寓。每日乘电梯，便指着电梯上的数字教你认读，你却总以沉默回答。两只乌黑的眼睛看着大人，似懂非懂的样子，略带几分保持距离的表情，好像学讲话这件事，实在是不屑一顾。

而你表达需求及感情的方式，常常是用尖细的嗓子着力地喊叫一声。记得那回安娜一家来玩，带来一位从伦敦来访的教授朋友比尔。用午餐时，比尔刚用手指夹住筷子，爬在桌底玩耍的你突然扯开喉咙，尖叫了一声。毫无提防的比尔被震得全身一抖，一双筷子哗啦地摔落在地上。毕竟是欧洲学府的绅士，比尔虽受惊却不失色，只是微微地笑一下，俯身将筷子从地上拾起，说：“叫得真响亮。”这时你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仍在继续玩你的游戏。

就这样，你没有像别的小孩子那样牙牙学语，而是坚持守着你的沉默，直到有一天的晚上。那是就寝的时分，我和往常一样，将你粉红色的小铁床整理好，为你掖好被子。说过晚安、正要熄灯时，突然地，仿佛是从梦境传来的声音，听你轻轻说了一声“Thank you”。如此自然，如此流利，像是一句已经说过上百回的话语。我定神看你，迟疑着，正想问你一句，你却一翻身，径自睡去了。

从第二天起，你开始用完整的句子对话。在我，最先的震惊已经过去，接下来，也就不那么惊奇了。当你以平静的口吻让我给你递一个苹果，当你自己用英语和中文将电梯里所有楼层的数字无一舛误地念出，我好像从你带点清高的淘气中读到你要告诉我的：你早就会，只是不说。

可我却怀疑。多少次了,常忆起两年前那个冬夜,总感到有些神奇。有时便想,也许那天晚上有把星星的银钥匙,从灿然的夜空落在你粉红的小床上,开启了关闭你心智的匣子,从此你智慧的话语,便像源泉似的潺潺流出?

静夜,为你织一件冬衣

给娜娜(二)

今年,冬天早早便已来临。

11月初,风刚将落叶清扫到路边的灌木林,秋雨刚下过两三回,窗外竟已开始飘起轻柔的雪花。那天早上,你在门前的小路上蹬着玩具三轮车玩,小脸冻得通红。我的心猛然抽紧,想起该为你织一件厚厚的、挡风挡雪的冬衣。

而在这样温柔的夜晚为你赶织冬衣,正好。炉火微红,如水的静寂中,只有织针时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以及火苗的低吟。编织毛衣时一针针恒定不变的节奏,催人沉醉,像是饮了浓浓的苹果酒。母亲对孩子不求回报的爱,在这一刻满溢,如毛线的柔暖,静夜的温馨,绵长无尽。



关于我这个人 以及我的诗

诗人们，朋友们，谈我的诗，须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人生，我的诗也将平淡无奇。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已经艰难地活了快 73 个年头了。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不能真正地轻松下来，冲出使我陷入其中的历史阴影。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

加拿大有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Anne Hebert），她写了一首诗，说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我为她这一行诗流了泪。她是个病弱的诗人，比我大七岁，但她的骨头闪耀着圣灵

的光辉。我的身高有一米九十，像我家乡的一棵高粱。我也是个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安妮·埃拜尔精心地保护她的骨头，她怜悯她的骨头。而我正相反，是我的骨头怜悯我，保护我。它跟着我受够了罪，默默地无怨无恨，坚贞地支撑着我这副高大的摇摇晃晃的身躯，使我在跋涉中从未倾倒过一回，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谢天谢地，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现在，我仍正直地立在人世上。我的手心有不少坚硬的茧子，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疤痕。几十年来，我就是用这双时刻都在隐隐作痛的手写着诗。不要以为茧子是麻木的，伤疤无知无觉，骨头没有语言。其实，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像中国古代刻在骨头上的象形字。大家都说诗人的感觉灵敏，我的感觉的确也很灵敏。但是，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它们有如小小的隆起的坟堆，里面埋着我的诗和梦。

由于被击打，我的颅内淤血，血块压迫神经，使我成为一个梦游病患者，已经折磨我半个世纪。梦游几乎成了我生命的特征。夜里梦游，白天也梦游，我成为一个清醒不过来的梦中人。我痴情地写着诗，在诗中我追求的那个遥远的艺术境界，与梦游中幻影般的境界

在冥冥之中毗连着，既真实又虚幻。因而使我更加活得恍惚，分不清我是在梦游，还是在写诗。说我是在梦游里写诗，在诗里梦游，都不算错。我有一首长诗，就叫《梦游》，写了很多回，很难定稿，日本诗人是永骏教授把它译成了日文。但是，由于诗的神奇的作用，梦游中的幻觉和经历，已不完全是由于病症引起的生理现象，倒更多地成为一种与人生的感悟相渗透的隐秘的心灵活动。由于梦游，几十年来，我仿佛变成另一个人，有了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固有的，另一个我是从布满伤疤的躯壳中解脱了出来的。我一生梦游，写诗，就是希望从灾难和历史的阴影中突围出来。梦游和梦游诗给了我信心。

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愿定居的野生野长的游牧习性，与我的梦游似乎又有着某种血缘和宿命的关系。我的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是骑在马上向远方奔跑着，搜索着猎物。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而我的诗总是在躁动，总在奔跑，总想游牧到水草丰美的远方。但是命运却使我不幸成为一个在围场中被捕猎的活物。我只能从命运中冲出去才有生路。这些复杂的生命体验引发我沉入一个个恶梦和幻想之中，我已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只能成为梦游的人。我只能用伤疤痛苦的敏感去感觉世界，以祖先的习性去游牧向远方，对我已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求生的自卫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这当然是一种

悲剧。

我有过单纯的幸福的童年，也有过短暂的明朗的青春世界。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得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没有伤疤，为此，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所以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人们谈论我的诗，最初总是归入现实主义的大类。后来觉得不合适，说我有超现实主义的情调，还带着某些象征主义的色彩。后来又觉得我这个人太野，拒绝定型，无法规范我。是的，我不属于任何“主义”，我不在什么圈子里。我永远不依赖文化知识和理论导向写诗，我是以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感悟构思诗的。我的人 and 诗始终不成熟、不优雅。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奔跑，从不徘徊和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死后升天或入地，变神或变鬼，想都不去想。这也可以说就是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的性格吧！

谢谢！

（本文为1996年8月23日上午在日本前桥市举行的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秦汉之制与公社古丹

(一)

朱学勤在一篇文章中提出“68年人”的概念，引发了我的许多回忆，还有感想。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我正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读初三。经过一年多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到了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后，北京中学各校基本上实行了“大联合”，校园里开始平静下来。在大多数同学去“逍遥”和搞“教育革命”的同时，少数同学开始了对这场大革命的反思，他们四处找书籍，搞聚会，交流心得，传阅笔记书信，至“68年”，便形成了一些边界不清的思想群体，其中有些已经突破了过去的派别界限。

我介入的那个北京中学生群体当时被他人称为“二流社”（至今也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来历），其较为稳定的分子是101中、35中、3中、清华附中、4中、外语附中、师大女附中、8中、2中等校的一些学生，除自己读书外，每隔一月半月便搞一次聚会讨论，地点大多选在市内的公园，如紫竹院、北海、中山公园、圆明园遗址，还组织过到十三陵和沟崖去郊游。

当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虽然还离不开“新二月逆流”、7·28工宣队进驻清华等发生于当年的政治事件，但主要方

向已转到了“文革”的社会背景问题上。当时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角度来解释“文革”的起源,已经不认为“文革”纯系由毛泽东发动而致,而是相信“文革”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背景,有着它的历史必然性。记得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反复阅读马、恩总结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几篇文章,如《1848—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力图从这些著作中找到研究“文革”背景和进程的方法。对于恩格斯论述革命必然性的一段话大家最为信仰钦佩,认为是探讨“文革”起源的一把钥匙。这段话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某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时至如今,对这段话我几乎还能背诵,可见当年印象之深。

至于“文革”的深层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当时倾向于一种后来受到批判的“阶级关系变动论”,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地主资产阶级等旧的阶级因失去了经济基础已经开始消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对立乃是特权阶级与人民群众。这种观点并非始见于 1968 年,遇罗克写于 1966 年冬天的《出身论》、1967 年夏天一家小报上登载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同年秋天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都早已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思想,而 1968 年在中学生群体中流传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等书,使我们更坚定更系

统地信服了这种思想。当然，中学生们还是努力从最权威的毛泽东思想中为这种思想寻求依据，这些依据包括：毛泽东在“文革”前一个关于“四清”的批示中提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曾说1967年的“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以及1967年春天传出的江青的一个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对于《战国策》中《触誓说赵太后》一文的评论，其中有“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的提法。对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是从政治的角度讲“走资派是主要敌人”，而不从社会的角度讲新阶级，我们在潜意识层中，是感觉不彻底、不过瘾、不满意的。现在想来，当时非要从抽象的理论角度去论证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不可，左躲右闪，汗流浹背，说也说不清楚，实在有些可笑。而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对中国的人群可以分为“官”和“老百姓”两大部分这一点，如今已经是全国上下不言而喻的共识了，这真是所谓“形势比人强”。

自信抓住了社会弊病的症结，接下去便是要探讨出路。当时相信湖南“省无联”的一种说法，即：单纯靠1967年那种夺权和政治冲击，搞不动人家特权阶级；消灭特权阶级不仅是个政治改革问题，更主要地是个社会改革问题，只有对中国实行“公社化”改革，才是惟一出路。那时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搞了十年，1967年的许多群众组织也均以公社命名，公社到底是什么？以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原则的总结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依据，我们这些“68年人”认为公社的本质就在于要建立一种逐渐消灭“旧式分工”、消灭三大差别的体制。同时又认定这在经济发达而又等级森严的城市已无可能，希望存在于广大的一穷二白的农村，今后应使农村由穷变富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这张白纸上画公社蓝图的过程。待公社制的农村经济实力强大了，就会再一次形成农村包围城市

的形势，到那时再着手“改造旧城市”，实现全国的公社化。不少“68年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奔赴农村插队，准备在那里“大有作为”的。记得1969年初我们插队来到晋东南沁县时，发现那里存在着连生产队种植计划、买卖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的原始民主时，惊喜异常，认为这就是在农村实行公社制的良好根基。

但没过多久，我们这种关于公社的乌托邦幻想便开始破灭。当时发现农村的社会差别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社队干部脱离劳动多吃多占尚在其次，国家的高征购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一年300斤口粮，连肚皮也填不饱。此外县里各部门如粮站、种子站、化肥站、农机站、信用社无一不是趴在农民身上的寄生虫，吃拿卡要样样俱全。这时才晓得要想用虚构的公社去消融国家这个利维坦，实在不啻梦幻。

破灭的梦幻不等于虚无，它总要在人生中留下印记。又过了几年，我上了大学，后又登上了大学的讲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产生了兴趣。这时突然发现如果抛弃“阶级”等等源于西方的概念而带上中国自己的眼镜，我们这些“68年人”当年的理论探索，在学术上和现实中仍有重要的价值。

(二)

治思想史者可以发现，近世以来的杰出思想家们，经常提出一种要求归复“三代之制”的主张。如黄宗羲主张经济上恢复井田制，使“田土均之”，政治上恢复学校的议政职能，“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顾炎武主张以古代“封建之意”来变通郡县之制，使地方官世袭，给其财权政权，准其自辟掾属，并恢复加强宗法氏族组织；龚自珍作《农宗》，主张恢复宗法土地

制度，改诸子平均继承制为长子为主继承制，以“大宗”养“小宗”；甚至被誉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康有为也对三代之前的
大同社会、太平之世无限憧憬。

透过这些思想的表层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精神内核无非是经济公有、社会自治，而这正是西文 Commune 的主要内涵。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思想笼统称为公社思想，而前述我们这些“68 年人”的公社理想，正是与先贤们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

对于历史进化论者来说，黄、顾、龚、康这些“进步”思想家何以在抨击“封建制度”的同时却提出属于“奴隶制”范畴的社会政治主张，是很难做出圆满解释的。有人将其简单地比附为西方的文艺复兴，说“复古即解放”，已算是很有见地，然而却未能深析其所以然；此外如“历史局限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的标签，就完全让人感觉搔不到痒处了。

其实，只要我们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来作茧自缚，把问题复杂化，那么就很容易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公社思想都是作为拯救时弊的药方提出来的。龚自珍就明确说过：“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此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即进一步搞清楚在这些“医国手”们看来，当时的中国到底是患了什么病。

显然，在黄、顾、龚、康等人的头脑中，并没有“奴隶制”、“封建制”这些进化史观的概念，分析起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倒是接近于今天的社会学，表现在他们重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在秦以前和秦以后，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秦以前的中国社会乃是社会主导型，其时由天子及其任命的官僚所组成的国家机构简单

虚弱，其治权仅限于王畿之内；而处于国家机构之外的贵族社会，却因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实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非常有实力和有组织的状态。整个国家(Country)的重心，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国家(State)。秦统一后，这种秩序被颠倒过来了。随着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废除，贵族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被打散；与此同时，在郡县制下，建立起了以君主为首以官僚为体的强大的国家机器，中国社会由此转变成为一种头重脚轻的国家主导型社会。这种特点至唐代士族阶级衰亡之后愈益明显：一方面是国家愈趋有序、有力、集权；另一方面是社会愈趋无序、孱弱、平均，至明清达到极点。对于这种始建于秦、完备于汉，而此后两千年间虽有损益却无根本变化的国家社会体制，文化史家称之为秦汉之制，认为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秦汉之制的根本特点，现在的教科书上用“封建”、“地主阶级”等概念来作归纳，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秦汉之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国家主导和国家专制。其前者是指国家强社会弱乃至有国家无社会，其后者是说君主官吏对于社会实行专制，对于社会各阶层的“民”，实行专制。在这种制度下，最具实质意义的社会分层乃是“官”与“民”，而不是现在教科书所说的“地主与农民”。当时中国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均是相对于“官”面言；而“农”之一层，又不仅是指自耕农与雇农，同时还包括没有官僚身份和科举功名的地主。试看中国历史上诸如秦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直至近世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其整体性质面言，没有一次不是“民”反抗“官”的斗争，用谭嗣同的话说，是人民“苦于君官，铤而走险”，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的话说是“官逼民反”；而所谓“农民反抗地主”云云，不过是始作俑者想当然，而学舌者以讹传讹而已。如此看来，“文革”中我们这些“68年人”用“特权阶

级”与“人民”、现在中国人用“官”和“老百姓”的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分层，都不过是继承了秦汉之制下的老传统。

至明亡以后整个有清一代，在黄、顾、龚、康这些目光如炬的思想家看来，这种秦汉之制的弊病已经十分明显：

第一，君主和官僚权力一元化、绝对化，缺乏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可以对之实行制约和监督，其结果一方面是君主对百官、官吏对百姓任予任夺，最终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是整个国家机器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低效和腐化。黄、顾、龚、康等人揭露秦汉之制这种弊病的言论随处可见。如黄宗羲作《原君》指斥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为天下之大害”，作《原臣》揭露官僚自甘做君主的仆妾，只知为了君主利益对百姓“治之牧之”，而不关心其憔悴劳扰；龚自珍揭露清朝皇帝视臣下为奴仆狗马，“仇天下之士”，思想专制，摧残人才，抨击官僚寡廉鲜耻，荒淫奢侈，“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

第二，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处于疲弱和散漫无序的状态。生产资料私有使得在西周井田制和“工商食官”制度下那种可以网罗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复存在，流民日多，治安恶化。如龚自珍指出，清代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顾炎武还曾指出，社会的疲弱散漫还导致抵御外侮能力的降低。他说，五胡十六国时异族入侵，东晋南迁，世家大族尚能组织起抵抗，而至宋代辽金入侵中原，社会如一盘散沙，国家不抵抗，便一败如水。

以上秦汉之制国家专制、社会疲弱的两大弊病汇集到一

点，便是周期性的天下大乱。原因在于国家不允许在自身之外存在任何积极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同时又不能保证自身机体的长久健康，所以一旦走向腐化衰落，便无人可以取而代之，政权无从和平转移。于是匹夫揭竿而起，逐鹿中原，谁也不愿看到的革命就想“告别”也“告别”不了，只能等待在大乱中形成新的有组织力量，再重建国家。近世最早的进化论史家夏曾佑曾指出，这种情况不见于秦以前，彼时天子衰落了，诸侯起来匡救；诸侯衰落了，卿、大夫起来匡救，从没有过匹夫自下倡乱而最终贵为天子的。

医治上述这种秦汉之制的病症，便是黄、顾、龚、康这些“医国手”们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任务。当时他们尚没有条件从世界其他文化中吸收足够的营养，便只好贩卖公社古丹了。这种公社思想的基本精神无非在于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充实社会，使之有力有序，从而使之能够制约国家，泯灭国家与社会间的鸿沟，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专制，最终做到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富裕、强大、和谐、有序的民族共同体。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68年人”所憧憬的公社蓝图，所设想的以公社融化特权阶级的改革方案，与先贤们的“古丹”一脉相承。

(三)

从黄宗羲到康有为，贩卖公社古丹只是书生空议论，确实将公社思想付诸实行的乃是握有最高权力、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他一声“人民公社好”，公社化便席卷中国大地；他赞扬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文革”中在厂矿机关学校便成立了无数个群众“公社”。然而，其结果却并不理想，这一点现在人们已有共识，

在此毋庸赘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1967年春天毛泽东下令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放弃了他的公社思想。当时，城市中群众“公社”林立，导致法治破坏、社会混乱的恶果已经开始显露，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早已在60年代初蜕化为一级政府。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后发起的。这时，他对历史上极力主张国家专制的法家学派全面肯定，大加赞扬，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观点。在给郭沫若的一首诗中，他说“百代都行秦政制”，明确肯定中国还是要实行国家主导型的秦汉之制。可以说，解放后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探索，转了一个圈子，始于秦汉之制，继之于公社理想，最终又回到了秦汉之制。

如前所述，年轻的“68年人”们对于公社理想的破灭，一般均早于1974年，早于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在理想破灭之后，他们没有退回到秦汉之制，因为他们的政治和思想生涯从一开始便起于对秦汉之制弊病的感受和发现。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甚至连同过去的公社理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理由很简单，公社古丹不灵，并不等于秦汉之制无病，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我们不可能“百代都行”那早已出了毛病的“秦政制”。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完成黄宗羲、顾炎武以来先贤们的“医国”理想，出路大概只能在于中医与西医的优化结合吧。

读“衰落”

1

陈寅恪悼王国维时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王国维是这样，陈寅恪是这样。一个“凡”字，都这样吗？

2

中外历史都有这种盛极而衰的文化现象。

就算王国维、陈寅恪“文起八十代之衰”，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终究“衰落”了。其苦痛缘自何处？如果缘自对新兴文化的抗拒，因抗拒而自杀，这种自杀，除了气节，也没什么好说的。若是因自省了所化之文化的衰落，即深察衰落的趋势而又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者，愿以死为此文化的绝处立碑，以警生者，那么，这种自杀，才是自由精神的象征，名可千古。

陈寅恪是这个意思吗？

否则：“衰落”一词作何诠释？

3

当然，一种文化衰落，有时，并非此文化腐败得一无是处，相反，它太精致了，太宏富了，太蔚为大观了，以致难乎为继而殒落，顶点即没落。这是历史与现实中最可赫怪的文化现象。

为“此文化”而殉葬者，那心死的，恐非破败的绝望之感，而是或多或少排解不了的纠缠。我已“表现此文化”臻于完美，独领风骚百年，为何“此文化”花开又花谢，而让别花别样红？“此文化”为何不能独揽时运的圆月不缺？原以为时运就只是“此文化”的时运，五千年不辍，不料骤然时过境迁，“此文化”才诧异而惊惶，时运像脱窍的灵魂，空有一副干皮囊，尽管它一样金缕玉衣，姿态万千，然风情已去，流年不再……

一个美好的东西，如此美好，美好至死，何耶？辜鸿铭不通，王国维不通，陈寅恪未必通，恐怕连当今一拍三叹的传记史家们，也不通。否则，“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假命题就不会当作真结论自艾自怜。

4

何谓“精通西学”？

中国人即使精通德语，大概也做不成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如黑格尔。

除了“集……成”一类的精通，还有另一类精通，如尼采。他看穿了他所传承的思想命脉即“柏拉图主

义”，其根底是“虚无主义”。事实上，西方思想史经历过多次对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本体”的推翻重建，其后果是“本体”多而无。尼采无非是把这一事实震聋发聩地说了出来，为了阻止后来者的重复。尼采为此付出了代价，阻止得“超人”陷入疯狂，或不如说，“超人”即疯狂。上帝死后，谁能如此强力地抵挡形而上学的诱惑和虚无的吞蚀？

经受过历史反讽的海德格尔，才默祷于“存在”对上帝的期待之思。要使“存在者”摆脱“最高存在者”的归宿，即摆脱形而上学之为“学”((o)logie)的本体论同一的虚无命运，必须让存在者的“存在”非实体化而悬置在生成的瞬间。它既不自持为“本体”，又不放肆于虚无。这就是个人可以越界(即越“本体”或“虚无”之界)但不能放肆自持为界的自律的自由。盖因有超验域否证的缘故，非人格所自足而成。

现代西方思想所转型的现代维度已是空前的开阔与精深，决非一两个大家的话语霸权所统摄得了的。似乎可以说，供神的庙堂已让位给节日的广场。神在节日中，谁还到庙堂里去祭奠神的逃匿。

5

“精通西学”，我们只能精通到西学之有限与越界的开拓置换之变，作为中学守常的参照。

例如，上述“自律”，并非“中庸”，或“中庸”所致的“无过无不及”的“中和”。自律也非“自善”，“心即

天”、“反身而诚”可也。总之，自律不能自足完满。它显然在内部驱动和外部牵引之张力中永不安息。“有限”与“越界”是自律的悖论式的动机，不是“天人合一”所圆融得了的。

6

西学之变，有本体论同一之变，也有本体论差异即非同一之变，前者属古典哲学形态，后者属现代哲学形态。你看，人家古今之变也大得“忘本”。

五四启蒙后的中国人，仍按中体取前者而用之，结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主义”话语，它早已被清算而定位在古典社会理论中，同时也化作环节被现代社会理论所吸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它从来没有作为“世界观”，作为“统治意识形态”被奉为金科玉律，像它在“东渐”时所做的那样，从“自由精神”变成排它的“独断论”。

中国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具体实践”是什么呢？

一方面，在物质上被迫经历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变革，它多少开化了中国社会的现代结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转型到现代社会上来。

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尽管主动经历了重大的“范

式革命”，从传统的国学转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作为限定修饰词的“中国”恰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同儒家“天人合一观”的对接。“文革”就是它的最高表现。

又是顶点即没落。“……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设若有这样一个“为此文化所化之人”，他的苦痛如何呢？

7

中华民族从晚清至今，一百多年来，社会与文化起落再三，遍历创伤，也应该从自己的苦痛的经历中走了出来。

然而，我们接连经受了两次文化衰落的苦痛，可我们真的摸到了我们的痛处吗？

8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有两句话：

甲、“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乙、“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的答复，当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且把这个背景暂搁一边，单就甲、乙两点以测试陈寅恪的“衰落之苦痛”。

陈寅恪给自己的“徒弟”明确了两个规定：

甲、“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乙、“从我之说”。

这两个规定要想自治而不互抵，只有当且仅当“我之说”=“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方可。

显然，这个恒等式是不成立的。

陈寅恪的学说只是陈寅恪的学说。如果他有的话，那也只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相对前人或他人在陈寅恪身上极有限的表现，并不能因此而囊括一切自由思想于自身。正如张三是人，但张三不是一切人。这里显然有“某一”与“每一”的差别，亦是“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别。但陈寅恪不通，他尤其不通他的“徒弟”规定是一个悖论：

A 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是我的徒弟。

B 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我的徒弟。

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等式成立，“从我之说”者，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从我之说”者，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那么，“我之说”，即便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也因“我”而垄断，走向“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反面，“我之说”变成专制主义、霸权话语。

陈寅恪的“国学”态度，正是如此。他有什么理由排马克思主义于“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外呢？

须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你陈寅恪，不也是按陈式公式如法炮制的吗？

9

面对黑格尔的“绝对哲学”，马克思无疑是“自由

思想、独立精神”的一次耀眼的爆发！这种爆发的差异性与自由度，恐怕是陈寅恪面对他钟情的“国学”所不敢想像的吧。

马克思比陈寅恪更有权利对世界、对信徒们说：

a、“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b、“从我之说”

然而，当“空想”变为“科学”时，20世纪只用了70年的时间作为“意识形态”作注。

这种“注经学”迅速从完美到衰落，它的虔诚而精通的注经者们，虽感苦痛，也未必知其苦痛。

陈寅恪先生有感于斯吗？

10

不能通西学恐怕也难能通中学的，如果通在变的话。

于是有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拟应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之一：

“自由思想”的产物如何、为何硬结成具有专制特征的独断论？

因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莫过于对此“如何、为何”的自我诊断或自我意识。然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代价是空前残酷的，它还不在于五千万、六千万无辜死者的数字，而在于这些死者去死的方式：

任何一个普通人皆可凭“真理”之名去心安理得地杀人；

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皆可凭“真理”之名去心安理得地剥夺他人思想。

11

“如何、为何”硬结？

尤其是“如何、为何”防止硬结？

我将背负着它翻过 20 世纪的门槛……

“20 世纪留下了一块‘创伤记忆’的无字碑，它冷冷地注目走过它的任何思想，看复活的理性是否撒谎或遗忘。”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 20 世纪中如此巨大的‘创伤记忆’，以为不靠文字像碑铭一样建立的反省、清算、消解而生长、置换、超越的能力就可以在下一代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中悄悄地遗忘、抹去，这除了不真实和不负责任，还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已在历史的惰性中无力无能承担他自己的遭遇从而把无力无能追加在历史的惰性中作为欠负的遗产弃置给了下一代。於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就这样自己注定了自己一再重复的命运”。

“其实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跨过‘创伤记忆’的门槛才能进入 21 世纪，因为我们是‘创伤记忆’的直接承担者，我们不能撒谎，不能遗忘，为了一块墓志铭的真实与安宁。”

——摘自《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

1996.12.4 记于海甸岛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共生

文字符号自创造之日始，其自然而不规则的组合便呈现为一种散文形态。对于散文，希腊人称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为“无拘束的陈述”，都是就散文的本然状态而言的。被称为散文者，质朴而富有张力，几乎披覆了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文学的所有著作，甚至自然科学著作。诗是灵物，既不宜思考，也不宜叙事，只宜承载幻想和情感；其中有益的成分，往往因敷设以取悦感官的韵律所破坏。散文则不然，枝叶留在空中，庞大的根系深入地下，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

后来有学者出，从中把格局较小，篇幅较短，且富于文采者分割出来，谓之曰“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随笔”等等，有如古代的分封诸侯，另立疆界，自成一统。其实，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漫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的自由精神。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为自由的，而又无时不在束缚之中。”在这里，“束缚”固然可以作关于必然性的形而上的理解，具有实际意义的阐释，应当是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宗教、法律、道德、舆论等对人类个体的规限和压迫。奴役与自由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全部历史。社会的开放程度，宽容与否；文人集团的素质、意识、人格、生存状态，都直接影响到散文的盛衰。

中国自近代以降，曾经一度兴起全面反传统的思潮，以至今日，仍然有人持汉民族不存在“蓝色文明”的看法。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中国远在春秋时期是自由的。的确，

那是一个思想与政权得以平起平坐的时代，所以有灿烂的诸子散文。及至秦汉，先是焚书坑儒，继则废黜百家，知识分子三缄其口，文学方面便只剩下赋了。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可以视作春秋诸子的遗风。汉赋大而无当，夸饰过甚，连屈赋里的一点“高级牢骚”也没有，从形到神都是反散文的。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时代。建安诗人以诗为文，创立一种称之为“风骨”的罕有的风格；当此黑暗与战乱之际，同时出现逃避现实的另一种倾向：幽玄，散淡，放逸，颓靡，琐细。极权主义变得松弛之后，思想容易流于瘫痪。散文化小说《世说新语》，很得文学史家的推崇，其实是末代士风的写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散体扫荡骈体；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试图在复古口号的掩护下解放散文，却陷入了“文以载道”，——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峡谷。好在当时的古文大家还有几分气魄，写得出像《封建论》一类文字；到了明代，大兴文字狱，行世便只有小品了。清末留学生运动打破了千年禁钢的局面，五四狂飙继起，揭橥“个性解放”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不出数年，出现了一批操使现代话语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成绩最大，公认在诗歌小说戏剧之上。肮脏的马厩毕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打扫干净的。新文学传统尚未完全确立，就又附上了古老的鬼魂。在中国亟待大批战士出现的时候，相当部分战斗过来的前驱者却退下阵来，以调和、闲雅、幽默的态度同旧世界对话。都说 30 年代是散文的盛期，其实危机已然发生。所谓危机，本质上是“角色危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溃退。于是，鲁迅成了绝唱。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二百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的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杰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只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历史的重压，他们对这种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

说到西方散文，人们总是把蒙田和培根例举为始祖式人物，其实这是囿于狭隘的文体观念所致。在此之前，从柏拉图、西塞罗、琉善，直到奥古斯丁，已经写下许多博大而深邃的文字了。“中世纪”严格说来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世纪，上帝的绝对统治建立起统一的世界观念，人与神的对话，乃至异端的声音遂得以广泛地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神的秩序，人类的自由精神渐渐复苏。在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密尔的《论自由》，都是震聋发聩之作。弥尔顿宣称，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因此，他不能不猛烈抨击“书籍大教区的大主教”，一批“铁锈式人物”对思想学术的“暴君式统治”。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积累培育了广大的市场，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以及活跃的竞争机制。保守主义和

自由主义,同时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土壤。18 世纪初期,报纸杂志相继涌现;有名的《评论报》、《闲谈者》和《旁观者》,创造了一批专栏作家和一种流行文体,这种文体,力求迎合有闲阶级的需要:雍容、细密、洒脱、有趣,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比较起来,法国散文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与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特性有关的。自卢梭之后,好像幽灵似地,法国总是不断出现向社会挑战的斗士或狂人;大革命的火焰,搅拌了所有作家的血液,无论共和派、保守派、颓废派,都表示出了对政治的关切的热情。在 19 世纪,法国经历了共和与帝制的急剧的更迭。此间,一批知识分子如雨果、基涅、路易·勃朗和欧仁·苏等,因为坚持强硬的共和反对派立场,拒不接受政府的赦免。“我忠于我对良心许下的诺言。”雨果发表声明说,“我坚持到底,与自由一同流亡!”对独立、自由、民主的热爱,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本世纪 60 年代的“五月风暴”,未始不可以算是上一世纪大革命的又一个回声。比起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斗争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质。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说到法国文学,包括散文,确乎特别的自由犷放,深具冲决的力量。至于德意志,这是一个盛产哲学头脑,先知与疯子杂处的地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德国统一的时间相当晚近;可是,在满布容克地主的小王国里,知识分子居然拥有那么超迈的世界性眼光,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他们写下许多震撼世界的散文著作,从路德到马克思,从歌德到海涅,从黑格尔到尼采;有意味的是,竟没有一个纯粹的散文作家。

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是文明的源头在欧洲;英国的清教,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尤巨。那些清教徒的子孙,冒险者,战斗者和拓荒者,他们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从事西部边疆的开拓,在现代民主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上,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和实验精神。在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里,知识分子并没有自

视高贵，却能够在平民本色的保持中，深明自身的职责。从初始的政治斗争，及至后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他们一直致力于个人性的捍卫。在爱默生们看来，只有在个人不受侵犯的情况下，社会才是健全的。幸运的是，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妨碍他们，而是跟他们一道进行社会的改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许多出色的散文，包括演说辞、文告、通信，都出自政治家的手笔。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完成对美国的考察以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散文，必定是盛大的，裸裎的，强健的。即使在“垮掉的一代”中，他们的文字，仍然有着对自我的执著的关注。

霍布斯把自由分为两类：“行动自由”和“愿望自由”。一般而言，自由当指行动自由；对于作家来说，即是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愿望自由是主体的，内在的，相当于俄国哲学家斯洛基所说的“意志自由”。行动自由是事实性存在，而意志自由是应当性存在，是以价值存在为最后依据的。意志自由是对行动不自由的反拨，对既定的、必然的存在的对抗。鲁迅所以强调“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正在于奴隶虽然没有行动自由，却有“心的反抗”，也就是说还有意志自由。从历史上看，当然不能说政治文化高压政策一点效力都没有；罗马帝国，秦王朝，除了暴政以外，不是很少留下其他东西么！可以想见，专制政体于散文写作的威胁是致命的。奥威尔说：“在极权时代，诗有可能幸存；有些艺术或半艺术门类，比如建筑，也许还发现暴政的好处。只有散文作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沉默，要么死掉。”他断言：“任何极权社会，如果得以延续两代人以上，就算已有四百年发展历史的散文，也有可能完结。”问题在于，意志自由是无法扼杀的。这样，暴君同样有可能落在不要沉默的散文作家的手上，从而失去平素生杀予夺的自由；其罪恶的黑手非但不能掩尽天下目，反之，将被文字永远钉在耻

辱柱上。倘世间果然没有这样的文本,我们凭什么知道尼禄、嬴政、伊凡四世和希特勒?最可怕的,倒是知识分子自身对自由的渴望的弱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内部不自由”。这比什么都严重。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把个人著作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也即“知识特权”,当作社会已经获许的普遍自由而加以滥用。单是文学史,例子便不鲜见。

密尔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人类的自由精神,在许多时候,都依仗着个人思想家薪火相传。如果连他们也放弃了这种责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题目,“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也要消失了。

自由精神表达的形式、内容和深度,决定个人散文,以及不同国家民族的整体散文写作的特点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分别集取了六个文学大国的代表性作品,名为《世界散文丛编》,以作精神现象的艺术的或一面见证。让阅读者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看散文——其实也是文学——怎样随同人类走向进步,或者竟不进步。知识和经验,未必一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精神存在本身,是可以不问时间的迟早或长短的。马克思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希腊艺术和史诗,至今就某方面而言仍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指出,要理解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接着,他本人便解释说,因为这些古代作品表现了一个“正常儿童”的“天性”。而这,大约也就包含了同样一层意思的罢?

是为序。

1996.12.15

(本文为《世界散文丛编》总序,全书6种,花城出版社出版。)

给卢纳察尔斯基的信

(六封)

第一封



柯罗连科
《世界文学》编辑部供稿

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

我当然没有忘记给您写一封长信的诺言，因为这是我的真诚的愿望。公开地讲出自己关于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问题的观点，对我如同对许多真诚的作家一样，早就成了迫切的需要。由于现在实行的“言论自由”，这种愿望无法得到满足。我们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得不写的不是文章，而是报告。我觉得，给您写报告对我来说要轻松一些。您的来访^{〔1〕}给我留下的印象加强了的这一愿望，所以我等待着能有时间坐到桌旁和一位作家同志交换关于当代最迫切问题的意见。

但是，在您来这里时发生的那段噩梦般枪杀人的插曲，如同一个巨大的障碍一样横在我们中间，使得我在克服这一障碍之前不能讲任

何别的东西，我不由自主地只好从这一插曲开始讲起。

还在群众大会前同您谈话，提出请求时，我就很激动。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将在刚刚封顶的坟墓上说一些没用的话。但是，当时我非常想相信，非常委员会⁽²⁾的首长的话是有某种根据的，所以五个人的生命还可以拯救。诚然，即使根据您说话的语调，当时就可以感到，即使您也认为这一噩梦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希望是人的本能……

就在第二天，在收到您的字条前，我就得知，我的模糊的预感变成了事实：五个人未经法院的审判就被枪杀了，五具尸体躺在我当时的印象和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信的此刻之间。只是在两三天前，我们才从当地的《消息报》上得知被害者的姓名。在同您会面之前，我看见了阿罗诺夫和米尔金的亲人们，这是个人悲剧的闪光照到了这些对我来说所不明白的阴影上。当时，我拿到群众大会上去的首先是一位负责粮食工作的人的官方结论。结论中说，在阿罗诺夫的行为中，粮食主管当局并未发现有破坏法令之处。其次，我还带到大会上一份磨坊工人们的请求书，请求书中证明，工人们并不认为他是粗暴的剥削者和奸商。这样，在关于这两个人生命的问题上就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官方的意见，这些意见不管怎么说都是要求慎重对待和进行调查的。而且，在此以前一个半星期，非常委员会确实收到了省执行委员会的建议，省执行委员会根据法律顾问的结论要求释放阿罗诺夫，或者把他的案件移交革命法庭审理。

然而他却被行政机构枪杀了。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种下的不仅仅是玫瑰。”在沙皇统治时期，我写了许多关于死刑的作品，甚至还为自己争得了在报刊上超出检查机构所允许的限度，较多地讨论死刑的权利。有时，我甚至还能拯救一些已经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也有几次在死刑缓

刑后,又获得了无罪的证明。结果,受害者获得了释放(比如在尤苏波夫案件中),虽然有时这些证明来得太迟了(在格卢斯克等人的案件中)。

但是不经法庭审判而执行死刑,由行政机构执行死刑,这即使在当时也是十分罕见的。我只记得发狂的斯卡隆(华沙总督)不经法庭审判枪杀两位青年的事件。但是这一事件甚至激起了军事司法界的极大愤慨,只是在愚蠢的沙皇称赞这件事以后,斯卡隆才免于被送交法庭。甚至连最高军事法庭的官员们也曾向我保证说,这种事情不可能重演了。

当时以及此后,发生过许多不成体统的事,但是直接承认允许把侦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合为一体的事,即使在那时也没有发生过。布尔什维克的非常侦察委员会的活动也许是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子。有一次,一位全乌克兰非常委员会的显要成员在波尔塔瓦非常委员会接见我时(我常常到那儿作种种担保)问我有什么印象。我回答,如果在沙皇政权时区宪兵局有权不仅能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能处以死刑,那么,那时就会出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了。

对此,我的交谈者回答:

“但这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我想,不是所有的手段都能够有利于人民的幸福的。对我来说,毫无疑问,被系统化了的,并且已持续了两年的行政机构的枪杀行为,就不属于有利于人民的幸福的手段之列。去年,有一次,我曾不得不在给拉科夫斯基^[3]的信中描写过一件事:契卡人员在大街上杀害了几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那时,人们常常把“反革命分子们”在黑夜里押到墓地里去,在那里让他们排成一排,站在挖好的墓穴前,不经任何程序就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也许,这几个“反革命”确实想要逃跑(这并不奇怪),而他们却被人用手提机枪射杀在大

街上。不管怎么说，第二天早晨，从四面八方到市场上来的人们还都看见一滩血迹，狗正在舔这些血迹，而人们正在人群中倾听着附近的居民们关于夜间事件的议论。我当时问拉科夫斯基，即使这几个死者是很能干的鼓动家，难道他们能够比当时的场面更加鲜明，更加有鼓动力地向人群作宣传吗？我应当说，当时就连当地的省执行委员会和基辅的中央政权都曾立即制止过（两次）这种集体枪杀人的企图，并要求把案件移交给革命法庭。法庭宣判了非常委员会判定要枪杀的一个人是无罪的，这一判决赢得了当时在场者的热烈鼓掌。连站岗的红军战士们也把步枪放在一边，鼓起掌来。后来，当邓尼金分子们打来以后，他们从大坑中拖出十六具尸体，把他们拿去展览。那印象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经法庭审判枪杀了几个人，所以我曾经问他们的支持者们是否认为被他们枪杀的人的尸体从坑里拉出来将有比较动人的样子呢？是的，双方都兽性大发，这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我痛苦地想到，历史学家不得不把第一个俄罗斯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一页认作是“行政活动”页，而且这不是在 19 世纪，而是在 20 世纪。

请不要说，革命有自己的规律。即使在 19 世纪也曾有过革命群众的情绪的爆发，这种爆发用鲜血染红了街道。但是这还是自发的，而不是系统化了的疯狂发泄。所以他们已长时间地成为（如同巴黎公社社员们枪杀人质一样）血腥的灯塔，这灯塔激起的不只是凡尔赛分子的虚伪愤怒（这些凡尔赛人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公社社员们），而且还有工人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愤怒……这件事给社会主义运动本身长久地留下了黑暗的不光彩的阴影。

在《消息报》6 月 11 日和 12 日终于登出的关于枪杀阿罗诺夫和米尔金的事件的报道中说，他们是因为粮食投机而被

处决的。即使是这样,人们总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粮食主管当局并没有发现破坏法令的行为,所以这种意见分歧本身就应当得到法庭的复查。总之,这件令人忧郁的事情,很像法国大革命时的状况。当时也有物价飞涨的现象。这种现象被最肤浅地解释为贵族和投机商捣乱,因此激起了人们盲目的仇恨,国民议会“迎合人民的感情”,结果当时的阿罗诺夫们、米尔金们的脑袋就数以十计地在砍头机的刀下断落了,但是,毫无办法,物价依然在飞涨。结果最优秀的工人们首先从命运的疯狂中觉醒过来。他们带着请愿书来到国民议会,请愿书中写道:“我们请求给我们面包,而您却想用死刑把我们喂饱。”根据同是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的米列什^[4]的意见,正是由于对死刑的厌倦,在圣安徒安^[5]市郊爆发了最早的反革命暴乱。

是否能够以为,用行政机构杀人的办法就可以比用杀头机更好地使物价变得正常呢?

在官方报纸的报道中,只举出了6月30日^[6]枪杀的四个人的姓名,而以前确实讲的是五个人。惊恐的居民们由此得出结论:名单不全。人们又举出其他人的名字……然而,如果说在什么问题上公开性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话,那就是人的生命问题。在这种问题上,每一个措施都应当公诸于众。所有的人都有权知道,谁被剥夺了生命(如果这已被认定是必须的话)?为什么?根据谁的判决?这是对政权的起码要求。现在,居民们在噩梦的压抑下生活。据说,名单上只列有部分被处死者的名字。人们开始传播一些可怕的流言蜚语,似乎连过去的一套程序都正在简化到缺乏任何形式的不可能的地步;据说,现在不审讯犯人也可以了。我想,这只是惊恐的呓语……但是,怎样把现实本身也常常在发呓语这一想法从居民们的头脑中清除掉呢?……

我想起您的做法就感到痛苦：您，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不去号召人们清醒，不去讲公正，不去讲对人的生命的爱惜态度（人的生命变得非常廉价了），却在自己的讲话中表示同这些“行政机构的枪杀”行为合作。在地方报纸的转述中，您的话就是这样的。我衷心地希望您的心中又会响起当年曾使我们在主要问题上互相一致的情绪的回声，当年我们两个都认为，向社会主义的前进应当依靠人本性的优点，我们要求在直接斗争中英勇不屈，同时即使对待敌人也要有人性。让兽性和盲目的非正义完全留在过去，留在已死亡的东西一边，而不要渗透到未来之中……

现在我终于说出了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头的所有的话，所以现在我想，我的思想已经摆脱了黑暗的幕布，那幕布妨碍我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普遍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意见。

余话下封信再谈。

1920年6月19日

第二封

这第二封信我将从具体的事例说起。这样我会轻松一些。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仔细观察人民生活，并养成了对人民生活的现象有某种敏感的人。

1893年，我参加过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博览会的筹备和博览会的本身吸引许多工人来到了芝加哥。在博览会之后，爆发了巨大的工人骚动，这是当时刚刚来临的失业潮所引起的。一时间，离芝加哥不远的普尔曼小城和芝加哥城本身都处在起义工人的控制之下。伊利诺斯州的州长奥特哥尔奇是一位有自己的性格，思想和行动都很大胆的杰出人物，一位美国民主的优秀代表，他预见到了这种严重的形势，他自己

还在博览会结束前就号召工人们及早考虑自己的处境，并努力组织互助。

有一次，在所谓“艺术宫”附近，在离密歇根湖不远的大广场上召开了失业者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和美国的其他类似大会一样，规模盛大。巨大的广场变成了人头攒动的海洋。据警察估计，会议的参加者在规定开会前一小时，已远远超过了20万人。

我也到那里去了。那是一幅独特的景象：在人头的海洋上，搭起了几个高台，每一个高台都建在两个很高的轮子上，每一个高台上都有一个演讲者在单独地对着人群讲话。我在这里听到了著名的亨利·乔治宣传他的“统一税”的演讲，他说，“统一税”将会用消灭地租的方法一揽子地解决社会问题。一位普通的铁匠，社会主义者摩根穿着工作服，挽着袖子，号召工人们使用暴力。他指着大广场周围的高楼说：“你们在挨饿，可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的。”第三个台子上有一位年轻的，当时很出名的小姐在演讲，这位小姐正在竭力鼓吹咨询事务处是根除失业的良方。也有一个工人演讲者在激烈地证明，资本家在组织生产的同时也在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在劳资这两个阶级之间，应当建立一种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

高台上的演讲者们不断地更换着，但是在每一个高台上演讲的人思想都是一致的，他们发出的都是同一类的号召，在听众中一直进行着相应的运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一个高台前走到另一个高台前，都有可能了解所有的党派的观点。这一切，显然不是为了要在群众集会之后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而只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不同的材料，以便做出自己的结论。其余的就是每一个党派以后的单独宣传的事了。

我听到我身旁有人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叹息的人穿着

一身破旧的工人的服装，可能是一位失业者。

“唉，这一切根本不是这样。”他对我说。“他们首先应当一起统一好意见，然后再带着同一个结论到这里来。那就好了。”

我们认出，说这话的是我们的同胞——一位俄国犹太人。同我一起参加集会的人中，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从血统上讲，他也是俄国人。但是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就来到了美国，虽然他懂俄语（按照家庭的传统），但说得不好。他就是斯通先生。我记得，他是一位小手工业者，但他已经以他的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对他的关注，所以他一方面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奥特哥尔奇州长也觉得可以请他担任保护工厂工人利益的官方机构的督察。在美国这种怪事并不罕见。

我问他：

“斯通先生，你怎么想，你是否希望我们的同胞的愿望能实现呢？”

“这话怎么讲？”斯通先生问，他想听到更加准确的话，也许他还没有弄明白说话人的意思。

我解释说：

“您是否希望在所有这些人的头脑里一下子产生某种相同的逻辑思考，使他们，而且不仅仅使他们，甚至使全体人民转向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们，并说，‘我们听你们的，请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吧。’”

“上帝保佑，可别这样。”这位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呢？”

“不论是我们这庞大的人群，还是美国的机构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照我们看，资本主义还

没有做完自己的事情。不久前,恩格斯到这里来过。他说“你们的资本在出色地起着自己的作用。这一奇怪的机构在出色地为未来社会服务。但是它的作用还没有结束。”这是真的,美国暂时只能将铁路经营国有化,铁路现在就已经集中在几个十亿富翁手中了。但是说到燃料……一下子想出铁路工人和燃料工人们的关系,这是较为复杂的事,虽然也还是可能的。至于按社会主义原则全面组织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那对我们的党来说可是力所不及的任务。例如,熟练工人和粗工们的关系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这只有在《乌托邦》一书的纸面上才是可以轻松做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清楚地知道,我们将不是面对一下子变成为天使的人,而是面对千百万单独的,甚至很厉害的利己主义者,为要使这些人互相协调,就要做大量的艰苦的改造心灵和过渡机构的工作……美国为此提供了出色的自由的土壤,但是暂时还只是仅此而已。”

开完群众大会后,在我们这个不大的人群中还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我弄清了这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但是我尽量用“自己的话”来把这一观点转述一遍。

社会不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在社会中,有许多有机的,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的东西。新的形式在社会中成熟,犹如大洋底下珊瑚礁的生长。大家都知道,这种珊瑚礁石只是许多单个的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发展的动物结合起来的。它们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片不断生长的礁石。而可以与社会相比较的是当这些珊瑚礁露出海洋表面的时刻。这时,它就会受到海洋狂涛的疯狂打击,这狂涛力图把突然冒出的障碍物清除掉,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大气中的影响又力图在这新的基础上孕育出新的生命,为了使孕育新的生命的事能够有牢固的基础,必须做长期的有机的水下工作。

社会上不也正是如此吗？需要有大量的，有如政治自由、文化教育之类的条件；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社会组合；需要在机关和人的风习中有不断的明显的变化。一句话，需要我的一位亲密的朋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奠基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盖里-多勃罗江所说的“社会转变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

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正是为此恩格斯在上个世纪末才说，就连美国也没有做好社会转变的准备。

多勃罗江也遇到了一些反对者，他们说，在罗马尼亚已经准备好了社会转变。实际上，在罗马尼亚确实既没有主观的，也没有客观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正是像英国、法国、美国那样有较发达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国家，拒绝响应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恰恰相反，却是匈牙利宣称自己是苏维埃共和国了吗？不是在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先进的德国（那里的社会主义组织比其它所有国家的都更加发达），而是在二月革命之前根本没有合法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落后的俄国举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多勃罗江在罗马尼亚的反对者们正是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越少”，它进行社会转变的准备就越好。这种论据可以随便叫作什么东西，但就是不能叫作马克思主义。

现在这些反对者们又能够添上一些例子了。英国工人代表团到俄国的访问最后以列宁的一封沉痛的信而告结束⁽⁷⁾，在那封信里充满了冷静和失望的情绪。然而苏维埃国家在东方却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只要深入地思考一下，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们的冷静和狂热的东方的欢迎都意味着什么，就很容易清楚了解它们的意义了。

日前，我在一家苏维埃的报纸上读到了愤怒驳斥土耳其

社会主义者巴里耶夫的材料,巴里耶夫发表了一些谈亚美尼亚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直接号召到亚美尼亚去屠杀。即使在欧洲的土耳其这一东方社会里也是如此。当你清楚地想像到这种东方人在清真寺前的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游方隐士们号召蹲在那里的听众们去同欧洲人进行圣战,并且欢迎苏维埃共和国。)时您就未必会说,这儿所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意义上的进步……更确切地说,倒是相反的意义:亚洲所欢迎的是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感觉到的那种亲切的东西。

余话下封信再谈。

1920年7月11日

第三封

又有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这部分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但这只是部分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忙着其它事情。又是一些“具体的偶然事件”没有给我留下谈普遍性问题的时间。您很容易猜到,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偶然事件。未经法庭审讯而枪杀人的事件在我们这里已经出了几十起,于是我又在做为时已迟的,或者毫无成效的请求。您会说,在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时期宣传温顺可太放肆了。不,并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沙皇时代写《日常现象》一文开始的对死刑的抗议,有朝一日竟会转变为对不经法庭审讯而随意处决人,或者对杀害儿童的可怜的抗议。下面就是我给我们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波赖科同志的信,从这封信里您可能看出,是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偶然事件将我引离了普遍性问题的讨论。

波赖科同志：

我收到了您给我的亲切的回信。显然，您考虑到我的内心安宁，告诉我说，我所提到的那宗案件“已经转交到哈尔科夫去了”。很感激您对我本人的这种友好态度，但是我知道，九个人已经在前天被枪杀了（我告诉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完全像您上次来时一样），其中还有一名 17 岁少女和另外两名未成年人。现在我已经知道非常委员会还在‘审判’其他的米尔戈罗德人，所以现在又重现了不经法庭审判而处决人的可能。我把这种处决叫做‘不经法庭审判的处决’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侦察委员会的作用是同作出判决的权利，甚至是作出死亡判决的权利连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地方，侦察委员会的行为都要经过法院的核查，而且只有在辩护系统的参与之下。甚至在沙皇时期也是这样。

为了不再像上次那样错过时机，我在这里事先表示我的抗议。只要我的微弱的嗓音还能讲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不停地抗议不经法庭审判的枪决和杀害儿童的行为。

在那一天（7 月 7 日）晚上，我被迫给上面说的那个人发了一封补充的信。

我要对我早晨给您的信作一点补充，我要紧急地告诉您一件我今天才确切得知的事。在镇压了去年的起义之后（当时有 14 个人在米尔戈罗德被讨伐队枪杀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认为自己得到了满足，于是在大街上张贴了对这一案件中其他人的大赦通告。现在省契卡又在重新审判那些相信负责责任的政府说话算话，相信大赦诺言的人们。这一情况是所有的米尔戈罗德人都知道的。作为波尔塔瓦省非常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的利特文同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可能处决人吗？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耻辱。

我又不得不就此事给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特罗夫斯基同志写了信。我认为将给彼特罗夫斯基^[8]的信引在下面也并不是多余的。

尊敬的彼特罗夫斯基同志：

我已经就此事给拉科夫斯基同志写过信。现在决定给您写信。我是要为农夫的女儿叶芙多吉娅·皮夏尔卡求情。她被波尔塔瓦非常委员会判处了枪决。在这一案件中已经有12个人被枪决了。皮夏尔卡暂时还在等待哈尔科夫中央机关对她的命运的决定。我不能相信，在中央机关里能够赞成枪杀这个未成年的女子，而连这里的非常委员会也已经怀疑是否要采取这种手段了。皮夏尔卡的姐姐正怀着最后的希望去找您。难道能让她一无所获的回来，而这个女孩子（她不久前刚满17岁）在经历即将到来的处决的恐惧和近来的痛苦地等待命运的裁决之后，还仍然将被枪杀吗？

借此机会，我还要告诉您下列的事情：现在正在决定那些被牵扯进去年的米尔戈罗德起义一案（就此案已宣布过大赦了）的人们的命运。据说，这是米尔戈罗德市非常委员会的错误：它本无权宣布大赦。不管如何，在讨伐队枪决了14个人之后，官方的大赦布告已经张贴在米尔戈罗德市的大街上了。这是官方做的决定，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做的决定。难道能够直接破坏诺言，让那些相信苏维埃政权的话的人们被枪杀吗？

彼特罗夫斯基同志给波尔塔瓦发了电报：不要将对未成年的女孩子的判决付诸实行，所以皮夏尔卡据说就被送往哈尔科夫了。但是因为“送往哈尔科夫，”在我们这里几乎就是“送往另一个世界”的同义词（在问讯处里，人们就是这样回答那些被枪杀者的亲属的），所以在当地居民的眼中，皮夏尔卡的命运还是值得忧虑和怀疑的。另外，至今确实还未处决

过被大赦的人，被大赦的人们还只是被关在监狱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大赦以后，他们之间有些人已经在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而且看样子并没有被指控犯有什么新的过失。

正是在我的信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被告知说，有一个孩子来找我。我走出房间，得知这孩子就是皮夏尔卡。她从哈尔科夫回来了，获得了自由。这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喜悦，我为她和她的家庭感到高兴。但是我却不能为我的祖国感到高兴，在这里竟然会想到要枪杀这个孩子，在这里她曾被和一些再也没有回去的人一起从犯人的队伍中带了出来。

我知道，我们的时代提供了许多这一类的“具体的偶然事件”，有一些偶然事件甚至更加令人震惊，更加悲惨。但是，我想在这里谈谈这些事件，把它们作为我和您进行现在这场关于普遍性问题的讨论的背景并不是多余的。

现在，我再回到上一封信中所谈到的另一件事上来。

历史命运的进程已在同俄国开着一场神奇而恶毒的玩笑。在千百万俄国人的头脑中，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一个逻辑的螺旋突然被拧动了，我国人民突然从以往对专制的盲目崇拜，从对政治的完全冷淡一下子转向……共产主义，起码是转向共产主义的政府。

风习依然如旧，生活结构也依然如旧。教育水平在战争期间不可能大大提高，但是，结论却变得极其相反了。我们从贵族专政（“团结的贵族协会”）转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布尔什维克宣布这种专政，而人民则直接从专制转向了你们，并说：“请安排我们的生活吧。”

人们相信你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们也没有拒绝。你们觉得这很简单，所以你们就直接在政治转变之后开始了社会革命。

您所知道的历史学家卡莱尔^[9]说过，政府常常死于谎

言。我知道,现在真理和谎言、真实和虚伪这类范畴是最不时兴的,并且似乎“是抽象的”。对历史过程产生影响的只是“利己主义的游戏”。卡莱尔坚信并力图证明,真理和谎言的问题归根结底反映在这“利己主义的游戏”的最现实的结果上,我想,他是对的。在你们的专政之前是贵族的专政。它是建立在长期压制俄罗斯的弥天大谎之上的。为什么我们在农奴制之后,国家的财产并不增长,相反在减少,而国家则陷入日益严重的饥馑之中呢?贵族书刊回答说,这是因为农民的懒惰、酗酒。饥馑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我们这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停滞,并不是因为对懒惰和酗酒的人民保护不够。我和同志们在饥馑的岁月里,曾经在文坛上和群众集会上同这一可怕的谎言作过坚决的斗争。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酗酒,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作为一个阶级,农民根本的本质并不是酗酒,而是劳动,而且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报酬,不能给人以牢固地改善环境的希望的劳动。近几十年来,沙皇制度的全部政策是建立在这一谎言之上的。由此产生了地方自治会首长的专权,产生了贵族在所有民事制度和地方自治会中所占有的压倒优势。这种令人震惊的谎言渗透到我们的全部生活之中……有知识的人们曾试图和这种谎言做斗争,参加这一“反对派”的甚至有贵族自身中的优秀分子。但是农民群众只相信沙皇,并且帮助沙皇们镇压一切热爱自由的运动。在专制制度方面,没有能够懂得如下道理的聪明人:由盲目的力量所支持的这一谎言正在最现实不过地将这一制度引向死亡。

卡莱尔的公式,正如您所见,可以用来确定专制制度死亡的原因。专制制度不是听从真理而停止自己的行动,相反,它只是在加强它自己的谎言,最终竟想到了极为荒诞的“专制立宪”,也即幻想用欺骗将专制主义的本质在立宪的形式

中保存起来。

结果，旧制度垮掉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制度中一切都是真理吗？在你们已经向人们灌输的那些东西中就没有这种谎言的痕迹吗？

我深信，有这种谎言，这种谎言甚至荒唐地带有非常广泛的“阶级”性。你们告诉起义的愤怒的人们说，所谓的资本家（布尔乔亚）只是寄生虫、掠夺者、剪息票者的阶级，仅此而已。

这是真理吗？你们能够真诚地这样说吗？

尤其是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说这种话吗？

您，阿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然还清楚地记得不久前的时代，那时你们马克思主义者们还在同民粹主义者们进行激烈的论战。你们证明说，俄国必须颇为有益地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当时，你们所说的这一颇为有益的阶段是指什么呢？难道只是指资产阶级的寄生和剪息票吗？

显然，当时你们是指别的东西。当时在你们看来，资本家阶级是一个组织生产的阶级，不管组织得好还是坏。尽管它有许多缺点，你们还是完全根据马克思学说认为，这种组织对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俄罗斯这些工业落后的国家来说是颇为有益的。

为什么现在“布尔乔亚”这个外来词，这个完整的、巨大的、复杂的概念被你们轻而易举地在我们愚昧的，此前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词的人民的 eyes 中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关于布尔乔亚的概念，结果，布尔乔亚就成了寄生虫、强盗、除了剪息票什么也不干的人的代名词？

完全同用寄生虫的概念替换了农民的阶级意义的贵族专政的谎言一样，你们的公式是用纯粹的强盗的概念替换了

生产组织者(尽管是不好的组织者)的作用。请你们再看看卡莱尔和他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强盗的本能在我们这里被战争和以后的在任何革命中都难以避免的骚动所激化了。一切革命政府都必须同这种本能作斗争。对真理的感情要求这样做,这种对真理的感情要求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必须真实地、诚实地说明你们关于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的概念。你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为了策略的考虑而牺牲了在真理面前所承担的义务。在策略上煽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仇恨,鼓动人民群众攻击俄国资本主义,就如同鼓动军队向要塞发起进攻一样,这对你们是有利的。所以你们甚至不惜歪曲真理。你们把部分的真理当作全部的真理(酗酒现象确实也有)。现在这一切带来了结果。要塞被你们攻占了,并已交给人们肆意抢掠。只是你们忘记了这要塞是人民的财富,是“颇为有益的过程”所取得的。在俄国资本主义创造的这一机器里,有许多是应当继续完善,而不是应当消灭的东西。你们告诉人民说,这一切只是掠夺的结果,现在应当遭到掠夺。我这里所指的不仅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工厂、机器、铁路等物质价值,而且还有那些新的过程和习惯以及那个新的社会结构,你们,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当年在证明“资本主义阶段”的有益性时所指的就是这一社会结构。

1902年,在波尔塔瓦和毗邻的哈尔科夫省的某些地方曾经爆发过广泛的农民骚动。农民们突然去抢劫地主的财物,而后来在当局来了之后,又驯良地跪了下来,并同样驯良地躺下来接受鞭打。当后来开始审判他们时,我一度担任过他们和组织起来的辩护机构之间的中间人。当时在波尔塔瓦的我的书房里常常有许多农民聚集在一起,我尽量地观察他们看待所发生的事件的观点。他们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也并不高。他们把整个运动叫做“抢劫”。农民中最聪明的人是这

样用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这一“抢劫”的产生的：“如果孩子们不哭，那母亲就不喂奶。”他们懂得，抢劫并不是争取某种改善的最好的方法，但是被逼到绝望地步的人们总是想出办法来引起“恩人沙皇”对他们处境的注意。剩下的事情就是盲目的贪婪所造成的了，所以就发展成了大规模的运动。但是沙皇政府是闭目塞听的。它只知道必须进一步管理、控制和使“牢不动摇的基础永存”，而并不能从突然爆发的严峻的抢劫事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一届杜马的农业改革尝试（相当聪明的）被扼杀了，而在抢劫时期推动农民群众的那些动机却一直保留到了革命时期。你们，布尔什维克们，把这种动机引导到极端的形式，你们用自己的“抢劫抢劫来的东西”的口号做了农村的“抢劫”所做的事情，农村的抢劫毁坏了大量的农业财富而没有给你们们的共产主义带来任何好处，并且还蔓延到城市，在城市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生产机器也被破坏了。

同这一制度的斗争带上了一种攻击敌方堡垒的性质。对被围困的堡垒的任何毁坏，堡垒中的所有火灾，对堡垒中储备的一切毁灭都有利于围攻者。所以你们也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的任何破坏都看作是你们的成就，你们忘记了社会革命的真正胜利（如果这一革命必须发生的话）并不在于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而在于运用这一机器并使它按照新的原则工作。

现在，你们终于想到了，但很遗憾，这已经太晚了，国家正处在被你们所忘记的一条战线上的可怕的危险之中。这一战线就是大自然的敌对力量。

余话下封信再谈。

1920年8月4日

第四封

看来,这一次可以不讲具体的偶然事件了,所以我想立即谈一谈普遍性的事情,趁着时局还没有完全改变我的情绪。

我是在英国代表团正走在回家路上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在我们官办的地方报纸上登载了,或转载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悲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和列宁致英国工人的一封信一起发表的。文章中说:俄国共产党人在为自己的革命首创精神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孤独的悲剧”。据文章作者的意见,在列宁的信里有一种对“在我们这一空前的时代还可能有像大多数到俄国来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这样的工人群众的‘领袖’一事感到的困惑”……“实质上什么也没有学会的英国的工团主义者不幸地仍然代表着英国工人的绝大多数。”

因为你们共产党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无产阶级和英国工团主义者相比朝前迈了一大步,然而,英国工团主义运动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其它苏维埃报纸上也已不止一次地重复说:“老式德国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甚至像考茨基这样的人,都是可鄙的妥协者,他们甚至已经卖身投靠资产阶级了。

抛开那些可以用争论的冲动和激情解释的东西,最后就剩下了这样的事实:欧洲无产阶级并没有跟你们走。总的来说,他们的情绪就是那位美国社会主义者斯通的情绪,在第二封信中,我曾经讲述过斯通的观点。欧洲无产者们认为,资本主义即使在欧洲也还没有干完自己的事情,它的工作还会对未来有益。在从现在向未来的过渡中,并不是一切都必须消灭和毁坏的。像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些东西对他们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是未来的必

需的武器，是人类通过长期的不无结果的斗争和进步所取得的护身神物。只有我们这些从来不曾完全知道这种自由，也从来没有学会和人民一起运用这种权利的人才宣布这些“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它们只会阻碍正义的事业。

这是你们的巨大错误，它一次又一次地使人们想起斯拉夫派关于我们的“信神的农民”的神话，更有甚者，使我们想起我们民族的关于伊万什卡的故事，这伊万什卡不学习，却掌握了所有科学；不劳动，却能按神的旨意获得一切。你们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带着跟你们走，这一点并不说明我们有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而恰恰相反，说明我国人民的不成熟。力学中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反作用力妨碍机械的工作，应当消除之，但是没有，机械就会空转，就不能做需要的功。我们这儿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你们抛出最高纲领主义的口号，你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你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这一切折腾丝毫也不标志着它的胜利。

在许多方面都和俄罗斯相似的罗马尼亚，人们给我讲了一则非常生动的，故意想出来的笑话，但这笑话却是很真实的。那里还保留着大庄园。这些庄园具有我们古代贵族时期的所有特征。这些庄园主甚至还叫做鲍亚林（贵族——译者注），这无疑是从斯拉夫语来的词。

这些鲍亚林们，尤其是年轻的，倾向激进政党，他们中许多人都接受过多勃罗江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一次，一位这样的鲍亚林在瑞士旅行，对无政府主义发生了兴趣，并且同一位园艺学家兼无政府主义者相识了。他们一起喝酒，互相都有好感。那位鲍亚林就邀请无政府主义者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国内有几处巨大的庄园，其中包括长满森林的土地，他决定把森林的一部分辟为公园。这也符合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他很愿意这位贵族的所有庄园都变成公共的财产，所以他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他预见到：有这样的“鲍亚林们”的罗马尼亚人显然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像瑞士人那样沾染资产阶级的偏见，所以在那里贯彻无政府主义思想要容易得多。他还预言，一旦出现革命的迹象，他就不仅不会保护鲍亚林的私有财产，反而会立即把这些财产交给人民，那鲍亚林同意了，也许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危险还不太贴近……

就这样，在罗马尼亚的一个角落，园艺家兼无政府主义者用鲍亚林的钱在鲍亚林的土地上搞出了一个供公众使用的模范公园。但是，因为“人民的年轻”而产生的各种别扭事很快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在桌子上、在长椅上，在墙上都出现了刻下的题词；花被肆意无惮地摘走；珍稀树木的枝条被折断；厕所脏得一塌糊涂。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写了一张言辞雄辩的传单，其中说明公园是交给居民使用和保护的，所以不应当摘花，不应当折树枝，不应当乱涂乱画……但是“年轻的人民”对这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热情话报之以独特的幽默：出现了用刀刻出的题词，花和树枝遭到疯狂的毁坏，厕所变得更加肮脏了。于是园艺家找到这位鲍亚林说：“我不能在你们国家生活了。还没有学会在公共场合怎样要求自己的人民距我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太遥远了。”

这一事例说明了我的思想的实质。并不是只要没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习惯，就标志着做好了社会主义的准备。社会主义者巴枯宁曾经写道：“我们应当同俄国大地上的所有窃贼和强盗结成同盟。”他擅长理论，是一位在理论上否定私有制的无政府主义者。窃贼则在实践上否定私有制。让实践和理论统一起来吧。现在我们会觉得这种说服是非常幼稚的，因为在高瞻远瞩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对私有制的否定与普通

窃贼的这种否定之间有一个无底深渊。窃贼首先要回过头去培养自己对他人财产的诚实态度，即培养“资产阶级阶段”所教导的东西，然后才不是个人地，而是全体人员一起去考虑对私有制进行社会性的否定。

您会说，我国人民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些罗马尼亚人。我知道，即使在罗马尼亚也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让我们诚实地，怀着对真理的爱来说我们现在的人们是什么样子吧。

您大概会同意，我爱我们的人民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您也会同意，我以我整个行将结束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并不是盲目地把他们当作适宜做这种或那种实验的环境来爱的，我是按人民实际的样子来爱他们的。比如说，当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我曾经满意地想到，在我国不可能有类似审判林奇的事，对林奇的审判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发生在南部的一个州里：这个黑人强奸了一个白人姑娘，后来为了掩盖这一罪行又杀害了她，小城的居民组织了审判，把他放在篝火上活活烧死了。记者们描写了所有的细节：绳索烧断了，可怜的黑人从火堆上爬了下来。人们给被害的姑娘的父亲以特殊的尊敬：他用自己强壮的双手抓住那个黑人又把他扔到火堆上。

我想，即使在现在这极端兽性化的时代，在我们这儿也不可能有类似的现象。我国人民的斯拉夫的天性要比盎克鲁撒克逊的天性柔和一些。在我们这里执行死刑的人也只有信基督教的希腊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承认，在美国，精神文明的水平要高得多。那黑人的事件是极端的例外，也正是这极端的例外才引起了人们那种兽性般的审判。在平时，年轻姑娘可以毫无危险地在全国旅行，受到可靠的社会风气的保护。难道可以这样讲我国的风气吗？在我国，这样的女旅行家每走一步都可能落入我们的那张放荡、荒淫的大网之中。就本

性和天赋而言，我国人民并不比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差，正是这迫使我热爱我的人民，但他们在道德文明的教养上远远地落后了。我国人民没有那种能够迫使自己摒弃某些行为（即使在谁也不会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的自尊。应当承认这一点，并且应当由此看到必然的后果。

我们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严格训练。你们在谈论共产主义，但却不谈共产主义还是一种尚未形成、未确定的东西，而且你们至今也没弄清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什么。——为了按这一方向进行社会转变，需要另一种风习。由同一种碳氧化合物既可以组成奇妙的钻石晶体，也可以组成难看的煤炭。这就是说，在原子本身内部结构上是有某种差别的。对于用以构成社会的人类原子来说也是这样：用现成的社会并不可能立即获得各种形态的结晶。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里，现在您就可以毫无危险地把自己的东西留在街心花园里，而当你回来时还会发现它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可是在我国——我们直说吧……在这一问题上做精确的统计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您知道在我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别乱放东西，别引小偷作孽。你们大概也同意，在从放置不好的东西旁边走过的千人中，被诱惑者的百分比在欧洲要大大低于俄国。而这种区别对于社会形态的结晶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去年冬天，我住在乌克兰的乡间，并同农民们就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过大量交谈。但我说到在图鲁兹（法国，省中心），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在住满工人的住宅里生活了一年，夜里一次也没有锁过门时，这引起人民的极大惊奇。

“但是在我们这里，”对此一位长得很好看的聪明的农民忧郁地说：“特别是现在，如果一个小伙子给母亲带回别人的东西，那么，有的母亲甚至会夸奖他：很好——往家里拿东西，而不是往外拿。”

自从你们宣传了共产主义以后，这种现象不是减轻了，而是大大地加强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但是意味深长的例子：为了哪怕稍微减轻粮食方面的匮乏，波尔塔瓦市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鼓励耕种所有闲置的土地。这样，大街上房屋前的小空地里都种上了土豆、胡萝卜等等……市立公园的空地上也是这样。这已是近几年的传统了。

今年的土豆长得特别好，但是……人民都不得不在土豆成熟之前早早地把它挖出来，因为有人竟然在夜间偷土豆。是谁在偷——这并不重要。但是问题在于一些人劳动了，另一些人却要享用，三分之一的收成给毁坏掉了，因为土豆没有长成，剩下的部分又无法储藏过冬，因为没长成的土豆容易腐烂。我曾看到一群可怜的妇女们，她们大清早站在夜间被盗挖的土豆地前哭泣着。她们劳动了，种了土豆，给它们松土，薅草。但是另外一些人跑了来，扯掉秧蔓，踏坏了许多土豆，挖走了一些还应当再长两个月的小土豆，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小时里做完的。

这一事例表明，像人民的道德品质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用数字来表这的。在一种道德水平上，庄稼的收成就会是一个样子，而城市居民也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可免受冬天的饥饿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我国人民的大部分收成就是被我们的道德毁掉了，而更大的损失在于：明年许多人将考虑是否还要耕种空地，——谁也不想为窃贼耕种……你们无论用什么枪杀也无法制止这种自发行为。这就需要某种别的东西，而不管怎么说，离共产主义还很遥远。

我并不想在这封信中谈具体的偶然事件。但是我马上就要写完这封信了。我们这里的情况依然如故。夜间不时可以听到枪声。如果枪声是从西南方来的，那就是说起义者攻了

过来，如果是从东南方公墓那边来的，那就是说又在枪杀什么人(也许是杀了许多人了)，双方都在比赛残忍。我们整个波尔塔瓦地区就像是一个火药库，现在已经有人在谈论要枪毙从起义地区抓来的人质的事了。这一措施如果采用了的话，那也是毫无意义的，残酷的，同时对于采用这一措施的人来说，只有坏处。大战期间，特别是我在法国的时候，我曾经观察过这种中世纪遗留给我们的野蛮行为，而且应当说，即使在战争时期，实际上枪杀人质的事情似乎也不曾发生过。法国人指责德国人，德国人指责法国人。但是似乎扣押人质的手段只是用来进行互相指责，而并没有真正实行。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枪杀几个老人的话，现在藏在树林里的年轻人和在我们旁边警觉的马赫诺并不会感到多么悲哀。这只能给他们增加几个新的信徒和彻底地激怒中立的居民。也许出于这种考虑至今还没有枪杀人质的事情。但是，监狱关满人质也就已经够了。这给人们的家庭带来了多少痛苦，我只从那些含着泪来找我的人身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在收割庄稼的大忙季节里，有多少劳力被从这些家庭里捉走了呀。

顺便提一下，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马赫诺已经在他占领的地区发行了自己的钱币。人们告诉我说，在这些钱币上写着这样两句诗：“哎，老婆们，高高兴兴吧，马赫诺有钱了。”另一句是：“谁不收这些票子，就要吃马赫诺的鞭子。”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在一定程度上很杰出的人物，马赫诺是乌克兰人民的中间派(也许还要广泛)。交战的任何一方都离不开他。他帮助过你们攻克顿涅茨克矿区。原来，又帮助过自愿兵扫荡过一条战线(虽然是消极地)。在最近这次攻占波尔塔瓦时，马赫诺军又帮助了你们。然而苏维埃政权却宣布他是非法的，但是他对此只是笑笑而

已，他的笑很像我们的革命的脸上那种真正靡菲斯托菲尔的表情^[10]。

1920年8月19日

第五封

我常常思考西欧社会主义的首领们和你们——俄罗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明显的分歧的原因。你们垄断的报刊解释这一分歧时说，这是因为西欧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已卖身投靠资产阶级了。但是，对不起，这是非常庸俗的，就像当初指责你们被德国方面收买了一样。

不应当为了说明这一分歧的事实而去寻找低下的原因。这一分歧有相当深刻的根源，它在于情绪上的巨大区别。关键是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已经在数十年间领导了本国无产阶级的合法群众斗争，他们早就深入到这些群众之中，还建立了广泛而严整的组织，并且取得了这一组织的合法的承认。

你们从来没有处在这种情况下过。你们只是秘密行动，最多也只是领导企图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的秘密行动。这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完全不同的心理。

欧洲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们在采取某一个决定，并把它推荐给自己的支持者们时，都习惯于权衡这一步骤的所有方面。比如说，当宣布罢工的时候，领袖们必须全面考虑的不只是罢工的宣传鼓动意义，还有这一罢工对于工人群众自身的全面后果，其中也包括当时的工业状况。群众是否能坚持罢工，资本家能否做出让步而又不破坏自己的生产（生产的破坏又会直接地反映在那些工人自己身上）？总之，他们不仅对斗争本身负责，而且还对他们推荐的措施是否会影响工人们

的福利负责。他们习惯于感到劳资之间的互相依赖。

你们从来不曾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因为由于专制制度的毫无意义的压迫，你们从来没有合法地活动过。你们本人也冒过险，也为在全欧洲都已被承认为群众的权利和群众领袖的权利的那些东西坐过牢，而这种坐牢的危险、流放的危险、苦役的危险在你们自己的眼中和工人们的眼中替代了一切其它的责任心。如果说因为我们计划中的错误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遭受了无谓的饥饿，感受到极端的贫困的话，你们自己也曾受到过另外一种形式的苦难。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总是习惯于号召采取最极端的措施，采取最差的办法，采取最极端的结果的原因。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养成对生活，对斗争本身复杂可能性的敏锐嗅觉的原因，这就是你们为什么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只看作是强盗，而没有复杂地考虑它在组织生产中的作用的原因。

你们对西欧的社会主义的失望和悲伤就是由此而来的。

工人们一开始跟你们走了。那还用说吗？在各种同资本斗争的尝试受到疯狂的迫害之后，你们一下子就宣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很讨工人們的欢心，而且又给了他们许多许诺，……他们跟着你们，也就是跟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向前冲去。

但是现实仍然是现实。在这里，对于工人群众，不像对于你们一样，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公式，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是他和他们的家庭直接的生活问题。所以工人群众比其他人都更早地亲身感觉到了你们的简单化的结果。你们战胜了资本，现在资本躺在你们的脚下，被打残了，打瘫了。你们只是没有发现，资本和生产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活生生的联系，所以你们在打死资本的同时，也打死了生产。你们在欢庆自己

对邓尼金分子和高尔察克，对尤登尼奇和波兰人胜利的同时，没有发现你们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战线上遭到了失败。在这条战线上，大自然的敌对势力从四面八方人进攻。你们醉心于片面的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注意其它的东西，一意贯彻自己的公式，你们把国家推到了可怕的境地。当年，我在《饥饿的年代》一书中试图描绘过专制制度造成的悲惨局面：广大的俄国产粮区的人都在挨饿，饥情还在加剧。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整个俄罗斯从首都开始——那里的街头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都被饥荒控制了。现在，人们说，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及时搞好了食品的供应（这能坚持很久吗？而且这是以何种代价呢？）。但是饥荒正在席卷着比 1891 年到 1892 年的外省灾区广阔得多的地区。而且最主要的是，你们摧毁了城乡关系中有机的东西：自然的交换联系。你们不得不用人为的“强制剥夺”的方法和借助讨伐队强征的办法来代替这种自然的交换联系。在农村不仅得不到农业机械，而且就是为了买一枚针也不得不付出两百卢布的情况下，你们确定了明显不利于农村的硬性粮价。你们在自己的报纸上撰写文章，向农民证明，支持你们是对农村有利的，但是让我们暂时不谈问题的本质，你们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我们的人民还习惯于总结现象。

每一个农民都只是看见他生产的东西被剥夺了，他得到的报酬同他的劳动相比，明显是不等价的，所以人们得出结论：要把粮食藏到坑里。你们在寻找粮食，强征粮食，在用烧红的铁扫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村，在焚烧一个个村庄并在为粮食政策的成就而高兴。除此之外，应当补充的是，俄罗斯的许多州也都遭受了饥荒，成群的饥民盲目地从那些地方，比如说，往我们乌克兰跑，而且这些农民家庭的父亲们因为没有畜牲，只好自己驾辕拉着载有孩子和家具的大车，

那景象比我在饥饿的年代所看到的全部景象都更加令人震惊……而且这一切并不只局限于遭到歉收的那些地方。还在两个月前，我就在我们的波尔塔瓦见过一个六天“没见过面包”的人，他是靠土豆和蔬菜勉强度日的，而现在又赶上冬季，饥寒交迫，真是雪上加霜。买一大车从不远的森林运来的劈柴就要一万两千卢布。绝大多数的居民，甚至连像你们苏维埃职员一样比较有保障的人也将处在无法御寒的境地（也许共产党员会例外）。在住宅里将几乎同在露天下一样。在这条战场上，你们把全体城市居民（以及部分农村居民）交给大自然的敌对力量发落。对这一点，被搞得破产了的，可疑的，“不可靠的”，身穿礼服的人和身穿工装的人都同样感觉到了。人民已经找到了简短总结这种状况的形式。一位早就住在城里，从事畜力车运货的农民带着一种痛苦而忿恨的微笑对我说：

当我们还有傻皇帝尼古拉时，
我们还有一点面包。
而当聪明的共产党来了以后，
人们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面包就是用钱也买不到……

这不是故意能想得出来的，这是从氛围中，从直接感觉中，从显而易见的事实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工人群众已经开始感觉到你们的根本错误，在工人群众中出现了你们强烈谴责的大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身上的那种情绪；在工人群众中孟什维主义（即社会主义，而非最高纲领主义式的）在明显加强。这种主义不承认以摧毁资本主义这一所谓敌方堡垒为开端的迅速而全面的社会改革。它承

认，资产阶级制度的某些成就是全民的财富。你们在同这种情绪作斗争。以前，大家都承认，俄罗斯是由沙皇意志专制地统治着。但是，当这位可怜的专制者的意志在某个地方刚刚表现出与当权的官僚们的打算不相符合时，官僚们就有成千上万种办法迫使专制者就范。同样的可怜虫，当今的“专制者”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你们怎么了解和怎么表达他的意志？你们没有出版的自由，也没有表决的自由。在你们看来，出版的自由也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然而没有出版自由使你们在生活现象面前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在你们的官方出版物上，是一派国内繁荣的景象，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因为饥饿盲目地“四处乞讨”（这是一句俄罗斯的老话）。正当乌克兰的乡村激荡着仇恨和愤怒，而非常委员会已经在考虑枪毙乡村的人质的时候，你们宣布了共产主义在乌克兰乡村的胜利。饥饿在城市里也开始了，严峻的冬天已经到来。而你们关心的只是捏造无产阶级的意见。在某一方面，工人中的与你们政策方向不尽相符的独立思想刚开始表现出来，共产党人们就立即采取措施。该工会组织就会被称作白色和黄色的，它的成员就会被逮捕，工会组织本身就会被解散，然后在我们的官方报纸上就会出现凯旋的文章《给红色印刷工人（或某个红色的工人组织）让路》，而这些人在以前只是少数。就是这一类的种种现象组成了你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在波尔塔瓦看到的也是这种情况：非常委员会（这一次是与其他机构完全一致了）对孟什维克进行了大逮捕。“不可靠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中所有的多少杰出一些的人现在都被关在监狱里，为此不得不将许多人从必需的日常工作中拖了出来（没有“不可靠的”孟什维克的帮助，你们总是不能应付这种日常工作的）。就是这样才出现了新的“共产主义的胜利”。

这是胜利吗?当年,还是在专制制度下,在新闻审查和努力自我解放的出版业交替加强的时期,有一次,在一家幽默刊物上,登了一幅专制君主坐在刺刀上面的画。图题是:“不太舒服的位置”或别的类似的话。现在,你们共产主义的执政党也正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它在农村的情况悲惨透了。不断地有被打伤和被打死的共产党人和政委被抬到城里来。官方报纸登出讣告,你们的党自我安慰说,这只是农村里的富人们干的,这不妨碍你们焚烧整个整个的农村,不管富的还是穷的全都一样。但是就连在城市里,你们也只是靠军事力量维持着的,否则你们的代表机构早就改变了。你们最亲密的同盟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者被关在监狱里。我不时看到这种现象。在1905年,当我还身体健康,能够活动时,我一度曾经同日益嚣张的抢劫犹太人的情绪作斗争,这种情绪所针对的当然不只是犹太人,而且还有罢工的工人。当时,当地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们破坏了罢工,印刷了《波尔塔瓦报》的传单和我的传单。这无意中使我和排字工们接近起来。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排字工,他无疑是左倾的,而且气质上也很容易激动。他的表现引起了宪兵当局对他的注意,所以在反动时期一开始,他就被流放了,先是到沃洛格达,后来又到乌斯奇—西索尔斯克。他的名字叫纳弗罗茨基。现在他在波尔塔瓦,而且……已被你们的非常委员会逮捕了,原因是他在一次印刷工人的会议上做过演讲。现在当我读到关于莫斯科和彼得堡“黄色”印刷工人的消息时,我不由地想到,有多少像纳弗罗茨基一样,在同沙皇反动的斗争中证明自己忠诚于工人解放的人,被非常委员会的共产党人们以所谓“黄色的”,即“不可靠的”社会主义者的名义逮捕了。有一段时间甚至传出因纳弗罗茨基在工人中发表了反对压制思想自由而要枪毙他的说法。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那样,非常

委员会和以前的宪兵局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以前的宪兵局无枪毙人的权利，而你们的非常委员会却有这种权利，并且带着一种令人可怕的随意性和轻松态度运用这种权利。

第六封

你们是在什么问题同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道扬镳，并开始同本国的工人群众不一致的呢？前面我已经回答过这一问题：这答案就是你们的最高纲领主义。

从逻辑上说，这一状况是最轻松的：一下子要求都成功，并把那些一下子就在复杂的、往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停步不前的人们叫作不彻底的愚蠢的人，有时甚至叫作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妥协者、高尔察克分子、邓尼金分子，或者统称为叛徒……

这一说法的不恰当之处在于，你们自己也不能一下子使一切都实现。例如，你们就允许货币制度存在。当然，这只是在“最初阶段”，当“还没有调整好新的交换机器，例如社会供应时”。但是这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某一个更激烈的最高纲领主义者在描写了实际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之一的货币制度的后果之后，就能够合乎逻辑地指责你们：你们容忍这一特点，那就是说，你们接受了它的后果，然后再按逻辑推上几步，你们就成了高尔察克分子、邓尼金分子、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了。请不要说，这对于你们来说只是暂时的阶段，因为全部问题正是在于理想与现实妥协的程度，西欧社会主义者们和你们都“临时”接受了这一妥协。你们是教条主义者、最高纲领主义者，而他们是在寻找革命的可能性的尺度。对你们来说，一下子废除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他们则看到更多的不可能“一下子成功”的事。

逻辑是一种强大的思维手段，但远不是惟一的。还有能够提供把握复杂具体事物的可能性的想像力。这种能力对于像治理一个大国这样的事是必需的。在你们那儿，公式完全压倒了想像。你们不能清晰地想像出现实的复杂性。例如说，数学家可以计算出一只铁球在多长时间以内以某种速度飞到月球上，但是物理学家却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最起码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上是这样。你们只是社会主义的数学家，社会主义的逻辑和公式的数学家。你们说，如果全世界的资产者都不妨碍我们，如果欧洲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和跟在他们后面的大多数工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做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做的事，不去摧毁资本主义，——不背叛的话，那我们早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你们首先在自己的国家里做了最简单的事情：消灭了没有组织起来的，不明智的和软弱的俄国资产者。你们知道欧洲资产者要强大得多，而欧洲工人也不是麻木的群体，不是一声呼唤就能把他们引进最高纲领主义之中的。欧洲的工人们明白，消灭任何机构都用不了很长时间，但是这里说的是必须在机构的运行中改造它，以免破坏生产，人只是靠了生产才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永恒敌对的大自然的危害。西欧的工人们具有比你们——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更多的现实意识，所以他们不是最高纲领主义者。在塞戈里^{〔1〕}和列宁通信以后，问题就清楚了：欧洲的工人群众总的来讲不支持你们的最高纲领。他们在妥协的范围内保持了中立。

在我们的波尔塔瓦，革命后立即改换了市自治政府。它成了民主的政府，并干预了先前的供应工作。它开办了城市劈柴仓库，当商人们大幅度提高物价时，市政府大量抛出自己的储备，于是价格降了下来，那时就有人喊叫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信奉法制的人和主张资本主义的人却宁可要完全

“自由的贸易”，而不要任何的干预。你们觉得这是过于低的标准……但是波尔塔瓦以前一直很好地抵御了冬季的严寒。

当然，这只是小事一桩，但是它却清楚地表明了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进行供应中干预供应，不破坏，也不消灭供应。然后，随着实验的进行，这种干预可以不断地加强，把它推到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直到社会最终转向社会主义。这是一条缓慢的，但是惟一可行的道路。你们却一下子停止了资本主义的供给生活必需品的办法，结果现在，波尔塔瓦这个产粮区的中心，尽管周围就是森林，仍然面临着饥饿，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严冬而无法御寒。在各地，在供应的所有方面都是如此。你们的报纸得意洋洋地宣称，在弗兰格尔统治下的克里米亚，粮食已经卖到150卢布一磅。但是在我们（也就是你们）这里，在波尔塔瓦，在俄罗斯的粮仓，粮食已经是450卢布了，也就是说，要贵上两倍。其它的所有情况也都是如此。

我已经说过，在波尔塔瓦这已经成了传统：居民们常来找我这个作家，因为我有时能够突破报刊审查制度的框框。以前，来找我的是一些受沙皇当局迫害的人们。现在来找我的是被你们逮捕的人们的亲属。在这后一部分人中，有许多是皮匠。生活总是起作用的：尽管你们明令禁止，手工皮匠仍旧不时要制皮，以此来满足人们迫切的穿鞋的需要，因为眼前就是冬天。乡执委员会有时也批准这种作法，所以皮革也在慢慢地开始加工，直到……这一罪行被你们当局知道并被制止为止。你们需要“一下子”把生产转到社会主义的，甚至共产主义的土壤上，所以你们在把互让说成同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妥协。当然，你们可以说，你们已经有一些“社会主义的皮匠”了，但是这些官僚主义的作法同海洋般巨大的人民

需求相比又算什么呢？结果你们就看吧，你们的红军战士和为你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们都穿些什么：你常常会碰见穿树皮鞋的红军战士和穿着木制凉鞋的公职知识分子。这使人们想起远古时期，但是这在面临冬天的现在是很不合适的。对于冬天将怎么办这一问题，人们往往只能以眼泪作答。

总之，一想到被人们习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个俄国社会阶层的命运，我的心就不由地紧缩起来。你们就看看你们的薪俸，并把它和粮食的价格比较一下吧。你们就会看到这是多么可笑地，更准确地说，是多么悲惨地不相称呀。但不管怎样，他们仍然活着……是的，是活着，但靠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出售过去剩下的财产：台布、头巾、长衫、大衣、西装上衣、裤子。如果把这些用形象的语言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出售过去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制造的一切，那制度还曾创造过某种剩余。现在却连必需的都不够了，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像海潮一样增长。你们消灭了资产阶级工业，但是没有制造出什么东西来取代它。所以你们的公社是一个巨大的靠资本主义工业的尸体生活的寄生虫。一切都在毁坏：从过去的那些主人们那里夺过来的房屋没有人修缮，正在坍塌，房子周围的栅栏被拆去当作燃料，总之，全面崩溃。

很清楚，继续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前所未闻的灾难在威胁着国家。这些灾难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城市工人。比其他人支撑得都要久的是钻研得很好的共产党员和红军。但是即使在这其中，在自愿者当中也清楚地看到了贫困的迹象。活得最好的是各式各样的掠夺者。这是很自然的：你们把一切都建立在利己主义之上，而自己却要求别人做出自我牺牲。请你们证明，对武装的人来说，不去掠夺没有武器的人而饿死要更加有利吧。

前面我讲过一个纯粹生活性的典型的小事，即抢劫菜园

的事，这种事的规模之大使人们丧失了未来进行劳动的愿望，但我只是没有说到过在这些场合红军战士起了什么作用。有时菜园的主人们也埋伏起来抓贼。当他们抓住一些平民小偷时，这些人就会不好意思地跑掉。但是红军战士们却简单地回答：你要我们坐着挨饿，还是怎么的？于是他们从这块地转到另一块地继续抢劫，现在还有一件类似的小事。在不到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红军团从波尔塔瓦开往前线。团司令部就设在我的住宅旁边，所以一清早，在我们街道两旁，就有红军士兵们在列队。在我住的房子的那个院子里，有几棵核桃树。它们引来了红军战士，我们院子里住满了等着开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很难描写当时所发生的情景。士兵们爬上核桃树，折断树枝，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匆忙，这些士兵像孩子一样，还抓起劈柴拌子、砖头、石块，把这些东西朝着树上砸，全然不顾爬到树上的人有可能被击伤，这些东西有可能飞到我们家的窗子里。劈柴有几次打到窗框上，幸好没打到玻璃上，您是知道的，现在打破玻璃意味着什么。我只得去找首长。但是首长只能使这些行为中断很短时间。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挤满了士兵。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扔劈柴和石头，以免打破窗户。所有的核桃树都遭到了洗劫，只是在一位指挥员说了一通红军要建设新社会的庄严的话之后，红军战士才离开了。……而我却忧愁地想到我们面临着灾难，到时候不是核桃的匮乏，而是粮食、燃料、衣服、鞋袜的匮乏将使这些现在抢着摘核桃的思想简单得可怕的孩子们去抢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粗暴的士兵胡闹。

在同您见面时，我不得不谈到红军和志愿兵占领波尔塔瓦时的不同情况。志愿兵们“在首长的允许下”在城里公开抢劫了三天多。红军战士们作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占领波尔

塔瓦后,各种匪帮制造的抢劫立刻就停止了。只是在后来,当你们采取了不经审判的枪决和强征住宅(常常也危害到劳动阶级)等办法时,这一印象才被另外一种感觉代替了。你们能够比自愿兵更好地占领新的地盘,但是你们也像他们一样不会保护它,——当时我也是这样对您说的。现在,从基辅来的人们说,有人建议红军在出发打仗前要“靠资本家的财产来保证自己的着装”。如果这得到证实的话,(我听到的消息带有完全可靠的性质)那么,这就意味着危险的征兆已经开始了:你们将像邓尼金分子们开始时那样结束。从基辅来的人们说,这一次抢劫持续了一个多星期,这也许预示着你们悲剧的最后的一幕的开始。

我觉得,我的信应该结束了。这些信太冗长了,它们妨碍我致力于另一项工作。再说,关于这一话题应当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研究,而我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健康的身体来做这件事,所以我就简单地结束吧:你们轻率地开始了你们的教条主义式的实验。指望这将成为世界最高纲领主义的革命信号。你们自己也应当看到,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在那个外国工人代表团访俄之后,在塞戈里的信和列宁的回信发表之后,即使对你们的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一幻想也已经消失了。你们只好满足于彻底的教条主义的乐观主义对于“妥协者们”的轻而易举的胜利。但是已经很清楚了,总的来说,欧洲的工人不会走你们的路,而习惯于服从任何压迫而没有创造出表达自己真正意见的形式的俄国将被迫完全孤立地走这条可悲的黑暗的道路。

走向何方呢?你们幻想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还在上个世纪,就曾有过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变成事实的尝试。你们也知道这些尝试是怎么结束的。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卡贝等人的信徒在欧洲和美国做过一系列共产主义的

实验。它们最后都以可悲的失败、分裂,以及对于倡导者们,如同卡贝的悲剧般的悲剧而结束了。而这些高尚的幻想家们最后都意识到,人类应当首先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然后才能消灭私有制并走向生活的公社形式(如果笼统地说公社是可以实现的话)。主张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列纳尔⁽¹¹²⁾说,卡贝和他那一派的共产主义者们采取了过于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中有一些可以和应当留给个人拥有的,另外一些是应当变作集体财产的。”总的来说,这一区分过程(你们是非常轻率地在做这一工作)是一个相当长期和艰难的准备“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过程,为了这一过程,必须调动共同的创造,而主要是自由。只有这种创造,只有进行一切实验的自由才能指出,什么能够经得起实际生活的批判,而什么注定将要死亡。列纳尔说,“卡贝(我要补充说,还有其他的乌托邦主义者)还不能找到一条原则用以区分划线。他赋予权利和一致以更大的作用。他所幻想的村社式国家就像一所寄宿学校,在这所寄宿学校里,人们给年轻人提供保证健康的节制的饮食,给它们的思想如同它们身体一样,穿上统一的制服,教会它们按照铃声劳动、吃饭、起床。这种单调严厉的纪律产生了忧郁和厌烦。这种修道院式的寄宿学校太狭窄了,人类不能不打破它而在其中活动。”你们的共产主义不是修道院式的寄宿学校,而是军营(只要想一想“劳动军事化”这一说法就够了)。你们按照自己的习惯自信地,还没有好好地思考区分划线的事,就破坏了个人财产不容侵犯和个人生活的自由,闯进了人们的住宅(英国人说:“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你们匆忙地瓜分所有作为个人爱好和理智反映的必需的东西,你们还插手私人藏画和藏书的事……你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却摧毁非常多的东西,换言之,你们在搞迅速的共产主义的时候,已经长久地使人们失

去了对普通的社会主义的向往,而推行这种社会主义却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一位目击者曾向我描述过下面这幅日常生活的图景:一些乡委员会的代表开完代表大会返回村子里,在代表大会上照例通过了一些最共产主义的决议。在签署这一决议的农民中,笼罩着一种忧郁的情绪。它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村子里了。而村子里的情绪,众所周知,远不是共产主义性的。在这群代表中,有一个激进的,看来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力图证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人们对他的激烈的长篇演说的回答却是忧郁的沉默。于是他决定打破这层坚冰,就对一位在场的聪明而稳重的农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为什么沉默?你怎样看待我对您说的话?

那农夫严肃地说:“这一切也许是真的……但是,糟糕的是,人的手长得有利于往自己身边捞东西,而不利于把东西推向别人。”

你们看,这恰恰是那些空想共产主义的幻想家们在实验的末尾所得到的东西。问题当然不在于手,而在于心灵。心灵应当再生。为此,首先应当使机构得到再生。而这又要求思想自由,要求有创造生活的新形式的原则。用强力遏制社会和人民中的这种创造活动,那就是犯罪,我们那不久前跨掉的政府所犯的就是这种罪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而且决不算轻的罪行——那就是用强力把新的人民还没有意识到其舒适性的,还没有在创造性的实验中充分了解的生活形式强加给人民,而你们就犯有这种罪行。你们用命令代替本能,并且等待人的天性将按照你们的命令而改变。你们将会为这种对人民自我觉悟的自由的侵犯付出代价。

社会公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们也公正地指出,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完全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

可能实现公正。为未来之舟导航必须穿过由奴役和不公正这两个怪物分头把守两边的海峡，而且不要永远看不见这两个怪物。不管你们说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只是奴役工人阶级的谎言，你们无法使欧洲工人相信这一点。现在正希望通过国会来进行你们的试验（当然，如果这些试验能够成功的话）的英国工人不会忘记，在独立自由的旗帜下活动的资产者格莱斯顿^[13]几乎一生都在为扩大工人们的选举权而斗争。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的各种政治改造都将把为社会公正进行的斗争变为可能，而一切的政治反动都产生相反的结果。曾经有过许多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还没有一次。你们在做第一个用压制自由的方法推行社会主义的实验。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不想当预言家，但是我的心却因这样一种预见而疼痛：我们还只是处在新的灾难的前夜，与新的灾难相比，我们现在所体会的一切都将黯然失色。俄罗斯好像是一个正在因自己内部长期的热病，因饥饿和痛苦渐渐地衰弱下去的庞然大物。协约国无须长期同我们作战就能制服我们。我们的内部混乱将为他们做到这一点。有朝一日，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将不问条件地向协约国乞求帮助它……而条件当然是相当沉重的。

我这就写完了。出路何在呢？在去年，即 1919 年，你们官方通讯社的一位记者曾来找我，问了几个有关我怎样看待时局的问题。我不喜欢这种采访。这不只是因为我是一位作家，我自己会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而那些采访记几乎总是不准确的。但我毕竟是一位作家，也就是一个力图使他的思想为大家所了解的人。而你们却消灭了出版自由。我同意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对于我的思想能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发表表示了疑问。他回答说，对此他无法担保，但是，通讯社将把这次采访记分送给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们。

采访记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我不知道它是否已送达您处，而您是否已腾出时间来看过那篇采访记。我当时说的总的意思就是现在我要重复的：你们能够占领新的地盘，但却不善于保住地盘，而且我感到，你们在乌克兰已经失去了根基。后来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我的这一预感：在一个半月之后，你们不得不在邓尼金分子们的压力下放弃了乌克兰。现在，你们在乌克兰的统治又面临着危机……

我以前说过的那位罗马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如此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规范自己行为的人民离理想的制度还非常遥远。现在我要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没有学会利用表决机器，不善于表达他们中占压倒多数的人的意见，而是通过个人抢劫（你们的话是：抢劫被抢劫来的东西）来制造社会公正，并用容忍群众性的不经法庭枪决人（这已经持续好几年了）的方法来建造公正王国，那么这个国家的人们远不能成为人类的优秀追求的领袖。

你们战胜了邓尼金的志愿兵，战胜了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波兰人，也许还将战胜弗兰格尔，也许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也将以你们的胜利而告终，因为干涉唤醒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在这以前你们曾竭力徒劳地为了国际主义而扼杀这种爱国主义，你们忘记了迄今为止，祖国的思想还是人类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的最高成就，人类的这种统一也许将来只能通过统一各个祖国来实现。一句话，你们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是胜利者，但你们没有发现内在的疾病，这一疾病正在把你们变成在大自然的战线面前虚弱无力的人……

由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既不等待协约国的干涉，也不企盼将军们的胜利，俄国正沉思着面对两种乌托邦：过去的乌托邦和未来的乌托邦，俄罗斯正在选择它应当投向哪一种乌托邦。外部干涉只会使实验变得黯淡模糊，而将军们大概又

将领导那些怀念过去，并准备为了过去而像你们为了将来那样滥用权利的分子们。在许多人看来，俄国现在的状况只能寄希望于奇迹。在我同前面的那位记者的谈话中，我呼吁你们这些早熟的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放弃实验，将健康的反对力量把握住，以便有可能利用它来限制不健康的、疯狂的和非理性的反对力量。人们对我说，这就是在指望奇迹的发生。也许这就是真理。当然，为此必须调动全部的诚意和善意，以承认自己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并转到另一条路上去，即转到你们称之为妥协主义的那条路上去。

我意识到，在这一建议中有许多天真气，但我是乐观主义者和艺术家，在我看来，这条路是能使俄罗斯体面地走出目前极糟糕处境的唯一的一条路。另外，早就有人说过，任何一国人民都只配有他们拥有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俄罗斯只配有你们……你们只是过去的俄罗斯的现今表现，过去的俄罗斯在专制制度面前怯懦驯顺，甚至当专制制度在农民改革及其后的另外几次改革中耗尽了全部创造的力量后转到盲目的反动，并在许多年里压制国家的机体的生长时，也还是这样。那时，人民在专制制度一边，而俄罗斯注定要腐朽和瓦解。正常的是要让各种色彩的思想，甚至最极端的，甚至有时不明智的思想都能表现出来。生动活泼的斗争可以阻止腐朽，甚至能将不明智的要求变成一种疫苗，因为对某一时代来说不明智和有害的东西常常包含着对来来有用的特点。

但是在顽固保守的政府的影响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社会思想中断了，并被强制性地排了座次。在农业上，笼罩着一派无望的停滞气氛，日益扩大的产业工人阶层依然不可能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同劳动人民友好的知识分子被驱入地下，被赶到西伯利亚，被迫侨居国外，过着幻想的怨

恨的生活,同祖国的现实没有公开的联系。而这又歪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走上了公式化和最高纲领主义的道路。

后来,历史偶然性突然摧毁了横在长时期来不考虑政治而生活着的人民和脱离人民,也即与现实没有联系而生活着的知识分子之间的障碍。所以当障碍突然坍塌后,很长时间互相陌生的分子的混合成为有毒的了。爆炸发生了,但这不是那种富有成果的,只摧毁妨碍国家正常发展的东西的爆炸,而是深深祸及社会机体的活的组织的爆炸。你们是习惯于专断,天真地企盼“一下子获得一切”,缺乏合理组织与创造的(甚至)萌芽的俄国人民的自然的代表者。毫不奇怪,这爆炸只能破坏,而不能创造。

而真正美好的奇迹是,有朝一日你们将终于不仅意识到自己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是孤立的,而且也意识到,本国的工人群众也开始离开你们,更不用说农村对你们的共产主义的正当仇恨,——但愿你们能意识到,并抛弃有害的暴力之路。但是这要做得诚实而充分。也许,你们还有充分的权利转到新的道路上去,你们应当直截了当地承认那些你们同你们的敌人一起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最主要的错误是,你们过早地取消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许多东西,而可能的社会主义的措施只能在自由的国家里采用。

政府因谎言而死亡……也许还有时间回到真理上来,而且我相信,盲目地跟着你们走暴力之路的人民,将怀着意识苏醒的喜悦踏上回归自由的道路。如果这不是对你们,不是对你们的政府有益,那定将对国家,对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意识的成长有益!

但是……这对你们可能吗?是否已经晚了,即使你们也想这样做的话?

1920年9月2日

注释：

- (1) 1920年6月7日卢纳察尔斯基曾到波尔塔瓦拜访柯罗连科。
- (2) “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17年12月—1922年2月，音译为“契卡”)的地方组织。
- (3) X·D·拉科夫斯基(生卒年代不详)——当时的乌克兰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
- (4) 米什列(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
- (5) 圣安徒安：法国地名。
- (6) 笔误，应为6月8日。
- (7) 指列宁1920年5月30日的《致英国工人的信》，载于1920年6月17日的《真理报》。
- (8) 彼特罗夫斯基(1878—1958)——当时的全乌克兰执行委员会主席。
- (9) 即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5)——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有《法国革命》，《宪章运动》，《过去和现在》。
- (10) 靡菲斯托菲尔是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托菲尔的表情”常用来形容恶毒的嘲讽表情。
- (11) 塞戈里(生卒年代不详)——英国自由党机关报《每日新闻》记者。
- (12) 列纳尔(1864—191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 (13)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四届英国首相。

译 后 记

○ 余一中

凡是稍微熟悉俄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柯罗连科这位在19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青年时代参加解放运动，屡遭逮捕、流放的经历；他歌颂革命者（《奇女子》等），为民请命（《巴甫洛夫特写》、《饥饿的年代》等）的呐喊；他描写俄国社会生活图画的宏篇巨制（《我同时代人的故事》）；他编辑《俄罗斯财富》时所做的巨大的社会启蒙工作等等，都为他在生前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1910年列夫·托尔斯泰逝世后，柯罗连科就成了俄国文坛公认的领袖。

但是，对于他十月革命后的大量政论作品、书信、日记，以及社会活动，前苏联的文学史家们一直保持缄默：在苏联科学院1956年编的《俄国文学史》第九卷下册中只字未提；莫斯科1966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也只是简单地说：他“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思想 and 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他这一时期的观点在《给卢纳察尔斯基的信》（以下简称《信》）等中得到了表现。但《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苏联的广大读者与学术界都不甚了了，因为《信》自写成之日起直至1987年在俄国都不曾印行过。

在这里，我翻译了柯罗连科给卢纳察尔斯基的六封信，以期我国读者对柯罗连科的晚期创作与思想有一个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状况多一些具体深入的了解。

根据当年接近列宁的邦奇—布鲁耶维奇的说法，1920年上半年，列宁曾提议当时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的卢纳察尔斯基去见见“牢骚太盛”的柯罗连科。^①同年6月7日，卢纳察尔斯基来到波尔塔瓦，拜访了德高望重的柯罗连科。两人进行了交谈，柯罗连科向卢纳察尔斯基坦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在此后的大约三个月中，柯罗连科

^① 见《同时代人回忆柯罗连科》，莫斯科，1962年，第507—510页。

又给卢纳察尔斯基写了六封信。前四封信分别写于6月19日、7月11日、8月4日、8月19日,第五封未署明日期,第六封写于9月22日。卢纳察尔斯基没有给柯罗连科回过一封信。1922年,巴黎的俄侨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信》。但是直到1988年才在前苏联公开发表。

终读柯罗连科给卢纳察尔斯基的这六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柯罗连科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一位“无党派的社会主义者。”

《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柯罗连科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柯罗连科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革命中,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垮台表现出真诚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与几代俄国进步人士所企盼、所为之斗争的目标,但是如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一样,他是一位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向新社会过渡的问题上,他认为:简单地“掠夺掠夺来的东西”是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

柯罗连科作为毕生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战士、进步作家,深知“左派幼稚病”患者们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表决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表现是极其错误的。他以一名老战士的身分指出,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表决自由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付出巨大代价,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权利,利用这些权利人民才能达到自我教育,提高觉悟的目的。相反,如果人民失去了这些权利,革命政权就会变成闭目塞听的聋子和瞎子,一些在革命大潮中混水摸鱼的人便得以售其奸。

一生的丰富阅历,数十年的深刻思考使柯罗连科养成了对不同思想、不同意见争论的科学的宽容态度。他在《信》中就指出,“正常的是要让各种色彩的思想,甚至最极端的,甚至有时不明智的思想都能表现出来。生动活泼的斗争可以阻止腐朽,甚至能将不明智的要求变成一种疫苗,因为对某一时代来说不明智和有害的东西常常包含着对未来有用的特点。”

柯罗连科在《信》中还“对‘穷过渡’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告诫新政权不要贪图虚名,搞所谓“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不要粗暴地干预国家的经济生活,不要放弃还将长期起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机器,要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他尤其呼吁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推行“普通的社会主义”。列宁在本世纪初曾断言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接下去将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列宁的预言发

展。倒是柯罗连科关于欧洲资本主义阶段还要延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话得到了验证。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亚理士多德的名言：诗学比历史——不只是历史！——更具有哲理性。显然，这里的诗学当指真正伟大的文学家的不朽之作。《信》就是这样的作品。

当年，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列宁是怎样对待柯罗连科的《信》的呢？卢纳察尔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向列宁详细汇报了与柯罗连科的会见，并将后来陆续收到的《信》交给了列宁。列宁并没有公开批评柯罗连科。在柯罗连科写了《信》之后，苏联政府还让他担任过多种全国性社会组织的名誉主席。从某种意义上说，1921年列宁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倾听了柯罗连科、高尔基及其他有识之士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结果。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建设新俄罗斯的伟大工作中，最诚实的俄国作家，具有伟大而强有力的心灵的人柯罗连科的出色劳动将得到应有的评价。”^①

令人遗憾的是，列宁逝世之后，柯罗连科在《信》中所批评的东西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强制工业化、强制农业集体化、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倾轧、肃反扩大化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口号声中进行的。也正是这一切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译完《信》后，回眸历史，望着前苏联帝国的废墟，我不由想起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诗：“对于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① 《高尔基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245页。

惶然录(节录)

宗教以后的幻象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着对基督教信仰的不信任，其中也造成了一种对所有信仰的不信任。我们的前辈仍感到一种信仰的冲动，于是从基督教转向了其它的幻象形式。有些人热心于社会平等，另一些人纯粹爱上了美，还有一些人则在科学那里安顿信仰并且从中受益，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些人，甚至很多基督徒也在内，起程远赴东方和西方，去寻找其它的宗教来填补自己的意识和生活，似乎不这样做的话，意识和生活就会一片空虚。

我们失去了所有这一切，生来就是这一切慰藉的弃儿。每一种文明都有宗教的亲缘外貌，以宗教来代表自己：于是追随另一种宗教就是丧失最初的宗教，最终也就会丧失所有的宗教。

我们失去了自己与其他一切人的宗教。

我们留下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放弃，在疏离之中仅仅知道自己还活着。一条船看来是一件用物，其目的之一是用于旅行，但它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来旅行，而是抵达港湾。

* F·A·N·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作家、诗人，后期象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继卡蒙斯之后葡萄牙的伟大诗人。——译注

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高高的海浪之上，却对我们将要投奔的港口一无所知。于是我们提出了淘金者大胆格言的一种痛苦版本：跋涉就是一切，而生活是没有的。

失去了迷幻，我们靠梦想而生活，这些梦想是迷幻者们无法得到的迷幻。我们靠自己独自活下去，弱化着自己，因为一个完整强健的人是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我们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了希望，而没有了希望，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生活。我们没有对未来的考虑，就没有了对今天的真正考虑，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今天的行为只是未来的一则序言。战斗精神已在我们身上流产，我们生来就没有战斗的热情。

我们中的一些人还纠缠于每一天愚蠢的征服，为我们每天的面包而卑下粗俗地挣扎，却不愿为得到这些面包而付出劳动，不愿体会到包含其中的艰辛，不愿有收获的高尚。

另一些人有更好的家世，总是避开公众生活，无所求也无所谋，试图扛起生命中忘却苦难的十字架。然而不像是十字架最原初的扛载者，在他们的意识里有一种徒劳的努力，缺乏神性的闪光。

另一些人则在他们的灵魂之外忙碌，给他们自己增添混乱的迷信和喧嚣，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因为他们能够被他人所闻；他们以为自己还爱着什么——在他们仅仅只是在爱的外墙上碰了一个钉子的时候。生活伤害于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还活着。死亡没有给我们留下地盘，因为我们对死亡失去了所有正常的关注。

但是另一些人，最后的人，临终一刻面对精神的边界，甚至没有勇气完全放弃一切，没有勇气在他们自己身上寻求避难。他们生活在否定、不满以及疏离之中。但是我们全都只能生活在我们自己内心，甚至无须有任何一个行动。在我们自己房间的四壁之内，在我们无能行动的囚室四壁之内，我们

长久地关门闭户。

现代社会是牺牲品

我属于的这一代，生于一个任何人拥有的智识和心性都缺乏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代人的消解性工作意味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世界已经不能使我们把宗教视为安全的提供，把道德视为支撑，把政治视为稳定。

我们诞生在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这种痛苦是形而上的和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动荡不宁。前辈们醉心于外部规则，仅仅掌握着理性和科学，就毁灭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因为他们从文本转向神秘学的圣经解释，削弱了真理，把犹太教徒们早期的神学削弱成一本虚构的神话和传说的选集，使圣经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他们的科学批评，逐渐发现了福音书上原始“科学”的所有错误和广泛智慧，与此同时，辩论自由也取消了对一切形而上命题、包括对宗教问题给予追究的限制。在一种他们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含糊理论影响之下，几代人批评一切道德，详细查究生活的一切尺度。教条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不确定性以及对不确定性的痛苦。很自然，一个文化基础如此混乱的社会，不可能不成为一件政治混乱的牺牲品。于是，我们梦醒的世界，渴求着社会变化，快乐地前进以获取自由，然而自由的意义不可理解，一种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楚的界定。

当我们的父辈以严厉批评使我们不再可能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所有可能性的丧失。当他们给我们留下对一切已存道德规则的不满时，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道德和生活尺度的替代物。当他们留下了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诸多政治问题时，他们没有留给我们相应的精神去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的父辈好心地毁灭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这个年代仍然能够指望和借重一些过时完整性的碎片。他们毁灭的一切还是足以给社会注入力量的东西，让他们去从事毁灭而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

而我们却继承了破坏以及破坏的后果。

在现代生活中，世界属于愚蠢、麻木以及纷扰。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无法兼得

我们在生活中的前景，是我们更多地诚服于两种矛盾的真理。第一件是，面对着生活的现实，所有的文学虚构和艺术相形见绌，哪怕它确实能给我们提供高于生活的愉悦，但也毫无意义。事实上，它们像一些梦幻，使我们得以从中体验到生活中从来没有的感受，魔变出生活中从来没有的图景；但它们只是梦幻而已，一个人从中苏醒之后，不会有记忆或者怀旧的愿望，更不会打算从今往后据此过上一种高级生活。

第二件是，所有高尚心灵都希望过上一种充实的生活，希望体验一切事物和一切感受，包括知道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生活只能有主观性的满足，只能放弃什么都占全的大胃口。

这两个真理互相不可化约。聪明人将会竭力避免去调和它们的尝试，也竭力避免在它们之间厚此薄彼。然而他将不得不在它们二者之间择一而从，并且对于不能同时选择另一项而深感懊丧，或者懊丧于不能把这两项都给予干脆的拒绝，从而使自己向某种个人的涅槃圣境高高升华。

快乐的人，在生活对他的自然给予之外别无奢求，几乎

循着一种猫的直觉，有太阳的时候就寻找太阳，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找个暖和的去处将就。快乐的人，在想像的趣味中放弃他的生活，在对别人生活的冥想中寻找乐趣，不是体验对他们的印象，而是体验这些印象的外在状貌。快乐的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于是不再有所失落或者有所减少。

乡下人，小说读者，清教苦行主义者：他们是真正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完全放弃了自我——首先是因为他们靠直觉生存，而直觉是非个别化的；其次是因为他们通过想像来生活，而想像是转瞬即逝的；再次是因为他们虽生犹死，也就没有死亡，没有休眠。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抚慰我，一切——不论存在还是不存在——都使我深感厌腻。我既不需求自己的灵魂也不希望将它放弃。我欲望自己并不欲望的东西，放弃自己没有放弃的东西。我既不能成为一切无也不能成为一切有：我只是一座桥，架设在我之所无与我之所愿之间。

重读自己

人类心灵的全部生活，只是在依稀微光中的一种运动。我们生活在意识的晨曦之中，无法确定我们自己是什么，或者我们以为自己是什么。即便在我们的佼佼者当中，也存在着对某些事物诸多自以为是的感觉，存在着一些我们无法测定的谬以千里。我们碰巧处于一出戏剧的幕间休息，有时候，透过特定的门洞，我们得以窥探到台上的场景是何模样。整个世界如夜晚声音一样混沌不清。

我刚刚重读了这些纸页，上面是我清清楚楚写下的文字，将要存在到它可能存在到的时限。我问自己：这些是什

么?这些是为了什么?我感受自己的时候我是谁?我是自己的时候又有什么东西在我心身中死去?

像一个高高立于山巅之人,试图弄明白山谷里的人们及其一切纷纭驳杂的生活,我俯瞰自己,像遥看一片模糊不清的风景。

在这样的时刻,当我的灵魂陷入地狱,以至一个最小的细节都可以像一纸悼词,使我惊悸不宁。

我感到自己总是处在一次苏醒的前夕,在一种让人吐不过气来的昏乱的最后关头,在一个充当着我的外壳里拼命挣扎。我要叫喊,似乎觉得任何人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所有的感受只是极度的疲惫,像流云一样一阵又一阵地袭来,像阳光将尽之时的形状,像辽阔牧场上的绿草若明若暗。

我一个人抓瞎式地忙于寻找一件东西,而这件东西从来没有人向我描述过。我们跟自己玩着隐藏与寻找的游戏。我相信在某个地方有这一切的超验理性,一些可耳闻而无法目击的流动的神力。

是的,我重读这些纸页,它们代表着空虚的时光,安定或者幻觉的瞬间,化入风景的伟大希望,房间从无人迹般的恐怖,一点点声音,一种极度的困乏,还没有写就的真理。

在有些事情上,任何人都是虚妄的。我们每个人的虚妄,包括着我们忘记了别人也像我们一样有灵魂。我的虚妄包含在零星纸片里,零星短章里,特定的怀疑之中……

我说过我重读着这些纸页么?我在说谎。我根本不敢去读它,不能去读它。我该怎么办?这些纸页简直是另外一个人,我再也无法理解他……

(1930.4.10)

时间

我不明白时间是什么。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办法,能够最真实地测量时间。我知道用时钟测量时间的办法不真实:它只是从外部把时间作空间性的分割。我也知道靠情感来把握时间不真实:这不是分割时间而只是分割对时间的感觉。梦的时间当然也纯属错误:我们在梦中清洗往昔的时光,一会儿光阴似箭,一会儿度日如年,而我们体验的时间既不快也不慢,它仅仅取决于时光流逝的特定方式,取决于我不能理解的事物之本原。

有时候,我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时间仅仅是用来环绕这些事物的一个框架,从而使其异变。在我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中,时间总是在荒诞的设计之下安排出荒诞的水准,以至于在我的一段生命里,一个十五岁少年老成的我,比起另一段里的我,即坐在诸多玩具其中的一个婴儿,还要年轻。

当我想起这些事情,我的意识便渐入困惑。我感觉到这一切往事中出了差错,尽管我不知道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就像我正在观看一种魔术,我已经察觉了这是一场骗局,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受骗,只是一时无法弄明白骗招的技术和机关何在。

接下来,我的脑子里闪念纷呈,虽然荒谬却让我无法全部拒绝。我很想知道,一个人在速行的汽车上缓缓地沉思,他是在速行还是在缓行?我很想知道,一位投海自杀者,与一位仅仅是在海边跳水者,实际上是否以同样的速度下落?我很想知道,这三件事是否同时发生——我抽烟,写这些片断,还有思考这些荒诞不稽的念头——真是同步进行的吗?

一个人可以想像,同一个轴上的两个转轮总有一个转在另一个的前面,即使它们只有毫发之差。一架显微镜会将这一错位放大到难以置信和似无可能的程度,亦即不真实的程度。为什么显微镜不能证明出比我们虚弱视力所见更为真实的东西?这些仅仅是胡思乱想?它们当然是。这些仅仅是些思想的迷幻?它们

当然是,它们确实是迷幻。

那一个没有尺度却测定着我们的东西,甚至并不存在却灭杀着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在这样一些我甚至不能确定其存在着的时刻,我体验着拟人化的时间,然后感到自己昏昏欲睡。

(1932.5.23)

语言政治

我乐于运用词语。或者说,我乐于制造词语的工作。对于我来说,语词是可以触抚的身体,是可以看见的美女,是肉体的色情。也许,因为我对实际的、甚至到梦幻或思想中的色情都无所兴趣——欲望便质变为我对语言韵律的创造,或者对别人言说中语言韵律的倾听。我听到有些人精彩言说的时候,我会发抖。弗阿尔荷(19至20世纪葡萄牙自然主义小说家——译者注)或者夏多布里昂笔下的特定章节,使生命在我的血管里震颤,以一种不可企及却已备于我的愉悦,使我静静地、哆嗦地发狂。更有甚者,维埃拉(17世纪葡萄牙著名作家,见前注——译者注)写下的某些片断,以他符号关系工程的全部惊人的完美性,使我如风中的树枝般战栗,经历某种情绪的晕眩错乱。

像所有伟大的恋人,我享受到失落自己的愉悦,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愉悦里全身心地承受屈服的开心。而这就是我经常写作甚至不假思索的原因。在一种外化的白日梦里,让词语把我当作一个坐在它们膝头的小姑娘抚慰。它们仅仅是无意义的句子,是水流的缓缓漂移,如同一缕细流忘我地混同和消失于波涛,又一次次再生,永无止境地后浪推着前浪。观念和意象,表达的颤抖,就是这样从我身上流过,一束丝绸瑟瑟作响飘逝的过程,月光中一片闪烁不定的观念碎片,斑驳而微弱。

我不会为自己在生活中的得失而哭,但某些散文的章节可以让我怆然下泪。我记得,仿佛就是在昨天的夜里,我挑出维埃

拉的选集,第一次读到他关于所罗门国王的著名一节:“所罗门建造了一座宫殿……”我一直读到结尾,浑身颤抖并且神思恍惚,然后,突然欢欣地大哭起来。没有任何现实的快乐也没有任何生活中的悲伤,可以激发我这样的泪流。我们清晰而尊严的语言具有神圣的韵律,以言达义的浩浩荡荡,像惊涛裂岸一样不可阻挡,每一个声音都以惊心的韵律获得了自己理想的色彩:所有这一切,像某种伟大的政治激情一样使我本能地陶醉。就像我说过的,我哭了。今天我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哭泣。这不是对童年岁月的怀旧,我对童年没有怀旧:这是对瞬间情感的怀旧,是我第一次能够阅读伟大的交响式精湛之作时不可重复的痛楚。

我没有政治感或社会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一种渐趋高昂的爱国情感。我的祖国就是葡萄牙语言。如果有人侵占和夺走了葡萄牙语言,即便他们与此同时对我个人并无侵扰,这件事依然会令我伤心。我满腔仇恨所向,并非那些写不好葡萄牙文的人,或者那些不知葡萄牙语法的人,或者写作中使用新式简化词法的人。我所憎恨的,是一纸葡萄牙文的贫乏写作本身,就像它是一个活人;我所憎恨的,是糟糕的语法本身,就像它是一个值得痛打的家伙;如同憎恨一个恶棍无所忌惮射出的一个痰块,我所憎恨的,是偏爱“Y”甚于“I”的现代词法本身。^①

词法就像我们一样,是一个生命物。一个词在人们看到和听到时候才得以完成。而对于我来说,希腊\罗马拼写语的壮丽,给这个词披上一件真正的皇家斗篷,使这个词成为我们的女士和我们的女王。

① 葡萄牙的现代文字改革中,新的词法建议用“I”代替很多单词中的“Y”,作者笔下的索阿雷斯对这一点极为不满。

威塞尔随笔(六篇)

○ 陈东飏 译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 1928—), Eliezer Wiesel 的别名。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小说家, 1986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是本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提供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严肃而激越的证词。其早年在锡盖特镇的犹太教虔敬派聚居区的祈祷与静悟封闭生活中度过。1944 年全镇所有的犹太人, 包括他的全家, 均被纳粹驱逐出境, 遣至奥斯威辛集中营, 他母亲及妹妹被杀害。随后被关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事奴隶式劳动, 他父亲又在该地被害。战后威塞尔定居法国, 就读于巴黎大学, 同时为法国和以色列报纸撰稿。1956 年移居美国, 1963 年入美国籍。1972 年起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在旅居法国为报纸工作期间, 小说家 F·莫里亚克曾敦促他作为见证人将其集中营经历写出来。于是他写了第一本意第绪语著作《而全世界至今不作一声》(1956)。1958 年出版了名为《夜》的节本。这是一部半自传性的著作, 叙述了一个男孩对奥斯威辛的感受, 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对大屠杀最为惊心动魄的文学表现。其他作品有《墙外那个镇子》(1962), 一部观察人性冷漠无情的小说;《耶路撒冷的一个乞丐》(1968) 提出了人为什么要杀人的哲学问题;《虔敬派的欢庆》(1972) 是犹太教虔敬派教徒故事的汇集。威塞尔亦是一个讲述犹太人及其他人在大屠杀中所受苦难的著名演讲家。在对大屠杀的见证与控诉中, 威塞尔将个人的关注提升为对人类以及人性的深刻追问, 和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

论文化与艺术中的革命

纽约城大学毕业生学院十周年大会专题讨论主题发言

1973年5月4日

在1920与1930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位哈塞德教派^①的拉比也决定去打听一下，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但当他在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时，却没有一个人能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②文学中出现过。这位拉比从没有这么好奇过，他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塞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

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我赞同那位拉比的意见。事实上，我们该怎样理解革命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呢？我相信我们必须细察我们最近的一段过去，倘若我们想领悟它们与我们纷乱无序的当今的连接点的话。

大屠杀王国的居民把自己视为见证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对他们的恶梦与苦痛一无所知。他们希望幸存下来，与其说是为了恢复一种正常的存在，不如说是为了给历史作证，揭开刽子手的面具，把那段过去变作一个警戒。他们以为奥斯维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世界不知道，因为罪犯们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盖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为世界一无所知。

但是，随着1945年的解放，那

① Hasidim，原为公元前2至3世纪的犹太教徒，这里指18世纪起源于波兰的犹太教派。

② Talmud，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律法全集，为仅次于《圣经》的犹太教经典。

些少数幸存者惊讶地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世界对所发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却听任它发生。这一觉悟改变了一切。他们受到了震撼，他们开始怀疑。“揭露”久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有什么用？至于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实的本质，去谈论无人会理解的事又有什么用？

见证人陷入了两难之境：他怎能相信生者而又不背叛死者？他怎能对未来抱有信心而又不与过去划清界限？他怎能开口而又不撒谎，或保持沉默而又不把他这沉默变成一个谎言？哦是的，保持沉默的诱惑是强大的，与世隔绝的感觉也是如此。倘若所有的幸存者都变成了隐士与疯子，也不会有一个人吃惊。而现在我们将要触及我们的中心主题，无论怎样地不情愿。

奥斯威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一个历史的和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十个世纪的基督教反闪米特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欧洲文化对犹太人的非人化负有责

任。正如让-保罗·萨特谴责福楼拜许可消灭公社一样，我们也应当谴责康德、费希特、伏尔泰和歌德是在特雷布林卡^③所犯下的罪恶的根源。这些伟大的哲人们，这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企图证明对犹太人的恨与对人类的爱是可以调和的，证明一面宣扬解救、平等，以及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而一面却在犹太人这一点上残忍和迷信是可能的。

他们所影响的几代人——在希特勒与希姆莱的统治下实践杀人科学的人们并非下层社会的人物，并非愚氓。例如，臭名昭著的Einsatzkommandos^④的领袖，就是贵族的成员。刽子手中的一些人，令我们深为羞耻，他们拥有哲学、社会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以及美术的学位，其中甚至还有法学家和——愿上帝怜悯我们——神学家。古老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他们所有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已经证明是一道薄薄的伪装。过去的世代已经深深织入了沙子与风；文化不过是浪尖上的

③ Treblinka, 波兰东部村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曾在此建立集中营。

④ 德语“突击队”。

泡沫。现在已显而易见的是,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联。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一个人可以当着父亲的面拷打儿子却又把自己视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啊,但愿刽子手们都是野蛮的畜牲、疯子、神经错乱的施虐狂……然而他们并不是。

欧洲文化的失败是真实的: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政权下任教;安德烈·纪德用反犹太人的玩笑娱乐;让·谷克多、蒙泰朗,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被占领的法国与阿尔伯特·斯皮尔^⑤共进午餐;让-保罗·萨特听任其剧作当着有德国军官在座的观众上演。更不用提,塞里纳、德里欧·拉·罗歇伊、艾兹拉·庞德、查尔斯·毛拉斯及其信徒了,他们公然并彻底地同杀人的纳粹德国合作——至少在关于犹太人这一方面。当数不清的牺牲者们倒进坑穴与火焰时,文化的王孙们高谈着文化。

在后来的岁月里,人们必须作出一次相当大的努力,来克服文学所激起的厌恶:只有时间来涤

净它,来改变它,来革它的命。

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相出现了:文学可以为革命服务而其对立面却不必是真实的。法国革命是由法国文学的作家们激发起来的。这对俄国革命也同样真实。伟大诗人与小说家在社会巨变中的角色之重要比军人和活动家也绝不稍逊。每一场革命都起源于灵魂。暴力萌发于想像正像萌发于实际的强制。没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高尔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俄国人民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然而,新的革命政权却拒绝容忍一种优秀文学的存在。它成了“反革命的”。可以理解确是如此。一切文学都是革命的,因为它站在现实的反面。在俄国,马雅科夫斯基和叶塞宁自杀了。曼德尔施塔姆和巴贝尔进了监狱。帕斯捷尔纳克选择了沉默。马基什、克维特科和费佛尔则遭到枪毙。

留下的是戴了口络、堵住了嘴、划清了界线、贫困化了的文学,由首长充当批评家并指定他在天才、想像力和趣味方面的法律。俄国(前苏联)进入了一个平

^⑤ Albert Speer. 德国建筑家,纳粹行政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指挥德国国内生产,战后在纽伦堡被判20年徒刑。

庸的时代。那时的俄国没有一部好小说出版，没有一出好戏上演。结束了，激情。逝去了，对想像的召唤。美、激情、真理被口号取代。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中国仍然真实，那里唯有红宝书被认为值得阅读，重读，背诵。为了确保文化革命的胜利，人们废除了文化。

但是共产主义虽然影响了30年代的作家，却绝没有在我的教育或态度上扮演一个角色。我太年轻了。我的生命，我几乎想说我的幸存，围绕的是集中营的现实。我们在1945年是本该绝望地喊叫出来，还是正相反，让希望来掌管？我们对文学的态度是由我们对伯克瑙天空下的火刑柱的凝视决定的。

概括地说，要谈论一种文学和文化的背叛是否不可能？这将解释欧洲知识分子所持的新的不信任态度。他们选择了行动主义而非沉思，反叛而非忠诚。他们试图蔑视文学，后者已经与侮辱、怯懦、盲目等量齐观。“一个人的饥饿比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意味着更多。”让-保罗·萨特说道，他却已写了一些。在特性上，写作变得

残忍、凶暴了。在诗歌中，字母派^⑥比超现实主义者走得更远：不再满足于打破句子和观念，他们打破了文字。小说竭力写得粗鄙、客观、赤裸，仅仅肤浅地存在，它们的人物在一个外化的世界里行动。罗布-格里叶和布托在这一支脉中出类拔萃。心理的或形而上的小说已经不合时宜。于是马德烈·马尔罗放弃了这一门类而投身于艺术史的研究就不足为怪了，正如萨特自己也为了文学和哲学的诠释而放弃了它。米歇尔·福柯、莱维-斯特劳斯，以及他们的结构主义门徒操纵语言及其神话用的是一种意在将它与其灵感源泉相隔裂的方式。简而言之，作家们寻找着那全新的或极旧的，以求远离他们最近的前人。

戏剧反映出同样的叛逆。为了逃避当今，主人公们逃亡或是面对最初或最后的人，感觉那不是太早就是太晚。贝克特、尤奈斯库、弗里希：他们的造物被知识所缩减，被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所焚烧，只有像受惊吓而迷惑的野人一样结结巴巴。在绘画里，混乱充斥并粉碎了主体。在音乐里，分崩离析的声响时时伴随着人们。

⑥ lettrism，法国现代诗歌流派，认为诗歌的单位不是有意义的词而是字母。

在文学里，句子——具体的、物质的、几乎是侵略性的——使人与他所感受的世界格格不入。全部文化都在强调个人的疏离状态——一个与传统划清界线而非在其中占据位置的人，在要求对话之后又拒绝了它的人。艺术或文学的事业总的说来萌生于一种无情的毁灭意愿。

那都是胡说八道？不可理解？是的，除非将它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观察。这时，只有这时，一切才具有意义，如果还称不上理由的话。你只有在以大屠杀作为衡量尺度时才能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当人们使用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作为视点，之所以任何人都希望与一切存在的断绝关系并将造物回溯到源头的原因才能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自相矛盾的是，呈现为我们当今文学的一个实例并由此不再随光阴流逝的人，正是那个集中营里的人：已降为非人，浑身赤裸或衣衫褴褛，见弃于社会与文明，永远是某人的受害者，暂缓处决的一具尸体，在黑暗中摸索，耗尽了希望与梦想。我们想要忘记他，抚慰他，但他自1945年以来就通过绝大多数的小说人物在质问着我们。他把我们掌握在

他的手中，我们仍旧是他的囚徒。

至于幸存者本人，尽管他竭力地抑制和忧虑，仍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语言。他相信它就像以往他相信人一样。他想要作证的需要被证明是更强有力的。他的证词被人理解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他的角色就是赋予它形式。但接着他遇见了另一种困难：如何表达那不可言传的？如何用言语来翻译一种谴责它们（或者更为精确的是）超越了它们的经历？

他只有重新发明一种语言、重新学习某些词语的用法，把它们的美或它们的恐怖存储进某些看似无害的措辞：孤寂。沉默。饥饿。未入门的读者究竟会不会理解这些词语为幸存者所包容的事物呢？火。烟。尸体。我的一个朋友从不能经过一所工厂而不颤抖。另一位只有付出后悔的代价才能交出他的信任。第三位多年来拒绝吃饱饭来满足他的饥饿。面包。睡眠。淘汰。读者的眼光会不会越过犯人们齐步迈向淘汰中心和死亡的队列？皮包骨的脸和圆睁的、熄灭了的眼睛——他是否看得见他们？

作家采用了一种初步的、袒露的、清醒的语言。一个人发布声

明，严肃、乏味、精确。事实与数字。一个人小心翼翼不陷人感伤。一个人写作简明的、锐利的、伤心的句子，与那些贱民区的史学家——林吉尔布莱姆，卡普兰，胡博班——留下的记述相似，他们都成功地以片言只字描述了异常之多的经验。他们的每一页都拥有一个遗愿、一句证词的重量与价值。每一句话都可以是最后一句。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正是这些证言，未结束，未完成。

在已确立的文学标准之外，见证的叙述是令人苦恼的：首先是由于其内容，其次是由于其对于作者本人的影响。如果说在19世纪，读者有时选择自杀的话，在我们的日子里是作家们选择了它：保尔·策兰在巴黎，塔杜维茨·勃劳夫斯基在波兰，本尼·威尔克堡在以色列。其他人，如大卫·罗塞特，则放弃了文学而投身于政治活动。还有别的一些人，诸如罗伯特·安塞尔姆、罗伯特·麦利、维考尔斯，以及罗曼·加利，转向了科幻小说。所有曾经涉足过那个禁忌王国的小说家们如今都感到不可能再尝试写一部传统的小说了。他们认为它过于幼稚。

对于幸存者还产生了别的问

题。相信什么也没有说过，什么也没有传达，什么也没有揭露，他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悔恨和愧疚状态中；他恼怒自己曾经开口。然而他弃绝了沉默的诱惑，不是因为他害怕在它之下粉身碎骨，陷入无时不在、无时不威胁着他的疯狂，而是因为渴望帮助和保护那新的一代，那既是最有福的同时又是最受诅咒的人们。生于这场苦难之后，在历史的浩劫之后，它愿意知道激情而不知道往哪儿寻求它。

今天的年轻人有着反叛一切的权利。它拥有大屠杀作为背景。可怜的一代，从一开始就已败坏。他们什么也不期待——再也不了。我们理解是什么令他们苦恼，是什么令他们疼痛。正是他们对过去的背弃把他们与过去连在一起。

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是运动、武力。这里一个政府受到挑战，那里一个体制被推翻。自由万岁，打倒解放者。真理万岁，打倒那些宣称它属于自己的人。图书馆被点火焚烧，文化被否定：无论什么从人民中来的都万岁。打倒精英。有人谈论神秘的追求、形而上的痛苦。怎么才能知道？这些被拉上了尼泊尔高山的大学生们，

这些自焚献祭的中学生们，他们想要赎什么罪？怎么才能知道？有人认为这值得他们花时间去解释。他们写了几行字，几句话——就像很久以前，在那边，在令人窒息的贱民区里——很近，很简单，涂抹在一张被撕碎的纸片上。一个遗嘱：有太多一些无辜的人在太多一些世纪里惨遭杀戮。或是：人欺骗，人撒谎，词语撒谎，人杀人，继续撒谎，继续杀人。接着还有：我不关心我的生命我也不担心死亡；不是我想死去，在法国的一个小女孩说道，我甚至不想死。他们的死是一件真实行动，在一个一切都是伪造的世界里。

然而，这些年轻人仍在倾听，并且是心甘情愿地听。我们已经给了他们一个令他们羞耻的过去，一种令他们恐惧的对真理的向往。他们的存在：一根缠绕着奥斯维辛与广岛的线。他们不再在希望与屈从之间摇摆，而是在恐惧与悔恨之间。反叛？没有用。他们的春天已被绞死而生活仍在前进。他们的冲动已被扼杀而游戏继续着。恰恰是他们的呼喊已被窒息。

这骚动——还有这疾病——的根源深植于那曾经是欧洲文化的废墟之中。无法简单地生活，或

者说简直无法生活，这些英雄与反英雄们，这些没有战争的战士们，这些没有信念的预言者们沉迷于火、逃避、移居、贫穷，向着虚无，对虚无的热情的逃亡。怎么理解他们呢。既然存在着虚空，就让它完全吧。既然无辜的人遭了杀戮，既然人们仍在彼此摧毁，既然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装备着终极的武器来互相消灭，既然世界和人类都已改变，那么好吧，就让一切都在爆炸中崩溃和陨灭吧。既然语言撒谎，就让它成为滑稽图画吧。既然想像不结果实，就让它闹鬼吧。

怜悯这一代吧，怜悯这青春，历史上第一代不想从往昔中得到什么的人：一切都是灰烬。生于大屠杀之后，它必须承担它的重负但却得不到它的神秘，并被告知：向前去，尽量利用它。只是那负担太大了，太重了；它不是躲过他们就是压倒他们。一个靠不住的状况：不可能无视，不可能想像。谈及它引出的问题正如回避它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被历史所背叛，他们宁愿回到源头，回到开端，再重新开始。他们的国王是一个穴居人。他们打扮得像他一样，像他一样表达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痛苦；他们像他一样为雨惊奇，在树

林里奔跑，崇拜他的众神，在他的庙堂里祭献，并非因为他知道得更多，而是因为他知道得更少，因为他曾在一个尚未被知识与权力固有的虚荣所腐蚀的宇宙里尽责和呼吸。循着他的榜样，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展示他们的身体，露宿街头，饥不择食，结结巴巴并且狂吼。陌生人互相拥抱、联合，彼此憎恶——随时并且仅仅在一瞬间——并永远隔绝，彼此间从不认识。像穴居人一样，他们也易怒、暴躁、嚎叫着互相攻击。他们攻击沉默：让世界在它自身的嘈杂里沉没吧。然而，其实，这些年轻人是感伤的、脆弱的，像穴居人一样易于受伤；他们掩盖了他们对自己命运的怜悯，他们隐藏起那压倒了他们的悲伤和他们为我们这些悲惨的乞丐所流的泪。

哦，是的。他们会如此愿意去爱，去崇拜；他们会如此愿意去希望，去歌唱。这足以去看，去在场。一个人只需倾听，而不转身回避：这些不恭敬的诗歌，这些渎神的口号，这些高扬的乞求，这些暴力与共有的情景。他们说话，他们从没有说得这么多。他们呼喊，他们讨论，他们爱；他们从没有爱得

这么多。因为，你看到，他们并不幸福而我们也一样。我们已经教给他们一切，除了梦想与祈祷的需要和能力。我们的祈祷使他们大笑，而我们的梦也是这样。

然而，我们给他们讲故事，或至少我们尝试这么做。不仅要把死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教给生者一种幸存的可能。这也许是愚蠢的，甚或是幼稚的，但它归根结底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一个信念的行动——一种对语言，对人的信念。尽管是对人，它也许是愚蠢的，甚或是幼稚的，但难道这不是革命的本质目标吗？改变人？这恰恰把我们带到了我希望避免的那个主题的核心：无疑那是拉比的错误，有一天他想叫人把革命解释给他听。这是一个词，他被告知。真的吗，他说。他疑心。而为了一个词，就要杀人？但是为什么？就因为每个人都宣称它是自己的？这同一个词就不能属于大家吗？

从各方面考虑，他都是明智的，这位拉比，而我要付出许多才能得以分享他的天真与缺乏觉悟。

大屠杀与作家的苦恼

纽约城大学毕业生讨论会论“大屠杀世纪：牵连与焦虑”

1973年3月22日

作家的苦恼萌生于他试图以词语来传达某种不可言传的事物。他所怀有的是这样一个人的苦恼，他收集故事与证言并知道他无论对它们作什么都将是错的。言说可能是歪曲，不言说则可能是背叛和掩盖。问已是对软弱的承认，而答则是对失败的承认。

大屠杀是这一世纪的中心事件，也许也是所有世纪的。可能除了西奈的 Mattan Torah，西奈的律法启示之外，这一事件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一个，是因为它加于人类良知与意识之上的重量。作为我们一生的中心事件，它引来了问题与挑战；它使我们面对某个黑暗地带。无论人会行动或经历什么，他都将震动于在那个火与彻底沉默的遥远王国里所发生的事。无论他会希望达到或放弃，揭露还是隐瞒什么，他的眼睛都仍会看见那无形的世界，在那里人与神对视是怀着恐惧而非骄傲。

大屠杀的意味是无穷的，覆盖了人类追求的所有领域。大屠杀使以往大约30个世纪通过知识获得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人与神的关系，与社会、时间、文化、他的同类，以及最紧要的，与他自己的关系。一切都须重新审视。

写大屠杀的小说家们面临着难题。作为某个以组合词语为使命的人，他经历着苦恼。为什么？因为词语都必须重新定义、净化、重新发明。一个词如“夜”——一个美丽、诗意、浪漫的词——对我们不再意味着它曾经意味的东西了。“面包”、“孤寂”、“淘汰”、“饥饿”、“沉默”——所有这些词对我们来说都承载了如此的重量，装下了如此多的幽灵，以致我们时常在这个还是那个之间束手无策，在从一个移到另一个的时候。

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的问题并不是如何习惯生活，而是如何习惯死亡。死亡在大屠杀期间是匿名的、例行公事的。它打

动不了任何人。而幸存者却花去了许多个月，倘若不是许多年的话，来再次认识到死亡是一个私下的、个人的事件。幸存者花去了无数年月，在能够目睹一个人进食、能够入睡之前，当然也在他们能够歌唱之前。

作家要采用所有这些故事并把它变成他自己的绝非易事。因此有了那苦恼。你如何处理一个超越了个人存在的主题呢？增加它的数量？你如何处理它而不以此自利，而不贬损它？你如何处理它而仍旧对曾经是你，曾经是

你的友人的人们保持忠诚？我相信作家的苦恼肯定不下于哲学家的苦恼与神学家的苦恼，因为当我们面对那个事件时我们都又变成了孩子——年老的、智慧的孩子——学过了所有的书籍并比它们的作者知道得更多，他们见过那无人见过的，他们比经验走得更远，远过语言，远过沉默，去而复返，而从不知道，真正地，我们是否已经返回。

疑问仍旧是疑问，而苦恼像以往一样无时不在。

寻找正直

改写于演讲，新泽西列文斯顿布奈·亚伯拉罕寺院

1974年3月17日

我知道写作是不可能的，但唯因其不可能才必须写作。德国人不愿意让他们的罪恶被记忆。因此我说无论是谁忘记了，都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无论是谁想要忘记，鼓动别人去忘记，也都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记忆，不是怀着仇恨

——在我们的启示里没有仇恨，一个犹太人不能仇恨，也许这就是我们一些年来的错误所在——而是去牢记。

作家的正直不仅要求忠实于过去：一个人还必须忠实于现在。据我的 *Weltan-schauung*^①，据我对世界的解释，我的过去是

① 德语“世界观”。

我的现在的一部分。倘若我无法相信亚伯拉罕是我的同时代人，倘若我无法相信我和我们所有人都曾站在西奈，倘若我无法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以撒，一个幸存者，那何必宣扬这些事情呢？以我的全部良心和我的全部热情我试图宣扬的正是这个。三千年的犹

太史正受到威胁，但它们交付我们的是如此之多，达到了这样一个极点，以致我所说出的每一个字，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姿势，我所选择的每一个承诺都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如果不是为了这，我就无法继续下去。

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

关于大屠杀的国际讨论会开场发言，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

1974年6月3日

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如此聪明又如此苍老的孩子们的故事。因恐惧而缄默的老人们的故事。把死亡视为一个老熟人迎接的受害者们的故事。将人们带到深渊之侧和更远处故事——和其他将它抬升到天堂和更高处的故事。绝望的故事，渴望的故事。无边火焰向天空伸展的故事。黑夜吞食生命、希望和永恒的故事。

让我们讲故事来记忆人类在面对凶猛的邪恶之时是多么脆弱。让我们讲故事来阻止刽子手

说出最后的遗言。遗言属于受害者。这得取决于见证人来抓住它，使它成形，传递它，仍旧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存，然后向其他人传播那秘密。

困难在于传递。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够、都应该以语言来交流。那么，一个人该做什么？一个人该对他的秘密和他的沉默做什么？这就是大多数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的问题，当他们决定把大屠杀的烈火变成词句的时候。

俄国伟大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时代她怎样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在卢布扬卡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

个给她儿子的包裹。数以百计的 如下：

妇女们在那里等着轮到她们。每人都有某人在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老妇转头对她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是的。”“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将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安娜·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

大战后，死者向每个幸存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R·福里森，索尔波涅的一位人文学教授，给阿耶尔·库博维博士写了一封信，后者多年以前曾在耶路撒冷的雅德·瓦辛姆文件证明中心供职。信的日期是1974年4月3日——这解释了为什么库博维博士没有收到它的原因：他已在十多年之前去世了。福里森教授并不知道这个，他也不知道另外一些事情——这正是他那封来信的最初原因。信的内容

亲爱的先生：恳请您告诉我您对于一细小问题的个人感觉；此问题与当代历史有关。您是否认为毒气室是一种神话亦或属实？

可否告知您对一个人须归于 Gerstein 文件、Hoess 自白，以及 Nyiszly 证词的价值意见？总而言之：所有写下的与出版的关于奥斯威辛、Zyklon - B、夜与雾和终极解决的文件究竟如何重要？我至今未能发现可靠的毒气室的照片……

于是，在那个事件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有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不知道——他希望知道——他要求证据……奥斯威辛的确存在过，而终极解决也并非一个疯子的梦想而是官方的政策，由成百上千的男人女人执行和完成。

在德国出现了一股希特勒潮。华沙的市政会计划清除贱民区的残墙，在原址建一所幼儿园。在法国，最流行的书籍与影片是有关杀人者与帮凶们的——不是有关他们的受害者的。

于是，作为一个曾努力了25个年头来讲述这一主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承认失败。见证人并未被听见。世界仍是世界——我们的证词并未带来变化。

如今，在那个事件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仍旧可以说——或者已经可以说——所谓大屠杀的文学并不存在，无法存在。它是一个用词矛盾，正如大屠杀的哲学、神学和心理学一样。奥斯维辛无视一切体系，反对一切教条。它们除了缩减那超出我们所及的经验之外什么也不能。

然而大屠杀却已侵入了文学创作的所有领域。戏剧甚至电影都在这一主题上存在。全都显示了太多，结果则是没有一个人见到任何东西。这经历以更大的影响力在文件、目击者证词和个人回忆录里通过。最震动人心的形象、事件、形势和人的蜕变的最迷人的组合还有待发现，不是在虚构中，而是在这样的文件和个人证词里，其中有一些读来仿佛是幻想或诗歌。每一个形象包括着一段人生的、不止一个人的、不止一个社团的无数形象。但那时生活本身在黑夜王国里却应和着一种不同的节奏。人们相遇、相爱、相别、绝望和死去——这一切都在一

星期，一天，一个小时之内。一切都迅速离去了，可怕地迅速。在正常社会里要经年累月的事情在贱民区和集中营里被减少到分秒。这都得在——也确实在——大屠杀本身期间所写下的编年史里反映出来。

后来，随着解放，幸存者本身进入了文学，把他们的无助、他们的愤怒带给了它。他们也共有为他们欧洲惨遭杀戮的族人作证的需要。

最先这么做的人之一是一个叫做扬克尔·维尔尼克的人，木匠是他的职业，而英雄是他的选择。他是那些参加了特雷布林卡起义并设法逃走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的个人叙述最先在波兰地下出版。这里是引言：

亲爱的先生：为了您并且仅仅为了您我继续紧握我苦难的生活，尽管它对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吸引力。我怎能自由地呼吸并享用自然所创造的一切？一次次我在半夜醒来痛哭失声。可怖的梦魇打破了我如此急需的睡眠。我看见千万具骷髅向我伸出他们枯瘦的双臂仿佛在乞求怜悯和活命。但我，大汗淋

滴，感到无力给予任何救助。接着我跃起，擦拭双眼，事实上是为它不过是一个梦而高兴。我的生命饱受痛苦。死的幻影时时造访我，孩子们，幼小的孩子们的幽灵，只有孩子。我牺牲了我所有亲近的、宝贵的东西。正是我自己把他们送往刑场。是我为他们建起了死亡室。

今天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没有住所，没有家庭，没有任何亲戚。我对自己说话。我回答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流浪者。怀着一种恐惧之感我穿过人的居住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所有经历都已成为我脸上的印记。每当我望见我在一道溪流或一个水池里的反影，或在惊愕将我的脸扭曲成一副丑陋的怪相时，我还像不像人？不，绝对不。邋遢，丑陋，肮脏，颓丧。仿佛我的肩上扛着几个世纪的重负。这重负令人厌倦，非常之厌倦。但目前我必须扛着它。我想要并且必须扛着它。目睹了三代人的末日的我必须为了未来而活下

去。世界必须被告知那些野蛮人的丑行，以使未来的世纪与世代能够憎恶他们。而正是我要让这发生。没有什么想像，无论多么大胆，可能构想任何与我所见、所经历的相似的事物。也没有哪支笔，无论多么流畅，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我意图精确地呈现一切，以使世界能够知道西方文化曾是什么样……

维尔尼克，在特雷布林卡，被迫为他的族人建造屠宰房和火刑柱。因为在1943年，当结局越来越逼近时，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决定杀死死者。焚烧尸体和散尽骨灰的命令下达了。这任务被强加到受害者们自己头上。每一处凶手们都同样行动，说出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手势。每一处德国敌人都剥夺了受害者的悲伤。受害者们必须强作欢颜。在特雷布林卡以及在雅诺夫斯卡，受害者们被迫穿得像妖魔一样来逗乐他们的同命人。刽子手试图把他们的惨剧缩减为一出滑稽戏。

他所不知道的，他所不可能知道的是，每一处都有着那些编年史家，他们的记忆将击败他。只要他们的词句得到传播，凶手就

不能宣称获胜。

为什么维尔尼克的叙述是真实的？因为它意在成为证词而不是别的。他既不是职业作家也不是诗人。最好的描述是由普通人或儿童提供的。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词语、正确的语调，坦白、质朴，这些都是真理以及艺术的印记。他们面临的不是艺术技巧的问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他们执着的顽念：担负见证，传达一星火焰、一段故事的残片、他们的真相的一个反映。

证词和遗言并非都写在纸上。有的铭刻进了石头，在监狱的墙上。在考维尔，凶手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集中到犹太教堂来屠杀他们的地方，在墙上发现了一段出自《约伯记》的铭文：“哦！大地，请别覆盖我的鲜血，让我的呼喊永无停息之所。”在俄国军队解放了考维尔时，其中的犹太士兵加上了如下的句子：“我们读过并理解了。在此处捕获的 330 名纳粹都已被处死。列宁格勒第四卫戍军团军官扎斯拉夫斯基和法尔布斯坦签名，在往柏林途中。”

一个人怎能使自己相信——而不怀愧疚之感——他可以

“使用”如此的事件达到文学的目的？那难道不是意味着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坡纳尔和巴比·雅尔都结束于……词语？意味着那一切都不过是个用词问题？

哪种词语？那也成了作家必须克服的困难。语言已经被败坏，而他可能希望成就的一切就是去传达传达的不可能。对于幸存者来说试图完成他的使命简直太过分了。他只有发明一种新的语言，构想一种新的节奏、一个新的结构来表达那不可言传的，去揭示由那么多死者那么警惕地保卫着的秘密的各个部分。

大多数这一类小说家似乎遵循同一个模式，把文学视为一个纠正非正义的途径，他们写下他们的故事来抗议对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族人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抗议意在成为针对社会、人、上帝的一个有力抗议。他们目标不仅在于描述那杀戮，还在于指出在它之前是什么：生活、家庭的安宁、它的假日的欢乐、它的傻瓜们的呼喊，以及它的孩子们的智慧。他们写下他们的回忆录来使被刽子手们所毁灭的人们重生，并证明犹太人能够——用词句——在废墟

① 意第绪语，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的犹太人小村庄。

上重建。这就是为什么 shtetl^① 对他们有如此的魅力：shtetl——远离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只在词语中幸存。幸存者们写下的华丽篇章是有关 shtetl 而非大屠杀的，只因一个人无法写大屠杀，倘若他是个作家就尤其不能。

可以理解，这一主题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神圣的敬畏。这一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们——马尔罗和莫里亚克，福克纳、西劳涅、托马斯·曼和加缪——选择了置身其外。这是他们向死者致敬的方式——也对幸存者致敬。同样，这也是他们承认他们无力处理那样一些主题的方式，在其中想像轻于经验的重量。他们的诚实足以认识到他们不能进入一个有那么多死者出没、埋藏在那么多尘土之下的疆域。他们选择不去描述某种他们无法彻悟的事物。

最纯粹的写作是那些献给了我们子孙的苦难、苦恼与死亡的写作——以及由那些孩子自己写下的作品。他们的词句比其他人的更使我们接近那经历——他们

的词句就成了经历。我们的孩子们是刽子手的根本目标；他们永远如此。法老始于杀婴。哈曼^②也是如此。希特勒也是如此。

伊茨哈克·卡曾尼尔森，在他的《我惨遭杀戮的族人之歌》里，给了我们如下的描述：

不要哭……在这个车站我看见另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姑娘。她在给她的弟弟喂食，而他哭了。他哭了，那个小东西；他在生病。往一点冲淡了的果酱里，她滴进了面包的碎屑，熟练地把它塞进他的嘴里。这一切我的眼睛有福看见，看见这母亲，一个五岁的母亲，在哺育她的孩子，听见她慰抚的词语。我自己的母亲，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也不曾发明这样的计策。但这一个却带着微笑擦擦他的嘴，把欢乐注入他的心里，这以色列的小姑娘。舒莱姆·阿莱赫姆^③也不能比她做得更好。他们，以色列的孩子们，要最先接受

① Haman，《圣经》中人物，波斯王 Ahasuerus 的宰相，因阴谋杀害犹太人事败而被悬于 75 英尺高的木架上绞死。

② Sholem Aleichem，俄国犹太人，意第绪语作家(1819—1890)，本名 Solomon Rabinowitz。

末日与灾祸，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父母。他们被霜冻、饥饿、蛆虫所吞噬。神圣的弥赛亚们，在痛苦中达到了圣洁。说吧，那么，这些羔羊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劫数到来的日子里是他们最先成为残忍的牺牲品，邪恶陷阱的第一个猎物，最先被留给了死亡，最先被抛入屠宰的货车？他们被扔进了货车，巨大的货车，就像一堆堆弃物，像大地上的尘土。而他们运输他们，杀死他们，灭绝他们，不留一点残余或记忆。我的孩子们中最好的都已被消灭，让苦难降临我吧，灾祸与荒芜。

每当我读到对孩子的杀戮，我知道我将需要我的一切力量来摆脱——而非绝望。这变得更为真切的是在我读到这同一些孩子们在进入火焰前所写下的作品之时。

一个叫做玛莎的小孩在死前不久这样写道：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们。

一个叫莫泰尔的小男孩写下了首极短的诗：

一个小花园，
和一个小男孩走在它旁边。
当花朵开放，
小男孩将再也不在。

另一个小女孩，阿莱娜，写道：

我想独自离开

到有别的,更好的人的地方。
进入遥远未知的某处,
那里,没有人杀害别人的地方。
也许我们更多人,一千个强者
会到达这目的地
在不久以后。

巴维尔·弗雷德曼写下了“蝴蝶”:

最后的,最最后的,黄得如此
斑斓,明亮,耀眼。
也许如果太阳的眼泪会对着
白石头歌唱
这样一种黄色就会被轻轻带起
远走高飞。
我肯定它走了
因为它希望向世界吻别。
七个星期我一直住在这里
关在这贱民区里。
但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族人,
而蝴蝶召唤着我。
而白色的栗子在庭院里点
亮。
只是我再没看见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儿。
在贱民区里。

最后一首,是由一个叫做莫
泰利的小男孩写下的。我不知道
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多大: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
今天我将快乐。
悲伤有什么用?
告诉我吧。
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
的风?
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
天?
明天也许还这么好,
这么阳光明媚。
明天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
们照耀。
我们再也不用悲伤。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
是。
今天我将愉快。
而每一天,
无论它多么痛苦,
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
我将悲伤,
不是今天。

是的,让我们来讲故事,诗篇
中的故事和文件中的故事。别的

一切都可以等，必须等。别的一切都不存在。

让我们来讲故事：恐惧的故事和黑夜的故事，发疯的老人的故事，他们在升上天堂时与他们的儿孙共舞。

让我们讲述发了疯的时代的故事故事，人类最深的苦难的故事。我说的是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犹太人。但在奥斯维辛死去的是人性。当人性杀害犹太人，人性就杀

害了自己。

让我们来讲故事：孩子们的故事，他们在死去之前的一刻还在歌唱着生活。让我们讲述睿智的老人的故事，他们爱孩子并继续爱着他们直到死去。

让我们来讲故事：因为孩子们爱听故事。但有一个故事决不会被讲述。很快我们甚至也不会知道它的名字——还有它的秘密。

遇见塞缪尔·贝克特

犹太前进日报，1969

人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一个也没有。他的希望能是什么？他一个也没有。天空乌云笼罩，太阳黑暗无光。人远离上帝，更远离他最近的邻人，离他自己则更其遥远。他的脸是一座充满面具的坟墓；他的词句，是充满幻觉与谎言的一声回响。

倘你愿意，这就是对诺贝尔桂冠诗人塞缪尔·贝克特的世界观的悲观总结——如在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那样。

如此的绝望，如此充满恐惧的绝望出于它们，使人把作者想

像成了一个傲慢的、邪恶的人，他恼怒于他的同类以及造物。人们相信这样一个把他的文学创作转变为一声抗议的有力呐喊，成为一声孤寂的狂暴呼叫的人，必然是邪恶、颓废、严酷的，以及更有甚者，满怀着嫉恨。

但这个印象是错的。塞缪尔·贝克特，63年前生于都柏林，是我一生中曾经遇见过的最为自律和温和的人之一。

瘦削，高个，一道灰白头发的前额——在街上他不可能不被人留意。但最吸引你注意的是他蓝色火

焰般的凝视。他用它把你洞穿——不是为了审判你，上帝不会允许，而是为了理解你，只是为了理解。

总而言之，他理解一切，抓住一切，仅仅用他的双眼。他无需提问。他望着你——就知道了。

一次与他的相遇必然要置于沉默的范畴之中。他是我所知的最沉默的人。有时在你与他同处的两个小时里他连两个字都不说。原因呢？首先，他对语言没什么信心。其次，他相信两个朋友不用词语也足可互相理解。

几年前我们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初遇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彼此间似乎都没有说“早上好”。他喝着他的黑咖啡而我喝着我的——我们俩都囿于自己的沉思之中，也许是同样的沉思。只在后来我们才设法相互交谈了几句。他告诉我他新近在一个旧盒子里发现了他尘封的《莫洛瓦》手稿，他的散文作品中最动人的一部。怀着惊奇他说他在出版的书里省略了最先一句——那段题铭。这句话是：“En desespoir de cause^①——因为别无出路。”事实上，这意味着他本想把莫洛瓦经

历保存在自己心里，而不是把它写出来，至少不出版它，但对于一个像他一样的诗人，一个像他这样的想像担负者，别无出路。尽管不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建起词语之桥，绝望本身同样必须找到表达的途径。

人际交流的不可能，顺便说一句，是他所有著作的主题。在这一方面他比卡夫卡走得更远了一步。对于卡夫卡，人是一个受害者，不公正地受到惩罚，不公正地被判罪，他整整一生等待着那王子邀请他进入城堡，这样他才能至少保护自己。在贝克特那里他无法达到如此之远；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人。他必须说的都仍未被说出。他所梦想的也仍是尘土。

例如，看看他的第一部剧作：《等待戈多》。两个乞丐，打扮得像小丑，等着第三个——戈多——他在期待中会来却没有来，事实上，他永远也不会来。悲剧不在于戈多（上帝的信使？）不会前来而在于那单单两个主角，他们谈论着他，仅仅谈论着他和他的等待，说的却不是同一种语言。寓意是：两个人不能相信同一个上帝或偶像，不能为同一目的而战斗，不能

① 法语“出于原因的绝望”。

联合起来反抗人的非人命运。每个人都被判在自身的监禁中生活，在他根本的孤独之中。

这是他的所有著作，他的散文与戏剧的主调。在《克拉普的最后终点线》里他描述了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声音说话。在《事物存在的方式》里他展示了词语的欺骗性质：不是把一个人带近另一个人，词语相反在他们中间筑起了重重高墙。

在《终局》（他的最后一部剧作）里贝克特描述了他的主人公……在垃圾筒里。他们互相说话——但言不及义。在问与答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一道鸿沟。他们住在同一堆垃圾里，使用同一种语言，然而他们仍旧毫无关系。

又一次，如此多的悲哀从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里涌出——真正的悲哀，没有一丝伤感的痕迹——如此多的绝望，以致最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读他或听见他——或是希望做到。

多年来在他自1937年定居，并在那里结交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巴黎，他一直无法出版他的书籍。最大的出版商们拒绝他的杰

作《等待戈多》。后来，当他已经失去了全部希望时，这部剧作碰巧引起了一个小而声誉颇高的出版社，由一个年轻、敏感、自由派的犹太人雅罗米·林登主脑的Editions de Minuit^①的注意。这是贝克特生涯中的转折点。

林登——他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立刻认识到了塞缪尔·贝克特作品的伟大和深远意义。他首先出版了作为剧作的《戈多》，然后寻找并找到了合适的导演来上演它。过不多久作者就闻名于世界了。今天没有一个大剧院不曾上演过贝克特的剧作；没有一种语言没有他作品的译文。

尽管他赢得了荣誉，塞缪尔·贝克特仍独自生活，只与他的少数密友会面。他不同意任何访谈，逃避摄影师和一切公关人员，因为他发现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他害羞。

他在巴黎之外写作他的书籍。他对每一句，每一个措辞都作出巨大的努力。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尽管据他认为，只有沉默才能是完美的。这就是他的书籍越来越短的原因。他最近写了一部长十二分钟的剧作，以及一本厚

① 法语“子夜出版社”。

不到二十页的书。

当他不工作时,他爱听古典音乐和走访艺术博物馆。他最好的朋友是著名的以色列画家阿维多尔·阿里哈。

让我利用这机会,尽管只是顺便一提,记下塞缪尔·贝克斯特是犹太人的一个真正朋友。与犹太人的命运有联系的一切都令他感兴趣。数年前阅读一部讲述大屠杀的书时,他彻夜无眠——只是哭泣。

因为,他怀有完全的绝望,他怀有完全的悲哀,却仍对人类充满同情与爱。与某些仇恨自己更甚于他们散文中的主人公的作家们恰成对照的是,塞缪尔·贝克斯特,人们感到,是怀着理解与爱来

讲述他的主人公的。

这就是瑞典科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原因:他杰出地描绘了必然生活在一个丑恶世界上的人类的不幸与悲剧。但他没有把自己描述为邪恶,因为他本人是邪恶的反面:他不嫉恨任何人也准备着帮助每一个人。

毫不足怪在某些圈子里他被视为不单是一个隐士而且是一个圣徒。在他的著作里有黑暗的悲哀但没有污秽。

每个有幸遇见他的人也都会说他有一种高贵的相貌。在他面前人有得到充实、升华之感。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马拉默德的魔术

马拉默德《傻瓜优先》的书评。《哈达萨杂志》

1963年11月

在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作品中动人心魄的激情是他对所有那些自命具有创造力却经历着失败之后还是失败,孤寂之后还是孤寂的人们的巨大同情;在他的作品中他们被赋予了得到庇护的权利。远非嘲

笑他们和揭露他们的苦痛,远非谴责和蔑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丑陋,如他那么多同侪所做的那样,他给了这些幻影一盏指路明灯。

此外,他并不满足于照亮他们的命运:他改变它。

他赋予一个人对死亡的胜利，准许另一个人通过他的艺术对一个渴望中的女人的征服。他的人物大多数被剥夺了继承权，饱经苦难，追求着那些幻象，瞬息即逝的欢乐。马拉默德准许一个人得到他的神话，给另一个人一种快乐的相似物。这样做他成功地使我们欢笑、痛哭、以及比这更远的，使我们大吃一惊。

他像加缪一样，是战后时期那些对爱的行动与疯狂的行动淡然处之的罕见作家之一。加缪主张有必要创造一个欢乐的世界来反抗一个悲哀的宇宙。马拉默德似乎在艺术领域采用了这一态度。两位作家的主人公都从未彻底迷失，他们的处境从不是不可挽救的。在马拉默德文笔的力量下死亡天使变得具有人性、脆弱、能够推翻永恒的律法。

在这一部 12 个故事的集子里（其中几篇发表在像《评论》、《花花公子》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各式各样的杂志上）我们发现了在他较早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里时时出现的某些主题、追求和人物。人面对死亡、非正义、不可能的爱。

情节发生在意大利或纽约，但根本上是在作者自己的魔术所统治的迷人世界里，那里现实被染了色只为了可以欺骗自己。这里死亡

大声说话，一只鸟经历一种人的命运，而受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新的故事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主人公们没有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似乎多少在走着同一条路，反抗着同样的势力，奋力跃过同样的障碍。

曼德尔，“傻瓜优先”中的老人，在青年时忍受了“裸女”和“静物”中的画家费德尔曼所面对的同一种考验。每一个人都 在马拉默德的魔术与神奇世界里发展，它保护着人性。的确没有一个人像这个人那样写，而他写得也与谁都不相似。

这里我们认识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最次要的事件都刻有他的印记，包含着他的想像的光辉。他轻轻地引导我们穿过他的世界内部，照亮所有属于他的人之家庭的人们——还有他自己——的力量、苦恼和命运。有朝一日我们谈论马拉默德的宇宙会像我们提到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那样。在那个世界里人比上帝本身显示了更多的力量。

在何种程度上马拉默德能够被称为，如他在概括地说是的那样，一个犹太作家？像他的共有这一名称的同侪一样，他否认这一身份，也许否认得更为奋然，因为他乐于摧毁障碍。然而，他比别人更具犹太性。他的主人公——通过他

们的苦难，他们的焦虑和他们最终给自己的绝望带去的希望——也是犹太人。在他的作品中那只鸟叫做犹太鸟，死亡天使叫做金兹伯格，而其中的意大利人和黑人妇女的声音也同样是犹太人的。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写道，做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事。而做犹太人则更其如此。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新小说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



哈维尔散文选

(三篇)

瓦茨拉夫·哈维尔(1925—), 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55年, 入捷克技术大学学习公共交通, 1957—1959

年服兵役。在部队里开始从事戏剧

创作, 此后成为有名的荒诞派戏

剧作家。曾发起并参与“七七宪

章”运动, 几度入狱, 现任捷克和

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除戏

剧作品外, 还著有《哈维尔自

传》一书, 对个人生平及有

关政治、社会和艺术等

观点, 有较详细的叙述

与阐明(中译本由东方

出版社于1992年出

版)。



哈维尔

《世界文学》编辑部供稿

○ 肖岩 译

政治与良知^{*}

我想，提出了所有这些严厉的批评之后，人们希望我说一说，面对当代世界的两难政治困境，我认为究竟什么是今日西方人的有意义的选择。

正如我的一贯思路所显示的，在我看来，我们所有人，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面临一个基本的任务，其他的任务相比之下都是从属的。这是一个抗拒的任务——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必须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即，抗拒意识形态、官僚、行政官僚、人工语言和政治宣传口号的力量。不论它以消费、宣传、压抑、科技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出现，我们都必须抗拒它复杂的全面异化的压力。这种种形式，其实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不怕被嘲笑，从我们的自然世界中选取准则，重新确认久违的被否定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去赞美自然世界的各式界线，赞美界线背后的神秘，并接受显然是超出人类本能以外的存在(being)秩序里重要的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会不断再发现和体验到我们的存在(existence)。以存在的绝对界线，我们必须恒久地与之关联。我们所有的行动，所有由个人体认，公开期望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必须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自己良知的声音多于一切抽象推论，而且只对良知的呼唤负责。我们必须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有爱、友谊、团

^{*} 原文共五节，共10000余字，这里节选的是最后部分。

结、同情和友爱的能力，根本不用为此觉得难堪；正相反，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人性中这些基础方面从“私下的”放逐中召回，并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的真正起点。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含混和不现实，但我向你们保证，这些表面上幼稚天真的字句，源于非常具体真实而难得的与世界同在的经验，允许我这样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

非个人权力的先锋队拖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之路上走，沿途尽是火箭发射台和被蹂躏的自然。它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组成的。无论是忽视、原谅、欢迎或是接受它们的游戏手法（从而令我们变得和他们差不多），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而对它们的最好方法，是没有偏见地研究它们，从中吸取教训，彻底而激进地与它们区分开来，并不是简单地与体现了极权主义精神、显而易见的邪恶作斗争。斗争应是持续不断的。对象就在四周，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我们心中。对这种邪恶威胁最大的不是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火箭，而恰恰是对当代人心灵结构中的这种邪恶的根本否定：人回归自身并承担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及其对在一切地方反抗的个人化权力，它宣称超越善与恶的每一种表现之决心的再度重申，不论它面对阴谋诡计采取什么样的伪装，哪怕它只有对抗极权制度的名义度——这么做也罢。

对抗极权主义的最好防卫方法很简单，只需把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赶出来，把它从人类中消灭掉。对所有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的最好帮助，就是去正视和对抗构成极权主义的邪恶因素——极权主义制度正是从中吸取力量并由此得到滋养的。极权主义制度假如不能充当某些东西的“先锋”和前哨，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疑，肯定人类的责任是防卫一切不负责任

的最自然的屏障。例如,如果先进国家的精神潜力和科技潜能不仅是在自私的利润计算的压力下,而是真的负责任的传播,我们便能够防止其不负责任地转化成毁灭性的武器。从原因方面考虑和运作,比起简单地待影响出现后再反映肯定有意义得多。否则,按照常规唯一可能的反映便是使用同一不道德的手段。继续这种做法。等于继续在世界上扩散不负责任的邪恶,结果正是制造和滋养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成“否定政治的政治”,即是说:政治不再作为权力和操纵的技术学问,不再作为高于人类自身的控制论规律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作为找寻和达到有意义的生活,并保卫这种生活,为这种生活服务的众多途径之一。我赞成政治应用为可实践的道德,作为对真理的服务,作为对我们人类同胞真正的,人性的,并以人性为标准的关怀。我看得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路是极不现实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困难重重。然而,我看不到更好的选择。

当受审讯和服刑时,我直接感受到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和有益的力量。我永远感谢所有那些声援。但是,我不以为我们这些在自身的环境下反思或行动的人,是处在只是被动接受帮助的非平衡地位,而不能加馈我们的力量去支援对方。

我肯定在英雄集团里所谓“异论”是一种很特别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在没有人性的权力堡垒中的生活经验。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有机会甚至有责任去反省这种经验,做它的见证,并将其传递给幸福的没有经历过它的人们。于是,我们一样有相关的机会以某种形式去帮助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在我们深刻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利益上去帮助他们。

这些基本经验之一是:否定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是有效的,即使它无法事前计算效果。这种效果,肯定和西方对政治成效的考虑完全不同。它是隐晦的、间接的、长期

的和难以量度的。通常它只存在于看不见的社会意识的领域，因而也几乎不可能去决定它的价值和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贡献——如果有贡献的话——有多大。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困在偏远的乡间，被受唆使的周围世界所恐骇，但他发出的警告，却能越过大洋，为他人所知悉。并且比起成群结队的受雇宣传的更能清楚地对这个世界的强者的良知说话。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具有良知，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是的，否定政治是可能的：“自下而上”的政治；人民的政治，而不是官僚、政客、皇上的政治；由心滋养成长的政治，而不是由理论得出来的政治。在单调的“日常性”环境下，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当帕托卡写有关《七七宪章》的文章时，他用了“无权势者的团结”这样的词汇，他想到的是那些敢于以自己唯一能支配的东西——自己的人性的去面对和反抗非个人化权力的人们。他们不参与传统政治的腐朽游戏，不追求名望和职权，努力从人类良知中——这正是被那些权力工程师们嘲笑的东西——锻造出真正的政治力量。难道更美好的将来，它的前景不是有赖于“无权势进入的国际社会”这样一类东西吗？

○ 黄灿然 译

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他曾经从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里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其中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

* 这是哈维尔 1995 年 3 月 31 日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演讲的文本。

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规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以经验保持联系和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是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往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变，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

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的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的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人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话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

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

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的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

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点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

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位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崔卫平译

狱中书简

1983年1月22日

我不时听到某个人灾难性的消息，告诫说在我们的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其他人吵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造更大的丑闻），仅仅关心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面更广为人

知的是仅仅猎取名声而无视其他人,等等,诸如此类。我知道从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中得出普遍的结论是多么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现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此弥漫混乱和无法理解。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的事情。

.....

当一个人选择采取一定的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种意义,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到达一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的行为和他的独一无二性;这是一种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为,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这是一种自足的行为,尤其是独立于其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作普遍的状况,而不管它在某个时刻将如何出现。如果这样一种倾向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的状况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

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不能满足他关于必须是什么的幻想，他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塌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意欲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都可以将他推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他可以非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每个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面对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的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服于“在世界中的在”，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做的事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的那种可怜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

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不能被允许触及事情的核心，即那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但是回到我们开始所说的事来：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新闻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其所揭示的客观状态，它们暴露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同盟者的不幸依赖，其间包括他仅仅寻求拯救的人，到他整个献身的人，而伴随着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同时，依我看来，我怀疑这种内在的精神状态——如果它定要出现——将微妙地出现在所有外在状态的报道之前，并对外在状态产生一种影响，直至最终决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怎样评估的东西，仅仅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一种令人振奋的长远观点及一种善意的理解，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这听上去也许奇怪，但是每当我听说我们某项事业处于危机之中时，我对此欣然接受，并将其作为这项事业仍然存在的证明：如果它不存在，就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你看到，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

1983年2月5日

一年总有两三次，一些灾难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来，其中部分是不可避免地报怨：“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

做”。你也许猜想我对这样的消息特别脆弱，因此感到不安和压抑，或在绝望中大声抱怨：为什么我呆在这里？如果什么也不发生会引起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对这种消息的反应是与你的想像完全相反的方式：我经常带些生气地反问：想要发生什么？为什么非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总要有有什么事情“被做”？什么是那些必须要做的？

当然，我的生气不是对这样一些个别消息的反应，而是对于这种抓住事物的反常方式所作的反应——不管怎样，它们总引起我的关注。这是一种建立在虚幻之上对于事物的了解：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在于“做”，做是这样一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当事情在“做”，原则上总比“不做”要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行动而行动、为做而做的崇拜，唯一重要的是让某件事发生；而发生了什么行动，谁在做及为什么做，它的意义是什么，将会有怎样的反响，引起的结果如何则是不重要和整个没有意义的。事件开始或结束的意义仅仅在于它曾经发生的事实，如果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尽可能多并尽可能经常地发生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数目和次数成了生活的尺度。

这样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空洞的信仰，“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么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生活事实上成为一种持续的死亡，被一些事件在这儿或那儿打断的事实。事件越多，我们似乎越存在，而事件越少，看起来则越不可避免地死亡。我不认为是否有多少事情发生这是根本重要的，也不认为事件的数量本身会告诉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种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感情，是一种表而化的，依附性的偏见，是空洞的精神，是始终屈服于时代，仅仅

通过不断编织伪事件的数量来证明自身的优秀，像一只蜜蜂，走向自己的结局。沉默往往比最雄辩的言词来得更雄辩。一个精心选择、安置恰当的词往往比一百页处心积虑的空谈更有效地净化空气。

显然，存在过一个非常混乱和闹哄哄行为的英雄时期，每个人做每一件事，个个友好地对待他人，愉快地分担事情，互相帮助而无人拒绝。每一个团体都有过这么一个年轻时期。显然人们偶然地会对此怀念，而借助这个背景，现在确实好像“什么也没有再发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警惕，并回想起那种从激情澎湃到虚无主义熟悉而危险的循环。在那个时代，它曾经席卷了我们同胞中的大批人，他们并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想到这一点确实悲哀，因为那些人曾经这样坚决地反对盲从主义和幻想，似乎能够免除这种立场，结果却以这种方式告终。

换句话说，我并不在乎发生事情的多少。我仅仅对所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我喜欢这样的事情：确实可靠的，有根基的、独创性的，有活力的、均衡的，有味道的、富有交流性、挑战性的，对时代是中肯的——简言之，带来意义的事件。一桩这样的事件，甚至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要比所有那些单调乏味，尽管其动机也许是高尚的，而其仅有的理由是无事可做而来得有价值得多。这种没有意义的行为通常仅仅使所采取的立场贬值，劳民伤神，结果落得个无补于事的印象[……]

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它有意思得多。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每个事先断定的某人远远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

布拉格精神

(三篇)

希望

若干年前，我被范科的小说《大自然界的野兽》所迷住。作者试图从中精确地指出人类和动物相区别的一种品行。他所提供的解释是，人能够创造仪式，制作护身符——出于对其自身命运的恐惧，他相信自己能够扭转和改变一种力量。

但是如果人对这种也看重他本人的更高的力量并不抱有希望，那么，相信比自己更强大的某种东西又有什么好处？

“因此拥有信仰、希望、仁慈”，像使徒保罗所指出的：“在这三者当中，仁慈是最伟大的。”

实际上，仁慈或爱，信仰和自由经常遭到否定，人们对这些东西表现得一再妥协、让步，但是一旦人们拒绝希望，他便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

甚至一个被判死罪的人在走向刑场的时候，或许还带着一线希望：在最后一分钟他被缓刑或出现奇迹。正是这点给了他走向绞刑架的力量。

希望总是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人想像自己处于不同于他所发现的目前的处境的能力。因此还有什么比希望更加富有人性？

死亡也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并且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和希望相对立的？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可以被看作人们用来回

避意识到的结局的徒劳尝试，看作反抗无时间性的短暂努力，看作淹没宇宙沉默的绝望的企图。

由于死亡显得是人类生活中唯一的绝对，因此所有希望只是相对的，都是帮助人们走向绞架的幻觉。

从绝对立场看过去，真正的希望仅仅是由能够用希望给最终必然性披上外衣的人所提供的，是由能引导人们穿过死荫的幽谷的人所提供的。

据我所知，基督教的上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刚才提到的以他的名义说话的人——是仅有的完成这件事的人。从来没有人能确凿地判断他所提供的希望是建立在错误还是灵感的基础之上，但是无疑地，这是人们可能被赋予的唯一真正的希望。

从那时候起，通往永恒希望的道路就展现在人们面前，每一个试图抹杀上帝的人都感到有责任给人们提供一种代用品，但是这样的希望很难和人类灵魂产生联系，它仅仅和他身边的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相联系。

外部世界中的希望变成了人的希望；一种本来是内在的东西变成了外在的。人们建造了这个世界，并最终导致了他灵魂声音的地狱，这种声音在极度痛苦中呻吟和被淹没。

所有和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希望，和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相联系的希望，在它们自身内部，都带着它们自己的虚幻和绝望。当人们看穿它们的时候，他便转身离开这种东西。但是因为没有希望的生活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他又去寻找新的希望。

像一望便知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仅仅是充满机器和其产品的世界上，也是一个充满虚幻的希望的世界里。它们创造了把人拖入其致命的毫无希望的那种循环。

而我们越是热烈地迷恋它们，我们便越是和那等待奇迹

出现的被判处死刑的人相似，走向那些虚幻希望的自身毁灭。

1982年10月

关于垃圾简短的沉思

在我去往市内有轨电车的路上，有一块小小的闲置无主之地。那儿曾经是一座花园；但是花园主人的房子已经不在。在树和灌木之间很好地踩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许多年来，它是我散步的最好去处。后来有人往草地上扔一只塑料杯，有人掷一个罐头盒，另外有人倒上一篮子垃圾。没过多久，我意识到自己已下意识地绕道而行，为了避开现在已成为废料和垃圾的墓地的这一小块地。

垃圾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吸引着我。作为一个问题和作为一个隐喻。为了研究一部小说，我曾经作为一个扫马路工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所生活的城市和垃圾有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大多数用作垃圾场的地方都已饱和，腾不出一丁点多余的空间。一座垃圾焚化炉正在建成，但是它位于一个人口稠密地区的中部，住在那里的人们抗议（如果我住在那里我也会同样做）他们已经遭受污染的地区，还将充满由于焚烧城市其它地方来的垃圾而产生的烟雾和灰尘。焚化炉仅仅对付已经造成的垃圾，而问题本身仍然存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量生产的年代。当某种东西被大量制造的时刻，它正变成潜在的垃圾。这种情况可以说自古以来就这样。区别仅仅在于所制造东西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一个石头做的揉面槽可以沿用好几个世纪，一个木头的手摇曲柄钻为好几代人服务。一个人有一双劳作时穿的鞋，如果不

是赤贫的话，他还有一双星期天去教堂穿的鞋。一直到把鞋穿旧了，鞋也可以沿用许多年。当鞋底穿出洞来时，鞋匠就换上一个新的。最终这鞋不能再穿了，那就到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我们铺张浪费和屈服于一种崇拜新奇的宗教。在某些东西远远没有破损之前我们就把它们扔掉。甚至我们还没有对它们产生厌倦，我们却知道它们已不如刚买下的那几个月里那样时髦了。我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被过剩所淹没的国家，这里的人们一直受制于匮乏与短缺，主要是缺少自由。我注意到有许多允诺人们将会富裕的前景描绘。这里将会有更充足的物资和更多的垃圾，但是将会有更多的幸福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当我试图去想在我们没有被垃圾埋葬之前，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时，我想到能够令人们满足的或许是结束对它们的贪求、将它们豁免的某种东西，是有能力拒绝时髦的专制，拒绝耀眼的式样和颜色的诱惑，是重新追求质量，而当这样做时，便开始适度的或甚至是节制的生活历程。

对表面上的和可见的事物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同样也适合于精神和灵魂方面。信息和观念的过量生产和物品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以数量取代质量。

我们的前人只有圣经和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但他们不仅会去读，而且会背。电视从未听说过。他们读的报纸只有几页。人们得到的信息很少，但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将事情仔细考虑和观察周围的人们和自然。由此出发，许多人能够形成一种他们能够抓住的生活观。但是今天呢？

我们生活在一种信息和观念的泛滥之中，它们当中的大部分于被创造出来之时，便已成为垃圾。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们不仅渴望新的物品，也渴望增加新的信息。在半

个世纪的匮乏之后，某种供应突然爆发至一个难以想像的水平。左派和右派的概念正待出售，同时伴随着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反犹太人主义和某些改头换面的内部敌人的理论。人们过度地认购它们又将它们丢弃，说到底，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他们所买的那些东西看上去有吸引力和耐用，但经常是它们无非和旧的东西一路货色，只是换了一个包装而已。我惊讶地注意到不久前那些穿过花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垃圾中而不是在花朵中穿行……

我观察到人们如何参加社会或政治运动，几个月后他们就将其放弃，又去参加看上去更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同样空洞的新的那些。有时人们排队经过我的窗下，大声赞美着那些煽动者，完全墨守着他们曾被劝说接受将会拯救他们的早已死去和过时的观念。

物质垃圾的泛滥是我们不易对付的某种东西。它糟塌乡村、田野，并能污染水和空气。但是就污染头脑来说，精神上的垃圾更危险。头脑被污染的人们会做出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事情来。

1991年6月

有权者和无权者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历了一种社会状态：其中，那些无权者完全处于有权者的任意摆布之下。得到广泛接受的是，有些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一种权利：自由搬迁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乃至一个有尊严的葬礼的权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具备有关社会正义或毋宁说是非正义状态的某些个人经验。正像我们的父辈被社会问题所吸引一样，我们这一代人被正义的问题所吸引，更准确地说，

被当权者应受惩罚但却悬而未决的正义问题所吸引。30年代初期,呈现在我们乐观主义父辈们面前的是无助的个人面对财产、失业和饥饿的压力。而纽伦堡法令、莫斯科审判、奥斯威辛和沃尔库特^①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让我们感到个人在面对极权国家可耻或凶恶的暴政时绝望的无助感。上一代人关于经济无限发展的没有根据的信仰破灭了,同样,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按照乌托邦的设计重新组建社会的朴素信仰也破灭了。每一代人都喜欢将其自身的经验当作唯一的,将其自身的成功和灾难当作划时代的和前所未有的,这就妨碍了去估计其真正获得的成功及其失败的范围和意义。

违反人性的种种现代罪行并不是这个世纪的发明——装模作样的审判,预先安排好的裁决:将无辜的人们判处死刑,从事奴隶劳动,大规模枪决,对整个民族的杀戮,等等。我们可以在所能考察的任何历史时期都发现同样的事情:审判苏格拉底、扬·胡斯^②、布拉格的哲罗姆^③、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拉·德穆兰^④、玛丽亚·安托万内特^⑤、德雷福斯^⑥的法庭,同样还有追逼异教徒、持异议者或其他“叛徒”和改革者的法庭,都不是受追求真理的动机所推动。它们并不想弄懂、更不用说判断那些指控的真正详情。它们仅仅企图支持和服务于现存权力结构,同时惩罚任何被挑选出来作为指控的人。它们残酷地惩罚他们,作为一种警告,将恐怖灌输到每一个有他自己不合时宜思想的人身上。在它们了解争端的实质(某些事情它们甚至不予承认,置之不理)之前,在看到有关文件或被告者的面孔之前,就已经作好了裁决的结果。

不需要我详细叙述奴隶劳动,——毕竟,直到两个世纪之前(对俄国人,对西半球的黑人,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奴隶是对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所熟悉的事情。

那么，对整个团体乃至民族的杀戮呢？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有关种族灭绝的例子。圣经中充满了整个王国和公国的人民被屠杀的故事，包括妇女、儿童和家畜。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数千名无辜的公民被处死。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全体土著民族遭受失败——在一个于那个时代，根据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中。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人类这个种族的历史是残酷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称之为文化、文明、人道主义或合法化的东西不过是覆盖在一种血腥本质之上的薄薄的外壳。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确立了这些东西或以它们来命名，便相信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制服。这是天真的想法，但是近好几代人却都屈从于这样的幻觉，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物质和精神同样丰富的纪元，一个诸如博爱、兄弟情谊、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基本的公民自由这样的概念，它们至少已经流行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几个世纪的话，终于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不再有人公然反对它们的时期。

纵观人类历史，始终贯穿着有权者和无权者、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有权者是埃及的法老，无权者是小小以色列民族。有权者是罗马人，无权者是勇敢而受困的迦太基人。有权者是封建领主，无权者是为数众多但散漫无章的农奴。天主教堂是有权的，那些徒劳地呼唤用圣经的力量反对刀剑的分散的追求真理者是无权的。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是有权的，扬·胡斯是无权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是有权的，用弓箭、过时了的枪支和绝望的决心抵抗加农炮和一支有组织军队的印第安人是无权的。盖世太保是有权的，犹太人和被征服的国家是无权的。每一个现代国家是有权的，尤其是不仅拥有所有武器（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权力），同时也拥有控制经济和精神所有手段的极权主义国家，而仅仅具备一种投票权和如何管理国家的理论上的发言权的人是无权的。

有权者的实力^①从来(或几乎从来)不是来自某种更高的授权,或来自精神上的价值,或由于他们在真理或智慧方面拥有一席之地,尽管有权者总是试图自称是这样。这种实力仅仅来自力量方面的优势。它通常建立在被统治的无数灵魂之上,建立在他们的武器和组织能力之上。

有时候有权者的胜利也恰恰预告了他们的失败,就像无权者的失败和死亡预告了他们的政党、地位和信仰的胜利一样。罗马帝国衰亡了,但至少基督徒的后嗣幸存下来并保存了他们已牺牲的先辈的某些东西。扬·胡斯也被列为圣徒。在历史上有许多次先前的封建领主因害怕他们的农奴而簌簌发抖,正像先前的资本家害怕他们的工人一样。

然而,即使他们令人可喜的后代为他们树立了金色的纪念碑,即使在他们的身后被宣称为神或圣徒或民族英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他们都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不可取代的生命被白白浪费,并且在其全盛时期被切断:苏格拉底、基督、扬·胡斯、吉奥达诺·布鲁诺、卡米拉·德穆兰、伊萨克·巴别尔^②、奥西普·曼杰斯塔姆^③、鲍瑞斯·普林纳克^④、科尔比神父^⑤、约瑟夫·恰佩克^⑥、弗拉蒂斯拉夫·范库拉^⑦、卡莱尔·波拉切克^⑧。还有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其他若干人,往往是那个时代最正直、最忠诚和可靠的灵魂。他们死在占领者的十字架上、宗教法庭的火焰中,死在第一次革命的断头台上,在第二次革命为前者举行葬礼的枪声鸣响之前,或者死在第十次革命的阵营中。从那个粗暴残忍的权力的立场看过去,他们都是无权者。他们的王国不是那样一种权力的世界。在其中,其他的价值和联系起支配作用。因为他们过早地被迫沉默,我们充其量只有问一问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大多数法典中,都有着将凶手和误杀者区别开来的条文。后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杀死只是出于自卫、失

误、愤怒或他的头脑突然失去平衡。乃至在犯下这种可怕的行为之后，他或许还能回到人性之路。而故意杀人的凶手，则出于憎恨、狂热或贪婪。他为了一个预谋的目标而行凶。一个故意离开了人性之路的凶手，要返回他意欲放弃的那条路也许将非常困难。

我们在有权者反对无权者最残忍的行为中也能找出相同的或类似的区别。强壮的民族颠覆弱小的民族，并且羞辱、奴役和屠杀他们。有组织的罗马军队、狂妄自傲的德国民族、野蛮的阿瓦尔人^①驰骋欧洲。他们因为领土、牧群、庄稼、黄金和俘虏而战。他们掠夺和抢劫，有时候杀死所有的活物，一般来说还是让失败者活着，奴役他们。他们在失败者面前散布恐惧并让后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的行为和宗教裁判所的行为之间还是有一个区分。一个宗教法庭根据精密的筹划选出它的牺牲品，折磨他们，为了摧垮他们的良知，使用酷刑摧残他们的身体，以残忍的方式杀死所有那些反抗者。在北美的殖民主义者和纳粹警察机器之间也有所不同，前者不断地袭击装备简陋和基本上是无助的土著民族，而后者则以一种有预谋的和冷血的方式杀害好几百万欧洲犹太人。

也许有人反对：对那些牺牲者来说，区别他是被谋害的或仅仅是被杀死的有什么不同呢？确实，这个区别仅仅对那些活着的人是重要的，对他们重返人性之路是重要的。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故意处死杀人凶手的权力仍然是犯罪的和应受谴责的，即使它最终改变了它的道德面貌，是试图为了忘掉过去和抛弃过去。一个可耻的、犯罪的权力过去是、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对所有人类社会的威胁。

恐惧总是权力的最可靠的同盟之一。有谁能够想像：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中居民们所感到的恐怖？当敌军爬上围墙时妇女们所感到的惊吓？宗教裁判官来到一座中世纪的城市时，恐惧蛰伏在一千张难眠的床上。同样，谁又能够想像，当

那些可怕的种族法令产生效果时，犹太人的家庭会有着怎样的焦虑？当三K党点起大火时，那些黑人会是怎样的害怕？而于黎明之前，到处都是专制权力雇用的杀手和虐待狂式的执行者们在沉默地搜寻时，那是一种何等透不过气来的恐惧！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苏联，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在巴拉圭、阿根廷、乌干达、智利、伊朗、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秘鲁、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国家，那儿的人民从来不知道死一般的黎明时分严寒的滋味，从来没有必要屏息观望，而死亡的使者恰好在他们的窗户底下起劲地跳舞？

进攻者总是在他未到达之前便先知道这种恐惧。他太知道真实的恐惧会暗中瓦解人的士气，造成惊慌和无能的抵抗。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利用这种恐惧的原因。他发动突然袭击，戴上恐怖的面具，他大喊、尖叫，挥动燃烧的木头，发出威胁，擂鼓，敲打锅盖，把他们的士兵编成看起来庞大得多的行列，将骷髅头的徽章别在帽子上，在他们的机翼下面弄出警报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依赖某些形式的恐惧。人们不仅恐惧外来侵略者狂暴的铁蹄，说到底他还生活在对神灵们、对上帝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恐惧之中。恐惧官方权威和他自己主人的代理人，恐惧失去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家园、食物、土地和工作。

解放人的每项努力都是将他们从恐惧之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是为了创造一种情境，于其中他不再感到他的依存是一种威胁。权力越凶恶越绝对，它便越剥夺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惧。

如果权力变得如此绝对，它可以采取任何专断的行为，可以无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将他逮捕，以想像的罪名去审问他和给他判刑，没收他的财产和工作，取消他的自由，并且最重要的，公开侮辱他，使他蒙受耻辱。那么，恐惧也将变得

如此绝对：为了将它维持下去实际上无须做任何事情。当权者只要偶或表明他们想做什么便能够随心所欲。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其中的有权者借以统治的手段不同于任何人类曾经知道的。他们可以控制和消灭个人和所有人民。当这些手段存在时，我们的世界将仍然是一个恐惧的世界。

蛰伏在无权者床上的恐惧给他们的梦想和行动一种强大的动力。无权者个人渴望逃脱他的焦虑通常只有两种途径：远离具有敌意的权力之外，或者将自身变得有权。恐惧导致权力之梦。

毕竟，权力完全和人联系在一起。它存在于人们身上，存在于他们的行为和社会地位之中。一个皇帝，一个国王，一位第一书记或一位总理，都属于人类成员，但他们却尽可能地使我们相信，他们具有神的血统，或至少，他们享有在职权方面特殊的保护。但是有一天，他们却被拉下马来面对割下他们头颅的行刑队员，而如果他们已经死去，便被从坟墓中拖出来以证明他们是肉身、世俗之人。有关人的事情大致都是可以做到的。某人只要发现将权力移位到他本人的途径，他便可以把它从天上降到地上，从现在拥有它的人手中将其窃得。对无权者来说，获得权力的幻觉允诺其将从恐惧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它同时也允诺自由和世俗的种种好处。

我们已经说过权力依赖实力，实力依赖人数、组织和有效的武器。正是以这种方式，那些曾经被扔给狮子、受折磨和遭谋害的无权者基督徒，那些谈论此处不被认可的某种价值秩序于其中发挥作用的另一个王国的人们，后来在人数上壮大和组织起来，终于有一天他们不仅控制了修道院和牧师，而且也控制了城堡和武装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胸前佩戴着最狂热的权力的象征——神圣宗教法庭。

同样，那些无助的无产阶级，超越了上个世纪悲哀失望的那些有觉悟的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直到

最终有一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他们的党推翻了国王的政府,砍下他的头颅,自己把政府接管在手中,去创造(或至少宣称创造)一种摆脱贫困和焦虑的生活。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开始是他们的敌人,接着是他们的党员,最终是他们的领导人,于寂静的黎明时分陷入令人发抖的恐惧之中,然后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被判处死刑或死在遍布全国各地监管营的冻僵了的荒野之中。

无权者当中那些运用自己的法则梦想拯救世界和将世界(和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从来没有从原先的无权者行使权力中得到救赎。因为一旦他们变得有权,他们将不再清白无辜。当他们开始恐惧丧失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丧失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时,他们将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将会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当然也将从中得到报应。他们不可能摆脱恐惧,他们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

这个世纪的中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欧美地区的人们再次拥有这种愚蠢的幻觉(这次是真诚的),他们正在进入一个被允诺的王国。这种幻觉建立在空洞的假设之上,认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如何给人们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给他们实现尘世梦想的机会而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充分享受生活的馈赠:吃、喝、旅游和生命的全部需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获得任何成功:为一代或两代人所获得的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从人类的角度看,其好处少得可怜,但却付出了难以想像的代价——是对整个这只星球的大肆劫掠和贮存了数百万年能量的滥用。我们几乎无法想像我们为这个幻觉付出的教训。我并不仅仅是指生

态方面所干下的坏事，那是我们孙子的孙子将要全力与之搏斗的（如果他们还幸存的话），也包括其它一些更坏的事情。

在这种把最广泛的力量组织起来“战胜自然”、“扼制它的危害”、促进“进一步发展”或“保卫已取得的成果”的努力中，现代社会已经形成巨大的行政、军事和警察的结构。这些机构用来服务于社会，而公民和每一个个人，正是由他们所委托的权力的来源。开始，人们无疑这样认同。但是接着，这些机构的行为表现得恰恰相反：它们开始为了自身而篡夺攫取，开始损害它们原先来源于其中的人们。当然，也有一些社会，我们所说的这些机构服从某种形式的控制，但在大多数国家中情况不是这样。它们不再是被支配的，而是由它们来支配。不同于早期权力篡夺者的是，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个性。在面对众怨沸腾时它刀枪不入。也许这些权力显得更加隐蔽，更较少公开宣称，但是它却无处不在和不断地增强。那些代表它的人不管是出现在公开场合还是隐匿于其背景之中，重要的是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被更换和取代的：指挥一个火箭师的将领们、多国公司的首脑们、自我委任的党的第一书记或秘密警察的头目。

一次次地看他们在电视屏幕里向我们挥手，觉得和他们所行使的权力相比，过去神赐的法老和皇帝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游戏。然而我们让自己相信，现在的权力只能是这样，他们体现了我们所要去的方向；他们保卫我们的利益，服务于我们的需求，维护我们的安全、进步、富裕，或者任何那些因我们自己的愚蠢所给出的虚假或华而不实的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不再以我们的名义而行动。我们不可能摆脱掉他们。他们既不认同在其之上的神性的力量也不认同在其之下的人民的存在。他们仅仅认同他们自己，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自己的运作法则，他们破坏性地扩张。他们控制着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为他们提供统

治地球的手段,以及毁灭地球的武器。

像我们目睹的那样,前两种可能性已经变为现实,而为了第三项内容,力量正在集结。我们却继续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那样做,因为那将是反对他们自身的行为。

但是每一种弄权的权力结构,每一个决心放弃其人性的凶恶的权威,出于徒劳地渴望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不受限制,渴望神一般的登峰造极,当他们继续其增长、繁荣和膨胀时,总是在玩火自焚。

罗马皇帝、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从维护他们权力的立场看,其所有行为都是自杀性的。那些继续他们工作的人如果不受人类一臂之力或命运之手的限制,几乎不能指望他们能自我遏制。对那些已经将他们本身超出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超出我们的语言、抗辩和威胁的人,我们这些压根儿无权的人能做出什么限制?我们这些除了支配自己的生活、自己灵魂的人能做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生活也被控制在他们手中。

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并且它来自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丧失灵魂的基础上并从中汲取力量。灵魂的阙失维持着和恐惧的联系。那些放弃他们灵魂的人仅仅拥有一个肉体,正是这肉体使他们感到有所害怕。他们担心失去尚存的动物性满足:平静和安宁,物质上的东西,方便、舒适和奢华。那些没有放弃灵魂的人能够克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说到底恐惧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来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和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当然，代表着没有灵魂的权力不可能理解看起来不可思议地走出队列的人的动机。他们猜想后者有着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的目标，他们把这样的行为解释为一个看不见的恶魔的指点，一个撒旦的门徒在其耳边的挑唆，目的是追逐权力。此时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能够明白：那些孤立的反抗者扰乱了恐惧者们的联盟和一致。因此，有权者便动用他们全部的威力和所有他们占有的手段，试图使反抗者回到他们认为反抗者应属的位置上：由恐惧所支配的虚无空洞。

当胡斯站在康斯坦斯的宗教会议面前时，他们并不试图劝说他，也不和他辩论，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要求他放弃信仰。当胡斯在火刑柱上奄奄一息时，他们满足了他最后一个要求。那些拒绝讨论问题或听到任何真理的证据的人，满足了这个要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解救一个无名的神学家的生命吗？完全不是。他们仅仅知道一个放弃了信仰、向恐惧屈服的胡斯，一个重新回到卑微的权力王国的胡斯，将不再对他们有着任何威胁。而一个不这样做的胡斯，不管是活着，还是被烧死，却是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凶恶的统治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所发生的实情，它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人出于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

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

1980年1月

注释：

- ① 沃尔库特(Vorkuta),其详情待查。
- ② 扬·胡斯(1372/1373—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在布拉格任教区长时,讲道用捷克语不用拉丁语。一度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最终被宗教法庭宣布为异端分子被判死刑。
- ③ 布拉格的哲罗姆(约1365—1416),捷克哲学家、神学家,曾与胡斯一起抨击天主教会并为胡斯辩护。结果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
- ④ 卡米拉·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后与丹东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 ⑤ 玛丽亚·安托万内特,其情况不详。
- ⑥ 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曾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定为叛国罪。后因证据不足和多方呼吁,撤销原判。
- ⑦ [原注]我仅仅从实力的立场来探讨。显然,有权者,那些当政者,也做了大量必要的和有用的好事。
- ⑧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苏联短篇小说家,以短篇小说集《骑兵队》出名。1937/1938年被捕,死于西伯利亚。
- ⑨ 奥西普·曼杰斯塔姆(1891—1938),著名的俄罗斯诗人,191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石头》。曾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创立阿克梅诗派。1934年第一次被捕。1938年第二次被捕,死在劳改营中。
- ⑩ 鲍瑞斯·普林纳克,其情况不详。
- ⑪ 科尔比神父(1894—1941)波兰天主教方济各会司铎和宗教组织创建人。因反对纳粹统治波兰,援助犹太人和波兰地下活动,两次被捕,最后押解到奥斯维辛,自愿代替难友受死刑。经过一段时期的饥饿之后,他被注射苯酚致死。
- ⑫ 约瑟夫·恰佩克,为捷克现代著名作家卡莱尔·恰佩克(1890—1938)的哥哥,亦是一位作家和画家,后遭法西斯杀害。
- ⑬ 弗拉蒂斯拉夫·范库拉(1891—1942),捷克医生、小说家,先锋派艺术团体成员。
- ⑭ 卡莱尔·波拉切克,其情况不详。
- ⑮ 阿瓦尔人,其来源和语言还未能确定的一个民族。6—9世纪在东欧起过重要作用。

半先知与卖文人*

○ [匈]杰瑞·格鲁沙 吴 思 译

无论他是普瑞特以东的那处现代类型的先知，还是我们应该说普瑞特以西的出卖文字和故事的人，那种喜欢谈论其完善的文人。他梦想着他的完善，好像那是一座失乐园。不过，自从他开始寻找另一座尘世间的乐园，他的梦想或多或少地总是落空。在我看来，这二者似乎存在着一种联系。

昔日的僧侣或者贵族，也就是今天的这些文人的前辈们，他们写作得更加自然。前者写的是上帝的荣耀，后者写的是自身的经历和爱好。而我们这些稳健的中产阶级的儿女呢，写的是自我实现。

我们顽固地相信，在我们心中必定存在着一些好东西，需要做的只是将它展现出来。我们常说，只要有心就行。在这种信念的熏陶下，我们屈从于两个世纪以来的割裂分解的方式，并且想方设法地炮制每一索然无味的碎片。我们偏爱具有自我实现味道的预言，这种偏好体现为对革新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过去就在习以为常中被现在所摧毁，我们也开始兴建那种华丽大胆的新世界，就好像兴建一条伸向未来的宽广大道。

我们命中注定只能当一种净化了的大都市的先知，在这样的大都市里，最终将获得自由的人们按各自的心愿生活。

* 半先知，ex-prophets，直译为前先知，即从前的先知或产生先知的一个有先知倾向的群体。中文无适当称谓，姑且译为“半先知”。——译注

当然了，这些人会由我们这类人物构成，天生具备能够乐此不疲地写作永无止境的自我实现的故事的心灵。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大都市更像是一所兵营，而且人们越来越少地需要我们的辛劳，这样的大都市也越来越飘渺，于是，我们清醒起来。尤其是在普瑞特以东的土地上，如今你只能在那里找到一些半先知了。

在那个维也纳大游乐园以西，我们仍然缺乏这份清醒，但是我们在家里对此做了补偿。他们发现了一副极好的安慰剂：他们需要我们的文字，不过他们需要它仅仅是把它们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于是我们也成了半先知，而且不知不觉地成了诚实无欺的半先知。走到那个舞台上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跋涉的。渴求已久的完善与自我实现的神话之间怎么也差上一截。

在把故事当作商品出售的地方，我们怀念那先知的时代，它在我们眼中就好像是完善的天堂。我们这些像供货一样供应文字的人，把嫉妒的目光投向我们东方的兄弟们，可是这导致了误解。因为我们东方的兄弟的那些先知的特点恰恰又自相矛盾地是热情的反预言的特点。不要被他们偶尔做出的过于夸张的姿态和雕琢的怪异措词所欺骗。不要被他们的个人生活故事所欺骗，尽管这些故事讲得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文学想像和商品世界的孪生的虚假的神灵，充满了创造性和首创精神，简直无与伦比。那些东方的确实恰恰表明了西方文学模式中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的普遍性。他们使我们记起了我们已经了解的或能够发现的东西，只要我们肯费心探究一下我们写出来的作品，包括那些罕为人知的作品。

像我这样的既了解半先知世界，又了解文字贩子世界的人，常常自认为最优越的西方忽视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在西方，写作似乎天然地与体面和完善连在一起了。

一个从先知梦中醒来的人可以成为由热情逐渐变冷的传道者，但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在西方世界偶然可以见到的那种才华横溢的大评论家。产生评论家的世界是一个安全保险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所有奇怪的故事、突然和意外都被视为灾祸。很容易理解，在这种好故事稀缺的地方自然会产生出对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进行评论的需求。说到这里我们又可以恢复一些昔日的自傲了。

即使那些半先知们，如今也很可以理解为一再试图在市场上出售故事（通常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恰巧由于太真实的缘故，这个故事在市场上不怎么成功，他们便骂起来（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说西方腐朽，是方向错误。他们傲慢，自视过高，同时也深知写作中的阴暗的一面。不过，当我们谈论起写作的完善的时候，还是不应忘记他们的经验。

当谈到流亡文学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西方（这里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因此也包括了东方）的文人们，他们是那些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们所持有的见解的教父。当谈到审查制度的时候，我们也绝不应该忘记，正是我们这些人赞美了国家，首先把它作为一切神圣之物的具体体现，继而又把它当成所有福利的终极源泉。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该大惊小怪，怪它在我们提笔之前就对我们写的东西感兴趣。当谈到文学的灵魂，它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自我实现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一个灵魂自我。而自我的原则正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扩展。难怪我们的作品进入教科书时总引起“噢，幸福快乐……”之类的感受了。当我们详细地讨论少数派权利的问题时，绝不应该忘记我们心中潜藏的对所有多数的轻蔑，我们对大众的挑衅和辱骂，我们那种关于多数究竟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数值而已的理论。最后，当我们谈起与历史相连的权利的时候，绝不应该

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爱国主义颂歌在欧洲各国所有的学校教科书中随处可见，那些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历史的作品在欧洲大陆的悲剧性灾难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的话有些夸大。我知道确实有许多人，他们不断地与独创性和创造力的无限性的幻想抗争，他们实现了比他们的自我更多的东西。

然而，今天我所谈论的不是这些人。我一直想唤起某种怀疑精神，一种必不可少的怀疑态度，当我们翻阅我们的那部被我们称为进步的喜剧性的最受偏爱的书时，怀疑精神应该是大有用处的。这是我们先知们居住的田野和林间空地传来的启示。为了得到这种怀疑精神，我们或许该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些基本的条件（感谢上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能够欣赏一个故事，不至于把讲故事的人作为祭品献给了一些血淋淋的部落神明），以使半先知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被遗弃，沉没在他们的孤独寂寞的教区中。

（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位反预言的伟大先知，
无法亲临布达佩斯发表这个讲话的会场）

○ 罗新璋 译

龚古尔日记

《龚古尔日记》，是我们了解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情况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价值远在龚古尔兄弟所写的小说之上。日记起自 1851 年 12 月 3 日拿破仑第三称帝之日，前期日记，包括这里所选二则，为茹尔（1830—1870）执笔。当天事当天记，至迟到第二天早晨，凡经过的事，遇有可写，随即记下，“把谈话中正在逝去而又令人感兴趣的一切采集拢来”。茹尔早逝，由其兄埃德蒙（1822—1896）一直记到 1896 年 7 月 3 日，他逝世前 12 天为止。早期日记，记有大量与时人交往的趣闻逸事，颇有“笔记小说”意味。今选两则，以飨读者。

——译者

1865 年 5 月 25 日

我们一行人，赴特丽亚农^①，与玛梯儿特公主共进午餐。生活真怪矣哉。我们为去寻觅玛丽—安朵纳德的遗踪，不想会在于贝·罗培^②为皇后擘划的茅舍别墅里，与拿破仑亲属^③同桌共餐。

傍晚——饭局收场，上甜食的时候，话题转到恋情、幽期、追求等方面。事实上，只此题目，公主才感兴趣，才愿说话。她一一问过来，各人从相好处最愿得到什么纪念物。一个说，一封信；一个说，一朵花；另一个说，一只鞋子，一绺秀发。问到我，豁出去了：“一个小囡！”就为这句话，我差点给扔出窗外去。

于是，阿莫利—杜瓦尔开始说话，一边眨眼睛，他讲起这类事总这样，说他从喜欢的女人那儿，特别想得到一只手套，得到她手的模样和造型，勾画出她的纤纤细指。“你们不懂，”他接着说，“跳舞时问她要手套遭到拒绝是怎么回事。事后，过了一个钟头，她坐上钢琴，脱下手套想弹点什么，你眼巴巴盯着那手套；她弹毕起身，把两只手套都留在那儿。你不愿就去拿。到分手时刻，她走回去取走一只。啊，看到这暗示，你还不够高兴吗，真是艳福不浅！”他讲这类琐事，特别风趣。

弗罗蒙丹^④是论艺谈美的高手。与他长谈之后，我觉得，

- ① 特丽亚农为附属凡尔赛宫的庭院建筑，分大小两馆，此处指小特丽亚农，路易十六（1750—1793）登基后赐其皇后玛丽—安朵纳德。
- ② 于贝·罗培为法国画家，于1783—1786年间为玛丽—安朵纳德在小特丽亚农置茅舍、水坞、磨坊、牛棚等。花柳园亭，颇具农舍风光之胜。
- ③ 玛梯儿特公主（1820—1904）为拿破仑侄女，其沙龙接纳社会名流、文士画家，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名重一时。
- ④ 弗罗蒙丹（1820—1876），法国作家兼画家，早年把自己初恋失败敷衍成自传体小说《多米尼克》，被评论家誉为抒情杰作。

在画家中犹有最后的神学家。

讲到他自己,说来奇怪,他说他对绘画术语一窍不通,即使为逼使自己好好观察,他也从来不照实物写生,不画速写。无论作画为文,都是事过几年后才着笔的。他的书《撒哈拉》和《萨赫勒》^①是旧景重现时再提笔写的,从前好像并未看到,故所以——真实而不准确。举例来说,酋长带着狗群穿行沙漠一节,他亲眼看到过,但跟游记里写的,又完全不同。

他还说:他的大不幸,也即当今所有画家的大不幸,是没有生于一个伟大的绘画时期,一个擅作鸿制杰构的时代。还流露出一点遗憾:自己在绘画方面没有根,没有在范·台尔·牟伦^②辈的画室当过助手。

——译自摩纳哥国家印刷局 1956 年版《莫古尔日记》第 7 卷 86—87 页

1866 年 2 月 25 日

我们周围的芸芸众生,都全身心地生活在当今世界。而我们的全部生活,通过写书,收集藏品,怀着心比天高的抱负,却指向未来。

咖啡馆的侍者,真是石雕的 *nil admirari*〔见怪不怪〕化身。耶稣的光环把食客的脑袋箍痛,或神仙的绝招把女子的裙袍掀走,他会照旧服侍那女子,好像她仍穿得好端端的,好

① 弗罗蒙丹,作为风景画家,曾多次去北非(1846、1848、1852),其《撒哈拉之夏》(1857)和《萨赫勒一年》(1858),是回忆旧游之作,深得乔治桑、米什莱、圣勃南的赞赏。

② 范·台尔·牟伦(1632—1690),为佛兰德画家,后入法国籍,善绘宏伟的战争场面。

像那食客不是天主。

多大的讽刺呀！天才和智者，一辈子都在为广大公众呕心沥血，同时打心底里瞧不起公众中的一个笨伯！

今晚，有位小姐告诉我，她写日记写写停住了，怕跟自己谈心谈惯了而一发不可收拾。于此足见女人气；怕挖掘自己，看清自己。

有头脑的性情中人，自己却生活得很少！看丹纳，9点睡，7点起，写到中午，恪守内地人的钟点吃饭，再外出参观，上图书馆，晚上消磨在母亲与钢琴之间。福楼拜像给拴在了苦役监或地牢里。再说我们自己，整天关着酝酿，无家室的欢娱或社交的打扰，除了隔半个月赴公主府吃一顿饭，偶尔像疯子般去逛逛赛纳河畔的古玩铺，纯粹出于对书画的癖好。

要多少平庸之徒，无能之辈，拉成一条阵线，才推得出一个邦萨^①与雨果抗衡，一个弗朗特林与德康^②较量！

少少这个修饰词，就是作家的签名，印章。

对我们的妒意想必已酝酿久久，才会这样爆发出来！但嫉妒我们什么呢？实在说来，我们两人身上只有两点值得羡慕，但对眼红我们的人又完全用不着：我们的友爱和我们的信誉。

——译自摩纳哥国家印刷局 1956 年版《莫古尔日记》

第 7 卷第 168—169 页

① 1843 年，雨果最后一部浪漫剧《城堡里的伯爵》刚降下失败的幕布，邦萨恢复古典悲剧精神的《吕克雷斯》已拉开成功的帷幕。

② 德康(1803—1860)，为法国风景画家，用色热烈，富有东方情调；宗教画家弗朗特林(1809—1864)，则代表严正的学院主义。

[美]尤金·麦锡文 程映虹 译

宿命的召唤



新人已经诞生，其数量正在成倍地增长。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象征。六年前我们还对他们一无所知，三年前还对他们投以嘲弄和蔑视。但眼下人们如何看他们并不重要。在数年之后——只需要短短的数年——人们就将乞求他们：拯救我们吧！那时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奉若神明。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苏维埃历史学家称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伟大的先驱”。这个比马克思晚十年出生的俄国正教教士的儿子，当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时，就认为自己注定会出类拔萃。他的修道院同学和教师都视他为东正教会的未来之星。是的，这的确可能。16岁时就懂拉丁、希腊、希伯来、法、德、英和波兰文，圣经、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其它宗教文献更在其心中刻下了特殊的印记。他憧憬着千年王国，深信希伯来先知所预言的“山谷中将如涌泉般溢满美酒”的那一天很快会到来。

宗教文献的熏陶和修道院的经历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一种强烈的自命不凡和妄自尊大感。但献身于神学并不能满足其救世的志向。1846年他18岁时放弃了修士的前途，前往圣彼得堡大学，并短暂地当过一段时间的高中教师。20岁的时候，在日记中他已经把自己描绘成未来极左翼的领袖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坚定的雅各宾主义者，倾心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实行“专政”。他还在日记中写下了“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不可抑制的渴望”以及用秘密出版物去煽动反叛的梦想。三年后，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已足以编撰一部包揽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还没有人做过我想要做的。在未来的世纪中，我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教师。”

这个年轻的自命的弥赛亚（救世主）很快就被俄国著名的文学刊物《当代人》所吸引。它由普希金于1837年创办，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已拥有在当时令人自豪的每期6000份的发行量。激进诗人涅克拉索夫担任其编辑，刊发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及其它俄国文学这一丰收时期的作家的作品。1853年，涅克拉索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评论和文

章，而后者则改变了刊物的方向，把它变成了激进主义的灯塔。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虽然还只有20多岁——已经成为俄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和文学评论家，知识界的思想向导。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中渗透着对自由主义者的愤恨和嘲讽，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只有一种绝对的解决办法：“非此即彼，没有中间道路。”这成为了他的心理特征，一种唯物论者、实证论者、决定论者的气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和互助合作的观点来自傅立叶、欧文和路易·勃朗。他崇拜罗伯斯庇尔和密谋家布朗基。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封信署名为“一个俄国人”的信刊发在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革命杂志《钟声》上。这是他第一次在不受沙皇审查制度束缚的刊物上自由地吐露心声。他的激进主张从根本上震撼了俄国的年轻一代。他要赫尔岑停止对沙皇的颂扬并抛弃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幻想。他把自由派地主、教授及作家和沙皇专制主义者一视同仁。他为沙皇尼古拉一世——一个极端反动的专制君主——的死感到惋惜，因为“在他的统治下革命的要求将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而在比较自由开明的亚历山大治下——他已开始改革农奴制——和平改革的希望已经出现，充满人们心灵的是一种为耐心和温和所寻找的荒谬的托词，这巩固了对专制君主的善意的白痴般的幻想。因此，和平改革推迟了革命的到来，而只有暴力才能去除国家的污垢。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真正的革命家确定了一种典型的立场，列宁曾一再地引用：“压迫越残酷，对我们就越有利”或“越坏就越好”。在他信的结尾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巴贝夫式的呼吁：“我们的处境已变得不能忍受……只有斧钺能拯救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斧钺！让你的《钟声》不再为祈祷而鸣，而像警钟那样敲响吧！去召唤俄国

举起斧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激发了他的一个年轻信徒扎切涅夫斯基，他写了一份宣言概括其精神导师的主张。这份题为“青年俄罗斯”的宣言 1862 年 5 月以“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它是俄国从未有过的——份最嗜血的宣言：

一当我们擎起未来的红色的大旗，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战斗的口号，向着冬宫行进并无情地消灭那里的每一个人时，盼望已久的那一天就将来到。……对于我们的力量、对于人民给予我们神圣事业的支持以及对于俄罗斯光荣的未来我们充满信念，这种信念将使我们注定要成为第一个去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人……

我们深信准备夺权的革命党必须保持目前这种中央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建立基础。这个组织必须通过专政和独裁去组织政府并不能有片刻的停顿。国民议会的选举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举行以确保其中没有留恋旧制度的人，任何这样的人甚至不应该在新制度下还有生存的余地。

我们必须比 1792 年法国革命中那些伟大的恐怖主义者更坚定不移。即使推翻旧制度所导致的流血两倍于雅各宾党人，我们也决不手软……我们将像一个人那样地呼喊：“拿起斧钺！”我们对君主制的支持者的进攻将比目前他们施诸我们的更无情；我们将在广场上宰杀他们，如果这些猪猡敢于在那里出现的话。他们的房屋、村镇、狭窄的小街和首都的通衢大道都将变成他们的屠场。记住：不和我们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们，而反对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必须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去消灭。

俄罗斯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

.....

(1862年《当代人》杂志被暂停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入狱)在被囚禁于彼得和保罗要塞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部小说作为对屠格涅夫的回答，因为激进分子认为屠格涅夫所塑造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是对于新一代革命者的歪曲。这部小说就是《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它匿名发表于1863年复刊后的《当代人》杂志。

俄国的激进主义——甚至世界的激进主义运动——从此便截然不同了。这部小说使整整三代俄国激进主义者感到战栗般的兴奋和鼓舞，并使得成百上千的青年加入了革命教士的行列，以致于在当时帝俄警察局例行的讯问记录中总是有这样一条：“在××年我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后成为了一个革命者。”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我们还将看到他也间接地对世界革命产生了影响。作为文学来说，《怎么办？》一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其它作品那样沉重而单调，但作为一种对被启示和预言了的革命的前瞻，它对那些懂得如何从那些密码般晦涩的语言中破译出革命内容的读者具有神奇的感染力。对于这些读者来说，这部小说描绘了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人格类型及其角色——“新人”或“职业革命家”，它为成百上千——有朝一日将以百万计——的革命信徒塑造和铸压出了一个模式。

《怎么办？》是俄国文学中第一部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作品——俄国的第一个乌托邦梦想。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便将是引导这个梦幻的革命家：

这样的人数量不多，但他们却能使人类生活如鲜花一样繁盛。而没有他们，人们的生活将被窒息。他们是万物的精华，有如美酒中的醇香。他们带来了力量和原创

性。他们是社会中坚,是所有动力中的原动力。诚实的人和好人到处都有,但我说的这一种却是最罕有和珍贵的。

强有力的个人对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个性左右事件的演变,加速它的进程,把组织和秩序注入由群众运动所激起的无序和混乱。新人已经诞生,其数量正在成倍增长。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象征。六年前我们还对他们一无所知,三年前还对他们投以嘲弄和蔑视。但眼下人们如何看他们并不重要。在数年之后——只需要短短的数年——人们就将乞求他们:拯救我们吧!那时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所有的人奉若神明。

在这些文字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擅长的伊索寓言般的隐喻已完全不能掩蔽其真意——这正是对那些年轻读者的召唤。“新人!”一批罕有的领导精英,他们将如摩西一样带领上帝的选民走出荒野来到允诺中的那片乐园!现代的弥赛亚(救世主)!像罗伯斯庇尔和布朗基那样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偶像化了的人!

《怎么办?》的主角是拉赫米诺夫,为了给投身于崇高的事业作好准备,他有意识地使自己过着一种禁欲的甚至连必需的生活用品都十分匮乏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愚弄沙皇检查官,故意不说清楚究竟什么是“崇高的事业”,但他的读者都十分清楚,那就是革命,一个新的社会,在其中人人都完全地自由。我们可以在许多细节中看到这个狂热地献身于未来的人:他可以连续阅读72个小时,在前两夜用意志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在第三夜则用八杯浓咖啡支撑自己。他卧在钉子上睡觉以使自己变得更坚忍。他准确地按着时间表生活,因而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和帮助别人。他使自己的生理、道德和精神生活都严格地遵循自己定下的铁律,只有当他在研究人

的时候才作出一些变通。生牛排是他的主要肉食，而它则使他的身体更强壮（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得自费尔巴哈的结论，费尔巴哈曾用一个警句来概括他那夸张的唯物主义：“人就是他所吃的那种东西”）。拉赫米诺夫为了解俄罗斯而云游四方，一会儿是农夫，一会儿又变成木匠，在伏尔加河上曾加入过纤夫的行列，而他们不但对他非常敬畏而且在他消失后仍流传着他的故事。有一次他还出现在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的陋屋中：“我有三万个塔勒，但我只需要五千个，我求你收下其余的。”“为什么？”贫穷的哲学家吃了一惊。“用它来出版你的书吧。”拉赫米诺夫答道。

.....

《怎么办？》成为俄国年轻激进主义者的《圣经》。它是所有地下图书馆和阅读活动中的必读书。很多作者用书中英雄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一些对话成为了道德律令，例如：“我将拒绝任何普通人所得不到的食物。我需要这么做是因为我想去体会——哪怕在一个微不足道的方面——他们的生活和我的相比是多么地贫乏。”.....

车尔尼雪夫斯基青少年时期在修道院生活中所萌发的那种想要成为传播福音的不朽的圣徒的渴望成为他毕生的宿命的召唤。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前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的妻子写道：“我们的生活属于历史。千百年将过去，我们的名字依然会被人们所牢记。当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离开人世间很久很久以后，他们仍将感激地追忆着我们。”他曾经骄傲地告诉一个沙皇的官吏他的名字将同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一起活在俄罗斯文学中。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和保罗要塞中搁下他的笔时，他所要做的都已经做了。1864年他被判处“象征性的死刑”和七年苦役，直到1883年才被允许回到俄罗斯的欧洲地区。

1889年临死前，他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他的一个18岁的崇拜者向他表示的敬意。这个小青年早已读过他的小说并决定把“革命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选择。这个男孩由于没有收到心目中偶像的回信而十分痛苦，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毕生志向。13年以后，这个小青年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没有任何职业，政治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此刻他用同一个“怎么办？”作为他的一篇论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培养和训练这种职业的政治人的文章的题目。当时在俄国以外他还默默无闻，而今天整个世界都知道他为自己投身革命所取的名字：列宁。

摘译自[美]尤金·麦锡文：《激进主义的兴起》中第三章“俄国的雅各宾党人”，略有删节，标题为译者所加。

（出版社及年代：Arlington House, New Rochelle, N.Y. 1973）



作家论(二篇)

○ [英]福斯特 李向东 译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乔治的独创性在这个国度已得到承认，他的集流丽与严峻于一体的独特风格受到欣赏，但一种避之则吉的倾向仍存在。在我们接受其最得意的大作《1984年》时，这种忌避心理很明显地流露出来。美国人出于其杞人忧天的本性，对这本书热情有加，但我们对未来没那么忧心，或者说是欠缺对未来的洞察力，便因了各种理由而嫌弃这本书。或指责它太布尔乔亚化，或指责它对左翼不留情面，或指责它不应该转投左翼，或指责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学术著作，或指责它令人厌烦，之所以令人厌烦是由于作者和济慈一样是个癆病患者；总而言之，讨厌。这最后的理由是一个大可尊敬的理由。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利逃避不开心的事，我们一定不乏机会行使这一权利。这可能是我们抵御自寻烦恼的唯一手段。奥威尔就可说是一个最难甩掉的烦人家伙。他眼见世界太多令人不快之事，而希望改变这世界，在《1984年》中，他把不愉快推到了痛苦的极端。在他描写的那个可憎的启示录般的世界中，没有一个怪物不是现实世界中已具雏形的。藏在联合国后面的是大洋国，三大世界邦国之一。藏在斯大林身后的是“大佬”，两者看起来最贴切，但“大佬”也同样隐藏在丘吉尔、杜鲁门、甘地，以及所有利用宣传或为宣传所利用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后。隐藏在“邪恶”的北朝鲜和“英雄”的南朝鲜后面

的是邪恶的南朝鲜和英雄的北朝鲜，在万花镜般的变幻中它们可以互相对调角色。奥威尔付出生命去透视未来，并在其萌芽上打上标记。这是他的强项。《1984年》是其作品之冠，当然，一望可知它是一顶荆冠。

在一边打标记时，他一边注视四周，试图改良这个注定走向不幸的世界。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只希望去帮助弱小者。宏大的改造计划只意味着有组织的大屠杀。照料一下玫瑰、照料癞蛤蟆，如果你认为文学艺术有意义的话，也不妨照料一下文学和艺术。我们破碎的救济就存在于这些徒劳的努力之中。

如果一个人对春来春去无动于衷，终日悠闲的乌托邦对他又有何欢乐可言呢……我想，人须怀着对绿树、鱼儿、蝴蝶和……癞蛤蟆的童稚之爱，才多少有点可能去建造一个欢乐宜人的未来。如果只靠推崇钢筋、水泥的说教，人只会越来越相信，除了憎恨和个人崇拜之外，人类就没有渠道可以发泄他多余的精力。

上面引自他死后汇编的散文集：《射象》。这里再从中引用一段：

如果你想为充溢于今日世界的恶意之渊再加一滴毒汁的话，再没有什么比安排一季由犹太人队对阿拉伯人队，德国队对捷克队……每场比赛都有十万人的双方球迷混座观看的球赛更容易的了。

如果只限于个人玩玩的话，球赛绝无害处，即使有点出猫作假也是无大碍的。然而国际体育比赛的场合，就能闹出

个地覆天翻。首先是那些参加比赛的蠢汉，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体育可以推进理解，其次，藉此妄求政治虚荣或藉此赚钱的现代的欲望也从中插进一手，这就成了大为有害的事了。奥威尔也一般性地思考了民族主义这一问题。大不列颠帝国主义是罪恶，正如他自己在缅甸亲身体会过的那样。但它比起那些后来居上的新兴帝国主义来说却略逊一筹。所有的国家都可恶，但其中一些与别的比较可恶的程度相对小一点。通过这样一条坎坷的、绝不令人愉快的途径，他得出了爱国主义的结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抵达爱国主义的一条最清白的途径。谁信仰玫瑰、癞蛤蟆、艺术，对救世信仰或其残碎破片略有所闻，就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爱国主义。在政治的世界里我们看不到获救的可能，我们不会轻易受骗，但我们同意两害相权择其轻，并由此成为爱国者，同时仍保持我们心灵和思想的自由不受其束缚。

这是一个沉重的结论。读奥威尔的书你不必指望能心情轻松。就像一个人温情地去拥抱玫瑰而会被它尖利地扎一下。它们打消人们对于未来社会的一厢情愿的信仰——所谓各适其适，相亲相爱，虽然明知你我均无缘亲睹——奥威尔的书不鼓励这种神秘见解。难怪他与H·G·威尔斯话不投机。他所想表达的，以及有时令他不免过于偏激的，是他对肌肤相亲的琐细事物的信仰，对人类友善、宽以待人和实事求是等品格的信仰。他也信仰民众，这些民众即使在较上等的人物被铲除之后，仍照样以其肌肉强健的手臂叉着腰，喝着洋菜汤生存下去。他没有详细说明民众为何是希望所在，也可能他只是错把信仰和同情混为一谈了。

奥威尔对散文的纯洁性怀着极大的热诚，在一篇随笔中他含泪对同时代人的一些文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是一件危险的事——被攻击者可能会以牙还牙——但它值得冒风

险去做,因为,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他主张说,自由和散文是不可分割的。想扼杀自由的官吏总是言语混乱文字不通,用的词句不是矫揉造作就是搅缠不清,或者用一种杂交的官用语言,掩盖了其真意乃至全无意义。警戒这些词句,一发现就把它们批个体无完肤,是每个市民的责任,尤其是身体力行的传媒工作者的责任。几年前,在所谓“瓶颈争论”上我们打过漂亮的一仗。自从“相互依存的瓶颈的恶性循环”这一名句被泰晤士报狠狠地抨击过之后,没有一个瓶颈再敢冒头。除奥威尔以外,尚有很多批评家为捍卫散文的纯洁而战,嘲笑官样文章,但他们多限于即席讽刺或从审美见地上加以批评。奥威尔的独特在于他极为严肃地讨论这一问题,且把思想自由和好散文联系起来。像我们中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给自由下一个定义,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在我们这里比在斯大林的苏联和弗朗哥的西班牙要自由得多,而若想延续民族的传统,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如果我们言语文字明晰,我们就更便于明晰地思考及保持相对的自由。奥威尔写下了关于使写作明了的六条规则,它们颇言之成理。

《射象》是奥威尔死后搜罗編集起来的,这样的集子当然很少会是前后首尾一贯的,它可视为是为奥威尔其它著述作注解的集成之作。读者可以去探寻到其中的文章与《动物农场》、《1984年》、《往威根埠之路》或《缅甸岁月》等的亲缘关系。读者也可以看出他的发展。早期的作品(例如那些命题随笔)有力但失之于平直,它们没有引起反响。后期的作品,尤其是他埋头于政治问题之后,点缀有更多富于创意的片段。我们失去了一位同行友人,他决心看看自己在这个自相矛盾的和不平静的世界上能做些什么,并追寻其意义直到迷

茫莫测之境,或至少追随它转过前面的拐角。

(1950)

次最伟大小说 Our Second Greatest Novel?

大多数人都承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西方文明孕育出的最伟大的小说。那么,次最伟大的小说是哪一部呢?我推许马歇尔·普鲁斯特的《往事的回忆》。

普鲁斯特是医生之子。他有犹太人血统,他成为又一个例证,证明这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世界的馈赠。他 1871 年出生于法国乡下,因他的缘故,这个名为康柏莱的地方成为乐园而名垂不朽。他后来赴花都巴黎,进入文学圈和上流人社会,就像但丁令地狱名垂不朽一样,普鲁斯特也令巴黎名垂不朽了。他健康不佳,而他甚至令疾病也名垂不朽了。他日渐从社交圈隐退,日睡夜起,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埋头写作,靠记忆之助,奋力把其感性和经验的灵息吹入艺术作品中。他终获成功。由此结晶而成的巨著虽不如《战争与和平》那样温煦博爱、富于英雄气概和气魄宏大,却在艺术成就上更胜一筹。它充满了回声、锐敏的回忆和知性的平行描写,它令细心的读者愉悦,而在结尾,甚至无须等到结尾,小说展示出的所有的回声和伏线都自然而然地归列于巨大圣殿的内部。他成功地展示出,我们初读之下散漫无章的小说,自有其建筑上的浑然一体和预定的形式。

小说的第一卷出版于 1913 年,共有七大卷,可说是七部亚小说,共同的人物出现于其中,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普鲁斯特等不及其大作全部出版便撒手人寰。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在作口述,与高热搏斗,除了加冰啤酒之外拒绝任

何食物。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而是艺术,生活于他殊少惬意之处,唯艺术才从生活中创造出一点意义来。在他的最后一日,那是在1922年11月,凌晨三点他召来秘书,口述意旨高贵的一段,他谈到小说家在其小说中应尽的义务,乃是置其基础于仿如天授的神律、道德和祭献之上。由于竭力口述文章,他肺叶中的溃疡迸裂,就此死去。普鲁斯特既不迷人也不健康,但他创造了可能是次最伟大的欧洲小说,他把颇有点乏味的字眼“艺术”抬升到如此重要崇高之地位,令我们不能再轻而蔑之。

小说通过叙事者之口讲述出来,这个叙事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多少令人想起普鲁斯特本人。他在母亲和祖母的羽翼下长大,她们是书中表现出完整人性的仅有角色;之后主人公离开康柏莱去到充满魅力的淫荡的巴黎;他走进贵族社会而初尝幻灭;他堕入爱河,再次体验到幻灭;他患病,同时早熟地懂得了,他的世界已过早地衰老但仍不失为一个魅惑的观察对象。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在书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往事,而是对于往事的回忆。悲惨的欢谐的往事纷至沓来,它们只在叙事者的冥想中最终定型。小说的名字不是“往事”而是《往事的回忆》,虽然它是写实主义的,它的写实性被包裹于白日梦中。它随时光演绎,重复同样的轶事、同样的角色而达至新的结局。它不断抽换环绕着人生的种种变数,从这个角度或那个角度透视人生。

文特尔的音乐中的著名的“小乐段”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个“小乐段”有如故事中的角色,在每个新章节中一再现身。我们在丑恶的环境中初闻文特尔的名字,他作为一个乡村的管风琴手而死于默默无闻,他的女儿使他死后的声名更为不堪。那一恐怖场面沿多个方向辐射,在普鲁斯特笔下

任何事物均会辐射。良久以后，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在巴黎上演，从缓慢拖沓的旋律里一个小乐段探出头来揪住了斯旺的耳朵，潜入了他的生活。斯旺正与一个无价值的名叫奥迪娣的家伙堕入爱河，小乐段参与了他的热恋。那场情事和普鲁斯特笔下的其它杂事一样中途夭折，小乐段也被遗忘。之后，当斯旺被忌妒折磨时，它又突然进出，带着它全部的神性，即时融入化为他的悲伤和失去了的幸福的一部分。这小提琴奏鸣曲是谁作曲的呢？听到是文特尔作曲时斯旺想：“嗯，我曾认识一个潦倒的管风琴手叫这个名字，但不可能是那家伙。”但原来确是那家伙，他的女儿那么臭名彰著，却虔诚地誊写了父亲的作品将之出版。她的性格包含许多侧面，正如普鲁斯特笔下其它众多的性格。

于是乎，小乐段再次横贯书中，恍若回声轰响。然后几百页、正确地说几千页翻过去之后，文特尔成了国人之光荣，人们说要在令他当年穷困潦倒而且声名狼藉的小城为其立雕像，他的另一部作品，死后遗作的弦乐七重奏也上演了。主人公倾听这部七重奏，他置身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悲凉世界里，突然之间，出乎主人公意料，也出乎读者的意料，奏鸣曲的“小乐段”再次重现，似曾相识又有所变化，但予人完全无误的指向，于是主人公重回到他幼年时的村庄，注意到他过去不曾注意的事物。它给记忆以当头棒喝，这些冲击以及随之而起的情感变化正是普鲁斯特主要的关心所在。

前述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叙事者与主人公的身上有普鲁斯特的影子，而第二个观点稍为复杂，因为它带我们走入普鲁斯特的核心问题，即：普鲁斯特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关心事件和人，他关心的是事件和人的回忆，而这导致他的小说时常带有一种白日梦的性质，在书中日常绵延的时间被中断和插乱。我的第三个观点，也是相当大胆超前的观点，涉及社会

场景。普鲁斯特华丽而辛辣地描绘了四五十年前法国贵族社会的风景。这些贵族拥有财富和风度,却毫无责任感,缺乏与土地的联系,同时除了自命比其他入高贵之外对别的一切都全无信仰。普鲁斯特看穿它但又匍匐于它。他既是讽刺家又是大俗人。他另外还描绘了一幅关于中产阶级的图景,却不那么让人信服,这些中产阶级随着故事的推进强使自己沿着社会构造向上爬,被格式化为讨厌的新贵老爷太太。工人阶级也以仆役和寄生虫的形象登场,普鲁斯特对两者都不怀好意地去描写。他唯一带尊敬地描写的只有主人公的母亲和祖母,不求名利和不涉卑污的女人,以及像普鲁斯特自己那样的艺术家:努力直视令人沮丧的世相,给它合乎逻辑的下场以及赋予它自身生命中从不曾具有的美。

观点之四:普鲁斯特的人物描写手腕高超。我们和他笔下的人物共同生活,我们看见他们成长,他们的行动匪夷所思,但稍后我们会获悉原因。他们自相矛盾,那使他们更为逼真。这里是人物肖像的巨大画廊,格尔曼娣斯之流高高在上的公爵夫人在其间占优势,但潦倒人物如查尔鲁斯男爵之流也叨陪末列。尽管有些人物仅出现几分钟,我们就已了解了他们,当数百页之后他们重现时我们会认出他们。书中角色常彼此堕入爱河,这也许引出我的第五个观点,我必须绕到这里来谈谈普鲁斯特的爱情观,那是一个我很难认同的阴暗理论。普鲁斯特认为,甚至近乎信仰:人陷入爱网越深,越相互误解,因此激情的序幕之后注定是相互憎恶的登场。他还认为,妒忌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到来意味着爱情的苏生,非如此它必已幸运地死去。小说后半部的冗长说教把笔墨花费在主人公与阿尔伯泰因之间的事务,读来郁闷,大多数人跳读不读。

要读懂普鲁斯特,重要的是能忍耐且够知性。他决不屈

尊向蠢人让步。不少作家,包括伟大作家都会让步,狄更斯会让步,托尔斯泰也会,但普鲁斯特决不让步。他要求不懈的注意力,包括心智方面的和感性方面的注意力。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个病弱者,他有点傲慢,他属于一个颓亡中的社会,而且他对社会改革毫无兴趣。我居然敢推举出这样一位人物说他创造了欧罗巴次最伟大的小说?是的,我敢。因为我相信他那一门艺术不会被抛弃。暴力无法摧毁它,嘲讽也不能使它渺小。它立足于人类的高尚本性,这种高尚非道德意义上的高尚可以衡量,它达到成就之巅,给我们理由去怀抱希望。普鲁斯特是艺术家,而且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发明了以回想的方式去翻译及人化这个混乱的世界,其结晶便是《往事的回忆》这本书。

(1943)



编 后

在知识界,几年来,有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和自由主义的阐扬。作为精神现象,无论中断或赓续,在世纪末中国的凸现,都是很有意义的。

散文——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不仅仅是思想的载体,就其本体意义而言,无疑是最富于自由的人文气质的。但是,索诸创作界,实际情形如何呢?唯见论客大噪,标榜所谓“大散文”。其实散文并无大小、倘要说“大”,亦非关题材,非关结构,非关滔滔乎滥情之言;在此,首要须得有大精神。何谓大精神?恐怕除了如宗教家的终极关怀者外,仍须具有如战斗者的现实关怀。作者当置身于时代的变革之中,担当公民的命运,感受大众的悲欢;有不平,有追索,有发现,有超越。散文创作,无论是生命的部分或全副,都是有着现代人的强烈的脉动的。不然,即令“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果然无所不包,也将无改于老旧的“小摆设”。

抱着对具有现代品格的作家和作品的期待,我们于是编辑:《散文与人》。

我们曾经以“拾柴人”自诩,五年来,确也积聚了若干柴薪,断断续续出版过六个集子,算是燃起了六堆小小的篝火罢。但接着,便告烟消火熄。就在我们搓着双手,彼此吹送“热风”的时候,三联书店为我们提供了生火的机会。也许应该说,得到援助的不仅仅是一种丛刊,更重要的是一种道义,一种精神。

当此火光重现之际,感慨与欣慰之情是难以言说的。

编者

于 1998 年 4 月

出版者的话

这是著名作家邵燕祥、林贤治主编的《散文与人》新一卷，由三联书店出版。从 1999 年起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卷推出。

本丛刊著译并重，每期篇幅 25 万字以内。

我们期望得到文艺、文化、理论各界及广大高校师生的关注与支持。来稿请寄：北京美术馆东街 22 号三联书店《散文与人》（邮编 100010）。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宿命的召唤

作者 =

页数 = 3 0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